



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
70年代地下诗歌
遗照

张丽 / 策划 廖亦武 / 主编

Chenlunde Shengdian

策 划:张 明
主 编:廖亦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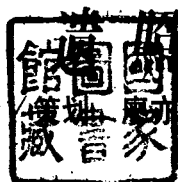
马高明	马 佳	王 捷	王燕生
贝 岭	北 岛	史铁生	田晓青
白士弘	芒 克	老 鬼	张 明
李 楠	陈仲义	陈 超	杨远宏
孟 浪	岳建一	林 莽	周 舵
周忠陵	食 指	徐 晓	唐晓渡
鄂复明	舒 婷	黑大春	彭 刚
蔡其矫	廖亦武	霍信彤	

99
I207.25
179
2

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
70年代地下诗歌

张明



武 / 主编



3 0103 8927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 2

ISBN7 - 5371 - 3291 - 7

I. 沉… II. 廖…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 史料 - 中国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363 号

书 名	沉沦的圣殿
策 划	张明
主 编	廖亦武
责任编辑	张德茂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71253 287038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字 数	320 千字 插图 200 幅 印张 16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价:30.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

楔子

廖亦武

也不知在哪本杂志里，我曾读到这么个场景：一窝老鼠排着纵队，翻山越岭，企图越跨整张大陆。不料所到之处，零星鼠类闻风而至。终于在几个月之间汇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它们义无反顾地诀别大陆，横渡海峡，又翻过一个岛屿。它们投向茫茫大海，终于停止在一片平滑如镜的波纹中。这支梦幻大军兜着圈儿，唱着哀歌，一批接一批地沉沦。在长达数小时的自取灭亡里，竟没有一只开小差的。月亮象一颗巨大的泪珠斜坠在海的眼角，接下来的寂静的黎明预兆着什么呢？沿岸的人类莫名其妙地恐慌。

科学家们经过长期考察研究，到底向健忘的大众揭露了答案：原来这儿是老鼠最原始的家园之一，后因地理变迁，大陆和岛屿的连结、延伸部分缓缓沉陷了。但经历过若干代繁衍、迁徙、变异的现在的鼠类凭什么也寻这种哲学命

题里的“虚无之根”？难道鼠血里也流淌着世代相传的记忆成份？

当我们怀着送葬心情诀别 20 世纪之际，张明和黄峰大概也读过上述故事。于是，他们便动了“捕捉老鼠”的念头。先是由黄峰找到一本 80 年代法国出版的介绍中国朦胧诗的书籍。想按此体例再编一本类似的集子。张明的想法不同，建议搜集当年有影响朦胧诗人的个人资料、照片以八十年代前后发生的“文化大事件”（如星星美展、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等）为背景。历史的、客观的编一本全面、真实反映朦胧诗人的创作、生活、情感、介绍他（她）们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及最后的归宿的书；最好能图文并茂。但苦于资料匮乏，久久下不了决心。张明把此想法讲给了我的患难朋友周忠陵，周对此亦很有兴趣（此时黄峰退出）两人商定在几天后的《中国知青诗抄》首发式上，向我的另一位朋友岳建一求援。擅长历史思考的老岳敏感到这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朦胧诗本身，而要借此深入，打开通往过去的隧道。他慎重地向张明推荐主编人选。（后来我知道这正是张明求援的原因）我想，除了对我的写作、编辑、人际交往的了解外，岳建一更多地凭着一种直觉。他预测世事的能力在文化圈内颇有名声。

周忠陵接连把电话打到家里，虽盛情难却，我却犹豫了半个多月。首先想到的是这事应该由朦胧诗内

部的人来做,80年代初这批人声名显赫之际,我不过是驾着卡车在川藏线上消磨时光的粗鲁的小伙子。我读到顾城、北岛的作品比一般人晚,大约是1982年在《星星诗刊》上。“在北京朦胧诗人和朦胧诗研究者都不少,建一为什么不推荐他们呢?”我想。

接着我想起了开篇讲述的老鼠寻根的故事,虽然人类的寻根没有鼠类那么直观、简洁,但就怀揣最初的家园,从世界各地汇入最终的归宿这一点,却没什么区别。只要我们还有冥冥中的心灵感应,就不存在所谓“自然死亡”,因此我把构成人类历史的最感人的基因叫做发生在时间海洋里的漫长的“集体自杀”。

“朦胧诗”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我以为这本书所展示的不应该是海面上壮观的艺术残骸——时过境迁的诗歌、小说、理论结集,也不应该是被商品观念所操纵的公众普遍认可,更不是掺杂编著者个人想法的历史评传或通俗演义,而应该是一本由图片、手稿、信件、刊物、编目、便条组成的资料集。当然,当事者的回忆、说明、论证及对当事者的采访都必不可少,这样才能一点点填补遗忘真空,部分恢复历史细节(历史肌肉)的弹性。

还原历史,就要心甘情愿地做一条狗腿,在炎热的夏季尽可能地多跑。除此之外,我唯一的优势在于

能够避开历史纠缠（构成那个时代的若干个人恩怨），保持一种客观和公正。“要尽可能找到最初的那窝老鼠，或那个鼠洞。”我想，“虽然这不太可能。但可以开个头，理一条线索，让后面的人知道这类工作该怎么干。”

于是，我决定上京应命。

7月1日抵达北京，90年代诗人陈勇接站，我与他的年龄差距相当于我与朦胧诗元老们的年龄差距。次日，见到张明，我们先前并不认识。此次由他给我安排在京的食宿。7月4日，召开选题讨论会，参加者有廖亦武、周忠陵、岳建一、唐晓渡、芒克、黑大春、马高明、张明、白士弘。徐晓因刚开过刀，未能赴会，但打电话表示全力支持这项工程。大家毫无保留地畅谈了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对我和张明表示充分尊重和信任。事后，芒克率先从家里翻找尘封已久的图片、诗人手稿、画册、杂志，干得满头大汗，使我们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

席终人散，我与本书策划人张明进行了一次私下交谈。他说：“在这次聚会之前，我一直在考虑这本书怎么做。严格讲，我是圈外人，虽然八十年代也曾喜欢过朦胧诗，但我没有资格去褒贬诗人们当年的“私事”，也无权对他（她）们的创作风格、生活经历“说三道四”，而这些恰恰是这本书与其它有关朦胧诗读物的区别。如果找不到一个象你这样能被“当事

人”认可的人做主编，书即便出来了质量也会大打折扣。那样，还莫不如不做，以免被人骂。岳建一推荐你。我找周忠陵把你从四川请来，他们的眼光是对是错，我心里也没底，这需要验证。今天，来的朋友都对你有高度的评价，我知道，这事成了。”

“你在暗中观察我？”

“对，也观察被请来的其它朋友，我发觉你与他们有种血肉联系。你只要答应编，就钻进这个套子中，只有替他们，同时也是替你自己玩命干到底。”

“这本书投资很大，而且不可能一下就‘火’起来，它的商业价值并不明显，你算过账没有？”

“你不用考虑投资和市场，你只须按你的思路编好它，其它是我的事”。

“相信你，我看到过一些由你策划出版的书，品味都很好。其实好的出版商并不是只会追市场，如欧、美有很多受知识界尊敬的大出版商，他们机敏，果断，精干，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我们国家还没有。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吧，书中主角在一夜之间拥有了能买下全世界的金银珠宝，但他最需要的一项是‘伯爵’的贵族头衔，以满足长期受到压抑的精神需要——高贵的复仇”。

“这些话本来应该由我说。其实在国内出版界（特别是“二渠道”中）也不乏一些有思想、有品味的人，至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能起多大作用，我想这不

仅与他们的能力及水平有关，更取决于我们国家的出版政策。如果有一天图书出版放开，象国外一样民间能……好了，我们不谈这些。希望你能马上动手编书。所需费用给我说个数就行了。出钱归出钱，我还是求你，用最短的时间编出最好的书来”。

“但愿这不是幻觉，你和我所了解的其它书商有些不同。”

“用做不太情愿做的书所赚的钱，去做一本愿做的书，也算合情合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偶然性，”我想。“改革开放已经 20 年，有关朦胧诗选题的书也出了很多，却没人去做细节化的工作。大家似乎都在谈论昨天，或在谈论昨天中暗地期待某种契机、某个人、某几个人的出现。还原历史的运作难道 必须依赖于某种偶然吗？”

幸好当事者还不太老。

幸好他们都或多或少保存着能证明青春的原始物证。

一九九九年二月

目 录

- 1 | 楔子 廖亦武
-

第一章 时代之根

- 4 | 书的轨道：一部精神阅读史 萧 萧
-
- 17 | X 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牟敦白
-
- 30 |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张郎郎
-

第二章 平民诗人郭路生

- 57 |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
-

目 录

- 59 | 写作点滴 郭路生
- 61 | 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
- 71 | 心中的郭路生 何京頔
- 80 | 路生与我 李恒久
- 85 | 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崔卫平
- 97 | 食指生平断代(1964—1979) 林 莽 整理
- 109 | 并未被埋葬的诗人 林 莽

第三章 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赵一凡

- | | | |
|-----|-------------|---------|
| 130 | 我的简历 | 赵一凡 |
| 138 | 对赵一凡同志的复查结论 | 北京市公安局 |
| 140 | 纪念赵一凡先生 | 《今天》编辑部 |
| 142 | 鄂复明访谈录 | 廖亦武等 |
| 153 | 无题往事 | 徐 晓 |

目 录

第四章 从白洋淀到北京的诗歌江湖

- | | | |
|-----|----------------------|--------|
| 183 | 彭刚、芒克访谈录 | 廖亦武 陈勇 |
| 195 |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 | 多 多 |
| 203 | 当年最好的朋友 | 周 舵 |
| 216 | 马佳访谈录 | 廖亦武 陈勇 |
| 236 | 白洋淀琐记 | 宋海泉 |
| 264 | 到对岸去 | 齐 简 |

- 268 | 春季白洋淀 甘铁生
- 275 | 昔日重来 白 青
- 277 | 我也与白洋淀沾点边 严 力
- 282 | 林莽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 297 | 生活、书籍与诗 舒 婷
- 308 | 第一九七六年 彭 刚
- 第五章 《今天》的创刊及黄金时期
- 327 | 北岛访谈录 刘洪彬 整理

目 录

- 340| 芒克访谈录 唐晓渡
- 356| 周郢英墓志铭 史铁生
- 360| 李南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 370| 王捷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 379| 〈今天〉与我 徐 晓

第六章 《今天》诗人的社会活动及影响

- 416| 13路沿线 田晓青
- 438| 〈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 鄂复明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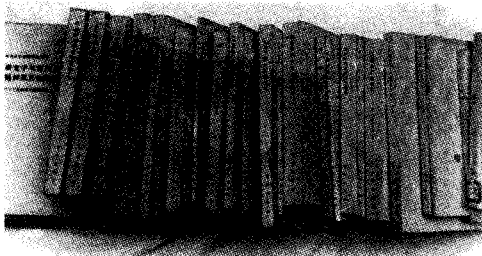
目 录

- 449 | 《今天》编辑部出版发行刊物总目 | 鄂复明提供
- 457 | 星星点点 | 阿 城
- 462 | 星星旧话 | 黄 锐
- 457 | 反省的时代 | 马德升
- 473 | 顾城访谈录 | 王伟明
- 480 | “朦胧诗”问答 | 顾 城
- 485 | 传统与我们 | 杨 炼
- 492 | 蔡其矫访谈录 | 廖亦武 陈勇

第一章

时代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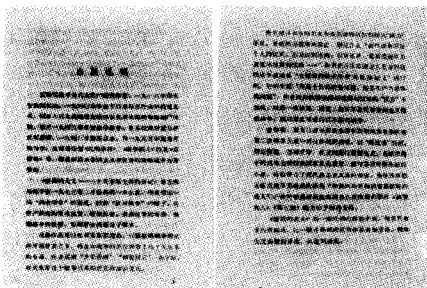
由于资料的匮乏和当事人的杳无踪迹，我们只能把书的副题定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暗示我们只有开掘断代史的能力。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旅美诗人孟浪发来传真，建议“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自由精神文化’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更大的一个历史框架中去做，涵盖三十年，直至当下。也许这是留给本世纪的一个活的‘遗产’。要做大历史，三十年，1949—1979年为一卷；1980—1989年为二卷；1990年至现在为三卷，这将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文献——撞击21世纪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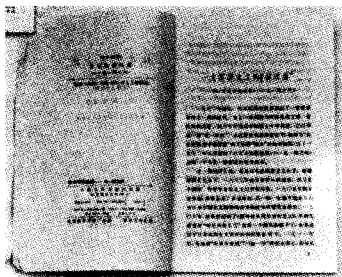
根据《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 1949 - 1979》(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的统计,在此 30 年内出版的“内部书籍”18310 种,其中社科类的有 9766 种之多。

孟浪先生的激情和认识都没错,但本书要做的是展示细节,像考古一样,把挖掘出土的文物——图片和文字材料按时间、事件先后排列,以待后人根据这些“残片”去发挥,放到更大的框架中去做“大历史”。

70 年代的根自然扎在 60 年代,但经过两个多月奔走,我们手里只收集到牟敦白的《X 社和郭世英之死》和张朗朗的《太阳纵队及其他》,两篇当事者的回忆文章也算披露了这一代人最初的思想、文化根须。除此之外,我们还收集到一批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这些当时仅供高级干部和少数党内高



是“出版说明”还是“大批判导读”？



以大批判文章直接代替了出版说明,读者对这种强加于人的语言风格是否熟悉?

级知识分子阅读、批判的苏联解冻时期出版的思想、文学论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同时启迪、滋养了 60 年代没留下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的诗人和 70 年代留下了作品的诗人。

虽然大量的灰皮、黄皮和白皮书都最终散落到民间,但成套的收藏者几乎没有,连当时出版这些文献的三大出版单位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仅存一套,还不敢保证“完整无缺”。

因此,我们首先在萧萧的《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中,选载了与此相关的一章,但愿以后能得到有关当事人的校正与补充。



文革后期出版的白皮书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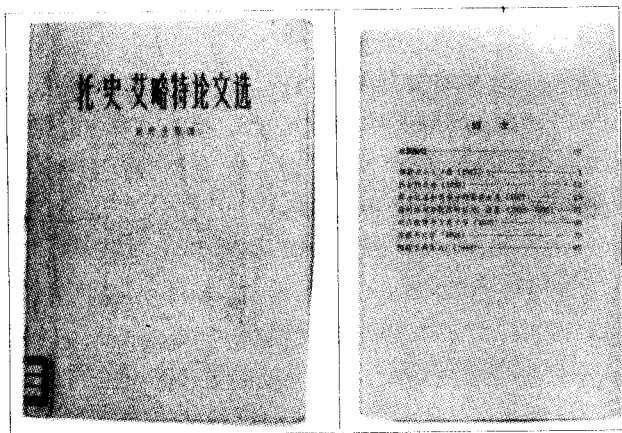
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

萧 萧

人类不可能一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失控阶段，一个曾经是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有了缝隙。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时值 15 至 25 岁的一代人正处在心理学意义上的“断乳—反叛期”，即精神饥渴而青春的能量却急需释放的岁月。而建国 17 年正规教育的戛然停顿正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开始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摆脱了父母师长的管束，又使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一位北大“共青学社”读书会的中学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后又进了正规大学，但她在比较了两种读书生活

后，仍不禁感叹：“我已不适于做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40天，196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40天。”她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做笔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

17年单一刻板的教育，在那一时代的青年读物上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据有些的学者们研究，不外乎：1、马列、毛选（但也只限于单篇和语录的死记硬背）；2、苏、中革命文学作品（自60年代起也不断缩小范围）；3、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但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革命一代，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何为他们狂热崇尚的“革命”。用如此简陋的革命的残篇断简，是远无法解释在“文革”中苦苦缠绕于他们心中的巨大的困惑的。由此，“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与此径庭相向的系统化和异质化的特点。这里，前者是指一代人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有关的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指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现代西方所有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文革”思想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里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60年代和70年代中，出版界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我党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的和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



1962年出版的灰皮书原件封面及目录,直到80年代中期,艾略特的同类书籍方得以公开出版。

关系的解冻,“四人帮”一伙也不得不松动了一下水泄不通的出版界,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自然,久遭禁锢的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正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原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柏元等人在1973年摩拳擦掌地准备重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灰皮书”便是很典型的一例。根据权威性的工具书《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1949—1979》(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的统计,全国这30年出版“内部书籍”18,301种,其中属社会科学的有9,766种之多。而1976年文革以前出版的有差不多4,000种。除去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其中属于西方理论和文学的著作,“文革”前大约有1,041种,而文革

中则出版了近 1,000 种。由于当时的中国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书籍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富于历史嘲讽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下列 40 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程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1. 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12。

2.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2。

3. 列夫·托洛茨基著，齐干译《斯大林评传》，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10。

4. 特加·古纳瓦达纳著，齐之思译《赫鲁晓夫主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11。

5. 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林南庆译《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北京：三联书店，1964，2。

6.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4。

7. 尼·谢·赫鲁晓夫著，陈世玉等译《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10。

8. 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著，北京翻译社译《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4。

9. 埃德加·斯诺著，王广青等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60，2。

10. 马迪厄著，杨人鞭译注《法国大革命史》，北京：商务

印书馆,1964,7。

11. 威廉·L·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12。

12. 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6。

13. Adam Schaff 著，林波等译《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63,11。

14. R·加罗蒂著，徐懋庸、陆达成译《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65,8。

15. 哈晨·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73,9。

16. F·A·哈耶克著《通向奴役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

17. 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译《人，岁月，生活》(1—3)，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964。

18. 爱伦堡著，沈江，钱诚译《解冻》，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19. 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2。

20. 让-保尔·萨特著，郑家璧译《厌恶及其他》，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1965,4。

21. 亚尔培·加缪著，孟安译《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2。

22.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9。

23. 萨缪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等待戈多》，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7。

24. 奥斯本著,黄雨石译《愤怒的回顾》,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7。

25. 杰克·克茹亚克著,石荣等译《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2。

26. 叶甫图申科等著,苏杭等译《“娘子谷”及其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9。

27. 瓦·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带星星的火车票》,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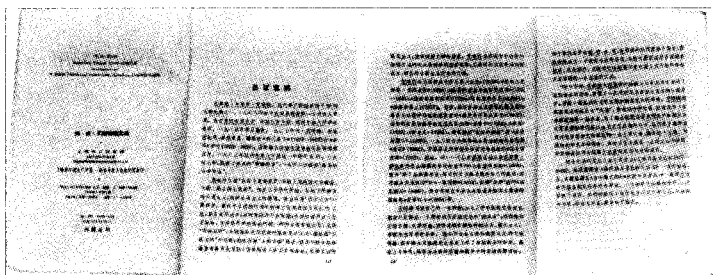
28. 康·西蒙诺夫著,谢素台等译《生者与死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2。

29. 切·格瓦拉著《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71,12。

30.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编译组编《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2。

31. 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多雪的冬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2。

“出版说明”作为一种“批判性阅读”
的导读,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



32.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落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9。

33.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社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你到底要什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34. 维·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译《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0。

35. 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人世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5。

36.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白轮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7。

37. 亨利·基辛格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选择的必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1。

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对上述书籍的作者阵容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蕴深长的提问。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德热拉斯、爱伦堡、索尔仁尼琴、西蒙诺夫……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他们曾都是狂热的革命中人,但他们又幡然醒悟为“革命”的怀疑者与反对者,这一思想历程和这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他们的话语系统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其次,他们作品的抒发特点都在于揭露正义旗帜下的专制和阴暗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对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和对人性、人道的“解冻”的呼唤,更触发了这些红卫兵们的强烈共鸣。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更肮脏、更阴暗、规模更大的斯大林

式的大清洗，这一代人在其亲身经历中不仅深切地体会到所谓“革命”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这一“革命”的黑暗性与残酷性。因而，当他们阅读这些“叛徒们”对“革命”的认识时，就不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是惊世骇俗般的人生大启大悟了。如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所言，阅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书籍时，她“如此明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的政治以外的意义”。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想“共产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最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此外，这些“灰皮书”中的西方历史书籍使久受谎言的迷雾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间洞察了历史真相。比如，《西行漫记》在无意中使人窥见“伟大领袖”的风流情史；《杜鲁门回忆录》使他们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必要》等许多的西方领导人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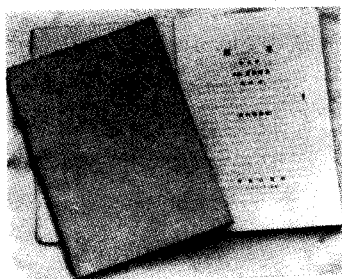
记与理论，第一次使红卫兵们感到他们并不那么面目狰狞，相反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如同蜚声一时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的作者张戎所感叹的：“这些书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静，使我喜不自胜。”这里，千万不能小视了这一代人侥幸获得的这一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在极端封闭的未央长夜之中，这一套由无法比较的谎言构成的童话，诸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极端腐化堕落的西方世界”云云，自有其道德的感召力。而这些书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可供比较和思考的机会，于是，谎言的地基不攻而破，那个信仰的大厦也就轰然坍塌了。另外，阅读《第三帝国的兴灭：纳粹德国史》就更难不震撼觉醒中国红卫兵们的魂魄，因为法西斯的纳粹德国和“文革”时期的红色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一位今天已是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回忆他在“文革”中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用了这样的比喻：“宛如闪电划过夜空”，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运动兴起时一样是一条“人民如痴如醉的拥护”的“毁灭之路……真可谓：要让一个民族灭亡，先叫它疯狂”。他还说：“那一夜的一闪念，对我的以往作了一次清算，注定了我日后对哲史思想史的兴趣。这种自发的经久不衰的理论兴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虽然成就甚微，但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兴趣和思想的权利投入研究，仅仅这一点。”正如同后来被打成上海第一大反革命案“复旦大学胡守均小集团”（其实仅是一个松散的读书会而已）的头头周谷声所言：“对于正处在觉醒中的我们来说，看了这样的书还不从国家体制上去怀疑，去思考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在上述书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数不少的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厌恶及其他》、《愤怒的回顾》、《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也对这一代人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实，这同样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共鸣。20世纪西方现代派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创伤心理。出现在“垮掉的一代”、“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儿子们，面对传统的道德信仰的崩塌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悲观、绝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后被放逐的一代表现出来的心境都十分相似。“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中造成的上述四种关系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处于精神危机中的青年人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异质的酵素更催发了他们的省悟。至于林林总总的西方现代哲学——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到哈耶克的“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论——都在刹那间荡开了他们思想的闸门，放出了多元的自由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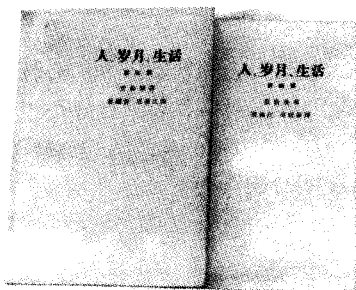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的“灰皮书”“黄皮书”外，另一类由这些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读物也不容忽视。国内女学者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老红卫兵的创立者与联动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插队落户期间组织“读书会”学习的情景：“后来我回北京，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22卷从头读过了几遍。同时，我还翻阅了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中斯大林的黑幕和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引起的

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7000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分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这里，“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等都是流行一时的油印地下读物。当这些红卫兵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时；他们完全用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呈现出他们的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过渡的精神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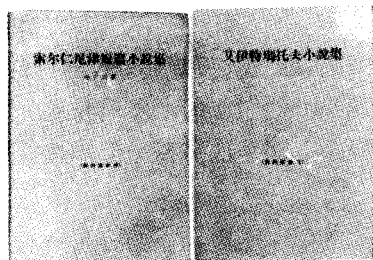
比“灰皮书”“黄皮书”更广泛地流传于这一代人的读书圈中的，是“文革”前出版的数百种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果说前者影响了他们开始摆脱“革命”价值体系的桎梏，后者则帮助他们重建人生、人道情感的世界。在公开发表的数百种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录中，这样一些古典名著和人物形象被值得注意地不时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贵族之家》里的拉夫列斯基，《前夜》里的英沙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卡尔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主角；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雷马克《凯旋门》里的法国医生雷维克；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笔下的奴隶统帅和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将军……这些作品的共同历史背景往往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或



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的思想禁锢逐步打破，于是，作为“解冻文学”标志的长篇小说《解冻》出版并引起轰动，图为1963年我国出版的黄皮书《解冻》。



影响了我国几代诗人、作家的随想式回忆作品，这部黄皮书二十多年后方公开出版。



两位前苏联文学大师作品集封面，他们的写作从现实和人性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俄国革命，这一组人物形象——革命者、爱国者、个人奋斗者——相似的性格特征常常是意志坚强、坚韧不拔却又充满了人道主义和人性情感。这些作品对革命的阴暗面、残酷性都有相当的揭露。在另一方面，又对这一颗颗永远骚动不安的理想主义的灵魂、人道主义的情怀及他们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歌颂。对于处于一场更大的革命悲剧——“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人物——这一代人来说，这些作品对革命阴暗面的揭露引起了他们共鸣；对理想主义的执着激励了他们的苦恋；对人道主义、人性美的不倦追求更激起了他们深长的思考。1968年秋，在上海市重点中学上海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读书圈中爆发过数次关于雨果的《九三年》和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的争论。其焦点之一是：身为革命军高级将领的郭文是否应当私自放掉贵族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后者是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焦点之二是：身为奴隶军统帅的斯巴达克斯是否应当和奴隶主的遗孀范莱里雅有那种卿卿我我的爱情关系？通过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讨论，绝大多数的红卫兵抛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他们的全部同情都倾注向这两位革命将领——郭文和斯巴达克斯那一边。从而，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他们获得了深沉的理性思辨又不失质朴的平民精神；他们被熏染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却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这一代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开始复苏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禀赋气质，就是这样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阅读史中成熟起来的。

X 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牟敦白

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而他已经离开二十四年了。

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人间？是自戕还是谋杀？这是撕人肺腑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澄清疑惑。所留给我的，只有悲哀、愤慨，和永远的怀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岁。他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留给人坚毅、年轻、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闪电，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死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周岁。

然而我认识的郭世英还要年轻，如果算十八岁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时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〇一中著名的杰出学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等到我们彼此熟悉时，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二十岁，一米七八的个子，经常锻炼，身材匀称结实，一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继承乃父智慧的宽阔的前额，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比我年长五岁，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由于他受到众多欧美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的影响，他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实际上他的心地平和，对

一个比他小五岁的无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诚的，热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从《克尔美罗姑娘》到《十批判书》，从《女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我无穷兴趣，给予我丰富的知识，我“攒钱”——将伙食费和零花钱省下来，购买了全套精装本的《沫若文集》。当时有许多学生对郭沫若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偏见。但是只要认真阅读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难感到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结论。由于对郭老作品的偏爱，自然而然要转到对其传人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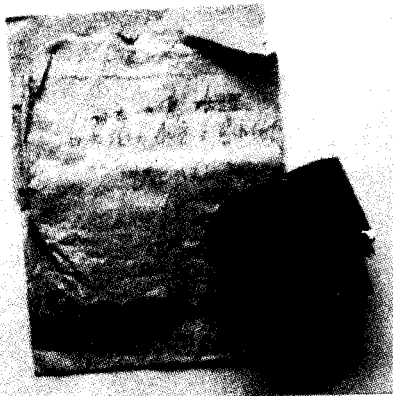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闲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跃进期间的诗著《百花齐放》。这时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我常想，人的命运，冥冥中上苍已做好了安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无法预料而必将降临的，至于是唯心论、宿命论，还是什么玄妙的哲学，我无法解释，也不能用“无巧不成书”这样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生活。在人生烦琐紊乱的生涯中，在主脉络上延伸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组成部分，但与主脉相承，形成复杂的网络，最终汇集成你生命过程的全部图像。我们常说，一个偶然事件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这解释太简单了，“偶然”仅仅是出于自我感觉，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这样比较符合“辩证法”，符合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缘分的——书归正传，郭世英身着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轻，盘子一样的圆脸，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养，

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一定会找个漂亮的女朋友的。（后来方知道，这位女士叫金蝶，是X诗社唯一侥幸到海外——香港——的人。至于此事涉及什么刑律问题，如何东窗事发，祸及郭世英及他人身系囹圄，从未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内情。我想，郭世英出于谨慎和爱护，或因我年龄小，涉世浅，他极少与我谈这类敏感问题）

我径直走到郭世英面前，请他在我刚买的《百花齐放》扉页上签个名。他笑了，年轻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质朴的笑，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我们就这样正式相识。虽然相差几岁，但都感到对方是诚实可交的人。

1962 - 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〇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来一〇一中找我。其人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的公子张鹤慈。他长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这种装束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却引起学校师生们的惊诧。张鹤慈也是本校毕业生，热爱文学艺术。我觉得他多少有些门阀观念，见我如此年轻衣著普通，大概认为



由电影胶片逐页拍摄的三岛由纪夫小说《忧国》，据说经过冲洗放大就能成为一部特殊书籍。我们曾企图把这些胶片透亮观赏，终因字迹太小而罢手（赵一凡收藏，拍摄时间约为70年代前期）

不入清流。张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在校园内招摇过市。郭世英则较沉默，不时有熟识的人和他打招呼，为了替张壮行，他也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春天，万物复苏，清冷的风吹着我们，我感到惭愧，自己学识浅薄，在两位老大哥面前孤陋寡闻。我看着张鹤慈苍白憔悴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觉得他“走”得够远的。我想他一定读了许多书，处于青春萌发晚期极度的苦闷彷徨中。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对郭世英形成一定影响。许多年后，我读了佛洛伊德的书，才明白当时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结”中，内心深处潜在的广泛欲望无从寻到正确的引导，空寂落寞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逐渐地演绎成畸形行动——这是酿成后来悲剧的根源。

那些日子我们接触频繁，互相交换作品，我开始练习写小说、写诗，我是个小诗弟，郭世英、张鹤慈说我写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可以。张鹤慈诗写得不错，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莱尔的神韵。他大胆地讴歌爱情。有人说郭世英也

写诗,这么多年过去,我实在记不起他和张鹤慈的诗句。要知道,在当时的岁月,热爱文学艺术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学的嘲弄,感到同人实在无法与之交谈,于是频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严峻,其实不乏幽默。有次他对我说,抗日战争结束快二十年了,可他们家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后一笑。他说他具有日本血统的异母哥哥不会过日子,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常跑来找老头子要钱。我说,你们过得那么好,应该帮助人家。他很宽厚地笑笑说:“我没有钱。”在一些场合我说话有时不着边际,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记得郭世英不抽烟,但他有只大烟斗,偶尔拿出来也吸几口。有时他和张鹤慈的行为也挺令人费解,他们心血来潮,用英文打字给我寄来一封信,弄得我这个学俄文的初三学生忘纸兴叹,不得不跑到同学邢祖介家请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译,邢先生说那英文实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当时就听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没有希望。”邢老先生说:“不通。”我们说:“通!”这句话如果说纯属因语法错误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处心积虑写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独运。我写信总称呼“世英兄”,对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来说,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恰当的名词,郭世英比我大五岁,今天看四十岁和四十五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当属于同代人。可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人在一起,那几乎意味着相隔“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不否认,我们当时都很幼稚,试想即便二十岁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玑,炉火纯青。除了王勃、李贺那样早熟的天才,在现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只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学,他比其他人更热爱生活,渴望那个时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个真诚

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时下一天到晚喊着要为理想去死的人绝不会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则很难预测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三个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正赶巧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似乎他儿子和我们一样，仅只是年轻人而已。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可他是你的父亲。”我回答。

“血统上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脑袋，都越长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开玩笑。“可能每年都长些才气。”我说。张鹤慈不客气地打断我：“近年来长的都是傻气。”我很不以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声对我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近三十年后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凭吊，郭老最后的岁月案头始终摆着戕于文革的两位爱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记，舐犊之情，至死未泯。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郭民英正提着小提琴从宅内出来，同样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郭世英给我作了介绍，郭民英很客气，很和蔼，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气，但看得出是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我们仅有一面之交，便成绝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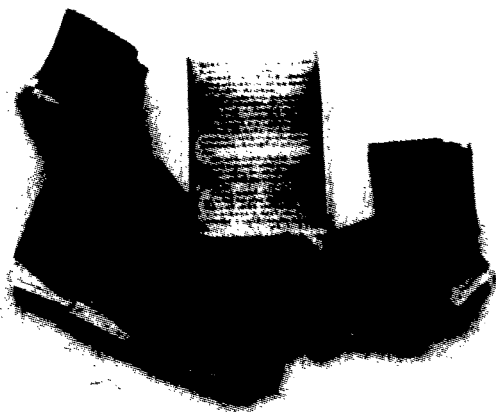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内一座小楼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筑。客厅里挂有色彩浓艳的齐白石“百花齐放”的书卷，到处是书。郭世英的房间也到处是书，抽屉里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妇写的大字，可能是习字所留，字字珍

品。郭世英对我说，我若愿意就拿走几张。我不好意思，因为有的纸上写着勉励郭世英的话。多年后，我在坎坷困顿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遗憾之感。倘若今日我手头有留下来的几张墨迹，恐怕今生再无衣食之虑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辈浑噩至今，混迹商界，事业无成，已属于轻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荣辱呢！

我和郭世英、张鹤慈正侃着，于立群女士走进来。她胖胖的，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十分慈祥可亲，比起我日后见到的若干位显贵的夫人，所谓的修养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握着我的手，我极难想象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软的手竟能写出极其苍劲工整众口赞誉的颜体楷书。

还有一件令我惊诧的事，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窗台和马桶水箱盖上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在人们刚刚度过荒年的1963年，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在学校饿得无精打采，吃掺

手抄本小说在文革中流传甚广，但用电影胶片拍摄的手抄本小说是我们所见的唯一孤本，因为底片和冲洗出来的一页原稿（赵一凡收藏，时间为70年代前期）。



小球藻的窝头和煮白菜根（将白菜根表层剥掉，将芯切成片，放在脸盆内，加糖精，在宿舍的炉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杨北平——杨勇将军之子的烹调技艺，大概源自红军或八路军）。明明饿得遍体浮肿，却还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如果讲实话，则认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讨过“说实话、说谎话”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今天我还是说实话吧，看到深宅大院里的情景，从此我知道什么叫特权。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层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间悬殊也是很大的。我对郭世英说，像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大概回了我这么一句，“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窗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看了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了吗？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我最喜欢的格言。”张鹤慈在一旁说。

我沉默了，安德莱耶夫的那篇小说是写一个坚韧不拔、历经艰险的牛虻似的革命党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显赫的父亲，父子沉溺于久别后的天伦之乐中，在老父乐极生悲的泪水下，为了不使慈父伤心，儿子答应不再四处飘泊、从事危险的活动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亲放心的鼾睡中，儿子悄悄离开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的危险事业，消逝在一片

笼罩在俄国的忧郁的薄雾中……我想，他从事的事业也像雾一样神秘，终生笼罩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师范学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她很文静，富有书卷气，身材纤小瘦弱、短发。然后我们四个人，郭世英、张鹤慈、师院女生和我，又到百万庄去找一位姓叶的女青年。在叶家看到一幅西方画报的插页：夕下的太阳映得海面一片灿烂，船舷边一个女人面对大海，双手伸向天空，后身剪影。大家都赞美她，我为了显示自己不人云亦云，说了声：“没什么了不起。”“噢——你怎么？”郭世英、张鹤慈转向我：“你还不懂艺术！”夜深了，我们到西苑大旅社外面的新疆餐厅小吃部，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街灯照着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动、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们下饭馆，第一次喝酒。

“敦白——”郭世英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X 诗社的成员们。”“‘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张鹤慈解释道。

我十分的冷静，十分的沉郁，实际上我内心和他们一样，对前途、对生活不那么乐观，因为我父母在 1957 年已遭厄运，我已知道人间世态炎凉。对于眼前这些年长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也算为 X 诗社中的一员。后来李岩老太太，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处长（十三处）负责郭世英一案。她夫妇是我父母终生的朋友，对我父亲说：“X 诗社最后几次重要活动，敦白都参加了。”还出示了我们的书信往来。我父亲不相信，身为郭老之子，年长我五岁的郭世英竟写了那么多信，真把我这个无名小子当成个“人物”了。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会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

在这次 X 诗社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对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达香港。

“敦白——”张鹤慈醉眼朦胧：“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不好。”

“所见略同——我也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问题。

“你真会说，有进步。”郭世英笑了，许多天来，他愁云密布，这是第一次绽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没选错朋友，调理出一块材料。大家都笑了，张鹤慈有些尴尬，不过他从此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小孩子了。

鹤慈先生，世英兄已作古，你今日又在哪里？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酩酊大醉。

天气渐渐地热了，我正准备考高中，郭世英和张鹤慈情绪日益消沉，晚自习后到北大找郭世英，他总不在，他的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身边。哲学系一位负责思想工作的教员，三十岁左右，浙江人，当时正在宿舍，硬留下我，从故宫封建土皇帝谈起，一直扯到江南园林风光，不知想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我没有真正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实际上，网已经撒下，就等着收紧了。

6月，一个黄昏，我到北大燕东园张鹤慈家还书，没想到很长时间没露面的郭世英正独自一人在张鹤慈房间里喝酒。

“走，到前面散散步，就咱们两个。”郭世英对我说。

张鹤慈进来了，样子很颓丧。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早因“意识形态问题”被师范学院勒令退学了。

我晚上尚有两节自习课，近来时有旷课，学校当局已对我提出了警告。

暖洋洋的夏风拂面吹来，未名湖畔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大多数学生已去教室上晚自习，在这时季里，你能感到某种青春期不安的躁动。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X’社的人面临严重的局势，也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没有说话，毕竟年纪轻，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彷徨、压抑。对日益降临的危险还缺乏感性认识。同时，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什么越轨之处。

沿着北大60年代留学生宿舍或留学生食堂前的甬道走上假山，四处弥漫着丁香的芬芳，夏风轻轻摇曳树叶。在山上的一个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郭世英开始抽烟。平时他不吸烟，夜色中那张坚毅面孔的倒影显得极其冷峻。

“我们是朋友，我比你年龄大，但，敦白，你是自愿和我做朋友的。”

“我不后悔。”

“真的吗？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后来我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烟，半晌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理解一

个扭曲的心灵，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满博爱与矛盾的羁绊的心灵。

“你不喜欢张瑞芳在《白痴》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欢。那是多么彻底的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声音。我告诉你，那可是真正的艺术。”月光下，郭世英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随后，他沉默了，再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时值1963年初夏。

以后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汉》杂志作了介绍，我不赘言，当然，我“自投罗网”，人生苦涩自此起，我走上艰难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对亡故朋友真挚的崇敬和怀念，我对上述经历没有丝毫的反悔。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脱胎换骨，走上成熟的关键时刻。郭世英及X诗社对于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影响，尚未有人做出正确的分析，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散失，影响不广泛。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记，现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熄灭，客观的社会现实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后又转到农业大学读书。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说过话，特别是我自认为已经步入到普通黎

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恋任何“布尔乔亚”和“沙龙文化”。我没有去找他。我想来日方长,总会见面,那时我将以一个坚韧的、成熟的、深沉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启蒙老大哥的面前。谁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令我终生遗憾的虚幻的梦!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们梅开二度,那么以青年人单纯的热情,同处一叶扁舟之上,又怎么能回避随之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惊涛骇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经愧对朋友在天之灵,近三十年后,我到郭世英居住过的庭园,又无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历历在目,然“黄鹤一去不复返”。面对故友胞,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92年元月—2月二稿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张郎郎

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很快我写了不少诗。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



1993年5月,张郎郎(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赛诗会”上,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卷入了“X诗社”和“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

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做省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虻”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还没敢回家问爸爸，别

添乱了。

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1959年，我上一〇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檐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我努力学规矩，没敢提自己的“犯规诗”，间或写应合之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在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时他主演《过客》。本来，由于我的不逊，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我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诗社”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当时小白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当时他紧张到

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没有错，没有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后来，也有确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着椅子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1960年，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

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不服输，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我从一〇一中转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转学，可能就不会有“太阳纵队”。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人肚子一饿，精神就宽松了，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每天到放学时分，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让我望尘莫及。可见激情出诗人。

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

张新华是我在一〇一中的同学，本来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学一年以后，我们同班了。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是个爱文的军人。张新华

也爱写爱画，一沾艺术就疯，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蜜枣酱。我把半个月饭票给了他，请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过去半个月。

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让人哭笑不得。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

于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语。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毛蓝布的贴身长裤。所以，人们叫他“奥里维尔”——《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

天天他皱着著名的眉头，念一些法文名诗，波德莱尔什么的。他也写一点，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薛宝钗外型。父亲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团时期，和王人美一起拼搏。所以后来，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她内心细腻厚道，口碑一直极佳。王人美晚年，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但他们不知道，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敏感而略显紧张，好写点东西，也似乎过于认真，过于激动，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觉得她有“过犹不及”的毛病。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而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搞壁报。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贝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

画。尤其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沙贝喜欢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他的幽默属于蔫逗，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

张润峰，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但毛病也较多，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只要投奔于我，阿狗阿猫也都收留。其实，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写得很有灵气，也很感人。我觉得他毛病再多，也还是才子，别人说：“那诗准是抄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但没见过原型。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

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在读书上常给

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

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在“太阳纵队”圈子内，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精神领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五

我们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海默家的藏书，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资源”。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者》，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地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撼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

那时，我们读书、谈书成了主要话题。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最近。下了课，我们流连在旧书店。在这里，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让-保尔·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而我家有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

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电影《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张润峰差不多能

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沙龙的人，都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光在小圈子里比试，觉得很不过瘾。还想大展鸿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完后，她诚恳地对我说：“还是要注意些，不然会有麻烦。”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六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在那样的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也有所察觉，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

可能，我们那一圈人，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汇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说：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对不起，您访问的PDF文件不存在，请访问其它资源！

对不起，您访问的PDF文件不存在，请访问其它资源！

治和诗有什么干系？

八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我在章程开始，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那时，我哪里知道，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

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画，诗人们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最终会被社会承认。

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鸽子》。我也画了《丹柯》、《随梦录》等画作。

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张新华也是。

后来加入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有诗、有文，也有画作。

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洛尔迦、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喜欢用比喻、象征，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我画的画，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当然，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就很难贴切。原来在写“太阳纵队”一文时，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这次回到北京，才听说这几年来，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

早几年，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

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可他突然病逝，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至少，我不知道会在哪里。

九

郭世英的沙龙 X 诗社成立，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消息很快传开，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只是同人来往而已，化整为零。所谓：凛冽冬风百草散。

1963 年，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张久兴参军走了，成了坦克兵，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被送去天堂河农场“组织劳动”。秋天，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班有一〇一中的同学巫鸿，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我们也都写东西，也画画、摄影，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妹妹蒋定穗。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搞版画、摄影，二哥蒋之翘写古诗，蒋庆渝写新诗，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那段时间，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

1964 年至 1965 年，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在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登了这张画，准备批判。学校里马上剑拔弩张，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大批。

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我决定独立行动。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校园里没人，我潜入学校体育馆，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做案现场”，做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没人怀疑过我。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获悉，这一条就能判你。对此，我是毫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十

当时，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一次在天安门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说他们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人们当时已经觉得，我的领袖欲太强，老想当“精神领袖”。所以，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不可一世”。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真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艰险。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那时，一方面我年少气盛，也无所谓。另一方面，也照顾不同的人面，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阶段，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朝增兴、巫鸿，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后来，也是在他家

听了“披头四”，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唱片。他父亲进来，脸色就不太好看。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又放那另一面。老天！

那年头儿，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我真是那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

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给我亮出了黄牌。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初生之犊，哪儿听得懂？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郭世英一案里，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最早被放了出来。就跑来找我，自然而然，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

他家成了另一个活动地点，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去甘恢理家，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画画，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往往是咸菜，或生拌大白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别有风味。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连吃带玩。张士彦是老大哥，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每次他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声喝彩。

那个时期，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风格比较像散文，情节性不是很强。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发展变化而来的。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毛

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有次，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他大惑不解，问我：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说这没法说清楚。

十一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品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读《红楼梦》。那是，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问路。

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干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乾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

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他见我这么年轻，颇为感慨。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得到承认，就觉得是“天才”了。于是人们开玩笑，把我也列入美院十大才子之列。

“太阳纵队”的人，也都兴高采烈，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所谓也够“公认水平”了。可见，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如愿以偿”，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弹冠相庆，就此被收编为“御用文人”。是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

那首诗，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而邵荃麟首当其冲。后来才知道，是邵荃麟签发我那首诗的。第二，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我的名字和“坏人”相等。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十二

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当时社会的“格”，人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手抄杂志。

因为，知道这是非法的，所以，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进行。我父母也参加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实在超前了。

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稿

纸和图画纸都行，留下装订线就行了。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耿军、邬枫、张大伟、蒋定粤、张寥寥等。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预感，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那期我记得乔乔写的是回忆童年的诗，那风格比较古典。耿军是漫画连环画，是讲当时恋爱的几大戒律，十分有趣。邬枫和蒋定粤都是抒情散文，比较古典。张大伟是怪异的梦幻录，还有光怪陆离的插图，很受象征派或有爱伦堡的恐怖气氛营造痕迹。张寥寥画的讽刺漫画，画上有河马等等，十分可笑，而河马正好在撒尿，而尿下有一棵小小的树，旁边写“劲松”。

我是用两种不同风格画了两张画，写了两首诗——“对春天不同的解释”，一边是用古典风格，另一边用现代风格。

“文革”一开始，我们马上请蒋定粤把这些期杂志藏起来，后来似乎在她家也不安全了，就转移到理召女士家里去。再后来，她也保不住了，只好付之一炬。

十三

1966年，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组织、秘密聚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我被抓，我逃跑，我被通缉……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逃到南方的时候，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真已离去》。

当时，人们传说我已经逃到了海外，其实我只是逃到了杭州。

后来，我又被抓回来，先关在学校，后来就进了北京市



张郎郎(右)至今也非常喜欢诗歌。1998年11月22日回国小住期间与诗人郭路生合影。

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他们一再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他们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了一个展览会,向人们展示我已经是反动艺术的追求者,已经走了多远。那些东西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

于是,我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领袖”。

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附录:

我想把当事人今天的情况,简述如下,也许会对研究者有用:

一、张久兴:我的案子发了以后,连累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他。他被整得很惨,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二、甘露林：后来上军事外语学校，在军中也被整。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三、于植信：后在天堂河农场改名于铁生，被送到新疆农二师。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写很多电视剧、电影剧本，但不合时宜，未被任何地方采用过，现仍然在写。

四、张新华：现为中国农民美术协会秘书长，自己一直在画画，也曾到匈牙利和美国展览。

五、张振州：现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翻译许多关于自然的电影片，如《动物世界》。没有再写作。

六、董沙贝：现旅居日本，在一所大学教绘画。现在他热中摄影和国画。

七、吴尔鹿：现居纽约和北京。是著名画商，同时也写艺术评论。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美术史硕士。在北京开有画廊。

八、张润峰：听说搞出版发了小财，后开文化书店。周围有文学青年圈子，未见有创作。

九、杨孝敏：因我们案子影响，一直在工厂当翻译，现病退回京，个体翻译工作者。也翻译艺术评论。

十、蒋定粤：现居洛杉矶，是医生。

十一、牟敦白：又名小白，是唯一横跨两大沙龙的健在者。这些年一直在写作。在如《南方周末》等国内刊物，写焦点报导。如《陈銜内何许人也？》（陈小同）。也写地下文学回忆如《X诗社回忆》等。现在内贸部当土木工程师，业余笔耕不辍。

十二、巫鸿：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讲座教授。有时画画，有多部美术史论著作问世。有本关于汉画象砖的论著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奖。

十三、甘恢理：后任中央民革秘书（或副秘书长？），一直想把“太阳纵队”的作品整理、出版出来。不幸英年早逝，未能如愿以偿。

十四、郭路生：现在北京，还一直写诗。住在精神病疗养院里。我们有时接他出来，在我家畅谈往事。

十五、张大伟：在北京实验中学教高中语文。依然坚持写东西，但很少发表。

十六、张寥寥：在北京一文化公司当编剧。他依然在写东西，时为公司拍片用，时为自己高兴。

十七、王东白：身体不好，提前病退在家。

作者简介：张郎郎，美籍汉语作家。1944年出生于延安，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组织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被判死刑缓期，坐牢十年，出狱后曾经商，现主要从事小说及回忆录创作，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汉语。

第二章

平民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强烈而健康的平民风格，使他能够闪电般眩目地突破 X 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楔入时代，以“文革”中特有的手抄本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以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真正、也是唯一带着作品从 60 年代进入 70 年代的诗人，他在中国新诗中的地位相当于惠特曼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平民出身的子弟是没有资格做现代诗人的，因为他们极少有机会接触到本世纪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艺术成果。黄皮、灰皮、白皮等内部读物既然只为特殊阶层所专有，那么能够读到并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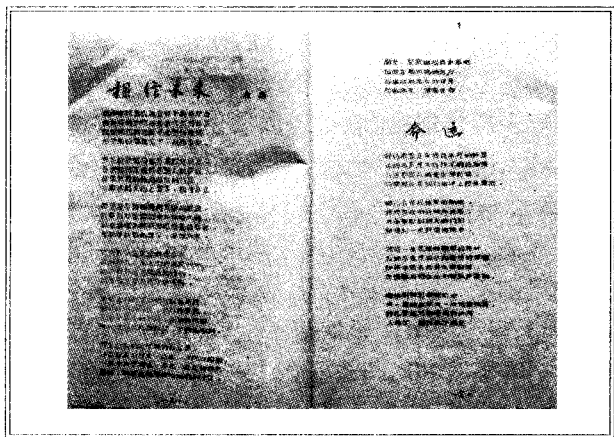
邻居曲磊磊（作家曲波之子）摄于1968年夏天。这是郭路生创作史上的黄金年，那一年，他写了《相信未来》等一批重要作品。



仿其著述风格语言方式、生活观念也象征着某种特权，这种特权造就也毁坏了圈子内的一代。使他们在先知先觉的同时远离中国现实。

我们收集到著名诗人多多写于1972年的短诗《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震惊之余又不得其解，因为70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见过“干酪”，更谈不上“从干酪上站起”了。

郭路生的可贵在于把一种狂飙突进的启蒙意识融入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形式，他的诗节奏铿锵易于朗诵，仅从作品皮肤表面就能使人感触到血管，长期以来，我们像拉线木偶一



发表在民刊《今天》上的食指名篇。

般在风口浪尖上摇摆，我们已经望见了体内还有祖先遗传下来的支配个人情感的血管。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作为人文色彩强烈的时代文本，流传下来可以证实五六十年代唯一一首能称得上是诗的东西，一个见证性的孤本。

在对郭路生同代人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郭路生朴实无华，极容易向朋友敞开心扉。他一点也不隐瞒自己诗歌的来源和构成因素。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他的乐趣不在于独占知识，然后出奇不意地显示自己的“独创”和“超前”，以博得阵阵惊愕与喝彩；而在于共享共求成果，感动自己，也感动他人。追求精神自由是他的天性。相关的话题，林莽、戈小丽、何京颀、

李恒久等人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在这里选载了他们的文章，同时，还选有诗人自己的两篇创作札记。

从林莽先生整理的“食指诗歌创作总目现存部分”里，读者能看出诗人的作品贯穿着两个互否的系列。一方面受“正统”时尚的影响，诗人如当时若干“文学同行”一样，愿意与“主旋律”合拍，写了不少肤浅平庸的应时之作，这证明郭路生也渴望得到社会的公开承认，从而掩蔽自己天性中的叛逆成份。然而，强大的本能是掩蔽不住的，它时时像野兽的爪牙从灵魂深处裸露、戳穿、撕碎企图“走正道”的郭路生。他在写《相信未来》的同时，也写出了《疯狗》。后来，他因神经分裂住进了疗养院。

所以说，郭路生是个天然的，甚至是宿命的诗人，作为常人，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许多人都走过或正在走的追求社会荣誉之路；而作为诗人，他一首呕心沥血之作就可以击溃全部的世俗设计，洗刷所有的世俗污点。而当灵感的巨兽被神明般的精神之光所照耀、所驯服的时候，食指式——殉道者式——的传世之作就诞生了。这种传世之作经过 80 年代漫长的埋没或贮藏，在 90 年代重见天日时，也显示出它内在高贵和外在语感的双重光辉。我和周忠陵曾在北京夏夜的一个现代酒吧里，挤在听众中看食指以质朴的方法朗诵。他站在那儿微笑着，全神贯注，使出全身的劲儿将诗句从口腔内压出来，他的嗓音低沉，但每个字眼落地有声——就是这么一个人，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在变化多端的时代潮流中始终坚持用一种方式、一种活法苦吟，写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青年时代的朋友们送郭路生去山西插队时，摄于北京火车站，其时1968年12月20日，诗人20岁，他在这次赴山西的列车上，创作了不朽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年12月20日

写作点滴

郭路生

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高潮兴起。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火车四点零八分开)，我开始写这首诗。当时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随着火车开动前的那“咣当”一下，我的心也跟着颤，然后就看到车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为户口也跟着落在山西)。

还有一点，小时候我有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妈妈给我缀扣子时，我们总是穿着衣服。一针一线地缝好了扣子，妈妈就把头俯在我的胸前，把线咬断。

我就是抓住了这几个细节，在到山西不几天之后，写成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原来还长一些，几番删改之后，就成了现在这样。

二

那是1967年末1968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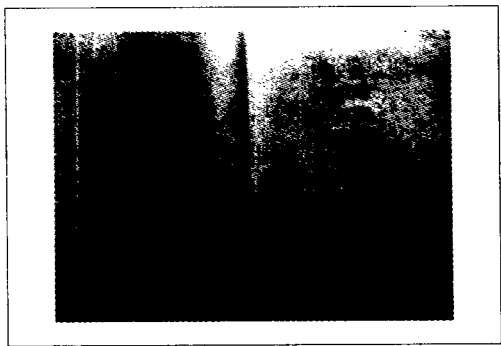
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在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

之后，我的朋友李平分给我讲了他的老家白洋淀冬天捕鱼的情景，加上当时一些政治背景，一经联系起来便有了第二部。

第三部是写“解冻”，“解冻”一词来自赫鲁晓夫时代初期。“文化大革命”中提“解冻”是非常危险的，况且当时我就被定为“右派学生”，准备后期处理的。的确我曾有过考虑，但是我认为第三部构思发自我的内心，我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即阳光的形象）。再加上诗一发已至不可收了，这就是第三部的背景。

记得有个朋友曾私下对我讲，这三部曲他曾经给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看过，被连声称赞是好诗。吓得我及时收敛，但已在许多人中传抄、传诵。

这三部曲曾发在民办杂志上。当时我只能记起第一部，第二、第三部是由振开给我抄到的，当时我对此曾感谢再三。



发表在民刊《今天》上的食指名篇。

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〇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

1985年夏天，戈小丽与杏花村插队的朋友们在张燕林家中聚会时留影。左四为戈小丽。



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浪流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〇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歌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娃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

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时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
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
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
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
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
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
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

大哭。凡是经历过 1968 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
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四点零八都有一班火车把
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
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红得像打蜡
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
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
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
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
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
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
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
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
哭喊着想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的北京”。多少
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
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
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
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
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
未来》是我们全身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
实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
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可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恰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背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姑娘坐在桃花怒放的桃树上，脸比桃花艳。美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能写得韵味十足。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录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斗角、阴险毒辣。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诉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

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会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他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破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玩笑时惯用的诡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的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

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

摆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的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噬，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

会。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的话。他说他身体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在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二十八岁“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二十八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

心中的郭路生

何京頔

1967年夏，一位朋友带我到一个正筹建中的剧团——这是当年由老红卫兵自发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剧团。他们正在排演由郭路生编剧、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的话剧《历史的一页》。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郭路生。

话剧排出后在学校、工厂、机关等地演出了十几场。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剧团解散了。但我和郭路生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更加密切了。

郭路生很希望通过我认识我的父亲，说他一直偏爱我父亲何其芳的诗，很想和他聊聊，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当时父亲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很少有人敢去家里看望他。为此，父亲待人一向是非常认真的。那天，父亲早早地换好衣服，为郭路生准备了红茶、柠檬及一些小食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他。后来，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虽然当时郭路生只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可父亲没有把他当成小孩子，而视他为同辈人，与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新诗的创作、发展，诗歌的韵律、语言等等，对郭路生所提的问题也一一作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1997年冬，何京颀（右二）与李恒久（右一）、郭路生（右三）、林莽（右四）在自己家聚会后合影。

从那以后，郭路生时常去我家，并把他那时写的诗带给我父亲看，记得有《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难道爱神是——》、《无题》、《黄昏》等。父亲每次总是中肯地对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不止一次地劝他学习外文，一门不够，要多学几门，以使自己直接读原文诗，这样才能更直接、准确地体会诗的原意。父亲曾对我说，郭路生有天赋，有诗人的气质和想象力，但他的诗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成熟，而且显得有些消沉。遗憾的是，父亲过早地去世了，如果他能看到郭路生后来的诗，我想，会对他有新的评价的。因为经受了种种生活磨练的郭路生，在长期的观察与思索中，已逐渐把自己的诗同整个时代和人民融为一体，终于成为一名鼓舞了一代年轻人的时代歌手。

没有多久，父亲离开北京，去了“五七干校”。郭路生依然是我家的常客，每星期总要来几次。

他每次来我这儿，都会给我那间寂寞的小屋带来朝气和

活力。我不会忘记他在这里度过的那一个又一个冬天的黄昏与夜晚。我们常常约上一些朋友，大家聊天、讲故事、唱歌、听音乐，每次不可少的节目便是倾听郭路生朗诵诗歌。他把他所喜爱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缪塞、波德莱尔、洛尔迦等的诗歌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都还是一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对这些诗只是略知一二，我也是从那时才真正被他带进诗歌和外国文学的领域。我们用心去听他朗诵这些诗歌。每当他那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响起，我们都会随着他那极富感情色彩的声音，进入诗歌的意境。那些诗像我所钟爱的音乐一样触动着我的心弦，让我全身心地感动。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曾经给我讲过的那些感人的小说，我时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种再也无法找回的气氛，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围坐在火炉旁，窗外是飘舞的雪花，屋里暖暖的，煤火噼啪作响，他总是缓慢地用他特有的嗓音开始讲《简爱》，讲《阿霞》、《安吉堡的磨工》，讲《约翰·克利斯朵夫》……每次直到讲完整部一部长篇，我们才发觉天已经完全黑了，窗外的雪也停了，炉火无声地熄灭了，可我的思绪还久久地停留在那些作品中，仿佛同那些主人公一起经历着人生的悲欢，体验着爱与被爱的苦涩和甘甜。直到他站起来告辞时，我才回到现实中，想起了正处在这个“震撼世界，史无前例”的年代，想起了国家和个人所遭受的灾难。我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能通过读书来暂时逃避，远离一会儿那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的革命造反派”。

那时，凡是郭路生有意无意提到的作品，我都会想法找来仔细读，从此，我心中慢慢建造起一个多彩的世界。他也常常鼓励我学习音乐，可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根本没有学习的条

件,只能靠自己。我借来一些乐谱和音乐书籍,每天给自己订学习计划,坚持练钢琴,学乐理,也读了不少音乐家的生平传记及有关音乐作品的评论。这些,都为我后来能考入音乐学院打下基础。从那时起,我就把音乐作为我一生的爱好追求,并始终为之努力。

我一直认为,郭路生是我青年时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初的思想启蒙者。

也是在那个时期,郭路生写了很多诗:《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等等。他每写完一首诗,总先拿到我这里,抄给我,并给我们一遍遍地朗诵。过后,我总是把它们重新抄在一个大本子上收集起来,而只是有一首诗例外。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几个朋友和郭路生一起到紫竹院散步。当时,他正和一个维族女孩相爱,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障碍。这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我是他的知心朋友,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哭喊着那女孩儿的名字。待他平静下来的时候,给我背诵了一首他新写的诗。年代太久,我只记得那诗的题目好像是《春天》。尽管诗句记不清了,但这首诗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记得,它异常的热烈,而且惊人的美丽,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总想再听他朗诵一遍这首诗,但他几次都拒绝了。我明白了这是一首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诗,是以他的心和泪凝结而成的,他不希望有丝毫杂尘掺进自己最纯的感情中。从此,我再没有对他和任何人提起过这首诗。但那一天带给我的感受却是那样难忘:灿烂的阳光、温暖的春风、醉人的绿草地……那样怡人的春天气息却与他毫不遮掩的痛哭、呼喊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惆怅的难以辨清色彩的画面和一段扯人心肺

的极不协调的乐章。

日子就那样随意又悠闲地过着，但我们却时时被一种无名的不安所困扰，预感着这表面的平静与安逸中正孕育着逃不脱的灾难和不幸。

果然，1968年的“五一”节——一个刮着黄沙的大风天，一清早，郭路生打来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我匆匆地骑车赶到他家，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说，可能要出事，前天他被抓到中央戏剧学院受审，名义上是要他交待和张郎郎的关系，实际上因为他的一些诗已落到江青手中，被认定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黑诗，江青的爪牙们正想寻找机会整治他。这使我想起几天前一个在公安部的朋友劝我最近小心些，说我家在公安局挂了号，已披上“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



高小刚(左)、张小红(右)送郭路生到山西插队时摄于北京火车站。

成为被监视对象，反动诗人郭路生是这个黑组织的头目。我当时听后没有太在意，现在郭路生被抓受审，多少证实了这消息的真实性。虽然我们心中坦然，虽然我们绝没有做过一点儿对国家不利的事，但这样的消息，在当时足以使得我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了。两年来的运动，使我们都太清楚“反革命”是多么容易就被定性的。那几天，郭路生一直烦躁不安。5月3日，几个朋友一起在我家吃饭，郭路生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不好，谁也没有劝阻他。他一直喝到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了。我们想，他压抑了几天的心情借酒发泄发泄，也许能好过一些。可他从始至终没有一句发牢骚的话，而是不停地哽咽着说：“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难过地为他掉了眼泪，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

又过了一些日子，公安局到我所在的一〇一中学调查了我。紧接着，我就被学校工宣队关进了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遭受了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与折磨。他们关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我揭发郭路生的反党、反对“文化革命”的言行，以此来达到整治他的目的。我写不出让他们满意的材料，他们以我态度极不老实为理由，关了我近三个月，一直到工宣队撤离学校，我才恢复自由。

我从学习班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郭路生的消息，得知他并没有被专政机关所押，才让我紧张了许久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这年的冬天，他去了山西杏花村插队，不久，我也和几个朋友去白洋淀落了户，从此我们就改为通信联系了。

刚到农村，由于各方面的不适应，以及在学习班所受的打击，我一度消沉，常常坐在冰冷的炕头上想家，想朋友，想在北

京时大家常聚在我家的小屋。在我觉得最孤独无援的时候，我总会给郭路生写信，诉说我对过去日子的留恋和现在心中万念俱灰的绝望。他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关心我在白洋淀的生活，时时提醒我，不要受消极因素的影响，在和别人交往时要多吸取有益的东西，要善于发掘生活中鼓舞自己积极向上的力量，以此来克制那些消极情绪，并鼓励我要在农村好好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生命。他曾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也很留恋我们大家的那间充满温暖的小屋和钢琴、书籍、娓娓的谈话、淡淡的烟缕，友好和互相谅解的微笑永远是被我们垄断的一种最神圣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总是留恋那房间，就永远也看不到外面晴朗的天空……我们青年人应该永远地扬起风帆，向前看，生活在前面。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让我们一同向未来进军！”另外，他还在一封信中，给我抄来了那首听他背诵过无数遍的被公认为是他代表作的诗歌《相信未来》。在这样的時候，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和这样一首充满信心、力量的诗歌寄到我手中，对我的触动和激励是多么大啊！我说不出地感谢他，感谢他能懂得我的需要，感谢他给予我的真挚感情和始终如一的帮助。那一封封充满诗意的信件和特意为我抄写的、字迹格外工整的诗篇，至今还被我珍藏着。在我人生艰难的道路上它们成为一股强劲的动力，始终推动着我向前。

再以后，他离开农村参了军，有关他的音讯越来越少。直到1974年我从白洋淀转回北京，我们才又见了面。那时候，正是他患精神分裂症病情最重的时期，我见到他时，觉得他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往日和善可亲的微笑没有了。那时，他神志很清楚，在我的台历上写了许多古怪的话。看到这一切，我有说不出的难过。从他那发呆的目光中我看出他某些昔日的神情，

让我感到他依然信任我，关心我。这种情，直到今天想起来，还让我落泪。

每次他从我家离去时我都不放心，总要走很远送他到王府井 103 路无轨电车站。我们默默地站在马路边，看着 103 路无轨车一辆辆开来又开走，直到 11 点钟末班车来了，他才肯上车。虽然这么长时间里，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这沉默却比言语更有分量。我在想，正是由于他正直、敢言、执着的性格和不肯违心说话、做事的做人原则使他得罪了某些人，才被整成这样；我也知道，由于他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磨难，由于他先天的敏感和多虑，使他脆弱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了，才变成了今天这样……他的天才，使他的诗歌流传四方，震撼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可却没有能带给他本该属于他的荣誉和快乐。我为他痛心、惋惜。但我相信，他决不会就这样沉默下去。

1989 年 4 月，在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举办了一场现代诗歌朗诵会。我们终于又见到了隐没多年的郭路生。他仍是一身 60 年代的装束，迈着成熟、稳重的步伐走上了舞台，依然是那低沉沙哑的嗓音，依然是那坚定自信的神情。我们又听到了那首《相信未来》和他亲自朗诵的此诗的姐妹篇《热爱生命》。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没有忘记他，人们仍然需要他和他的诗歌。

我真为他高兴！

从 1990 年起，他基本是在北京远郊一所福利院里度过的。1991 年，我去了美国，又是几年没有见到他。我回国后，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和他有了一些联系。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也见过几面。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头脑清楚，思路也敏捷。从 1993 年出版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我了解到，

这些年，他一直没有停过笔。最近仔细翻看了一遍他在病后写的那些诗。我又一次被深深地震撼了。那沉重的悲怆是另一种美。这其中的内涵，我想，我会比别人体会更深。

去年夏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他家看望他，他说他现在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出一本他的诗集；第二是他要准备写回忆录。我想他第一个愿望在不久就会实现，第二个愿望也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他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努力创造条件去做，而且一定会做得很成功，很出色。

三十年前他曾写给我几句诗：

“让我们的友谊像流水，
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有价值的黄金。”

“让我们的友谊像彩带，
把你幸福的花束系得更紧”

这短短的几句诗，对于我来说，包含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内容。时光流逝，岁月变更，但我心目中的郭路生永远是那个面带微笑、朝气蓬勃、真诚、善良、美好的年轻人，也永远是最可信赖、最可亲近的朋友。我们之间这段纯洁、深厚的友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珍贵难忘。

路生与我

李恒久

我和郭路生是在 1967 年底相逢、相识的。那是一个富戏剧性的场合。

我原是北京第十一中学 66 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生迈进大学校门梦想。作为那个时代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也不例外地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那场运动。

随之而来的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鲜明的“血统论”的内容。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被称为红五类，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知识分子也被打入另册。成千上万非“红五类”出身的中学生被隔离在红卫兵的各种组织之外。

我出身于“资本家”家庭，自然是属于被歧视之列。

漫及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开始后，不甘寂寞、不甘被歧视的我只身加入了红卫兵走南闯北大串联的行列。

1967 年上半年，红卫兵运动的狂飙时期已经过去。一部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从最初的狂热和冲动中冷静下来，在没有出路中寻找着出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一部分红卫兵从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看到了更具刺激性的“为世界革命献身”



李恒久与郭路生(中)、刘孝存(右)合影。

的机会，于是采取各种途径到了越南战场。

1967年8月，我和北京翠微中学的红卫兵傅梅国一同搭上北京开往凭祥的火车，并成功地从隘口越境到了越南。

个中的细节不是本文要说的内容，总之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北京。郭路生从我和他共同的朋友何京颀、伊里·卡尔（民族学院附中的红卫兵）等人那里也得知了此事，他对我们去越南的事情表示了极大兴趣。

1967年11月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百无聊赖中到颐和园去闲逛。在石舫餐厅吃饭时，恰逢郭路生也和农大附中的丁克白、姜克敏及石油附中的老贺（当时他们都是北京中学红卫兵的知名人物）等人在我们餐桌旁等候吃饭（等我们吃完占用我们桌子）。我们当时互不认识，但出于对红五类老“兵”（老红卫兵）的本能反感，我们较劲似地偏要呆到底。双方僵持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郭路生无意中听到我的一个朋友叫我的名字，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是叫李恒久吧，你去过越南，对吗？”我点点头，他笑着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一场

无言的冲突化解了。我从此认识了郭路生。

从那时起，直到1968年6月，我们几乎是日日相聚，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家。可以说郭路生是何老先生最钟爱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色恐怖”中，“焚书”是红卫兵“破四旧”的一项重要内容。爱书成癖的何老先生冒着危险保存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名著。郭路生得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

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相约在北海见面。见面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昨天夜里又写了一首诗。在早春的寒风中，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听他用那沙哑而低沉的嗓音缓慢地背诵了后来曾在一代人中广为流传的《相信未来》那首诗。我被诗中的激情、诗人对未来的期待憧憬以及他那优美的诗句和深深的内涵所感染、所震慑。直觉告诉我，这首诗一定会成为传世之作。我请他马上给我写出这首诗，而他自己却觉得诗中的某些词句段落还欠推敲。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拿到了他已经修改过的、工工整整抄录的《相信未来》。1968年6月的一天，我们也是相约在北海，他还约了他的另外两个好朋友。那天，我等了很久，但等来的只有他一人。他痛苦地告诉我那两个朋友因为政治问题都被抓走了。他还说，“上边”已经派人到他父亲的单位和他学校的“革委会”去调查过他。

在北海公园白塔下那清静无人的茶座上，郭路生把带来的两首诗交给我，告诉我这诗是有感于朋友们的不幸而作。因为把它们放在家里不安全而请我帮他保存。这就是《书简》两首。我读着这两首诗，他缓缓地、无力地背诵，他的眼泪不断地滴落，直至他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那天直至分手，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相对而坐，共同啜饮着内心深处的这杯苦酒。

命运是不公正的，命运带给郭路生太多的不幸、太多的痛苦、太大的打击。读他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太多的苦涩，但这“苦涩里流溢着沁心的甘美/甘美里寻不到一屑俗尘”（《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那两篇诗他后来再也没有收藏。在那动乱的、谁也不知今后将是怎样的日子里，为了使这些珍贵诗篇不致散失，也是由于我对郭路生诗歌的深挚的爱，我把他当时已创作的大部分诗作统统背诵了下来（大约有38首），牢牢地藏在了谁也无法夺去的记忆中。

1968年下半年我和钟阿城、孙立帆等人一同离开北京，辗转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插队落户。当我们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疲倦地披着星光从庄稼地里归来时，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他的诗使我们焕发着精神，憧憬着未来。阿城在读过的诸多诗人中偏爱郭路生，他近于强迫地责成我把我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给他。许多年过去了，我无从得知在阿城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究竟从他热爱过的郭路生的诗篇中得到过多少启迪。

1970年，我终因“反革命”罪而锒铛入狱。入狱后，我曾在单身牢房里披枷带镣度过两年多漫长的岁月。在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炼狱中又是得益于郭路生的诗篇使我获得生存的信念。为此，我真诚地感谢他！

诗人郭路生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1996年元旦，我和诗人林莽、作家刘孝存又来到阔别二十八年的百万庄辰区郭路生家中看望他，看望我们共同的朋友——这位曾经在一个时代里叱咤风云的郭路生。

路生过早地苍老了。岁月的风沙虽击垮了他身体但也磨砺了他生存的信念。他至今仍未辍笔，仍在为中国诗歌的发

展而顽强地创作。

我们合十祝愿他能够健康、再健康一些。

不久前,按照郭路生的要求,我把他由于年代的久远而已遗忘的部分诗作整理出来寄给他,同时写一短信。我把此信亦附于此文:

路生:自年初一别,又几近一年。我和孝存、林莽等人时时在挂念着你,不知你近来身体如何?非常想去看望你。

今天,我为你录下的你三十年前创作的部分诗篇完全是凭着我的记忆,由于年代久远,很难说其中没有差错。但我想,当你重温到你昔日的这些作品时,无论如何是可以触发你的回忆,使你把它们继续完善起来的,因为这里凝聚着你的血泪。

路生,这些珍珠般闪光的诗篇是属于你的,但也属于往昔的一个时代,它鼓舞和激励过我们整整一代人。如今,在静寂中我们尚可以听到它那隆隆滚动着的遥远的回声。

路生,作为你的朋友、特别是作为你三十年前曾经朝夕相处过的挚友,我引为自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别数载、渺无音讯。但我们的心却从未分开过。如今,该结束的已经结束,该过去的已经过去,但愿我们不再被厄运追随。

无数昔日的年轻人竭诚祝愿你的身体早日康复!

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崔卫平

1998年6月10日，我带着《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林莽、刘福春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样稿，在百万庄他自己的家中，采访了这位诗坛传奇人物。

“疯了倒好了”

崔：约一个月前我们见面时，您突然冒出一句：“疯了倒好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郭：疯了就可以面对命运。要不面对命运就坏了。就像那谁呀，徐刚，写革命诗。革命诗在我也走过一段，就像这本集子里的《南京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代》。写这种诗比较苦恼。不写自己，都是外在的。

崔：面对命运也就是面对自身？

郭：对。因为不仅是面对外在的东西，寄托外在的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是自己直接面对人生，这样好一点。所以命运的跌宕，能引起诗歌比较大的变化。

崔：是不是对诗人来说，有些挫折反而是好事？

郭：对。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有波折，感情上有起伏，有撞



崔卫平与郭路生合影

击,才能写诗。像波德莱尔说的:痛苦产生诗。别的不成为诗,只有痛苦才产生诗。

崔:痛苦成了诗的财富,想想这挺残酷的。

郭:只有这样。

崔:或者说谁也回避不了痛苦和挫折,只不过懦夫对待它们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郭:这有一个过程。我开始也不满,理解不了。女孩子把我毁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化为诗。诗出来了,火就没了。

崔:愤怒变成了优美的形式。很多人不能完成这个转换。

郭:那就不是诗人。诗人就是把感情……(略停)化苦难的生活为艺术的神奇。这句话开始不是我说的。有一个人曾

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的诗是“化苦难为神奇”。我后来把这改成“化苦难的生活为艺术的神奇”。

崔:这就是对待苦难所产生的不同态度。

郭:别人想输赢。那不是诗人。有人搞政治去了,多数人默默地咽下苦难求生计去了。

崔:诗人有抓住痛苦的能力,或者说宁愿被痛苦所抓住。失败和挫折对他来说变成一个汲取的源泉。那么是否可以说,诗人即站在失败这一边?

郭:对,是这样。失败时使人感觉到“啊呀,这才是人生。”如果是胜利、是欢乐,就体验不了这些。多多那句诗怎么写的?“因为欢乐我变得无用”。人啊诗啊,得“有血有肉”,什么叫“有血有肉”?就是“有血有泪”。

崔:我在您的诗中经常读到诸如“受伤”、“欺凌”、“嘲弄”,这样的意思,是不是写出来了,就和具体的人没什么关系了?

郭:是的。我就出了这口气。没写出来之前老在那儿想,老有这种感觉。这感觉被装到心里去,只有写诗时才把它吐出来。所以意大利有个疗法叫诗歌疗法,你不高兴了,精神抑郁,就花钱让人给你念首诗。

崔:而您是自己动手写诗。通过这个办法您也原谅和宽恕了别人?

郭:对。但是伤还在。内心痛苦还在。不管怎么的,多少有。这是事实。我觉得人的心都比较嫩,你给他一刀,就是结成疤,这痕也老在。

崔:只要是有心灵的话。

郭:对。没心的人爱怎么着怎么着。那没心的人也不知怎么活的。



1993年，重病后的郭路生摄于精神病院。

没什么意思。

崔：白天也看电视？

郭：白天就看电视。从早上起就看。我就涮碗。干点活，做点事啊，有点乐趣，有点寄托。

崔：最近看书了吗？看的什么书？

郭：电影界于晓阳给了我他的文集，我看了。

崔：那个环境和外面相比怎么样？

郭：不那么乱。吃饭有时

“那儿不是现实”

崔：平时在福利院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整天做什么？

郭：擦地呀，涮碗。涮碗一天涮六遍。那儿的护士比较少，大伙就关在那儿看电视。我对电视文化特别不感兴趣，就看点新闻。电视剧、电影很少看。也没几个台，也没室外天线和有线天线。护士就往那儿一坐，你就那么关着看，也

1993年11月21日，诗人48岁生日时摄于地处北部昌平的北京第三福利院。



间,吃完饭就完了。没别的事。人际关系简单。在外面就是会朋友,很累的,前一段,这报社那报社的记者要瞧一瞧,开那么老远的车,他们不觉得累,我都觉得累。什么还没看呢,还叫谈谈也谈不出什么来。

崔:但是写诗需要一些来自外部,来自现实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下——

郭:在那儿不是现实。怎么说呢,我感觉我主要是因为命运。(现实)对我倒无所谓。(那儿)反而好一点。有一个审视自己心灵的机会。没事呀就考虑自己的事,洞察一下自己的心灵,有这好。在外面没那个环境。一乱呀,应付社会、社交,就不能静下心来考虑问题。

崔:我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恨不能到什么地方躲起来。

郭:现在有啊。有人在山里买房子,住几年,静下心来考虑问题。我真奇怪,你们怎么写东西?”你和晓渡两人都写东西,那也不知怎么写?多干扰啊。

崔:是的,那现在和你在一块儿的人,他们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郭:他们睡觉了。我写诗的时候他们躺在床上睡觉。我就比较安静。一支烟,一杯茶,考虑点事,写点东西,在晚上。

崔:有没有第二天把你写的东西读给他们听?

郭:读过。

崔:他们反映如何?

郭:他们嘛,一般。还可以。他们文化层次比较低,最高就小学生,再就是文盲。

崔:你和他们有没有撞击?

郭:有,也有撞击。他们野蛮、自私,使我吃惊。还有这样

的理论,这样的想法:比如你掉东西在地上了,你不知道。别人告诉你:“你掉东西了。”你去捡,但是蹭的一下被别人捡走了。我说:“给我呀!”“嘿,我捡的,凭什么给你,我捡的就是我的。”这理论哪来的?那儿是这种物质贫乏的地方。我捡的,管你是谁呢。

崔:然后您怎么办呢?您跟他们计较吗?

郭:没有哎。没法计较。他拿我一包烟,我就没烟抽了,要等买了才有烟。

崔:买烟在哪儿买?

郭:家里带去的,很紧张,就这么些烟,在外面一根烟、两根烟、一包烟这都不算什么。在那儿没烟就非得抽。

崔:家里人什么时候看望你?

郭:一个月一次。有时我也托人带些钱往那儿带烟。

崔:一般多长时间出来一次呢?

郭:不一定。这回是杨益平接我出来的,在路上正好芒克打来电话,问他去不去白洋淀。他说:“这不,我正把路生接在路上呢。”

崔:伙食标准怎样?多少钱一天?

郭:160(块)。

崔:160是什么意思?多长时间160?

郭:一个月。

崔:都吃些什么啊?

郭:(笑而不语,不告诉我的那种笑。)

“为感觉寻找一个形象”

崔:请谈谈作为一个诗人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郭:有两项可以成为诗人或艺术家。首先一点呢,要敏

感,要能够和周围产生撞击,“‘啥’怎么回事?”“哇”一下要有震动。在别人就过去了,对诗人,震动以后就存在心里了。第二,存在心里的东西,需要你找到一个形式,把它们透露出来。有些诗人有点感触就写,写感觉,我不赞成。过去有人问怎么写诗,我跟他们说,要首先练意。

崔:练到什么时候才应该写呢?

郭:给它找到一个形象,为感觉寻找一个形象,有了感觉不要忙动笔,搁在心里想一想,想好长时间,直到一个形象冒出来。形象能说明好多感情,能深刻地表现自己的感觉。

崔:您的诗中有一些形象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里:“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还有《受伤的心灵》里的:“不得已,我敞开自己的心胸/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它们让人过目不忘。

郭:你发现了?我自己也比较喜欢。通过形象让人感觉到“这颗心哪”。

崔:也许对心灵来说,能受伤害才能表示它是一颗心。如果不能受伤害,那就麻木了。

郭:对的。那天谁跟我说呢,一个也认识张朗朗的人,说:“你们现在还写诗啊,听上去特别遥远。”这心就麻木了。还是鲁迅写的“闰土”特别好,年轻时眼神骨碌碌转,什么都好奇,有新鲜感、生命感。到后来呀,看见“老爷”一副麻木的样子。这是中国人的命。外国人也一样。

崔:对有些人来说,他要求自己早年的生命与后来连贯和一致,而另外一些人呢,不连就不连贯。

郭:不连贯没法看啊。我写的都是短诗,放在一起连着看

也像看小说似的,有连贯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前会儿聚会,大春这么说的。

崔:您能否能给自己的诗歌分出一个大致的阶段呢?

郭:可以,年轻的时候比较忧郁和优美;后来疯了,写的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比较愤怒、比较火;到后来进福利院,这之后比较沉静,写出来的像《归宿》、《人生舞台》、《午后的生涯》。写这些诗,岁数比较大了,也没那么大火了,比较平静,带有哲理性。

崔:我看了林莽、刘福春编的这本诗集,晓渡是出版社的责编,我“近水楼台”。不过看了《南京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代》、《红旗渠组歌》,还是十分惊讶,您还写过这样的诗!

郭:这些诗没有发表过,这是头一次发表,大春他们说,这些诗革命性特别可以,也特别艺术。

崔: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形式上的探索?

郭:对。比如有意识地使用民歌起一个文学上的过渡作用。“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回是什么“来了”呢?是登上上层建筑。

崔:这个阶段对您先后有什么意义,应该怎么看呢?因为在这之前您写过很优美的诗,在这之后写的诗也很优美,就这么几首。

郭:(略停)时代是那么个时代,一点不合那个时代的拍子也不对,一点不留时代的痕迹也不对。没有了。也写不下去,那不受罪吗?据何其芳的女儿说,一次看团体操表演,发了一张观礼台的票,孩子跟他抢,他说:“别抢,我写一首诗呢。”看完回来说:“真没意思”。他女儿说:“没意思你还写诗啊。”像马雅可夫斯基写了那么多,最后疯了,自杀了,不疯怎么办?

崔：何其芳在您的创作道路上很重要？

郭：新格律诗我是向何其芳学习。他给我讲了诗歌大概的发展、起伏。一开始没有格律，到形式格律，再打破旧的格律，产生新格律。

崔：他谈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吗？

郭：不，是现代，现代诗。他也研究外国诗。我写了新格律诗后，见过贺敬之。他说我的语言有点晦涩。正好我要下乡了，去河北或者山西。他说：“那正好，有民歌，学点歌有好处。”我到农村也写了点民歌。

崔：这个集子里没收进？

郭：民歌没搁进去。以后再增加吧。

崔：您对中国现代诗歌形式的探索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音步的考虑。

郭：我的音步比较整齐，也比较长。对生命起伏的体验只有在节拍比较长、起伏比较大时才能表达。贺敬之写《雷锋之歌》：“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的节奏起伏就不大了。

崔：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所表达的内容本身起伏比较大，音步也就随之——

郭：比较长，比较复杂。老是那么高，谁受得了？没有低沉下来的东西，没有痛苦、沉思，也不真实。

崔：您自觉地向前辈诗人学习，也带动、启发了后来一大批人，在诗歌发展方面来说，您起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

郭：不能这么说。诗要写得像宗白华说的“新诗要像古典诗那么美”这才叫中国诗。

崔：“美”是指什么？有那样多的伤痕怎么还是美的？

郭：写出来就是一种美，是一种力量。写出来就是一种力



1993年11月，部分朋友去病房看望郭路生。左起：
严力、食指、芒克、杨益平、黄锐、鄂复明、李南。

量。

崔：“美”在这里不是表面的意象的“漂亮”？

郭：是深刻。深刻本身就是一种美，是力量的表现。哲理和诗是不可分的。悟出一道理来，是好诗。

崔：您和您后来的诗人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郭：不一样。我不朦胧。

“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

崔：您的作品中有“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这样的句子。

郭：我是有感觉。有这样的感觉：写不出来了。写不出来

1993年春天，《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引起反响。图为（从左至右）郭路生、鄂复明、黑大春、林莽、芒克在作品讨论会上。



我就把它比作“精神的死亡”。

崔：您指的是有关写作灵感的枯竭？

郭：对搞创作的人来说，这比较可怕。写不出来不如死了呢。死了完了，活着干吗？

崔：这种感觉就像水不流动了？

郭：比较惨。当时只想到死。

崔：但是过去以后，会有一个新生的感觉。

郭：有。跨越精神死亡之后，感觉就不一样，写的诗、诗的承受重量与死亡之前就感觉就不一样。能成熟一大块。诗呀，诗的品位格调都高出一大块。

崔：那这个阶段对你来说大约有长时间？

郭：不一样。有时候一年。

崔：这其中的滋味——

郭：不好过。只有干活。拼命地想帮自己考虑这件事，考虑了又特别苦恼。于是不去想这事。玩呀，聊天呀，说点胡话，打点混架，打发过去就是。只有打发。一想就特别痛苦。一两年了一点东西没写，干什么了呢。

郭：惦记着，很苦的。等到一首诗写出来，一首好诗写出来，哎哟，觉得没白过，受的苦也值了。

崔：能具体地形容那种感觉吗？

郭：昂首天外的感觉。

崔：昂首天外怎么讲？

郭：刚到泰山时，感到头顶上都是云，四周围都是云层，等登上山顶发现，哟，天外了，豁然开朗了。

崔：您动笔写时，写下一首诗很快吗？

郭：哎哟，好些日子，好些时间。今年已经写了几首，比较成功的有三首。

崔：您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写诗而进行的，其他的内容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郭：安贫乐道。生活得很简单，就容易多思考问题。写诗的人和当官的不一样。当官的人人来人往，吃啊，喝啊，就这个，还有什么？到哪儿去一帮人迎迎送送，开会啊，住宾馆啊，不就这事嘛。我呢，一杯茶、一支烟，简单的三餐，涮完碗就完了。

崔：可是有些人就不平衡了，和其他人一比……

郭：比什么？“比”就是没找到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创造。比什么？比吃比喝？有什么意思。中国人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就觉得很讨厌。没有意思，到头来有什么价值。

“又要回去了”

崔：您现在心境比较平和了。那么还有没有称得上是来自现实的冲击？

郭：有。比如回家来生活优越一点，吃得好一点，比较懒散一些，不写都可以，看看书啊。再回到那个环境呢，嗨，又要回去了。有感觉。心哪就又变回去了。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我又要回去了。又要回去了。又静下来了。又穿上病人的衣服，又涮起碗来……

食指生平断代(1964 - 1979)

林莽整理

1964年 16岁

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失利,初次尝到了人生的磨难。据好友李平分(郭路生的邻居、初中同年级的同学、诗歌写作上的好朋友)回忆,路生学习一直很好,考试一时晕场造成失误。等通知书时他精神高度紧张,知道未被录取的第二天,他头上突然多了许多白发。

同年在西城区教育局办的文化补习班学习准备下一年的考试。在一次参观美术馆的时候,遇到同在补习班的牟敦白,郭路生又多了一个文学写作上的朋友。以后,又与张朗朗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边缘性接触。这是一些对中国文学发展表现出极大关切的青年,他们相互促进,希望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新潮流,因此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必然的冲突。当时接触的除了张、牟外,还有郭世英、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董沙贝等。

1965年 17岁

2月开始了他的重要作品《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分《波浪与海洋》的写作。这首每节4行,共4节的充满激情与向往的作品,抒发了他人生第一次受挫后的沉郁与不甘于失败的

1951年，3岁的郭路生与爷爷、奶奶合影，从这幼年的血缘和土地里能否猜出孩子将来的命运？

路生周岁照



胸怀。与1967—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后有感而发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给朋友》组成了组诗《海洋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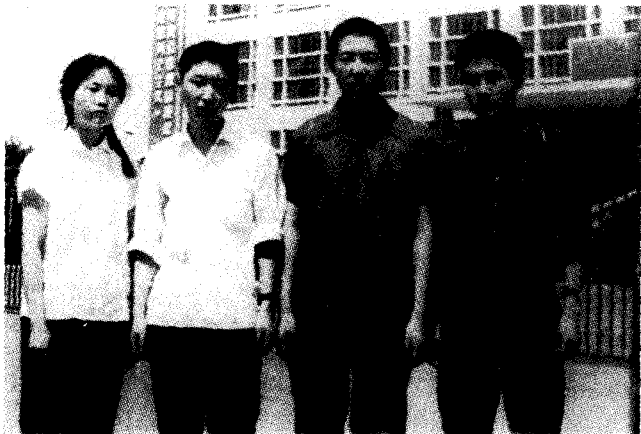
夏天，考入北京第五十六中高中部，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同年加入青年团，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而受到学校批评教育，并令其退团。郭路生很难接受；后经父亲与区有关部门反映，学校才恢复了他的团籍。高中同学刘光辉回忆说：“他为人耿直、充满激情，而且太人性化，况且在那样严峻的阶级斗争年代，表现得有些固执，毫不随波逐流，因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相融，相碰撞，从而损伤了自己。”“高中时代我记得他功课还是很好的学生……但格外地偏爱语文课和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那时就经常谈论普希金、裴多菲的诗……因而受到当时组织上的非议……他的作文还是受到同学和老师的赞

扬,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评。”“虽然‘文革’前社会已对他有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凭着家庭和社会良性方面的影响,‘文革’中他始终反对极左思潮,反对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文革’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与‘红卫兵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的主要兴奋点还是在诗歌、合唱团、话剧团这些方面。”

这一年还写有短诗《书简》(一)。

1966年 18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许多老师被批斗。郭路生因劝阻其他学生殴打教务主任而遭围攻,后又因写诗被批斗。据同学赵强回忆,当时几个班的学生开他的斗争会,说他那时写的有浪漫主义情调的诗是资产阶级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郭路生深深体验了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父亲在运动中被审查、揪斗,为了少惹麻烦,母亲将家中的藏书



郭新生、郭路生、郭京生、郭丽娜兄妹四人合影(从右至左:老二、老大、老四和三妹)。1974年,诗人第一次病愈。



17 岁时的食指

全部销毁，只有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因放在床下边得以保留。郭路生痛不欲生，将家中的灯泡通通打碎，全家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同年 10 月参加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他南至广州，西至新疆，对祖国的广阔疆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1967 年 19 岁

步行串联去延安，行至河北、山西交界处，遇到一个仍在坚持工作的“四清”工作队，他与这个工作队一同工作、生活了一个半月。当时他与队里的老饲养员住在一起，他帮助大爷喂牲口和干其他的农活儿，与老人相处得很好。临走时大爷将祖传的一套《呼延庆打擂》送给了他。

“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派性斗争的混乱中。“红卫兵运动”落潮，许多中学生都处于无所事事之中。作为中学生的郭路生，进入了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黄金阶段。他的重要作品《鱼儿三部曲》(又名《鱼群三部曲》)始写于这一年的冬天。这是一首反映一代青年的失落、彷徨与向往的长诗。

郭路生曾在《诗探索》上发表短文说：“那是 1967 年末 1968 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径一片农

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起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

《鱼儿三部曲》是他最早完成的代表作。那时郭路生接触人很多，无论是“老兵”、“联动”、“四·三”还是“四·四”派他都接触。有干部子弟，也有当时正处于极度压抑中的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大串联中在火车上偶遇“联动”的几位骨干，郭路生与他们一席交谈后，他们就请他加入“联动”，还发给了他一个号码很靠前的袖标。但郭路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文学创作中。当时也有郭路生是“老兵四秀才之一”的说法。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一批人，郭路生抱有极大的同情，他曾对新生说，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他们几乎没有活的愿望。我们有些干部子弟是无法理解的。后来，报纸上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郭路生便叫新生陪他到北京市公安局自首，新生拿了洗漱用具在外面等他。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让他们回家了。

同年创作话剧《历史的一页》。这是郭路生为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剧团撰写的剧本，是一部反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及红卫兵那一阶段各种活动的话剧，1967年夏天，在北京的学校、工厂、机关上演了十几场。此剧由李平分导演，姜昆等人饰演。一次在景山公园演出，观众竟达几千人。戏中郭路生撰写的台词，情真意切，每次都有许多人为之落泪。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颀。何其芳是郭路生最敬佩的诗人，通过何京颀，郭路生拜访了当时已被打成了“走资派、黑帮分子”的诗人何其芳虽处于被审查中的诗

人，依旧非常认真地接待了他。那天，何其芳早早换好衣服，并为他准备了红茶和一些小食品。从此，郭路生经常向何其芳请教和讨论有关诗歌的问题。何其芳去了干校后，郭路生依旧是他家的常客，他与何京颖、何辛卯等一些青年朋友经常在一起朗诵诗歌，讨论小说，交换图书，结成了一个异常活跃的青年文学沙龙。在这其间，他还与作家、诗人贺敬之、郭小川、曲波等有过接触。

除《鱼儿三部曲》外，1967年他还写有《命运》、《书简》（二）等诗作。作为一名中学高年级的学生，郭路生因家庭教育和自我开发，19岁时已成为一位诚恳、朴素、努力向上、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尽管置身“文革”那种特殊的年代，他却并没有加入中学生的各种派别的斗争中，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读书和写作上。当时与他交往的有许多是热衷于文学的青年，如李恒久（他读了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后，深知自己不能超过他，就宣布以后不再写诗。他曾将郭路生早期作品全部熟记于心，在东北插队时广为传播。同村插队的小说家钟阿城曾请他抄录郭路生的诗。时隔30多年，与郭路生再次相聚，他以惊人的记忆为郭路生录下了已遗失了的4首诗作）、刘孝存（北京青年作家，“文革”中因写诗与郭路生相识）、杨桦（当时中学生中传看“黄皮书”的重要传播者，“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成员，现为某公司翻译）、任志明（红卫兵诗人，他的作品郭路生认为写得很好，有的现在还能背诵）、马娅、马佳（曾与郭路生有文学写作上的交流）、陈凯歌（当时也与郭路生有过很密切的来往，他们曾在一起讨论如何拍出意境化的电影）。

1968年 20岁

这是郭路生诗歌创作的黄金年华，现在保留下来的诗作有近20首。其中有他的代表作《相信未来》、《烟》、《酒》、《海洋

三部曲》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一年的5月，因他的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郭路生心中感到十分不理解，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诗歌写作。在他居住的百万庄一带楼群里，有一百多个中学生，因为学校停课大家都闲置家中。有时，许多人便聚在一起听郭路生朗诵他的新作和他喜欢的诗歌。因此，许多人成了他十分要好的朋友。

何京颖在《心中的郭路生》一文中说：“一个刮着黄沙的大风天，一清早，郭路生打来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我急匆匆地骑车赶到他家，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说，可能要出事，前天他被抓到中央戏剧学院受审……”同文中还谈到有人告诉何，说她家“在公安局挂了号，已被安上‘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成为被监视对象，反动诗人郭路生是这个黑组织的头目……虽然我们心中坦然，虽然我们绝没做过一点儿对国家不利的事，但这样的消息，在当时足以使我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了。”“在学习班里，我遭受了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与折磨。他们关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我揭发郭路生的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行……我写不出让人他们满意的材料，他们以我态度极不老实为理由，关了我近三个月，一直到工宣队撤离学校，我才恢复自由。”

那一年，许多思想活跃的青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张朗朗在逃离北京时在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了四个字：相信未来。甘恢理写下了伤感的别离诗，郭路生写下了他的名篇《相信未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

1968年在北京，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纷纷离开北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青春的放逐。郭路生在这期间写了一

批离别诗,如《送北大荒的战友》、《冬夜月台送别》等。

12月20日郭路生也离开北京,赴山西杏花村插队。当年青年学生成批告别北京,凡经历过火车站送行场面的人都不会忘记哭声响成一片的悲壮场面。在赴山西的列车上郭路生开始了他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创作。

1969年 21岁

与21名北京知识青年在杏花村落户。新生回忆当时在公社等待分村时的有趣过程:郭路生在那儿叼着一个大烟斗给等得无聊的同学们讲《皇宫珠宝盗窃案》,讲得所有的人都入了神,郭路生却戛然而止,大家都请他接着讲,这其中就有杏花村的大队长。这之后,大队长便把郭路生一行人带到了较富裕的西村。他和郭路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他认为郭路生是个有学问的人。据同村知青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撰文说:“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现在北京电视台主持“晓鹰热线”的秦晓鹰当时就经常来杏花村找郭路生,还有芦苇、刘会远等。

在插队期间郭路生有意锻炼自己,尽管劳动十分坚苦,但他从不叫苦,他把毛巾绑在膝盖上跪着锄棉苗。一次背砖坯装窑,因劳累失足,险些落入十几米深的窑中。当时10分工值1元1角,有时他能挣11分,那年他挣到了200元。

在劳动之余,他为大家讲中外名著或故事,还经常朗诵他的诗歌。大家经常是聚在伙房里,坐在南瓜上听他的朗

诵。有时也在地头，他一边读，一边与大家讨论诗句中的感觉与他的想法。在那年他试着创作民歌，为写好这种体裁还到处搜集当地的民歌。他写了《新情歌对唱》、《窗花》、《杨家川》、《农村“十一”抒怀》及《等待重逢》等诗篇。

这年郭路生曾到白洋淀考察，想转插到那儿。后放弃。

1970年 22岁

插队生活远远不能满足知识青年的文化要求，杏花村的知青也开始传抄、传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郭路生更是处于文化的饥渴中，春节与知青们在冀村饮酒大醉，经村里兽医救护脱险。春天开始远游。他前后到过湖北、南京，在湖北宋怀云处长住达3个月左右，后分手。

4月10日在南京写作《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这是一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诗歌，它体现了那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另一面。同年，为另几个青年制作的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撰写了配乐朗诵诗《我们这一代》。

这年的秋天，郭路生回到山东老家鱼台县王庙公社程庄寨大队务农。在养育过自己的家乡，郭路生更进一步体验到，中国农村还远远没有摆脱贫困与落后。他曾多次充满深情地向朋友们讲述自己的感受。直到今天郭路生仍保持着那些年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1971年 23岁

2月在济宁入伍。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了野战部队舟山要塞直属通信营设备架设连。这是一支建设和维护有线通信的连队，郭路生是一排一班的排头兵。与同年入伍的大部分战士相比，郭路生因读书与阅历的不同，在连队里属于文化高、觉悟高、进步快的战士。在战友中，他待人诚恳，见多识广，加

之他在一切方面都严格地要求自己，大家都很敬重他。第一年，郭路生被提升到连里任文书。他负责全连的档案管理、行政管理、枪械设备管理和文艺宣传报道等工作。他参加师里的文艺调演，作为要塞直属部队篮球队队员，参加军区的篮球比赛。

据与他同时参军的战友常青回忆说：郭路生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为人宽厚、善良，生活朴素，接受新事物快，有天赋，也很有人格魅力。在接触中我们发现，他对新诗很有研究，当时贺敬之的诗集《放歌集》中的许多诗他都会背。他成熟较早，在性格上、思维方式上都与众不同。他抽烟很多，每月的6元津贴费，都买了七八分钱一包的烟。

这一年他在部队写了《新兵》、《架线兵之歌》、《澜沧江、湄公河》等反映部队生活的诗。

1972年 24岁

这一年郭路生由一个活跃、积极向上的青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年底，大弟新生去部队看他，已发现其状态不对，每天精神抑郁，以烟为食。

究其原因，至今说法不一。一说，“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二说，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有“文革”初期他因写诗而被审查的材料，后被说成“5·16”嫌疑；三说，诗人恋爱受挫……总之，诗人敏锐的精神已无法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而跌倒在社会生活的尘埃中。

1973年 25岁

2月退伍，在家依旧抑郁寡欢。到北医三院就医，专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几个月后初步病愈，不久进通县

北京光学仪器厂团委工作。

这年写有《壮志篇》初稿。秋天为写“红旗渠”，只身去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中钱被偷，再次发病，流落街头。二十天后被人送回北京，重入北医三院治疗。

1974年 26岁

夏天病愈后入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在单位一内刊工作。该内刊停刊后到传达室工作，后做杂工。无论做什么郭路生都十分认真。在打扫卫生时，他总是跪在地上一点一点认真地打扫。他说：我干不了研究工作，不能让研究所白养活我，我要尽力干活。所领导多次表扬他的这种工作精神，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为写焦裕禄而赴兰考，在郑州火车站钱和郑州亲友的地址均被偷，按记忆寻找亲友家又迷失道路，身无分文，再次发病。夜宿火车站，饥饿待毙，乞食度日。父亲向各地亲友挂电话寻找，不知其下落。二十余天后，神志忽然清醒，记起新乡技校有一叔伯哥哥，便用腕上尚存的手表换了五元钱，用四元买了去新乡的车票，剩下的一元买了碗粥，一盒香烟，便去了新乡。不料又坐过了站，下车连夜步行几十里，清晨抵达新乡。堂兄见其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十分惊诧，陪同他回到北京。郭路生再一次入住北医三院。

1975年 27岁

依旧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他完成了长诗《红旗渠组歌》的创作。

他的病情较稳定。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1976年 28岁

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垮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

郭路生向胡耀邦写信，反映李立三一家被放逐山西运城的生活状况，希望中央给予落实政策。后郭路生与李雅兰赴山西接回了李立三夫人。

创作《我不相信这样的讯息》、《最后一班车》、《敬酒》、《大风大浪不可怕》等诗歌作品。其中《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名《有这样的婚礼》)，陈凯歌考电影学院时曾以此诗为面试的朗诵作品。

1977年 29岁

撰写《陨石雨的神话和传说》、《无题》。

1978年 30岁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进行，中国文学也迎来了它的新时期。现代诗歌以最先锋的姿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批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涌现出来。“伤痕文学”、“朦胧诗”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郭路生再次焕发了一个诗人的创造力，开始了他的创作的新阶段，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同他的本名一样，这也是个很有意味的名字。他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于是，他索性用“食指”为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

1979年 31岁

创作《相信未来》的姊妹篇《热爱生命》。在刊物上发表早期代表作《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烟》、《酒》、《这是四二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郭路生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

并未被埋葬的诗人

林莽

一、简短的回顾

从某种意义上讲，食指（郭路生）并不是一个被埋葬了的诗人，但他却真的被埋没了许多年。

在那个时代，那个红卫兵运动刚刚退潮后的时代，面对一代青年政治热情的高涨与失落，作为歌者，他曾使无数人之为之倾倒。他是那个时代的歌手与象征。作为诗人，新诗潮诗歌的第一人，他的确被埋没了许多年。但这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悲剧，正如许多人那样，生命之光敛于珠宝的体内，它的光芒并没有消失。在生活之路上，每一个与之相遇的人，都会受到他光芒的照耀。

食指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8年11月母亲在行军的路上分娩，故取名郭路生。他自幼聪慧好学，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善良、质朴、刻苦读书的好品德。

食指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于北京。十五岁开始诗歌创作。五六十年代的生活与教育，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的身上至今仍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影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食指正就读于北京五十六中



林莽近照

高中部。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使诗人的心灵开始了真正的觉醒。

他站在时代的背景上，唱出了同代人心灵的挽歌《海洋三部曲》与《鱼儿三部曲》。

他以哲人的睿智写出了那个时期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诗歌式的预言《相信未来》。

《烟》、《酒》、《给朋友》、《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篇为一代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无法选择的必然命运，记录下了最为真挚的情感。

当然还有《寒风》、《灵魂》、《愤怒》、《命运》等等折射出时代精神的诗篇。

1966—1969年，食指由山西插队转回山东老家务农，而后再到部队参军。这是他最为痛苦的一段心灵历程。理念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使他一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1972年，在部

诗人谷一海(左)黑大春(右)
去病院看望食指时合影。



队当兵时,因强烈的精神刺激而导致精神分裂。自此食指陷入了长期的病困中。

“文革”后期,因病痛的重压,食指一直处于生命与情感的再度寻求中。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一切都出现了转机,食指于1978年写出《疯狗》、《热爱生命》等好作品,它们标志着诗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1979年,他的作品《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诗刊》上发表。这是他的作品首次公开问世,除了朋友们的祝贺外,并未引起诗歌界的广泛注意。

以后的十年中,诗人在治病与疗养中辗转生活,每年都有

一两首新作问世。他写得严肃认真，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而这十年，正是中国诗坛异常活跃的十年。食指不为新潮流所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落叶与大地的对话》、《愿望》、《诗人的桂冠》、《向青春告别》、《人生舞台》、《归宿》……这些凝重而深情的诗作，让我们再次听到了凝结着历史回声的歌唱。

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相信未来》。收录了诗作18首。

1992年春天，《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引起了较大反响。北京作协诗歌委员会召开了他的作品讨论会，首都十余家报刊发表了这一消息。

一个被埋没了许多年的诗人正逐步得到他应有的荣誉。

二、时代的哀歌——《海洋三部曲》与《鱼儿三部曲》

如果我们称食指为“红卫兵诗人”，这无疑偏狭的，但却是一种有益的提示，因为他的创作正是发轫于那个时期。他的《海洋三部曲》和《鱼儿三部曲》（原称《鱼群三部曲》）是那个时代的一曲激荡人们灵魂的哀歌。

《海洋三部曲》第一部分写于1964年，那时食指刚刚十五岁。诗句热情而透明，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诗人的影子。1964年诗人初中毕业，学习一直名列前茅的他，因考前沉入文学的追求中，在升高中的考试中落榜，初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恼。于是他在诗中说：“喧响的波浪/深沉的海洋/引我热烈地追求/使我殷切地向往/因为我有时惆怅/所以我喜欢大海宽阔的胸膛/……这是因为我能力寻常/所以我渴望大海的巨大力量……”食指在挫折中用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勇气。这首题为《波浪与海洋》的短诗竟与两年后一代人的痛苦经历融为一体，这也许正是命运的有意安排。

食指在辍学的一年中，认真地读书写作，并结识了一批有志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青年，朋友间的交流促进了诗人的成长，而迎接他的便是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乱，它使一代青年空前的政治热情几乎在转瞬之间陷入迷惘。一首题为《昨日的我已不是我》的诗作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突然就遇到了
这样冷酷无情的霹雳
将我寄寓着理想的花园
轻蔑地化为灰烬

一代青年满怀热情投身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在阵风之中突然改变了模样，一切都如残破的枯叶，谁也无法估测未来的前景。理想的破灭使人们陷入了自省之中。

食指正是在这样的時候，从失落与惆怅之中站立了起来，为一代人的灵魂而歌唱。我们在长诗《海洋三部曲》中窥见了诗人的向往、迷茫与并不甘于沉沦的渴求之情。

诗人在第二部分《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中以幻想与激情沉落后的叙述进入时代与生命的内心，似乎这种遭遇使诗人比他人更清晰，他以基督受难的语调劝戒着人们：“不、朋友，还是远远地离开/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我噙着热泪劝你/去寻求灿烂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诗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韵律，那有如发自大提琴的沉静而略带哀伤的调子，有如海浪般一次又一次涌现着：

开船啦——
失望的风呜咽地呼唤
止不住的热泪扑向沙滩
把几行新踏的脚印吻舔



1997年盛夏，郭路生在白洋淀的船里准备下水游泳。左为诗人林莽。

呜咽的风啊，掀起滔天的浪
精神的船啊，划着意志的桨

……

深情的嘱托，絮絮地诉
乘海风随帆船飘零
待海风再把它送回岸上
也化作令人心碎的桨声。

——《海洋三部曲》之三《给朋友》

如果说《海洋三部曲》第一部分《波浪与海洋》是一位天真少年刚刚进入热血与激情时期对海洋博大精神的向往，那么第二部分《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则是红卫兵运动落潮后，一个青年诗人徘徊在退去潮水岸边的歌唱。这声音仿佛是一个独行者的箴言，哀婉、深情、劝戒中渗透着提示与请求。它汇聚了那个时代的声音。《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分《给朋友》又分

为三小部分，诗人说：“少用眼泪叙说悲欢/多用诗歌赞美勇敢”。在送别的象征场景之中，诗人表现了正面临生活选择的一代青年：“握住桨的手臂是那样弱小/远航者的行装衣著/又是那样朴素单薄”。是的，等待人们的道路并不平坦：

这夜，深远的夜空星光暗淡，
狂风在命运的海洋里扬起了狼烟。

……

像秋风卷起一片枯叶，命运的海洋啊！
你将把这条船带向何方，
是地狱呢？还是天堂？

那是一个命运未卜的时代，到处都充满悲剧的情调，诗人正是站在这种背景上发出了希望、劝戒与预言的声音。正如布罗茨基评论阿赫玛托娃时所讲的：“至少来说，面对这场遭遇，阿赫玛托娃看上去要比大多数同代人准备充分……用现代的话说，她把它内在化了。她简单地把它看做一个令人颤栗的民族动乱，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灾难都将与日俱增……”



1997年，左起：田晓青、郭路生、林莽。

…诗人是天生的民主派，这不仅因为其地位飘忽不定，而且是由于他们总是对整个民族语言铭记在心，因而注定与悲剧生来与共。”我引用这段话形容食指当时的处境是因其有些相近之处，当然对于“文革”的动荡无法用“准备充分”来评论我们的诗人，然而凭着艺术家的洞察力，食指准确无误地表现了那个时代。

同年，食指写成了另一首长诗《鱼儿三部曲》（原名为《鱼群三部曲》）。他谈到这首作品时讲：“那是1967年末1968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想到了在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

冷漠的冰层里鱼儿顺水漂去，
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既然得不到一点温暖的阳光，
又何必迎送生命绚烂的朝夕？！

这是不甘于沉默的心灵的发问，回响在迷惘的心中。诗人发自心灵的吟唱充满了苦涩的深情。

为什么悬垂的星斗眼泪一样晶莹？
难道黑夜之中也有真挚的友情？
但为什么还没有等到鱼儿得到暗示，
黎明的手指就摘落了满天慌乱的寒星？

当朦胧诗的众多作者还处于蒙昧时期，食指已写出了划时代的篇章。他成熟而深入的语言，无疑已远远走在了一代人的前头。

一张又一张新春的绿叶。

无风自落，纷纷扬扬，
和着泪滴一样的细雨，
把鱼儿的尸体悄悄埋葬。
是一堆锋芒毕露的鱼骨，
还是堆丰富的精神矿藏，
我的灵魂那绿色的坟墓，
可会引人深思的遐想……

这是面对历史发出的纯洁而透明的声音，心灵的颤栗来自诗人身心的体验。

两首长诗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其中《海洋三部曲》写作时间较长，手法变化也较多；《鱼儿三部曲》则把象征手法与具体而真切的抒情融为一体。诗人流淌的泪水和沸腾的鲜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两篇永恒的祭文。同时也确立了诗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他正是那个在冰层的潜流中追求精神的鱼儿，也是命运的海岸上孤独的徘徊者。

三、沉郁中的光辉命题《相信未来》及其他

1967—1969年是食指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一个背负着历史十字架的灵魂是沉重的。《寒风》、《灵魂》、《愤怒》、《命运》、《烟》、《酒》……从这些诗的内容选择上我们看到诗人的思考。

在这个时期，他的诗歌《相信未来》与《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相信未来》是诗人发自深心中的呼唤，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诗人高傲灵魂中质朴的希望。无论是“美丽的雪花”“失望的灰烬”；无论是“凝霜的枯藤”“凄凉的大地”；还是“摇曳的曙光”、“孩子的笔体”都为那个特殊的时代镌刻着墓碑、昭示着

希望。我们从中听到了诗人纯洁的灵魂发出了智者的声音，看到了相信未来的人们：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是一篇预言性的诗歌力作，当“文革”的迷雾使人们陷入迷茫与混乱中，人们为命运哀叹之时，食指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光辉命题照亮了前途未卜的命运。

诗的前3节(原为4节，删改后为3节)抒情笔调隽永、深切而催人泪下，“用孩子的笔体”“摇曳着曙光”写下“相信未来”确是神来之笔。

1978年诗人又写下了此诗的姊妹篇《热爱生命》。诗人将自己坎坷的命运中生命的支柱献给了这个世界。它们体现了食指低声吟唱中生命的光辉。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表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开家园，奔赴边陲乡野时一首送别的诗篇。

1968年底，食指和当时的一代青年一样，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凡是经历过那种送行场面的人，我想都会永生不忘。远离父母、远离亲人、远离家乡，对十几岁的刚刚步入人生的青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惶恐、希求与别离的痛苦之中，当时的北京火车站告别的泪雨与声浪确实如海潮般有卷走车站的力量。这不是一般的分离，也许就是永别。同学、朋友各奔东西，父母儿女远隔数千里，到底何时能相见？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文革”的那些年月谁也无法估测，也许这就是我“最后的北京”。对那些牺牲于云南、东北、内蒙等地的知识青年来说，对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说，当火车开动的一瞬，那就是最

后的生死之别。也有许多青年，当他们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再回到养育自己的城市时，一切都恍如隔世……

诗人在赴山西插队的列车上开始写这首作品，他对亲眼目睹的这一悲壮场面，进行了速写式的记录，诗写得简捷、清晰、情感真挚。全诗三、四节写得更为突出，在一片离别的声浪中诗人突然沉入冥思：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1968年，食指已经成熟地应用多种手法表现一代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的诗是艺术品，也同样是历史的见证，他为那个时代的宏大的历史事件留下了最直接的记述。

食指那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大都在一种沉郁的调子中诉说自己的愿望，他仿佛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身份——为民众背负苦难的苦行者。希望的破碎、爱情的失败、人生道路的迷惘构成了60年代末期的社会病。人应该如何生活，诗人在痛苦地寻求着“怀着苦思不解的沉重/奔向十字架神秘的阴影”。诗人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在《愤怒》与《命运》说：

我的愤怒不再是泪雨滂沱，
也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怒火，
……

但是在我未完全成熟的心中，

愤怒已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

《愤怒》

我的理想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梨；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我愿为野生的荆棘高歌。

《命运》

在沉重的心灵重压下，诗人最终疯了。在他的心中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与当代的一些青年诗人们相比，这似乎过于古典，但食指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时代精神是纯粹的，透明而晶莹。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抒情诗歌才为一代人所崇尚。即使今天读来，它们依然会唤起人们心底的激情。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没有时间性的。一个好的诗人，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写作，同时，他所表达的一切也属于人类共同的情感。古往今来，千秋万代我相信人的情感深处一定是共通的。

四、人生舞台上的歌唱

纵观食指的创作历程，深切地感到他是以生命，以血在抒发着人生的体验。他是人生舞台上的一名伟大的歌手，虽经历了精神崩溃与理想的幻灭，“但终于我诗行方阵的大军/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当今天，诗人的生命走到了草木知秋的年岁，生命之火依旧在不熄地燃烧着，它依然：“……一点一滴地品味着/稍有些苦味的人生”。从惊涛骇浪中的歌者到生命本能的吟唱，食指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创作历程。

对今天，食指的诗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读他的作品，许多人都有一种沧桑之感。是的，食指的作品处处回响着

那个时代的声音，他曾是一代人的代言人。正因如此，在现代诗歌史上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那个没有诗歌的年代，他写出了影响了一代诗人的诗歌作品，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

食指的写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66—1969年是他辉煌的青年创作期。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划时代的作品，填补了诗歌的空白，完成了开启一个诗歌新时期的重要使命。这之后他也在不断地写作，但从作品中缺少新的发现，加之疾病的折磨，诗人挣扎在痛苦的生存中，这之后一段近十年的停滞期，1978年“文革”结束后，诗人又写了《疯狗》、《热爱生命》等名篇。

从此，诗人每年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一两首很有价值的诗歌作品。经历了精神死亡后的复苏，食指的作品变得澄澈而凝聚了，他的诗歌作品也走过了不惑之年，《向青春告别》、《人生舞台》、《归宿》、《诗人的桂冠》等等诗篇依旧是当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潜在着沉重的历史负罪感。

从文体上分析食指的诗歌作品，他基本上采取传统的抒情与结构方式，他自称：“我的诗是一面窗子，是窗含西岭千秋雪。”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过：“就诗歌的本身而言，食指的作品是传统的，无论是语言、音韵及形式都是严谨的。他的每一句，每一行都经历了反复的敲打。他的作品非常适于朗读，节拍有力，意味隽永，充满了激情。”食指的诗歌作品自始至终是坚持自己的风格的，尽管现代主义的诗歌之风影响了众多的诗人，但食指不为表面形式所动，他更注重诗歌内在的质地与精神。在每节四行的基本形式中，他确实做到了“窗含西岭千秋雪”。

食指之所以受到同代诗人们的敬重，更重要的是他诗中所体现的艺术指向。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让我们感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并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他的后来者们，朦胧诗的早期作者们正是沿袭了这一点，才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从这一点上讲食指诗歌作品确实是划时代的。

聂鲁达讲：“诗是内心的召唤；祈祷文，赞美诗是由此产生的，宗教的内涵亦然。……今日的社会，诗人仍然属于最早时期的祭司一类。”食指正是如此，他以真诚的内心召唤向我们叙说，又如一个独自承受痛苦命运的苦行者，他对诗歌的虔诚是发自生命的，因此他说：“诗人的桂冠与我毫无缘分/我是为记下欢乐与痛苦的一瞬。”食指以质朴的人格对待生活，对待诗歌，即使在多年的患病之中，他依旧是一个谦和而温厚的朋友。

今天我们评价这位在人生舞台上歌唱了三十年的诗人，也如同我们近些年的许多工作一样，只是在清理历史的旧账。中国近代的艺术史，似乎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历史，许多艺术家在他本该得到应有的那份荣誉的时候，被无情的现实剥夺了这种权力。“文革”后的十几年，在纷乱的争执与前进中，在补偿了老一代的旧账时，又不得不欠下新账。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对食指有一个较公允的评价，这本来应是十年前的事。

今天我们评价食指，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应该指出，中国当代诗歌，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风浪冲击之后，在它逐步走向新阶段之际，我们提倡食指这样的创作精神：以纯净的精神质量抗拒那些哗众取宠的花样翻新；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人格

抗拒那些急功近利的市侩作风；以一丝不苟的严谨的创作态度抗拒那些自欺欺人的伪劣作品。食指如同我们所敬重的诗人们一样，无疑是我们的光荣与榜样。

几经生活的磨难之后，食指已成熟的灵魂正渐渐沉静下来，他说：

在人生舞台上我匆匆行走
谁知已走过了四十五个年头
人世的冷暖给了我一颗心
虽外表寒酸、但内心富有。

（摘自诗人新作《人生舞台》之二）

在北京第三社会福利院，食指已经度过了四个春秋，在这种环境中他依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生存着，写作着。

命运

食指

好的荣誉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情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漂泊。

哪儿去寻找结实的舢板，
我只有在街头四处流落，
只希望敲到朋友的门前，
能得到一点菲薄的施舍。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专棵，
如果命运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特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地燃烧着，
挣扎着爬进那喧闹的江河
人死了，精神永不沉默！

第三章

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赵一凡

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包围了北京朝内前拐棒胡同11号的一所民宅，逮捕了残疾人赵一凡，并从“罪犯”家中搜出大批的“文学罪证”。据若干当事人证明，这批“罪证”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包括解放前后的多种报刊；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资料；“文革”大字报、标语、红卫兵战报、演讲稿及各及各类文献；思想、文学通信；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作为地下读物流传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其数量之巨，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为世所罕见。

目击者称：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辆130

型国产货车将那堆积如山的“社会资料库”满载，然后运走。

令赵一凡锒铛入狱的罪名有两项，一是参加“第四国际”反革命组织活动，一是“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所谓“第四国际”纯属莫须有的玩笑，却弄假成“真”被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致使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株连，至于第二项罪名，不过是传播“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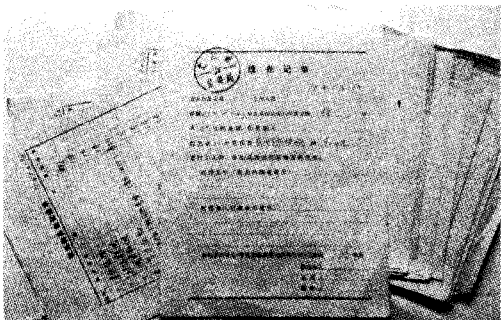


赵一凡遗照

在这里，我们首次公布由赵一凡自己撰写的简历，赵一凡父亲、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平生先生在儿子“东窗事发”后，写给单位党支部的检讨，以及1978年12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给赵一凡的“复查结论”。人们可以通过种种历史物证，走进赵一凡和与之息息相关的时代。

现在被视为平淡的自由阅读是多么来之不易。

许多年过去了，除了一个极其狭窄的过时的文化圈，赵一凡的身世几乎不为人知。当年在他的病床周围出没，经过他的手、他的嘴读到和理解到“禁书”，或经过与他的通信从封闭的炼狱底部豁然开朗的人们，有的已成名，有的已出国，



1975年冬，因一项子虚乌有的“第四国际纵队反革命案”，赵一凡突然被捕，并被关押了近两年。他收藏的资料随之被装满三辆130汽车运走。图为部分搜查记录。

有的已改变初衷，踏踏实实地过普通日子，而赵一凡依旧故我。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办了公司，念叨着要赚一笔钱去养穷困潦倒的朋友和诗人，结果被累坏了。1988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虽然他早就留下遗书，指定一位朋友继承当年平反之际从公安机关失而复得的三车资料，但不谙沧海桑田的保姆却将这笔非同寻常的遗产当废纸卖了——幸好老鄂和徐晓及时赶到，从一座时代的文字矿藏里，取出了与自己血肉相连的部分——《今天》文学杂志的全部资料。据说，这些东西还不及赵一凡收藏物的1/50。

又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经多方寻访，得到并复制了这批仅存的、一再劫后余生的物证，但赵一凡的故事是无法复制的。这是多半个世纪，或近百年以来最动人的收藏家的故事，也许将来有人会据此构思一部小说，但是对历史



从赵一凡家中搜出的诗稿清单。

细节的还原却排斥任何想象的主观描述。

在这部以赵一凡的遗产为主要构架的书中，赵一凡已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块广阔的土壤，一条绵长的线索，一把在黑暗中向四面八方蔓延的根须。也许在时代大地上，最醒目的总是几棵遮天蔽日的大树，人们赞美它们，以它们作为经风雨、见世面的象征，却忘了它们起源于土壤。不管现在或将来，还将继续受益于土壤，受益于土壤下的根，这些根像一只一只筋络密布的手，互相紧握着，牵扯着，探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根和土地都没具体的名字，但它们比树更永恒。正如文字起源于历史，假如某一天，某个诗人，某部诗集或小说消失了，有关这一切的历史也会消失吗？

不会，因为人类必须依据历史创造精神性的东西。

仅从本章陈列的原始资料里，就能看出赵一凡人缘极为

庞杂，一个不能直接下地走路的人，却比那个时代所有脚力强健者先期抵达自由的境界，他的家几乎成为当时各种异端思想和民间精英集聚地。他不仅收集和抄录过赵振开（北岛）、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岳重（根子）、郭路生（食指）、孙康（方含）等人的诗，《九级浪》、《第二次握手》、《芙蓉花盛开的时节》等地下小说，还保存有大量的哲学、政论作品。其中的《出身论》曾为遇罗克事件的平反提供了有力佐证。

“文革”因“四人帮”的垮台而告结束，文化的解冻时期也随之降临，《今天》应运而生，受到广泛的好评。但读者不知道，这份代表着当时中国最高水准的文学刊物却是赵一凡的孩子。在盛行文字狱的蒙昧时期，诗人们如惊弓之鸟，到处藏匿或大量销毁自己的作品，以免招来杀身之祸，而赵一凡却默默地保存着那些极为珍贵的手稿，等待着在某个春暖花开的好日子归还给主人。据当事者证明，至少《今天》前4期或前5期的绝大部分稿件是赵一凡提供的，有些诗稿连作者自己都遗忘了。

此外，赵一凡还拖着病残之躯，加盟《今天》的幕后工作，主持刊物校对和联系读者。

北岛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他们这一代为重见天日默默地准备了十年。然而能够证实这话的只有赵一凡。因为这个人为了收藏这个民族的精神史，付出了不止十年，而是全部生命。

这是他的本能，是他生命而为人的使命正如渴望得到最高的艺术桂冠是许多诗人的本能。

我的简历

赵一凡

我叫赵一凡。男，39岁，原籍浙江义乌。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文化程度相当大学。

我1935年出生于上海。我3岁时，日寇侵华，上海沦陷，父母因工作无法照顾我，设法把我送回浙江义乌老家。不久日寇侵浙，又逃回上海。逃难路上我正出麻疹，又传染了猩红热、白喉等小儿传染病，接着并发肺炎，最后又转成肺结核、骨结核。从4岁到10岁，卧石膏床6年，到1945年才基本痊愈。

1942年，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我父亲因参加左翼文化工作，不能存身，上海党组织送他到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上海治病。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我的病已基本治愈，可以行动了，就由组织上帮助我们化装成难民，通过敌人封锁线去苏北根据地找到父亲。

我到根据地后，日本就投降了。不久，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大举进攻根据地，我随父母的机关从苏北、鲁南、胶东根据地步步撤退，1947年秋到大连。这几年的生活基本上是战争环境，行军生活。

我自幼生病，没上过学校。到大连后，我12岁，插班到小学五年级。这时大连的中小学学习苏联，十年制，有劳动课。我因参加劳动（抬木头盖房子）过累，主要还是因为几年行军生活上过敌人封锁线时一晚上要急行军七八十里以上），身体亏了，所以上学三个月

后，我的骨结核又复发了。这次病比第一次更严重，由于病灶压迫神经，下半身麻痹，两腿完全瘫痪了。大夫都说治不好了，不用治了。但我自己还是比较乐观，卧石膏床九年，从1948年一直到1957年才终于把病养好，能起床了。只是两腿瘫痪至今尚未完全复原，走路还得拄双拐。

我因长年卧病，只上过三个月小学，其余都靠自学。我4岁得骨结核后大夫让卧石膏床静养，不许起来。但4岁的小孩正精力旺盛，躺不住，父亲就买来一盒看图识字片教我自己看图学字以消磨时间。小孩记忆力好，很快就把一盒2000字学会了。父亲又给我看小人书，以使我能安静躺着。当时上海小人书品种很多，我看了总有好几百种，开始只看画，要别人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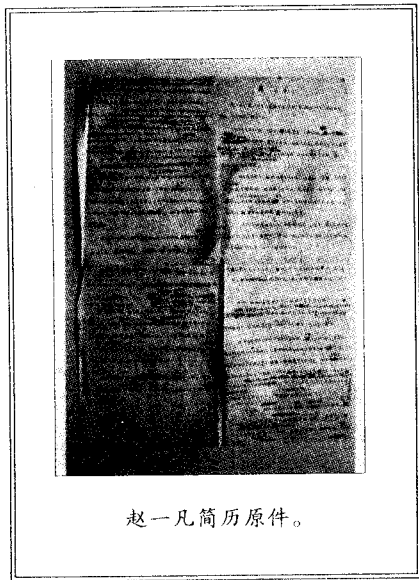


幼年赵一凡和父母合影。

讲；后来发现小人书的说明文字也看得懂（因为有了看图识字2000字的基础），就自己看了。渐渐的小人书也不能满足了。又拿父亲书架上的字书来看。从6岁起就看了《西游记》，因为它的故事很吸引我，加上《西游记》的故事早已从小人书中看熟悉了，所以看起来竟然没有多大困难。遇到不认识的字，上下文一串，也能看懂它的意思，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很多字都“秀才认字念半边”，如唐僧我念唐“会”，牛魔王我念牛“鬼”王，但是我知道“僧”字是和尚的意思，牛魔王是牛精，念白字并不影响我理解书中的意思（这样，以后的许多年中我一直是个“白字先生”，最后，我下决心读了一本字典，才彻底纠正过来）。这部《西游记》我反复看了许多遍。此后，看别的书就不困难了。在10岁以前，我就看了许多书，包括

《鲁迅全集》这样的大部书。因为看得多，阅读速度较快，一本六七百页的长篇小说，一天就可看完。由于从小看书多，所以我比较喜欢文学，尤其喜欢儿童文学。13岁时在养病中曾编写过一本《新少年故事》，在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在大连时，学俄语的空气很浓，我也从广播俄语讲座中自学了几年俄语，依靠字典帮助能阅读一般俄文书报。



赵一凡简历原件。

我第二次病愈后，本来打算上大学，曾去人民大学文学研究所听过一学期课。当时文字改革出版社新成立，工作缺人，要我去工作，我就未上大学。从1959年11月到1962年底，在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部儿童读物组做儿童读物编写及注音工作。当时以临时工的名义进去的，一直没有转正，1963年机构精简时，把我裁减回家。当时文改出版社还有几个临时工，他们都是工作半年，在机关里加入了共青团，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给我转正。我自己当时也不懂这些，没有想到要求转正。

1963年至1965年，我在家里替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做校对工作。校过的书，较大的有《红楼梦》、《聊斋志异会评会校会注本》、《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几十部。由于我对校对工作比较熟练，错误率低，所以校《现代汉语词典》等要求校对质量高的书时，我担任最后校次。

此外，从1963年起，由于我的团组织关系转到街道，所以在街道上做团的工作（街道上有学生团支部，成员多为因病休学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担任过团小组长、支委、支书等。因为一直担任团干部，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后，1973年才离团。

从“文化大革命”后近十年来，我一直在家中没有工作。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深感不能再这样呆下去。我现在除了因骨结核后遗症下肢瘫痪未完全恢复，走路尚须拄双拐外，身体还是不错的，每天工作、学习都在10小时以上。除了体力劳动外，一般脑力工作及某些坐着工作的体力工作，我都能够胜任。我自幼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现在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迫切希望参加革命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尽一份力量。希望有关领导根据我的情况安置适当工作为感。

我能够做的工作有：

一、出版社。我比较喜欢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读物比较熟悉。对汉语拼音比较熟练，拼写拼音读物、注音、打字都可以。一般编辑儿童读物、通俗读物、字典等工具书的工作我都可以担任。另外，对校对工作比较熟练。

二、图书馆或资料室。我自学过图书分类法，对图书分类编目工作比较熟悉。我也比较适合资料工作。过去学的俄语，因多年不搞生疏了，但如工作需要也可以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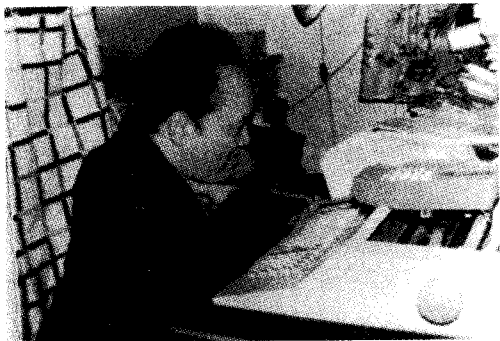
三、机关、工厂资料室、情报室的暗室。我自学过暗室工作。一般冲洗胶卷、洗印放大照片可达专业水平。特别是对资料、图片的翻摄比较熟悉，曾帮一些工厂、学校搞过展览图片的翻摄工作。（附翻摄样品）。

四、某些工厂。我养病中经常帮别人制作和修理半导体收音机、万用电表等。所以无线电工厂的工作我也可以做。

以上几项是我比较熟悉、适合做的工作。此外一般脑力和坐着的体力工作我也都可以做。

（根据年龄推算，此件写于1974年）

80年代以后，赵一凡也曾涉足商界，以图实用赚来的钱资助诗人、作家的宿愿。



我的检讨

文改会党支部：

我现在书面报告我儿子赵一凡被捕审查和我对他教育不够的问题。

上月28日晚上，我在熟睡中被叫醒起来，见有民警和便衣公安人员数人进来对我说，我对儿子教育不好，我儿子赵一凡犯有反革命性质的罪行，现在被捕了。这事由他自己负责，但要我同他划清界限。过了很久，给我送来的经公安局盖印批准“搜”赵一凡的证件和搜去的赵一凡和人来往的信件，以及笔记、记录、照片、手稿和各种书籍等的清单，要我以家长名义签字。

这事对我如同晴天霹雳一样震惊！这些天来，我正在用心学习四届人大文件，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不料阶级斗争的敌人就在自己儿子身上出现！这对我是何等沉重的教训！

我是共产党员。对于犯有反革命性质罪行的儿子，当然要和他划清界限。我完全相信和期待我们的专政机关会把他的犯罪案件审清楚，使他无法逃避，彻底交代，重新做人。

春节这几天，我反复思考自己对儿子教育失败的问题。我是读师范、做教育工作的。我搞的是什么教育呢？现在看来，实在是以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这在我过去对待赵一凡的看法上表现得清楚。

赵一凡在幼儿时睡石膏床六年。在青少年时期又睡石膏床十年。我现在才明白断定，他这两次睡石膏床都是他受封建修教育很深的时期。

赵一凡两岁时，在上海因为看管他的阿姨不小心，从

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大概脊骨受(损)伤了，瞒(着我)了不说。知道此事的邻居大姐也帮着瞒住，怕我们解雇那阿姨。这大姐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见到我)(才)像受(着)良心责备似地给我说出真相，使我慨叹不已！(此事我也不忍向赵一凡和他母亲说清楚了)。赵一凡(从桌子上摔下来)摔跤以后，不久出麻疹，转肺炎，又转肺结核，都好(了)以后，发现脊骨痛。(拍)照了X光片，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癆，我们也就相信了，当做骨癆用睡石膏床方法治疗。(小儿不肯睡石膏床，挣扎要起来，只有讲故事和给他看画书，才能哄住他。我们就物色识字和会讲故事的阿姨陪他)(我们后来请到一位做过小学教师的阿姨)。在六年之久的睡石膏床时期，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各种小说。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四卷本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加以宣扬(传为美谈)。实际这六年里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后来，他病好了。在日寇投降前夕，他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介石)匪帮进攻解放区，我们由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严重脑病，到大连治疗。不久(我脑疾稍愈)，我又带病回解放区工作。赵一凡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这学校有劳动课)。上完几个月之后，一次参加抬木头劳动课，由于抬的木头过重，赵一凡受伤未愈的两节脊(椎)骨突然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失去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文艺小说(他找到新旧、中外的文艺小说都看)，也学会俄语。在他十二岁时，还编写了一本《新少年故事》，在大连光华书局出版，我听到还高兴呢。其实，这十年是赵一凡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赵一凡能起床用双拐(走路了)行动之后，我和他才在北

京住在一起。我要他去北大文学系学习。他说，他已去人民大学旁听过一学期课了。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新成立缺人，把他作临时工招进去，编辑了二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在这时也加入了共青团。后来文改出版社取消，我没有像别的临时工一样给他转正，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这个团专(管)收有病休学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的团员。病好后介绍他们去参加工作(从此赵一凡和青年学生来往多了)。当时景山公社的负责人也答应给赵一凡介绍工作，但不久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这时，我就靠边站，以后关“牛棚”，解放后不久，就到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从“文化大革命”起，我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他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和青年接触更多了(他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往多了)。1972年，我回文改会工作以后，赵一凡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和家人离开，我更不大好管他了。我只见和他来往的人太多，劝过他多少次警告他，要他改变状况，这太浪费时间(我说，来往人多了，一则耽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再则，阶级斗争复杂)，而且人多了，良莠不齐(会发生问题，上当。他都不听)，难保不出问题受牵连。我还没有想到赵一凡本人会参加反革命行动。这也是我麻痹大意的过失，果然现在出了问题。但是我只口说，没有对他进行具体措施，今天出了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但是，看来这不仅是人家害了他，而是他自己可能早已有些变质了。这也反映我管教不切实。儿子犯罪，我是有责任的。

赵平生

1975年2月13日

(赵一凡父亲、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原秘书长赵平生的检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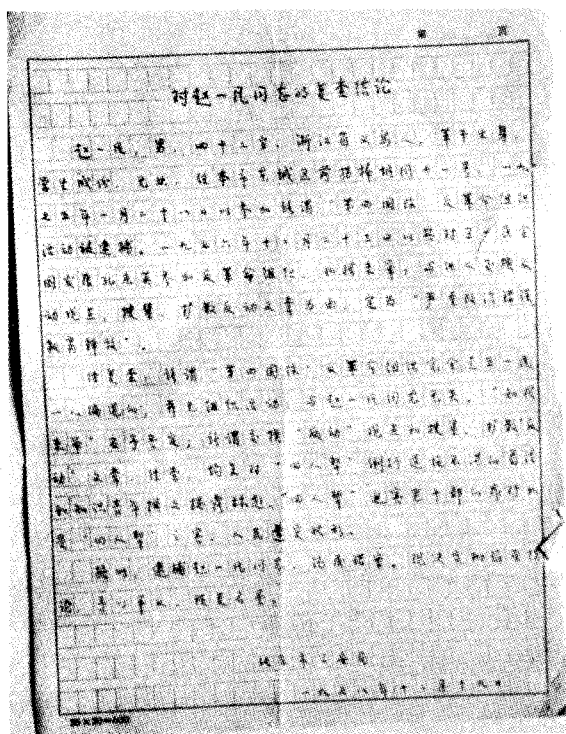
对赵一凡同志的复查结论

赵一凡，男，43岁，浙江省义乌人，革干出身，学生成份，无业，住本市东城区前拐棒胡同11号。1975年1月28日以参加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组织活动被逮捕。1976年12月23日以其对王一民企图发展孔庆英参加反革命组织，知情未举；与他人交换反动观点，搜集、扩散反动文章为由，定为“严重政治错误。教育释放”。

经复查：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组织完全是王一民一人编造的，并无组织活动，与赵一凡同志无关。“知情未举”应予否定；所谓交换“反动”观点和搜集、扩散“反动”文章，经查，均系对“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的看法和知识青年撰文揭露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和受“四人帮”之害、人民遭灾情形。

据此，逮捕赵一凡同志，纯属错案。现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公安局
1978年12月19日



1978年12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为赵一凡平反，并如数归还三年前搜去的三车资料。图为赵一凡亲笔抄录的“复查结论”。

纪念赵一凡先生

1988年7月9日,《今天》杂志创始人之一赵一凡先生积劳成疾,在京病逝,终年53岁。

赵一凡先生,浙江义乌人,1935年生于上海,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病长达15年,其间只上过3个月小学,以自学修完大学文科课程。

赵一凡先生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为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担任校对工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和整理。在文化专制期间,他保存了被称之为“地下文坛”的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于1975年初,以“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的罪名被捕入狱,两年后平反出狱,所抄资料幸得发还,相当部分已为作者所遗失和忘却的诗篇,得以在《今天》杂志上重见天日。作为《今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他在与读者联系和资料收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赵一凡先生为中国新诗歌的崛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7月14日上午,市东城残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赵一凡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今天》编辑部在京的同志们们在灵前献上了一只鲜花圈,挽联上写着:

一凡兄 千古

《今天》编辑部同人
及生前好友敬挽

赵一凡先生的遗体
火化后安葬在北京南郊
太子峪陵园。

一凡，我们的好兄
长，安息吧！

《今天》编辑部

纪念赵一凡先生

1988年7月9日，《今天》编辑部同仁及一凡先生生前友好、北京各界、朋友敬挽。

一凡先生，原名王凡，1932年出生于天津，自幼随母居沪，后随父居北京，又随母上高中并毕业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

一凡先生是《今天》创刊元老，也是《今天》的旗帜，是《今天》的灵魂。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为《今天》的创刊和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今天》的同仁们一起，为《今天》的创刊和成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凡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今天》杂志，并担任主编。《今天》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凡先生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今天》杂志，并担任主编。《今天》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凡，我们的好兄长，安息吧！

1988年7月9日，赵一凡逝世。
图为《今天》编辑部发的讣告。

北岛(赵振开)在赵一凡墓碑后痛心疾首。



鄂复明访谈录

廖亦武等

时间:1998年8月2日上午

地点:北京劲松

人物:鄂复明,48岁,《今天》杂志编委。

采访者:廖亦武、张明、周忠陵、陈勇

问:随着时过境迁,许多历史事件在人们眼里变得模糊。但历史毕竟存在过并决定着现实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向历史资料的保存者表示敬意!从六七十年代,其中经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80年代文学的繁荣,到90年代,文化的变革反反复复,但源头是不会变的。国外和国内在收集整理这种源头上,都要花相当大的功夫。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今天碰见你,算种缘份吧。

答:我打断一下。所有这些资料收集,乃至整理、保存都要归功于赵一凡。他死后家里(在国内)没有亲人了,我算是抢救资料。

问:据你所知,赵一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那个时候怎么对收集文化资料产生兴趣?

答:我是在他死后才从遗留的资料中看到的。一凡是个

不爱张扬的人，生前极少向别人谈及他的过去，是朋友们把他描述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那篇简历实际上是他为申请工作无意中留下的，但他的精力和工作能力确实是超人的，办事极其认真，从不拒绝做一些小事，他是可以称之为“圣者”的那种人。

问：你是说，一个是他自身条件限制，身体残废，使他能静下心来收集这些东西。另一个是他家庭的熏陶，懂得这些东西有价值。据你了解，他那时想没想到过收集资料为了将来这一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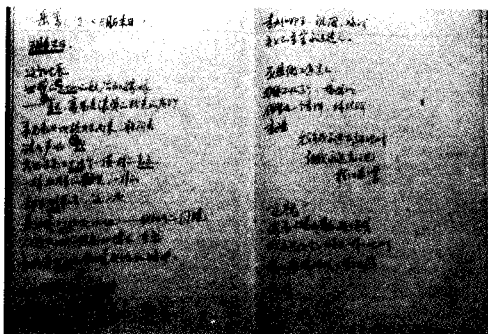
答：他肯定想到了。他已经是很有意识地去做了这些事情。这对历史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后来确实发挥了很多作用。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起作用了。比如《今天》杂志前五期，要是没有他保存的那些手稿的话，至少有一半作品根本找不到了。像北岛和芒克的早期诗作，当时传抄范围相当小。非常幸运，赵一凡在平反以后，收缴的东西全都还他了。这在当年是很难见到的。赵一凡很特殊，不是一般的收藏者，把收藏品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将发还的稿件全部赠还给作者，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份当年公安局所作的查抄目录。

问：他还收集过什么？

答：包括“文革”前的许多东西，甚至解放前的报纸、解放后几种报刊的全部，文化革命初期的小报，朋友的信件、便条。后来遇罗克要平反，到处找不到他那篇轰动一时的《出身论》，最后还是赵一凡向《光明日报》提供的。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也默默地发挥作用。

问：赵一凡和太阳纵队那些人有没有什么接触？

答：后来接触资料知道，他们属于《今天》以前的群体。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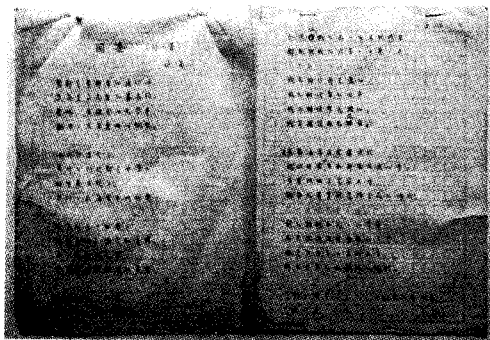


多多收藏的根子(岳重)手稿。这首《三月与末日》是70年代地下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环境恶劣,他们和X诗社的郭世英他们,都基本上没留下作品(食指是个例外)。他们是没能留下作品的诗人。

问:你的意思是说,以食指为界,之前是没留下作品的诗人,之后是留下大量作品的诗人?

答:那些先驱者的处境太凶险了,通过张朗朗和多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的承继关系,整个说来是一座大海中的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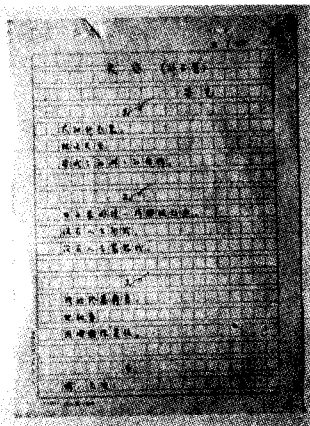
赵一凡亲笔抄录并收藏的北岛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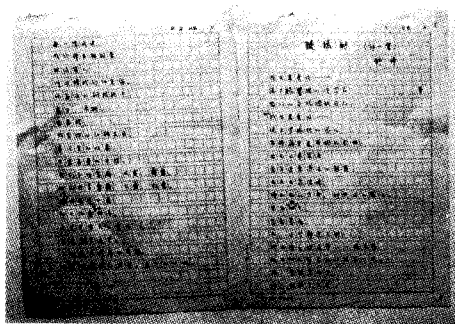
诗人芒克送赵一凡的部分诗集。

山,《今天》只是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今天》是时代的幸运儿。

问:我最近从一批《今天》朋友那里得到的资料里,看到一些当时的部分诗稿,还是相当震惊。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组织”发生时,警察从赵一凡家搜走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大量诗稿,仅目录就有八十多份。在今天,警察是不会要这些东西的,但那个时候居然就当做一种罪证。文化也犯罪吗?



芒克名篇《天空》,由赵一凡抄录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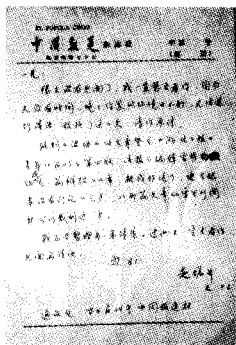


赵一凡抄录并收藏的舒婷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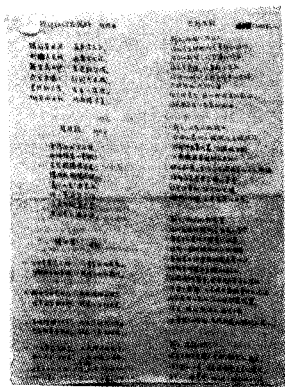
答：要说荒唐可不荒唐，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问：后来，你参加了《今天》的编辑工作，与赵一凡同事。好多东西，还是赵一凡的编校？

答：一凡为《今天》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稿件，信件当时我只负责收发，然后全部由他整理、保存。在办刊同时，他陆续编校《读者来信选编》，让大家传看，以此鼓励我们把刊物办好。



北岛写给赵一凡的信(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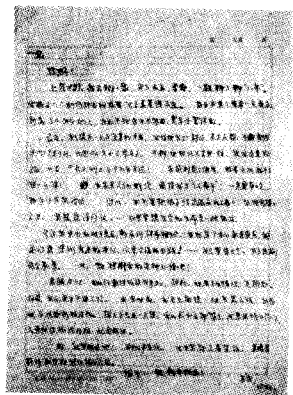
赵一凡抄录并收藏的赵朴初等名流悼念陈毅的诗稿。

问：赵一凡平反之后，公安局又归还了他的资料，两年前三卡车拉去，两年后三卡车拉回，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又是怎样具体转到你和一些朋友手里的呢？

答：这些资料是在他死后，我和徐晓去他家拿的。阳台、屋子都乱极了。已被保姆当废纸卖掉一大批。很可惜。

问：除了《今天》以外，你还记得有哪些重要的东西？

答：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只有两天的时间。有些东西都不



1979年，《血色黄昏》作者老马（马波）写给赵一凡的信。

知道怎么利用,比如很多捆报纸。

问:赵一凡收集的资料好比一个矿藏,你们拿走的只是自己认为有用的小部分。

问:赵一凡家里还有人吗?

答:没有了。在他死前,母亲先去逝了,他死后一年,父亲也去世了,弟弟一家去了美国。

问:他当时到底是以什么具体罪行被抓?

答:这一段我不太清楚,徐晓知道。

问:你是对《今天》这批人要熟悉一点,徐晓或其他什么人是对另一批人要熟悉一点。那么,赵一凡基本上处于那个年代各路异端人马的交汇点。他当时和民间各类思想的活跃的人都有接触。这么一个人也真不简单。

答:中国的事说起来也很简单。国土虽很大,圈子却特别小。

问:赵一凡身上也许有超越了圈子意识的东西?

答: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别人不敢做和不爱做的地方,他做得很好。他有爱心,肯奉献。

问:你刚才印证了历史的两个阶段。一部分像郭世英、张朗朗式的,因个人灾变没留下那个时代的作品。食指以后,《今天》这些人都有作品。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它有诗歌这么一个传统。当时凭你和一些朋友的直觉,在一个矿藏里拿了你们认为有价值的这么一块黄金。中国人的心理,包括郭世英他们办X诗社,都是企图通过诗这么一种形式,这么一种探索,去贯穿思想、文化乃至哲学、政治。后来发展到天安门诗抄中的“扬眉剑出鞘”,都主要以诗这么一种形式从个体到全社会的反叛。中国人习惯于这么做。那时候的分类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学哲学的学哲学,学思想的学思想,写诗的就

是不问政治，孤芳自赏的一帮人，每种门类都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内。那个时候，一个优秀的诗人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答：江河在1979年曾这么讲：他们看了食指的诗以后，才感到我们也能写诗。《今天》是以时代为背景，以历史的转折点为契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沉积，就这一点来讲，《今天》对得起我们民族的悲剧。

问：你认识北岛，芒克早吗？

答：相当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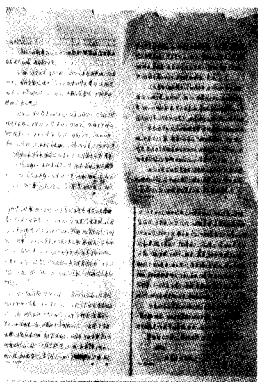
问：认识赵一凡呢？

答：也相当晚，我认识周郢英比较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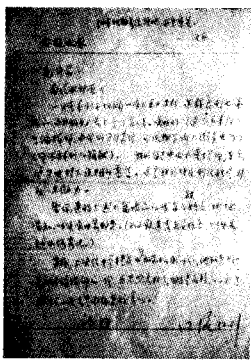
问：你当时和周郢英接触是个什么情况？

答：主要是通过朋友。还是在办《今天》以后接触比较多了。他是一个乐于帮助人的朋友。许多人有解不开的精神疙瘩，总爱找他。这里我想提供《今天》的创办人名单，他们是：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孙俊世、张鹏志、陶家楷、马德升。后来因为办刊宗旨发生了分歧，就分裂了。五人退出，留下北岛、芒克。这最好由芒克去谈，这很重要。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从后来看，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把架子搭起来了，其他人后来才能够加入进来。当初立框架需要相当的胆识、勇气。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陆焕兴，还有他的夫人申礼玲，《今天》第一期是在他们家印的，地点在昆仑饭店的后头。还有孙俊世、张鹏志、陶家楷。可是在《今天》第一期后退出了。我认为他们是善良的、纯粹的、有胆识的，他们的主张没有错，我本人也倾向于文学不要过多涉及政治活动。

问：《今天》创办的时候有几个编委？



1979年,《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写给赵一凡的信。赵一凡曾将这部手稿油印、装订成册。



1979年,当时的《安徽文学》主编给赵一凡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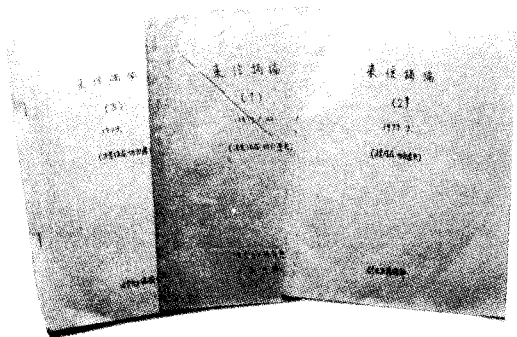
答:七个。职务没确定,反正大家一起干活。

问:分裂后的那些人就消声匿迹了?

答:一直是朋友,他们关注《今天》,参加活动。他们不是怕麻烦,而是不要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至今为他们惋惜。

问:《今天》当中,除了为人熟知的北岛、芒克、江河、杨炼、多多、顾城以外,其他人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

答:《今天》编辑部只是一个工作室。没有任何学术性,完全是一个工作室。《今天》分两个系统:一个是出版、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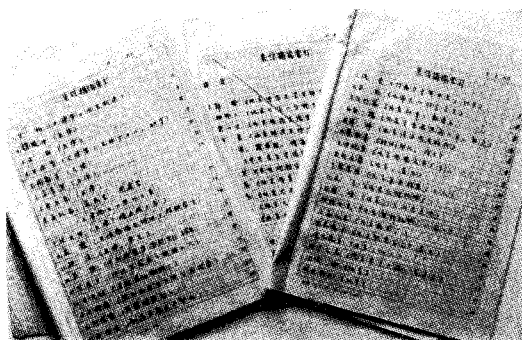
由赵一凡编校的《今天》读者来信摘编。

行，纯工作系统；还有一个系统联络作者，扩大社会影响，在赵南家，就经常搞文学讨论会，文学研究会。

问：那《今天》有哪些比较有影响的活动？

答：除办刊以外，两次诗歌朗诵会，还有二次读者、编者见面会、讨论会，还有星星画展。黄锐和马德升都是《今天》的人。

问：就是说，《今天》一个是出版发行，一个是通过作品然



赵一凡编校的《今天》读者来信摘编索引。他也曾参予《辞源》等工具书的编校。

后联系作者，发动组织一些比较广泛的活动。从这三个方面产生影响。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赵一凡什么时候死的？

答：1988年7月。

问：当时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人像你一样去抢救他留下的“遗产”？

答：还有徐晓，其他人我不清楚了。我想你们今天做的工作，同我们昨天做的同样重要。这本来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来做，因为你们多少对《今天》还有陌生和隔膜感。但是，时间流水一般过去，朋友们走的走，改行的改行，死的死，而我，也是有心无力。

问：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只能尽量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公正一些。但由于你讲的这些局限，疏漏肯定会有。感谢您，老鄂。从还原历史这一点去看，我们肯定有缘分的。

无题往事

徐 晓

一凡临死前的那些日子，正值我中年得子。年近三十五岁才决定生个孩子，这其中的理由和原因真是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成了一个男孩的母亲。我沉浸在做母亲的惶恐和困惑之中。

儿子满月的前一天，我到位于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去看望一凡。那是夏天，病房里很热，单薄的白床单下，凸现出一凡那使陌生人感到尴尬的畸型躯体。一凡的头很大，前额巨宽，眼窝深而目光明亮。这颗沉重的头颅因为装满太多的记忆终于低垂下来。我告诉他，儿子的体重，儿子的大名、小名以及他出生后让我失望的丑样子……以往在一凡面前，我总是这样芝麻西瓜一古脑都倒出来，如同倒进一个没底的篮子，不管多么琐碎和无聊从不觉得不好意思，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微笑和专注，然后或者劝说或者安慰或者鼓励，我则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霸道地占有一凡，却很少考虑到他是否能够承受。躺在病床上的一凡仍然听着我的倾诉，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意识到这将是我们的永别。我注定了是个没有悟性的人，对于死神光顾的征兆总是特别迟钝。



赵一凡先生与世长辞，终年 53 岁，朋友们赶来进行最后的道别，从左至右为徐晓、周郁英等。随他的辞世所散失的大量文史资料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以及遗忘的真空。

对于一凡死前我没能身前身后地照料，死后没能操持后事我始终感到内疚。但我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绝不会生我的气。我是一个被他宠惯了的女孩儿。在他眼里，不管我多大，只要他活着我总可以被一个人当成女孩儿。他死了，我现在只能是女人，是母亲，永远不再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了。也许这正是他的死之于我的实质性损失和致命的伤痛所在。所以说，在儿子出生第 45 天，拖着臃肿而虚弱的身子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时，我哭得那么伤心纯粹是为了自己。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即使是一凡。我这样愿望着，不过说明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的自私和霸道。

回顾走过的道路，对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出现，

很难说是纯粹偶然造成的，更不是简单的猎奇所致。对于在少有精神浸润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她随时都企盼着，等待着，准备着遵从内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响应来自心灵的召唤。与一凡，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郢英，与那些有了他们的分担，失败便不再显得可怕；没有他们的分享，成功也变得黯然失色的朋友们的相识绝不是偶然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每个女人，都能享有这样一份馈赠，或者是我得天独厚？

无论如何，我感谢命运！

认识一凡，是因为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因为他自学成材，而是因为他的古怪和独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说即使有人穿着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会恼火。我当然不信，朋友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不气不恼，又写第二次，她还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又写第三、第四次，直到被说服为上。一凡认为，这时候的自尊心无异于虚荣，为了对方，他不在乎自己受伤害，或者说他根本不认为是受了伤害。

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的腼腆而感到吃惊。他微笑着，涨红了脸，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别大的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上的东西，几乎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

那时除了睡觉吃饭，一凡总在后院一间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间老式的木地板房，一凡常年穿在脚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发出缓慢地吱吱响声。很快，我成了那间屋子的常客。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那样坐着谈话而出世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书刊报纸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一凡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手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过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的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都有分类记号。据说，“文革”以后，《光明日报》要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还是一凡提供的。那里还放着一台苏联生产的放像机和冲洗照片用的盘子罐子。为了冲洗照片，后窗常年挂着黑布窗帘，因此光线总是很暗。以后我从他那儿看到的几部手抄本小说，都是一凡用工整小字誊抄，然后在那个角落里翻拍洗印的。

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热闹，也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来往于院校、部委之间的一凡该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一凡死后我从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几本笔记本、几张儿时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写得有多长，他总要打底稿，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因为他写信不流畅，而是他有保存东西特别是文稿的癖好。我没想到，在我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了一凡写于1977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使我多少有点得意甚至骄傲。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当我看到遗书时，那些纸片早已经被送到不知哪个废品站，正等待着被化为纸浆。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且不说这批资料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不必说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遗产继承成了水中捞月，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断了我与一凡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凡不会起死回生，我永远无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见到他，永远无法听到他那有点古怪的声音。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唯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种出卖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觉，尽管当时我是未出满月的产妇这一事实也不能使我得以自我安慰。

二

一凡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法的楷模，十二月党人则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我觉得他们



1993年，赵一凡墓前的友人合影。收藏家永诀了，谁来继续收藏下一个时代呢？

才是真正的自觉革命者。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的故事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故事诠释的不只是浪漫，不只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之乐为乐，以己之乐为他人所乐，那无私和无畏岂不是来得更实在更可靠？

我想没有一个二十岁的人会读《牛虻》而不被亚瑟的魅力所迷醉的。我看《牛虻》时因为割扁桃腺在家休假。那是夏天，院子非常安静，我靠在树上，

从早晨一直读到合欢树收起那羽状的叶片，读到院子里喧闹起来。家里人叫我吃饭我不理睬，爸妈以为我不舒服，不断地问这问那，我实在忍不住趴在床上开始哇哇大哭，哭得昏天黑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家里人都吓坏了，成年以后我从没这么放肆地哭过。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发现我床头放着《牛虻》，告诫我以后应该读《欧阳海之歌》或者《金光大道》，我笑着，但不置可否。从那时起我的正统形象改变了，我任教的学校有人提出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再加上我对黄帅造反表示了不同看法，入党申请一拖再拖地被搁置起来。

最让我如醉如痴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和姐姐安多纳德的故事感动得我泪如泉涌。1978年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第一批就有这本书，我当然买了一套，但却从来没有翻看过。我拿不准重读是否会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记忆，不愿意相信，人一成熟就得否定单纯。

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后我给一凡的信中写道：“我们无缘享受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

《红与黑》、《红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也为我反叛的初恋增加了几分悲壮，对家庭的反对更有恃无恐，尽管实际上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外国经典小说，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

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小说和诗，在一凡那里，这些全被

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记得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我把《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背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未来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人间大同的共产主义，我们无需描述她是什么样子，无需证明她是否完美是否能够实现。如果能在失望中找到安慰、鼓励，何必要去追究是否实现呢？有一个能够让你相信的未来，又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与利害呢？“相信未来”的呼唤，温暖着一代人的心。

地坛公园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那时的地坛公园荒凉而安静，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会儿书。其实要的是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读书，读文学书，读外国文学书，觉得自己很浪漫，很理想，甚至很贵族，很文化。总之，带着用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小说去上班的那些日子真让人兴奋，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你变得格外活跃，也格外大胆。正是在那段时间，在那条路上，我认识了双腿已经瘫痪的史铁生。正像铁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所记述的，他正失魂落魄地在那古园里反反复复地想着关于死的事，而我对他感兴趣的是那残废了的双腿上摊开着的书，和他攀谈的勇气则来自自行车后夹着的从一凡那里借来的外国小说。

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功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

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 24 小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晚上读书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夜读的习惯始终没改。后来坐牢、审讯时，预审员让我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我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我迷上了写信，一凡也鼓励我写，尽管我们常常见面，有时一星期能见两次甚至更多，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写，而且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常常是发出的信还没收到人已经先到了。写信成了一种精神享受，成了日常生活的功课，后来我之所以读了中文系，之所以总梦想着写点什么，究其原因，应该说归于当年我和一凡的通信。在一凡仅存的遗物中，保留着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的底稿。我自己也不可思议，当年这些信为什么全部写在白报纸上，而且不留天头不留地脚地写得密密麻麻，有的还正反两面写。我给一凡的信中说：“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为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也从没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许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这总比麻木要好得多。”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重读这些文字，那些已经被我遗忘了的感觉又在我的心中复活。二十多年来，我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感受过生死相依的友谊，年轻时的悲欢与许多年来我经历的世态人情、生离死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如今我们也

早已久违了浪漫和神圣。但我仍然怀念甚至迷恋那些岁月和时光。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年轻时被我忽略了的东西也开始愈来愈清晰地在我的意识中浮现，我从遗憾和悔悟中感知时间、历史和人，感知生命、死亡和爱。

为此，我感谢一凡，是他使我走向人，走向自己。

三

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应该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

一凡当做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轮回、报应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避地进入了悲剧。

1975年1月28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长亲自

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仅仅把那当做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还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的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

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要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它都变得更更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没忘记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一到万一他……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还是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

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甚至想，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教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互相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的，我不

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难耐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后，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完全在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

四

两年的监禁，使得本来就双腿残疾的一凡行动更加不便

了。他不再去后院的房子，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屋子的一角是他的床，床上堆满了书报杂志，只留一小块仅够他躺下的地方。白天他就坐在床沿，在全家人一日三餐用餐的方桌上看书写信接待朋友。他忙于搜集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忙于为在监狱里认识的难友写上访材料，忙于诗歌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为了生存，他还得为出版社看校样。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未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婉转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么沮丧，总能从他那里得到鼓舞或安慰。现在看来，那些信显得琐碎而平淡，不再能打动已经被磨得无比坚硬的心，可当年每个收到信的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没有收到信的还免不了嫉妒和抱怨。一凡是我的“专利”，不管他多忙，我总能收到他的回信。

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于1978年都得到了彻底平反。

平反使一凡受到巨大的鼓舞，并不是他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多么重要，而是他从自己的平反中为自己的信念增加了证明。他在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我们案件的预审员老马的信中说：“审讯时我曾自信地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我党的一员。出狱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党被林彪、‘四人帮’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以致使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导致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党一定能重新恢

复光荣传统，我一定要为祖国恢复和重建民主制度，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年，一凡在给我们同案一个难友的信中说：“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我国人民将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逐步摆脱困苦的同时，人民也将同时摆脱愚昧，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人的解放，中国人将真正成为人。”

出狱之后，我看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共产党员都更加真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多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报纸上出现的错别字、语病，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辞书都曾由他终校。他始终是党报的忠实读者，早在1948年，他刚十三岁，躺在大连的病床上，看到某工厂领导只注意抓产量，不注意工人健康，以致有些工人劳累过度工伤住院，就写信给旅大《人民日报》反映情况，当报社的人带着稿费到医院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孩子。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

在狱中，他曾与后来被称为反“四人帮”英雄的青岛工人韩爱民同囚一室，出狱后，韩委托他帮忙为许多人上访，其中有四个人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平反。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党拨乱反正尽力。

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

在此，我想摘引一凡的父亲在1976年一凡被捕后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织写的一份检查中的一些话：

赵一凡在两岁时，在上海因看管他的保姆不小

心，从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脊骨受了伤，怕被辞退她没有告诉我们。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痠，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为了哄住他，在睡了六年之久的石膏床上，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小说。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传为美谈，实则这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他病好了，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匪进攻解放区，我带着他从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重病在大连治疗。不久我又带病到解放区工作，一凡则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也是唯一一次上学。几个月后，因参加学校抬木头劳动脊椎骨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中外小说，还学会了俄语。在他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的故事》，在大连兴华书局出版，我听到后还高兴呢。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时期。

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我们才一起住在北京，我要他去北大文艺系学习，他说已去人大文学班旁听，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都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成立缺人，我把他当临时工招进去，编了两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还加入了共青团。文改出版社取消时，因为名额有限，我没把他像别的临时工那样转正，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关‘牛棚’，去五七干校，所以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

我之所以占用如此多的篇幅引用一位老人、一个父亲的

“检查”，是因为我认为它要比任何文字都来得逼真而深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没有认识的人，无法理解一凡父亲的这份检查从形式到内容蕴含着的深刻幽默和复杂哲理。他是1926年就入党，而后又被打成“托派”，并且在白色恐怖中坐过三次牢的老党员。一凡的父亲写这份检查时——如果它算是检查的话——七十多岁了，我无法知道，这位善良的老人，看着多灾多难的儿子拄着双拐被推进警车时，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当年被捕的情景，是否会因为儿子的遭遇，对自己的一生加以反省，更无法想象而后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篇回顾父子两代人命运的文字。

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是最简单的，但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远没有他们善良，远没有他们宽厚，也远没有他们正直、正派，远比他们付出的少得多，却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命运时，又觉得这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如果说命运能解释一切，那么过失和丑行都应该被原谅，更不必问人格问人性；如果悲剧是必然是绝对，那么反思和内省都多余，更不必问历史问社会……

我想，要了解一凡的正统，理解一凡的执着，懂得一凡的单纯，再没有比了解他的身世更为重要了。正如邵燕祥先生发表于1981年的文章《我死在一九五七》中所写的：“年轻的后来者！你们也许惋惜、同情、怜悯我，你们也许讥诮、奚落、蔑视我，以为我是盲目、愚昧的白痴吧！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理解像我和跟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志，而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有值得你们嫉妒的炽热的爱，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即使在我们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里，也伴生着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着的追求。”我想，这就是当年一凡要对我作的解释，他终于没有明

白地说出来，是因为他比我更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这差异而痛惜。

五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我的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对我似乎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你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能不能在几十个小时的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张志新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符实的政治犯。

虽然两年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捱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坐过牢的人和一个人没坐过牢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女孩儿尤其是不同的。

当你被放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时，没有人会公然地因为

你坐过牢而歧视你，相反更多的人会同情你甚至钦佩你，毫不虚伪地同情你和钦佩你。但当你被放在女人的层面时，你坐过牢这一事实就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一再地强调和提醒。这时候，一切原因都被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只记住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的事实——这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在人的理智里这绝不是一个坏事实，但却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而复杂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是极其微妙的。那么，强调和提醒到底想记住或者忘掉什么呢？你的伤疤或者你的眼泪、你的坚强或者你的软弱、你受过的委屈或者你得到的尊严？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我从人们，包括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神态中读到了“另眼相看”。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良家妇女一时失足堕入风尘的感觉。也许是我把这种感觉夸大了，因为当年我和他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恶意甚至是善意的“另眼相看”曾经怎样压迫着我，并不断地给着我被排除的暗示。从此我似乎真的被排除了。也就是说，我的被排除从坐牢的内容转而成了坐牢的形式。

也许就是在那时起，我不再是需要由一凡呵护的孩子，我非常不幸地、毫不例外地长大了，在一凡面前跃跃欲试，并且终于离开，终于走远，离下一凡一个人……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人的绝对选择。

我与一凡，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

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呈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

能苟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接受了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来说,面对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并不陌生。然而,曾几何时,经受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这种理想和情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过去时”。一凡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接受了一种信仰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身,而另一些人则起了变化,虽然这变化的背后,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历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的心灵史,这小小的差异仍然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这些真的那么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吗?

同龄的朋友们,请想一想,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点向往,禁不住感叹每天都悬在你头顶的夜空今天是如此的美好;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或者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想一想吧,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那样的时刻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

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

1983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一凡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现在看来，一凡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几年以后才意识到的项目，一凡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在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贸易的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而大批文化公司的出现应该说是90年代的事情。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不仅买书，读书，而且能出版书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做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的——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几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当他被唯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处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别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陵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阅读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

第四章

从白洋淀到北京的诗歌江湖

80年代之前，中国摄影业特别不发达，除非有特别值得纪念的事，老百姓是不会进照相馆的，而私人照相机更是一种奢侈品。这种历史环境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因此在这一章里，没有能证明关键细节的图片，例如彭刚和芒克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浪，二人成立“先锋派”的手舞足蹈，当时沙龙的活动情况，有关根子、江河、依群和徐浩渊的图片和文字材料，北岛和艾青交往的图片、各位诗人的创作照，甚至白洋淀和知青居地的全景照。

我们只有尽可能地让当事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尽可能地倾听众多当事者对若干历史细节

1975年秋，在北京郊外游玩时合影。蔡其轿(右三)、姜世伟(芒克、右四)、陆焕兴(左四)、申礼玲(左三)。



1975年春，在北京某风景区的一次聚会，黄锐(左一)、赵振开(左二)、赵振先(左四)、姜世伟(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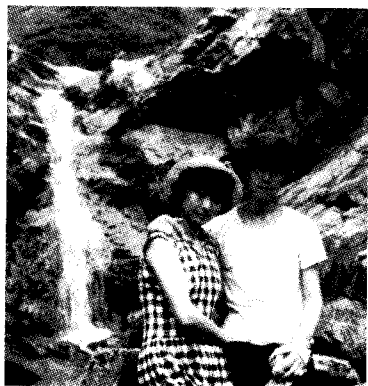


不同的描述和估价。我们没有权力去判断。我们只感觉到，如果再过五年或十年，这项工作将随着人们叙事角度的微妙变化而更加艰巨。

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历朝历代领风气之先的地方，而在离北京不太远的白洋淀，却是一片烟波浩渺，宛如世外桃源的边缘之地。从中心放逐到边缘，然后又从边缘回到中心，一个地下诗歌的江湖

1977年秋天，在去北京郊外门头沟的途中，路过一座古寺，于是合影。从左至右：姜世伟、赵振先、蔡其娇、赵振开、黄锐等。

79年夏天，在密云水库北面瀑布赵振开与未婚妻邵飞。



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个“江湖”不仅仅是诗人，也包括对艺术、政治、哲学、体制改革、大文化感兴趣的一批有志之士。从“文革”的狂热中冷却下来，这些门第不同，生活环境各异的放逐者都汇聚在芦苇荡中，思考、读书、写作，在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共同的孤独”里，“禁书”广为流传，不再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利。

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沉沦时期，林彪事件的震撼使高速挺进的时代列车突然停顿，所有的乘客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江湖应运而生。江湖的一大特点就是流浪，由流浪而生的岁月沧桑感，以及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此，白洋淀—北京的“模型”，当时已扩展到全国，知识青年们串联成风，可这种串联不是几年前在偶像号召下的“煽风点火”的集体行动，而是一种个人的随心所欲。在串联中，偷鸡摸狗、骚扰乡民是难免的；谈恋爱、唱恋曲，把中外老歌翻出来，重新填词，“创作”并传唱成知青歌曲，更是填补空虚的经常性节目；当然，最诱人的莫过于传阅手抄的小说和诗歌……。

知青世界的江湖性质决定了它只能产生于当时的主流政治格格不入的边缘文化，而在边缘文化中，又重新开始确立自己的中心。赵一凡、徐浩渊都有各自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对某人和某部作品的预言和评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在这些京城圈子的另一端，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等人的诗歌与生活，吸引着彭刚、北岛、江河等大批枭雄一次次“下水”朝圣。这种“天不管地不管皇帝老子也不管”的状态持续了几年，直到邓小平复出，整顿当时濒临崩溃的经济，中国社会又有了兴奋点。

在这一章里，我们登载了大量的当事人访谈录和回顾文章，以促使这段显得含糊、破碎的历史变得鲜明和比较完整，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今天》的创办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在新文学时期地位的确立和产生影响，依赖于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契机，而前者没有（至少在当时看不到）这种契机，它只能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功利的脑力劳动。

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摸索、准备时期，处于边缘的诗人们交友，结伴游玩；分化，又重新组合。似乎无所事事，像徘徊于自然和城市之间的一只只无家可归的狼。但是事件还是在“偶然”中发生了。彭刚和根子罢笔了；多多销毁自己的诗，又到别人家里去“毁诗灭迹”；芒克跑回家，在露天的日子里得道；北岛与从新疆回京治眼疾的诗歌泰斗艾青有了交往；老



在蔡其矫先生周围的一群文学青年，右二为诗人吕德安，其时是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右三为诗人、小说家金海曙，其时是厦门大学哲学系学生；右五为舒婷，厦门灯泡厂女工，右六为舒非（舒婷表妹）；现为香港三联书店文学编辑、诗人、散文家。（1978年，摄于厦门万石山植物园。）

诗人蔡其矫发现了舒婷,并把她介绍给北岛。这一切,都是与文学无关的“玩”,但是,往往又为后来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有人曾经问:如果把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历史再延长十年会是什么样?我们无以回答。我们只能说,幸好创办《今天》的人们抓住并投入了“解放思想”的风口浪尖,才为我们现在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借口。而我们的脚下到底有多少铺路石呢?天知道。

彭刚、芒克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时间：1998年8月6日

地点：北京劲松一家小餐馆

人物：彭刚，45岁，70年代的先锋画家、诗人，后移居美国，研究化学，成为科学家，现为美国某大公司的总工程师。

芒克，48岁，诗人，《今天》创办者之一。

采访者：廖亦武、陈勇

芒克：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老哥们儿彭刚。70年代的画家。他现在是美国硅谷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

廖亦武：听许多圈内朋友念叨你，特别是芒克，还有唐晓渡的文章。隔着这么长一段时间距离，我们感觉你是一位传奇人物。真的不可思议，你们70年代就能有那种说法。能讲讲你的故事吗？

彭刚：先从哪儿讲起呢？那就先从流浪讲起吧。看了许多书，许多画册，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法，有点唐·吉珂德的味儿。我和芒克约好，从家里翻墙出来，当时手还挂着彩。我们一商量、流浪去。

廖亦武：到哪儿流浪？



1978年，诗人芒克重返白洋淀。

彭刚：没怎么想，随便翻墙进北京站赶火车就走了，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心中充满反叛的劲，对家庭，对社会。美国有本书叫《在路上》，我们也是走到路上再说。

廖亦武：哪一年？

彭刚：1971年？好像是1972年。我和芒克成立了先锋派。

廖亦武：就你们两人？

芒克：只有两个人，当时我们也想拉多多，吴川，还有其他什么人参加，但他们，可能嫌我们太疯了。我们想在那儿发展先锋派。

廖亦武：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组织吧？

彭刚：哈哈，对我来讲，逃离北京就算解放，呼吸新鲜空气，背毛泽东的诗：“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又流浪，又有美味，多棒。我想象的先锋派，到武汉，那边的人会热烈欢迎，那是一座有革命传统的大城市呀！哈哈。

廖亦武：结果如何？

彭刚：差点被饿死。混出火车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路上混熟的人。人家给我们吃了两碗面就不理了。武汉可真够没

劲。我们没多久就混不下去了，车站又查得特别严，没钱，绝对上不了车，这不好，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家也回不了。什么流浪？讨饭去吧。芒克平常倒挺帅的，但这时面带青色，一副倒霉的样子，连美男计也施展不出。

芒克：还是彭刚有头脑，建议去收容所。

彭刚：对，我们找到收容所，我去和警察交涉，建议他们把我们俩抓起来，那样又有饭吃，又会免费把我们当盲流送回去。

廖亦武：这是个好主意。

彭刚：主意是不错，警察也爽快：你们进来吧！于是我们跟着往胡同里走，可站在门口，就是不敢跨进去，这哪是人呆的地方，整个一狼窝！我俩一进，可能连骨头也没了。于是我

1976年春夏之交，芒克摄于地震棚前，唐山大地震前后，这种在室外搭棚躲地震情景，在全国各地十分常见。



说警察叔叔谢谢了，我们还是自己走吧。可怎么走？车站的人已把我俩看得眼熟，只有沿着铁路线步行到下一个小站，再混上车。

芒克：于是我们就走呗！几十里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我没问题，彭刚就不行了。不行怎么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弄不好还有什么野兽蹿出来。又冷，又饿，又恐怖，彭刚的虚汗都出来了。

彭刚：你也好不了哪去。这流浪跟书上没法比。我们可真快不行了，才望见前面有灯光，真是欣喜若狂！跑拢一看，是间木房子，有一个人坐在门口。我们要东西要水，他什么话不说，就知道摇头。我急了，把棉衣脱下来，要卖给他。猴子也把外套（一件军便服，那是最流行的时装）脱下来，我要价五块，他嫌贵，摇头；我降到三块，他还不要。最后只好两块钱把棉衣和外套出手了。

廖亦武：才值两块钱？

彭刚：还外加一件小棉袄。得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好几碗肉面下肚，腰才直起来像个人了，我们顶着寒风在小站上等车。久了，扛不住了，这种末等小站，只有最慢最坏的车才停这儿。人一穷，胆子就小，如果再上不去车，只有饿死冻死在异乡的份。所以只好忍痛买了一站地的票。上了车，躲在角落里，把脑袋朝脖子里缩，偏偏一个胖列车员查票，直冲冲就过来了！我立即低头，双手把票举起来，浑身抖得厉害。那胖大娘们把票夺过去说：“谁有没有票，我一看就知道。下一站你们就滚下去吧！”

廖亦武：芒克的美男计也不灵？

芒克：遇见美人还差不多，那是一个胖娘们呀。

彭刚：一站就被赶下来，怎么办？身上还有两毛钱，生死关头，我对猴子说，你好好洗个脸，发挥白马王子的特长，找个姑娘管饭吧。这话说完，我眼睛都红了。那时车站外面，有卖洗脸水的，五分钱一盆，不带肥皂，我一狠心，掏出一毛钱，让猴子洗了个带肥皂的。勉强清爽了一回。

廖亦武：我怎么感觉你像只野鸡呀？

芒克：什么话，咱们真有两下子，没多大功夫就搭上一个，三十岁左右。给了我们两块钱，还招待了饭，碰见好人了。这位女的在民政局工作。她领我们去了单位，让我们在运动室打乒乓球。时来运转啦，好不开心！到了晚上，女的就打电话查询。终于有了回音，我一接听筒，果然是我妈的声音。我想这下坏了，我最怕惊动我妈。

彭刚：女的把我们送上火车，还给了二十元钱，这可发了大财。那可真是好人，我们曾答应以后去看她的，一恍这么多年过去了。

廖亦武：这就是你们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对你们人生道路有影响吗？

彭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回来狂画，猴子狂写，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也就是说，被刺激起来了。

廖亦武：你写诗吗？

彭刚：也写诗。我住在吴川家，吴川是吴三桂的嫡系子孙，正宗的，我们经常在那儿聚会。

廖亦武：类似沙龙吧？你和芒克什么时候认识的？

彭刚：那太早了。1969年还是1970年？那时我画印象派，色彩用得非常疯狂。接下来我认识了谭小春，几个人混在一起办画展。

廖亦武：你当时没下乡吧？怎么和白洋淀挂上钩的？

彭刚：我坐船到白洋淀，到淀头找芒克，哇，这小子坐在床上，剃了个大光秃瓢，正喝酒呢。见面一聊，就有相见恨晚的意思。这是我到白洋淀最为美好的一次，我们聊了一个通宵的艺术。

廖亦武：谁约你去的？

彭刚：卢中南，据说现在是大书法家。我看郭路生的诗很直。我觉得我比他做得极端。我们在北京街头宣布我们是先锋派，所做的一切全是反社会的。画画以外，我也写诗，一年一本，至少写了五本，我的诗感觉也极棒。1975年邓小平下台，我被关了三天，出来之后，感到政治气候不对，前途渺茫，



1974年，画家彭刚在白洋淀划船、唱歌(可能是咏叹调)。

就全烧掉。我的画也全没了。多多当时把我的画藏了一部分在棚顶上，日晒雨淋，后来取出来，全粘一块了。我知道，公安局看不懂的东西，就是“反革命”呀。其实，我的画当时不卖钱，只为了与朋友们交换，随着自己心意，把压抑的东西排出来。我从没想到将来成名。那时绝对的穷，又穷又绝望。即使欢乐的时候，也感到一堵要把自己压扁的墙，喘不过气来。多可怕的1975年，恐怖极了，想改行做奴才算了。

廖亦武：你从此就没创作了？

彭刚：1975年整个是淡季。1978年芒克、北岛他们才搞《今天》。

廖亦武：你经常去白洋淀吗？

彭刚：70年代只去过两次，第二次是同赵振开（北岛）他们一起去的，许多人，但没有第一次那么有意思。我们在那儿过圣诞节，恐怕我们是中国人的最早过圣诞节的。我和芒克床上地下地跳摇摆舞，真“先锋派”！

廖亦武：你说你被关过，怎么回事？

彭刚：有个人来找过我的，我觉得那人有点意思，挺特别的，就同他一块玩，他们的年龄要大得多。后来那人说，有兴趣请我们参加他们的活动，还把鸦片给我们抽。

廖亦武：第一次抽鸦片什么感觉？

芒克：没感觉。那拨人不久就出事了。原来是个反动组织，叫“强力集团”，警察给彭刚看名单，全是上层的人。彭刚一下子就蒙了，警察见他的确傻冒，才把他放了。

廖亦武：你们当时怎么回事？那么多人不小心都混在一块了？你最早读黄皮书是什么时候？

彭刚：我们交朋友讲究有艺术气质，达达主义对我的影

响很大。我是从徐浩渊那儿读到《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的。据说她母亲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那半个。这些读物使我在十七八岁那个生理叛逆期里，追求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对个性的压制。还有我也不想上班，彻底的反物质。

芒克：我们在一块，真是又穷又开心，当然也常闹翻。多多与根子那时就叫劲。因为争一个女孩，又比唱歌，又比写诗。

彭刚：毛头（指多多）是真读书，做了一大堆笔记。他字也写得好，好多的哲学呀，好多的政治呀，不像芒克。芒克更多的是闲适的，本性的感觉，人的灵感、直觉，读起来新鲜、亲切。多多比较善于严肃、沉重，仔细地思索。多多与人见面，啊！一个拥抱，西方式的。说到底，我们的“先锋派”就是崇拜西方，不单是崇拜西方的文学艺术，而且是崇拜西方的解放，个性解放。在中国找不到。你看古诗，那么讲究，那么死板，甚至李白的诗，也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感觉不到自由。

廖亦武：多多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彭刚：多多写诗比芒克晚。他偷偷写是在1972年，公开写是在1973年。

廖亦武：你当时的诗、画主要跟谁交流？

彭刚：芒克，还有多多。我还想参加全国美展，那就可以不上班。自己在家写诗，画画。上面要求画劳动模范，好吧！那模范是一个卖书的，我就大量用红颜色。画好之后挨批判。批判者之一就是马德升。他当时画的是牧羊姑娘读毛选。

廖亦武：什么时候？

彭刚：70年代初。印象派的颜色，特别强烈，到处都有红色。但我觉得很好，很刺激。于是出问题了。

廖亦武：马德升当时会批评你？

彭刚：无所谓，官样文章。

廖亦武：你的创作时期是 70 年代初，一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彭刚：然后结束。关键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跟芒克不一样，我跟多多也不一样，主要精力集中在绘画上。就走得特别远，到后期，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命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超现实主义之后，你强调的完全个人解放，这意味着失去标准。艺术也有标准，但我的标准和你的标准难沟通。所以就没人懂你的作品。我当时碰到一个最终的问题就觉得艺术走到绝路了。我记得画了幅画，叫《告别了艺术》，然后……当时我真觉得不能再画了。不管你怎么变形，怎么抽象，到最后已经没法和别人沟通了。这是非常苦恼的。再加上政治上的压力特别大。到最后，我觉得我要走不同的路，而这条路已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廖亦武：你还可以谈谈当时的诗人，包括多多、北岛、白洋淀的根子。

彭刚：这个问题很广泛了，而且谈不好容易伤和气。《今天》开始的时候，芒克和北岛都到我家来找我，让我去帮忙。而我当时非常自私，一口回绝了，理由很简单，我实在不愿意再牵到政治的麻烦，政治的漩涡里。我早被吓破胆了。

芒克：我最早都找过这帮老朋友。

彭刚：我不愿丧失读书的机会，我当时正在北大化学系。北岛是特别不高兴。记得有一次我跟北岛讲过，屠格涅夫的《罗亭》，大约是 1974 年吧，它很古老，写的是一个没落贵族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最后巴黎爆发激烈战斗，大家都革命

的时候，他也投入时代激流，放弃了这个女孩，到巴黎去，终于被杀。这是非常浪漫，非常悲哀的故事。《罗亭》里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他（罗亭）愿为人类的进步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给北岛讲了这个故事后，曾经许愿：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发生民主运动，我愿做一块争取自由的基石。没想到北岛不仅找来，而且记得我的誓言，他说彭刚你不是讲过要做中国民主运动的基石么？现在需要基石了。我说不不不，我不是说我不负责任，不过真是……

廖亦武：四年以后，人会改变的。

彭刚：不错，人生选择也多了起来。另外，这是私下感觉，我和芒克，还有多多更艺术一点，北岛政治成分大一点。他的《太阳城札记》，写的都是政治理想，追求民主，我当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追求自我的感觉，追求先锋派。我们不关心政治。你看芒克的诗，我当时画的画，都是纯艺术。所以不太一样。

廖亦武：80年代以后，芒克、多多他们和北岛走的路还是不一样。北岛更倾向客观地说，他还是寻求一种妥协与渗透。在妥协当中，把自己的某种观念渗透进正统文坛，并逐步改变它，这是社会责任感起作用。然而芒克无所谓，他一种天然的东西。有些时候，你得服从大历史的操作，你该付出代价，埋在地下也罢了。

芒克：正统文坛那帮文人，包括那些杂志的编辑，他们绝对接受不了我。

彭刚：不管怎么说，北岛懂得跟官方讨论政治，而我们根本不讨论政治，我要讨论纯艺术，拒绝意识形态。

芒克：因为艺术里有一种可能性，这更危险。

廖亦武：在某个历史时期文化与政治都有个限度，你如果超出这个度，就绝对不允许。诗歌领域也一样。彭刚，你后来跟老朋友们没联系了？

彭刚：偶尔有联系，但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偶尔也和北岛交换两首诗。我这些年偶尔写点诗，但科学的因素混进来了，越写越冷。有次北岛看了，他非常惊讶。

廖亦武：写诗，画画的意思还是没有断过？

彭刚：还没断。上次回国我去了福建，沿途写了二十几首诗。跟吕德安还有几个诗人在一起。大家到马尾港泡澡，在那儿就开始比诗了，在吕德安那儿住了两天，整整写了两天诗，真高兴。然后到了舒婷家，但我没把诗给舒婷看。后来我把诗给徐星。徐星去厦门时把我的诗给舒婷一看：哇，写这么好！

芒克：徐星后来在很多地方都象你。包括说话的口气。

廖亦武：去年我在你这儿碰见他，特别好像不行。

芒克：是不一样。徐星原来挺有意思，装乞丐要钱，和彭刚一起骗饭吃。

廖亦武：彭刚，你同现在的北岛有接触吗？

彭刚：见过两次还好，就是心情更沉闷，不过他从年轻时代到现在，一直就这样阴影缠绕。

廖亦武：几十年一副面孔？

彭刚：生活还是永远都有乐趣。但北岛走不出自己的哲学，就像猴子（芒克）喜欢穷作乐。北岛现在的诗风也变了，自然多了。

廖亦武：你们和徐浩渊是一个圈子吗？

彭刚：我们有自己的圈子。

廖亦武：芒克，你是怎么认识赵一凡的？

芒克：在北岛家。赵一凡是残疾人，一直在家，他爸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一凡坐了几年牢。1978年办《今天》开始接触，他是在家的编委。这人根本不睡觉，只有脑子，没有身体。他没少帮助我。他把我过去的诗收藏了许多。

廖亦武：今天聊得很开心，芒克，感谢你为我们介绍了这位传奇人物。

彭刚：别客气。我对你印象非常好。



1998年，科学家彭刚站在美国某山顶展翅欲飞。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 - 1978)

多多

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在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了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之一多多

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

芒克、岳重(既根子)和我相识于1964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我

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记得在纪念毛主席生辰73周年时他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1968年晚秋为同学古为明插队作赋《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硬，程远雄心固。”除此，我们三人未见谁有过动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蒂的《人的远景》。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

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犷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 8 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当时我认为此首最好，现在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至今我仅发现岳重 3 首诗，其余全部遗失。

1972 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声（现在仍在其位）。我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位自郭路生以来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 100 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的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

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他是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

同样，岳重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1972年6月19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徐浩渊在我完成前闻讯对我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这不但是她一人所见，在于我一直对思想感兴趣。因此，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依群的反应和岳重差不多，暧昧和不服气，但我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他希望我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这是依群洗手不干的一个解释。

1973年夏到来之际，岳重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从此，岳重搁笔。到1973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由于政治压力，沙龙已经解体。诗歌传抄范围更为扩大。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舍。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如果从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理、张朗朗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也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等。关于那一代人我接触有限，但他们刚好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文革”。十

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提笔。

1973年我读到了史保嘉的旧体诗,觉其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笔录,现将手上仅有的其他人的散段抄录

马佳:

○只要

你学会

从姑娘的嘴唇上索取诺言

你

便可以和爱情

走遍天下……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除了酒

还是酒

二十岁以前

天天都过节日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的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地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芒克与彭刚,组织了最早的“先锋派”,拉我参加。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维持了大约二个月。除此北京不再有沙龙或文艺组织,除了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我和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可以说,从1973年后,北京青年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关于1970—1978年当中纷乱的诗歌现象,我接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仅为很有限的诗人的见证者。但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我欣慰地看到:芒克近期达到高峰的成熟期的诗作,也认为岳重随时都会再次崛起。

1978年,《今天》问世。

赵一凡收藏的诗人多多手稿。

北方的土地

总是数着脉搏,目送河流远去
总是依着木柴,思念大雪
斧声和劈出木柴的煤虫
总是在触摸过冬的存土,所
就认定:我属于这里
我属于这里,我记录,我测量,
仪器以生肉,我认定:这里,在
总是在这里——

当年最好的朋友

周 舵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能指望他会还；你的回忆录中不能包含他认为对他不利的、有损他光辉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看法，朋友，就是自认为有权对你不讲理的那些人。

照我理解，回忆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不故意地说谎，不无意地歪曲事实（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潜意识），这远不算是达到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这就和朋友要求最惠国待遇的主张发生了根本的抵触。是要真实，还是要朋友，你必须二者择一。而且，问题真正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回忆到的朋友。你的其他朋友都会从你对待某个朋友的行径中举一反三，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后果，是对你大大的不利。

关于朋友与回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相信读者们自会得出适当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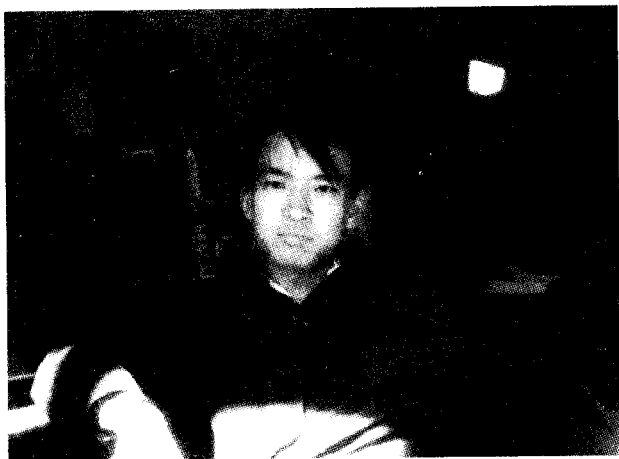
正如本文标题所揭示的，诗人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诗人。“最好的朋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并且向众人广为介绍。甚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漂亮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今天我们常见的贵宾签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就是题献给我的，用典型的诗人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猜想，他后来多半会为他这份热情后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幅照片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紧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原因忘记了，倒好像有意留下来要接待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坦然走进，自我介绍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子）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世界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净合身的旧军装（这是当年干部子弟流行的装扮），眉清目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成熟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欢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出众小伙恐怕不容易做到——也许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世故。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偏见。

那时我刚刚从自惹的一个大麻烦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186天的冤狱，从云南边境上的开远收容所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所在的滋味——从收容所、看守所、学习班到省监狱——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育释



1966年，栗世征（绰号毛头）身着当时的流行“时装”摄于颐和园后湖。



1972年，栗世征在自己家中。



1974年，圆明园(从左至右：周舵、何方、张小军、栗世征)

放”。这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其时我父母以“特嫌”罪名双双入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家产外，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毕业分配”，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出身不好，不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监狱的大麻烦，全不类常人。这还不算，我不但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庆幸有机会增长这一番牢狱生活的宝贵阅历，这一切讲来都让栗世征感觉有趣。

略略作了些相互介绍，这位栗世征很快进入一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话题——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我的浅薄意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而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一定是抱着十足的耐心和诚恳与他认

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好像是：打不起来。当然我猜对了，否则这篇回忆录多半是没机会写了。

第二次见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小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感动，又惭愧。他到处对朋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尴尬。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皇帝，那曹操就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评语就成了孙猴子脑袋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好事，不许干坏事。不能辜负好朋友的信任，不能玷污这圣贤的美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朋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朋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活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学和朋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古怪的是，我从小不喜欢知识

1987年，沈忱、周舵、栗世征在地坛公园。



分子子弟，宁可结交工农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学眼里，他们大多成绩不好，品行不端，是坏孩子、野孩子。为了我和坏孩子交朋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告诫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示不满，说是照这样交朋友可就难了，你想结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那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感情”之类的阶级路线，不然家父家母之间就会爆发一场阶段立场问题的大风暴，一如后来。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精神生活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许多同学之间价值观、审美趣味的距离。我和班上几位着迷西洋古典音乐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几乎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对象。但也正是西洋古典音乐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宽阔的一座沟通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爱好启蒙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受。

那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录音机在京城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录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半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行家，经常能从寄售商店弄到好东西。

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人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空隙，冒大风险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就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认识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通过毛头认识的一群干部子弟，当然还有我们不认识的其他人，大概就

1985年，周舵家中，
栗世征、黄贝岭合影。



诗人芒克收藏的依群诗稿。

巴黎公社

齐云

奴隶的歌声被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榴蕊上
 象纷纷落下的泥土
 呵，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象血滴，象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志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
 向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的剑

诗人芒克收藏的依群诗稿。

成了“文革”以来京城最早的一批发烧友。当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激动、狂热和自豪，今天的发烧友们是体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禁的东西愈是被人渴望，这就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枉然。

还有就是疯狂读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那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籍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狂热追逐的猎物。借

到或不管用什么手段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但通宵达旦地一气读完，而且尽可能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境界如今怕不多见了。

由于父母双双入狱这种相当特殊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孤独。旧日的朋友、同学，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倒霉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友善（据我的经验，那时受教育越多的农民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加倍的感激，但那离精神上可以沟通共鸣的“朋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习惯，我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读书时间，请勿打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苦的是无书可读，甚至根本读不了书。那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衰弱，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极度缺乏蛋白质，大脑拒绝工作，罢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挤时间读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朋友、书、音乐，对我是如空气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在崇尚粗野、愚昧的那个昏乱时代，我只觉得整个中国是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欢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欢的统统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异者的地狱，愚者低下者的天堂。有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静静地躺在清白的湖底永远不要再看见这个混账透顶的世界。

毕竟还有一些支撑自己勉强活下去的东西，其中包括毛头，和通过毛头认识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数可贵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慷慨友情，成为我当时灰暗绝望的内心中最充实的一片光明。

1972年，毛头忽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那个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诗人（毛头之外还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诗人的农村公社，恐怕举世罕见。个中原委，遵照早已交代的“为尊者讳为朋友隐”的原则，我不便多言。

我当时是以颇为挑剔的外行眼光看待这些最早的“朦胧诗”。以我这种崇尚古典的审美趣味，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受一半。形式上，我坚持无韵的不能叫诗；内容上，我那时还不能



1988年，写诗“三剑客”在香山。从左至右：
周舵、芒克、根子、多多、黄贝岭、林墨。

接受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文字。当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感，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也许就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共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谊有了裂痕。我向他推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本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勉强读了，但毫不喜欢。

诗人不仅仅是生产诗的人。按照诗人们自己以及热爱诗人的人们的理解，诗人还得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据我的切近观察，大体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像个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

我得直截了当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就是小儿科。以我愚见，诗人是天生的，能不能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关联。你要是诗人，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监牢找那前三样东西，就是天天去舔警察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如今当然另说）；你要是诗人，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枉然。

（同理，许多中国人出产一种昏话，什么不喝酒不像男人。其实你要是个男人，滴酒不沾照样英雄；你要是，成天泡在酒缸里也不过是个酒徒而已。甚至更糟。）

痛心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诗人的天份，相反，他足够。我只是委婉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必费心去装扮什么诗人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好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毒害，若是天生就有诗人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下场者几稀。果然被我不幸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青春时代愈去愈远。我

得说，是变成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混不讲理。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大师”的毒害，一半是因为抽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健康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打算出卖朋友。总而言之，经过无数呕气、和好、破裂、又和好的波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和解），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耍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从此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苦莫名。多少回想要再次寻求和解，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有什么意义呢？若是在一起只有不愉快，这朋友还有什么交往的价值？

从此，我听见“诗人”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赶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许多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惋惜之声，没有一个人替谢烨说句公道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愤怒之余，我当即写下那篇批评顾城的文字，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幸亏没有几个诗人读到那篇文章，不然我可把他们得罪惨了。

今天，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朋友，除去满心的怜悯之外，还是忍不住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许多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到搅得中国人统统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

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仅仅因为他们出众的智慧,也因为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理性。无论对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和人类,身心的健康都是太重要了。本来,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如果我们不但不去设法弥补,反而有意无意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家不倒霉,这世界不乱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抽烟、少喝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极端、教人疯狂的坏事坏人尽量远一点,身心的健康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不会生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朋友,不但不照这样子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败,由衰败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乐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等于活埋了自己,这些惨痛的悲剧让我不能不提醒那些玩艺术的特别是玩诗的朋友(以及崇拜艺术家崇拜诗人和明星的追星的朋友):真疯真傻也还罢了,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不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念头:这毛头要是那年根本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相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青春年代的记忆中那个风趣、健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有着说不完的长处,总而言之,一个光彩四射、魅力无穷的,极出众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人魅力言,毛头在我那些优秀的朋友当中也属不多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后来的身心衰败,多半是咎由自取。

现在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

晚了。我当年苦苦劝戒，他自我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相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感动。但在我看来，这话简直混账到了极点。我的坚定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

尽管已经太晚，我还是希望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立场。

在我心里，当年那个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心酸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

马佳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时间:1998年8月11日

地点:北京后圆恩寺7号

马佳:45岁,诗人,小说家,有时有经商才能。

采访者:廖亦武、陈勇

问:请你随便谈谈同代诗人的情况。

答:多多非常有勇气,真正揭示了这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历程,实际上也匡正了这些诗人沉寂之后,为媒体所变形的一种对历史的评说。我对多多这篇东西非常欣赏,这需要有勇气。因为它最后说,《今天》诞生了,而在这之前,很多很多人前仆后继做这个工作。而我迄今认为,大多数最优秀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从何说起呢?还是你怎么提问,我怎么回答吧?

问:开始朋友们把我找来,我也感到无从下手。后来开了一次会,大家提供了很多线索。这些线索就要一个一个去跑,幸好还遇了一些能够保存这么一段历史的人,比如芒克、鄂复明、徐晓等。从收到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今天》之前有很长一段历史。可以说,没有赵一凡这个人也就没有后来的《今天》。《今天》一至四期的作品,都是赵一凡为他们提供的。赵一凡死后,鄂复明和徐晓只是拿走了自己感兴趣的一部分资

料。其他还有什么就无从知道。前几天彭刚从美国回来，我也采访了彭刚。我对鄂复明、赵一凡这么一批人，内心充满敬意，自觉要尽力把这一段历史还原。这其中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虽然你下乡在黑龙江，但我看你的诗和白洋淀根子他们的诗血缘非常近。虽然地域相隔比较远。我问了岳建一，岳建一说，这个人你非去做他一个采访不可。

答：是这样。你们要编这个东西，我倾向于你们以多多那篇文章的脉络来编。他很勇敢，能够直面历史，并且能匡正后人对历史的歪曲。大多数人缺乏这种勇气。

问：我想听听你对这个脉络的梳理。

答：我只能从我感知的这块说起，别的我没资格去评价。我的诗歌历程应该说是从1971年开始。我们这一群体的诗人有几个基本特征：这第一个就是毫无功利性，这和《今天》开始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正是因为没有功利性，他们才是真正的诗人。当然这就是我要谈的我由诗歌的美学观点，也表明我为什么不发表诗。第二，当时写这种东西有杀头之



1973年秋，诗人马佳摄于北京。



1973年秋，知青马佳摄于
黑龙江嫩江之滨。

罪，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朦胧诗的出现，心理、社会承受，历史感都不一样了，有截然不同的不同。因此改革开放过后诗人的出现，虽然也痛苦，但是能够被社会所认同，社会有一个

通道，使他们能够和社会对话，和读者对话，而那个时期是没有的，并且还有杀头危险。像张郎郎、牟敦白，还有郭沫若那个儿子叫什么呢？

问：郭世英。

答：对。这些人都坐过牢，还有死了的。所以说，在黑暗时期，诗人像一场战役，是一批斗士。不单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有政治含义的。这些人我没法评价，他们长我许多。但他们的诗我都看过，我没有保存。我进入诗歌界，最主要的引路人就是郭路生。他的成就、他的人生和他的不幸是一体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来真诚地面对自己。这是我所认识的诗人里最真诚的一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当然，正是因为过于真诚，他才会疯。我呢，当时是介乎于郭路生和白洋淀群体的一个中间点，我是在夹缝之中。多多那篇文章写道，1973年的时候在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沙龙，这是一个自发的沙龙，当时有多多、芒克、我、彭刚、鲁燕生、

鲁双芹、张寥寥（即张郎郎的弟弟）、根子，还有一个后来是著名的书法家，叫卢中南，这个人很重要，他没有写诗，后来成为中国非常出色的书法家。此外还有郭明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她把大家给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李素兰，现在定居在澳大利亚。当时这些人的爱好不光是诗歌，还有小说、绘画，几乎大家都是这样。这个沙龙是一个很奇特的沙龙，应当说都是多才多艺的。我当时搞绘画，之所以没搞成绘画，主要有彭刚在。彭刚是个奇才，和我同岁。我至今一直认为，绘画的没有一个人超过彭刚。不管后来出现了多少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也是我放下画笔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觉得有他在，别人就不必再画了。而这些人能够集中在一起，有几个特点。第一点，虽出身不一样，但有同样的嗜好。比如说绘画能够和诗歌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写小说。在这种下，能产生这种不同艺术形态，不同艺术形态相碰撞，并且还能有契合。其他人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不是，我是所谓干部子弟，大家创伤差不多。第二点，多多在那篇文章里写到过，当时受黄皮书的影响。什么《麦田守望者》、《厌恶及其他》。还有一批手抄本，像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阿赫玛杜琳娜的一本诗集，还有《同窗》、《带星星的火车票》。我迄今非常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当代的诗歌和文学受这些书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王朔后来的文学形态无非是阿克肖诺夫文学形态的变种而已。而这个，我应当说是开了先河的。我1982年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首先使用这种手法。我毫不忌讳，是阿克肖诺夫对我的影响。所以在当时（多多在这个问题上回避了），我觉得我可以比他更直面一点，我知道大家诗歌的出处在哪儿。

这里除了自身的感觉、才华之外，还有一些参照物、参照

的译本和对参照译本的回应。因为我觉得任何创作都是如此。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这倒不是说临摹，或者说是一种抄袭，我觉得不是。所以我刚才用了“回应”这样一个词。比如像波德莱尔，我觉得根子更喜欢波德莱尔。我只能这么说。郭路生呢更喜欢贺敬之，所以郭路生的诗上口，容易流传、传承。而根子的诗始终没法背。我呢，应当是受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这几个诗人的影响。我的诗分成好几类，《北方之歌》是属于一类。这里我觉得我有资格说这种话，我的诗歌才能是最高的，但《北方之歌》是我发表的第一首。我当时能够一天创作一首诗，这个多多是承认的。当时大家都是定期拿出一本诗集来。诗集就是一个厚皮的笔记本，大家相互之间交流，再摘录各自好的句子。但我刚才所说的出处，无非就是这样。一类信息的来源是共享的，书的来源是共享的、尽管文化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在这么一个文化封闭的社会里，只有那几本黄皮书能够向大家提供那么一点信息。也只有在1966年以前所翻译的一些诗作所提供的这些。但这样说是否客观，那就只有别人来评论了。而这个圈子呢，维持的时间很短，也就半年时间。多多在他的文章里，就回避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有很多情感纠葛，这个东西，我在这里不好说了。

问：多多和根子的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答：不是三角，是多角。所以我必须回避。有的人很早就组建家庭了，所以只能回避。再说手抄本吧，有阿赫玛杜琳娜、波德莱尔的诗，聂鲁达的《伐木者之歌》，还有泰戈尔，北岛后来的东西有点像泰戈尔，像《断句》这些，有点像。我呢？也就是多多那会对我的评价，我吸收惠特曼可能最多。因为大家都仿惠特曼，什么《太平洋》。我的诗歌一直没有问世，这

也是岳建一非常严厉地指责我的地方。就是说我写了这么大量的诗，没对中国新诗运动作出贡献。我的诗都还保留着，我还没有想到发表。所以说这个圈子虽然很小，但非常有生气。大家喝酒、绘画，谈论诗歌。至于后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朦胧诗的攻击，对什么意识流小说的讨论，我觉得非常可笑。严格说，我们在那时候已玩遍了。我在那时候已经完成过三本电影剧本、两本小说，还有现代派的绘画。

问：据彭刚讲，《渴望生活》出发点看得很早。

答：实际上，大家的知识结构就这些。也就说最早的一批中国的年轻的艺术家们所认识到的那些东西。因为当时画册也非常流行，所以我现在来评价那段历史，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仍然有少数人拥有着看这些书的特殊权利和条件。他们才开始产生了这样一种同样的回应。因为这个是很偶然的。在白洋淀那会儿（实际上大多在白洋淀插队的都呆在北京），我之所以进入这个圈子，是由于我当时在北京养病。我当时靠绘画，想在北京谋得生存的位置，比如说，能够进入到部队文工团当美工，如此而已，是为了生存。只有这些不是喜欢在外头的人，才能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小的团体。而白洋淀离北京最近，所以，这该叫什么群落呢？

问：我看像一个诗歌江湖。

答：所以他们才能够有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可能性，客观上造成的。我作为一只候鸟呢，无非是穿行在南北之间。根子呢，据多多讲也只写了九首诗。后来不写了，唱歌去了。我当时认为多多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评论家。芒克是个诗人。严力太晚了。严力是我带进来的，绘画、诗歌，我跟他相差几岁。后来，像星星画展，严力这些人都是有成就的了。我不好再评论，论什么呀？但是我认为，郭路生的遭遇是这个社会这个历

向于谦的墓地祭奠

呵 这一瞬间	不要蔑视我的意见
奇异的颠三倒四	不要嘲笑我的愚昧
太阳从情的野里回来	不知道还有谁比我更会情调
满身大汗	因为我把所有的爱都奉还
月亮从情夫那里回来	可是菩萨以上
神采奕奕	骄傲地在骄傲地跳舞
我将背累点烟	那寂寞的都市上空
胆敢看我的灵魂	又掠过空洞的月
而你的眼睛	爱情呵
套套于前的江灯塔	那飘来冷漠的人生之海面的
有海草转包吗光明	新月亮
我来，来！	夜凉！
有理由云	大街上空！
拉起我的鼓敲打起来	我 没有家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 北京

马佳手稿

史对于这批人不同样遭遇的一个代表。因为我觉得，恐怕没有一个时期的诗人能像这个时期。没有功利的，能够真诚的直面人生。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像我 80 年代进入作协、剧协以后，接触到一些专家，我也看不到这样一些真诚、磊落，大家能面对面来进行一些批判。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全是假话、虚伪。当然也只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这样一群人。因为大家是过于狂妄，过于自我，过于居高临下，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推动社会新文化的东西，那不可能。实际上组合的初期就预示着他们组合的末期。但是我认为，这个时期不管留下来多少诗（因为我的诗大多数多多和芒克他们都做过笔记，这个我清楚。根子的诗呢，多多都做了笔记。芒克的诗，我觉得他保存得也很好），应

当说这些诗对于《今天》以后这些诗人产生过影响。尽管现在这些人拒绝承认这一点。但确实是产生了影响。因为我在后期，我在北大读化学系的时候，把北大图书馆所有的中国的，而且翻译的，外国人的诗都读过。按我们内部朋友的话讲，大家一见面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就是说，你甭跟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的诗是谁的，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大家一见面都露出了会意的一笑。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就说不管是得到多少的借鉴，但产生了这样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确实是对《今天》以后，比如北岛以后，产生过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些诗人优秀之处就在于，在可以各领风骚几年或几十年的日子里，大家都没猜疑，这是他们优秀的一点。这个群体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解体，正因为大家太骄傲了，太具有才华了，太不屑于世俗这一套了。所以，到后期，除芒克介入外，我不知道还有谁参加。起码我没有，我沉默了二十年。

问：根子和彭刚罢笔也很快，他们是在1975年。

答：彭刚诗作不多，根子有九首。

问：他画画了。

答：他也画到家了。我觉得，他再要画就疯了。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人超过他，这是我很固执地这么认为。彭刚最后上北大化学系，跟我一个专业，我跟他一个宿舍。但是我文学成就比他高。我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

问：清楚了，很好。

答：所以，这些人真正到了熙熙攘攘、社会开始接受朦胧诗的时候，大家反而都见不着了。我认为，这是大家最优秀的一点，过去的就过去了，该做的做了，而这不是为别人做，而是为自己。真正的好诗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这是我一个对文学创作的美学观点。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有几个出发

点，第一，就是我认为诗就是隐私，隐私怎么能成为一个读物呢？我迄今为止就不理解，有人把诗人作为一个职业而活着，换一个说法，就是能够把自己的隐私作为一个商品进入到社会，我觉得不可思议。第二，我对于改革开放的朦胧诗保持一个绝对的蔑视。我觉得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根子，也没有人超过食指。第三，是为了功利，为了生存，拿诗来作为挣钱的手段的话，我认为那不是诗了，那是另外的东西。可能我对诗过于苛求，如果说有一天我准备发表我的诗集的话，我也是自费的，印个500本，1000本，我送朋友了，而绝对的，我是不会作为一个商品，标出价格，在市场上流通。我认为，我接受不了这个。至于芒克怎么想，我不知道。我愿意汇入这样一个诗歌大潮，当然，我跟岳建一也说过，我也很敬佩他。因为他毕竟对中国的新文化有贡献，我是没贡献的。

问：也不能这么说。

答：这是实话。因为我只发表了一首诗，所以你们采访我，我也是没资格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诗人，是我愿意写诗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个诗集（实际上我早已整理好了），也写了一个自序，我刚才谈的观点，我在里面都谈了一些。并且我认为诗应该属于二十岁以前的，以后呢，我的经历、社会背景、情感以及其他形而上的问题，已经完全发生变化了，应该和诗告别了。所以，作为隐私，再一个作为告别，第三个作为蔑视，这是我远离这个诗群的原因。后来我改写小说，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写诗，只有几个朋友知道。我为什么有权力这么来评价呢？因为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有功利性的。我是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的专业创作员，我必须得有我的创作发表量，我必须得去创作，我有生存的问题，所以我出了六本书，但是都比不上我的诗。所以我说我有资格说这种话。我迄今为止也是这么认为

的,我的诗比我的小说好。因为我觉得不管后来多么优秀的文学家,我指的是我们同时代的,随着社会的开放,之所以还能够被社会承认,还能被拍成电影电视剧的话,多多少少已经开始有商业化的味道了。按我的认为,就已经开始媚俗了。曹雪芹生前没有看过他的著作发表。而我认为真正好的东西,恐怕都不会为当代人所接受。换句话说,压根就没出现过好东西。不管哪个阶段搞创作的,都把自己提升了,事实上大家都很差劲。基于这种评价,我觉得我的东西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姑且承认岳建一对我的评价,我确实对新诗没作出过贡献。这一点呢,我持一种极其固执的,带有偏见的傲慢来面对历史和后来又发生的一切。

问:你刚才说了一些关于历史的话题,实际上,我们做这个工作,还是尽量能够看到表象历史的背后。就像你刚才有一种说法,我还是不能够同意。比如说像赵一凡这么个人,这次我们不整理的话,完整介绍他的文章就那么两篇。而且根本没引起过注意。另外,当年办《今天》做大量幕后工作的一批人。

答:有人不写诗,但是他愿意抄,抄得非常漂亮,还订出来给别人看,所以我刚才提到两个人嘛,一个是郭明瑶,一个叫李素兰。

问:那时虽然圈子很小,还是算一个诗歌江湖,后来对《今天》产生影响,毕竟还有一种潜在的东西,你不能说彼此没关系。这个我还是不同意。最起码,前期你对我的影响,我对你的影响,咱们是一批人。这一批人就出来那么一两个人。当然你不能说一两个出来了,就昧着良心把这段历史割断、割裂了。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和那些人的一些具体的交往,比如说和郭路生、和根子、和彭刚等具体的,一些比较感人的交往。

答:根子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天生能唱非常好的男低

音，音色极好。当时有一首朝鲜的歌，叫《岳飞山》，根子之所以能打动人，就是那首歌唱得非常好。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傲慢。这种傲慢带一种偏执，就是自视过高，让人不可接受这种傲慢。我刚才说这些人，按理说都非常较劲，都写诗，也写小说。多多呢，是一个读书在当时来说是读得最多的一个，并且极有口才，雄辩滔滔。所以，他给出的评价，通常带有一种权威性。1973年6月，有一天下大雨，他把我叫到他家去，就在西四，一个摇摇欲坠的小楼上面，拿出两大本诗，极棒，我当时确实非常受感动。就我的诗的意象成份大于其他人。那次是我增强了我写诗的确信。但是我这里要说的，真正对我影响深的还是郭路生。郭路生是跟我姐关系非常好，他们年龄一样。我一直是仰视郭路生。所以我们在一开始交谈的时候，受到这些诗人、外国诗人，这些黄皮书的影响，而这些诗人和这些黄皮书都是郭路生向我介绍的。

问：他那时又是从哪些地方得来的呢？

答：当时是文化部的，一定级别的干部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书。也是赏给高干提供文化、精神、娱乐的某种特权，发行量很小。当然还有《金瓶梅》。所以，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流传这些书，而这些书又属于“文革”前期没被抄家失落的，所以存量非常少，大家很珍惜。因为当时大家也确实是无书可读。我家里是存有一些唱片，根子家里有些画册，多多家里有些书，小说。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环境。这里当然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我借你书我就说丢了，借你唱片我不还。这是种讹诈、垄断。因为社会的封闭。他拥有了，相当于拥有专利一样。为什么我不愿去说这些事情，很复杂的。我不愿意。因为我本来就没进入到诗圈里去。所以我不愿意对这些事情发表评论，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回到做人上说，

郭路生是非常透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他能够把自己的胸膛敞开，接纳任何人，别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我碰到唯一能够背诵自己诗歌的人也是他。应当说，他是靠他自己的朗诵来传播他的诗。所以他为什么后来影响面最宽，正是因为这种坦诚，才造成他精神要崩溃，因为别人不是这样对待他的。诋毁他的人是相当之多。后来人们觉得这对他不公，又翻过头来，重新来歌颂郭路生，是公正的。我觉得从做人上讲，如果大家都像郭路生这样做人的话，这个群体能够延续下去，并且能够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大家做人做不到这一点。我是看到这一点，非常失望才退出的。我就一直保持二十年的沉默。我可以这样说，谁的诗是抄谁的？我都知道，因为我太接近了，所以我反而就没法再说话了。所以，我刚才说，我抱了一种固执的偏见和蔑视。因为我和所有人都有过愉快和不愉快的接触。人做到什么位置，诗到什么位置，有人做不到这点，诗就到不了这点。这个东西是没法欺骗的。你再聪明，像我，我现在看当时的诗，我都能看出破绽来，有些句子都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是大多数在当时，后来成了一个诗潮的情况下，没看到这些原本的遗作。其实，只要大家都静下心来，用一个星期去翻一翻这些有限的遗作的话，大家就会对后来的诗作个客观的评价，所以应当说个性是没有的。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拿我为例，那《北方之歌》，是我第一次失恋，由于出身不好，又不让上学，再加上失恋。当时送女朋友上火车，从车站回来的时候，我发高烧，就晕倒在荒野里了。醒之后是因为雪下来了。那天年二十九，当我爬回我们连队的时候，已经年三十了。当时东北知青到冬天都回家，我回屋之后，把所有的箱子在我炕上都码好了，点上蜡烛，年三十晚上写了那首诗，醒来之后是在医院里。那时初二了，是平时和我比较好的一个农

民，发现屋子里有人，报告了生产队里的连长，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那是一个要和生命告别的场景。后来我给一些诗人看过这首诗，他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其实你写一段就可以了。我无法给你解释了。当时从大背景来看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命运、前途，你什么也看不到。从面临一个爱与恨、生与死，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在呻吟，乃至对生存的一种渴望、一种挣扎，这个在后来，很多人就看不懂，怎么能写这么长呢？这个时候我没有动，我觉得保持它原貌为好。所以说，每一首诗都是我的情感、经历、遭际、瞬间的感情的产物。可是我觉得后来的诗人就缺少这一点。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从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转变为功利性的，能成为一个商品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发生变化了。所以，我刚才说了，一旦熙熙攘攘的时候，很多人反而见不着了。不要说我，现在开始经商，做一个很大的公司。我会采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活口，而我不愿糟蹋我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宁愿像郭路生一样疯了，而不能顶着一个诗人的桂冠，无耻而健康地活着。这是我万不能接受的。并且还有多少人在写他是怎样写诗的，这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郭路生有次险些自杀，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失恋的经历。能够在自杀前期听到马车驶过运河那种铃声，在听到这种铃声时，他又产生一种生命的渴望，后来的诗人没有。没有，因为历史大背景不一样，后人写的还有一些情感的诗，还有他特殊的遭遇，但毕竟和那个历史背景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诗人的诗显得博大。而不像后来那么儿女情长。因为当时写诗还都有“载道”，还有这样一些志向，起码还包容了这些，但后来没有了。

问：前些日子在黄亭子酒吧，我听了郭路生的朗诵，我看了对他种种采访，他最近出的书。我发觉这个人整个来看，还

是有社会属性。他希望自己的诗传播，乃至发表，这是他当时的渴望。但他诗人的属性非常强烈。他写两类诗。一类诗他还是希望传播。另一类非常排他化，这个人就处在这么一种强烈的搏斗之中，这种东西造成他的一种分裂，比如《疯狗》。

答：我懂，我比你更了解郭路生，你这么分析他可能更准确。郭路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和我不一样。

问：比如他写《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答：你别分析了。郭路生对知识青年上乡下乡，一开始是歌颂的。郭路生写知青跟我写知青完全不一样，他是歌颂，因为那时候是他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不是，我这个梦是很早就破碎了。因为我十四岁就坐牢。我根本就不信这些，这是我跟郭路生的差别。对于整个历史，他更理想化，但有些人不理想化，我就是这一类人，我不认为毛泽东所倡导的东西都是对的。我是不相信这一点，我那时小，受的熏陶也少。像郭路生他长我六岁，他所被灌输的这些东西比我多。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东西是一个骗局。所以他有他理想主义的一面。他要用诗去歌颂他理想这一面。另一面完全是他感情生活造成的。他的真诚、善良，得到都是相反的结果。他爱的人不爱他，爱他的人他不爱。再加上政治环境，造成他多重性格。

问：梵高也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希望为宗教、为爱情献身，但社会回报他的都是拳头。

答：所以他才能这么辉煌。问题就在这儿。哪怕能够得到一个妓女，他也愿割去一只耳朵。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有哪一个艺术家能像这样活，没有啊！卖出的唯一的一幅画还是他堂弟来欺骗他的。这种人是天才。那完全是心灵中感觉，没有任何功利的，连基本爱的权利都没有。这样产生的作品我

认为才是伟大的作品。如果进入市场,那些东西就不存在。所以刚才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我沉默的主要原因,我总不能一个堂堂男子汉,走到哪儿都说我疼啊!我他妈失恋了痛啊!这他妈是男人吗?只是一种自我对话的产物,完全形而上的一种东西,这才叫诗。所以我称它为隐私的东西。满世界去喊,它就已不是一种诗了,一旦人为喊出来他就不再有这样的痛苦了。这种痛苦是喊不出来的呀!是没法传承的一种痛苦,没法转移的一种痛苦,只默默中自我来承受这种东西,这才能升华出来。只要有宣泄的通道,它就没法升华。所以,我认为这是这类诗人和后来到80年代所不同之处。所以我说,最优秀的人都有疯。而我只能改行做别的。所以我认为多多这篇文章写得极好。倒下的第一人,就像真诚。这一点谁也做不到。

问:你刚才说的隐私性,我还是能够引起共鸣。我觉得历史就是由这两部分人组成的,一个像你刚说的那样,另外作为封闭的社会,它毕竟还是要有一部分人去开路,这是肯定的。要不这个社会就永远封闭下去了。

答:我觉得是这样。在诗完成的时候,你起码能想到一个衔接的通道。但是我认为呢,实际上没有一个这样衔接的通道。这个你不能强加在你这本书中。你的主观意志,不能强加在这个历史断层上。

问:应该让当事者自己说话。

答:有些话我没法说。因为太知情了,反而不能说话。我跟岳建一说过,说了要伤害很多人。

问:我找过周舵,周舵很了解多多,他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慢慢的,只能够这样。虽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比较艰难,但是只能由当事者自己说。由于经历特殊,我知道人证、物证这

一套东西。最起码，历史是由这些非常细微的细节构成的，而不是像通常的表面上看到的大历史，就是非常宏观的那种。

答：所以我说，谈到朦胧诗这块，一开始我就有一个定义在前头，不知道你领会到没有，不能和绘画、不能和小说、不能和戏剧脱离，因为当时是一个群体。而只有那个时期有那么一段非常短暂的、灿烂的文化形态，很怪。第二次，就是在星星画展时期，后来我就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群体出现了，不为功利，执着的、纯粹是为了艺术。

问：《今天》创刊时期，如果没有一批自愿者的话，它没办法这么长期持续下去，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像赵一凡、鄂复明、周郡英，乃至赵南、李南、徐晓、王捷，当时基本上都没有发表作品，都是做幕后的工作，比如说读者来信把它装订起来，一大本。历史就这样构成的。如果我们还原不到这么细微的一些东西，那就没法言说。好像一个诗人，比如北岛，一下子成了无根之木。

答：北岛是属于无根之木吗？

问：我不认为。

答：还有一类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相互之间传。当时没有复印设备，只能是摘一些好句子。或者说想把这些句子传给别人看。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问：我们小时候都抄过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这个我很有感触。有的句子，你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觉得非常好。

答：对，包括什么叶赛宁、阿克肖诺夫，我看的都是手抄本。所以应当说有很多人，谁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只不过是在某一个圈子里先拥有。看到这些手抄本的人，而同时有这种生活遭际，才能够最后转为自己抄摘。所以，你要是在这里找到，假如说，这样一种延续性，或者延续的形态，我觉得，从我

所知，我只能作这么一个抽象的解释。因为这些都是默默无闻的。当然这些诗后来有传到东北去，传到云南去，传到宁夏去的，是吧？当时传这种东西都是有风险的，虽然有些没有什么，但起码它不是歌颂党的诗歌。完全和当时文化形态截然不同。当然接受的人也很少。不知到哪儿，这个手抄本就消失掉了。所以数来数去也就这么几个人。从张郎郎到徐浩渊这样下来，到我们这一批再接下来，再往下去，下面的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像星星画派那时的严力，因为我跟严力还有接触。去年他回国采访我，我拒绝了，我说我还没到写回忆录的时候，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没让他来采访。所以往后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话说到位了。

问：是吗？

答：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他们持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蔑视，就是这样。我知道你的诗出处在哪儿，你们抄谁的我也知道。所以，我说这里有资格的，应当是芒克，因为是芒克仍然在活跃着。

问：芒克这人很天然，也很诚实。

答：我觉得，后期对诗歌有延续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多多，多多我觉得是最真实、最勇敢。芒克是做了承上启下这么一个衔接工作。而北岛是把这些入给光大出去。我觉得三者之间不可缺一。毕竟北岛有这个勇气办这个杂志，把这些散落的诗给集中起来。这是真正对于诗坛有所贡献的。我没贡献，所以没资格说这个话。特别是多多，能够在那么一个时期写那么一篇东西。而之所以后来引起社会的注意，实际上就是多多这篇文章。我以为大伙都沉默了，没想到多多那么愤然地写了那么一篇文章。实际上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你们别在那儿瞎胡闹，玩去。

问：我觉得你说话非常具有激情，但实际上说的好多地方还是非常克制。

答：彭刚、芒克怎么评价我？

问：他们就是把某种生存状态描述得比较多。

答：比如说什么状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问：芒克、彭刚个性比较相近。两人出去流浪呀，然后回来呀，我觉得那种挺好，恰好就是一种非常细节化的。到了哪个地方没钱了，哪些地方脱了衣服去换吃的，等等。整个就是一种状态。与你今天谈的还不一样。你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分析，非常理性，非常好。

答：是啊！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细节。这个破裂是由于四角恋爱，可能五角，也可能六角，是导致这个圈子破裂的原因。我估计你们也知道。女人只有一个，所以这是很复杂的。我呢？很早就退出来了，因为我知道这很血性的。完了，我把它写了一篇小说。在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就传开了，引起了所有人的愤慨，要求给我画画，我就极其丑陋地被画在画布上。从那以后，我就退出了。

问：你描述这个东西时，眼神非常有趣，显得非常年轻。

答：实在不可言喻。我做人不愿意说别人。但是呢？我也非常深刻地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所以我依然又回到了原处，我宁愿和土地、和白桦林、和庄稼人打交道。因为我觉得那样才没有冲突。所以我真正好的诗，是后来才写出来的。

问：你给我们谈谈徐浩渊？

答：徐浩渊，这个还有好多恩恩怨怨，没法说，你知道吗？事情太多。我并不是说我将来要写，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是不太愿意说别人的。我只能说经历过什么，或者我对什么

的感触。

问：徐浩渊现在在什么地方？

答：不知道，但是这里面有名气的不是徐浩渊，这个我也没法说。有些人属于交际花，容易被人所知。但徐浩渊绝对不是一个能够把谁的诗抄下来给谁看的。她不是一个传承者。可徐浩渊也不可缺少，她能够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还有两类人，都搞创作的，有一类愿拿给别人看，有一类不愿拿给别人看，比如我，就是后一类人。我的确很难作出评价，我很难描述这些事。这些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我是一个多年在政治上有很多纠葛的人，可他们不一样，比如像多多，从来就厌世，所以能飘然而去，爱怎么着怎么着，气不过写一篇文章，啪啪往哪儿一扔，走了。根子，我想现在也过着安宁的生活。其实，还有些诗人都没看到了，后来在生活中也没有传名。这些一说出来就很远，都没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应当说，在一个社会处于最低迷的时候，文学恐怕是最茁壮的生存时期。

问：是啊！有些事令我非常诧异，比如彭刚和你吧，现在基本上不在个圈子里。彭刚是美国硅谷的什么公司的总工程师，科学家了。和这个圈子没多大关系。可是我把动机给他谈了吧，他就非常自然地把过程描述了出来。他还是觉得自己有这个必要，或者有这个责任。

答：我只跟彭刚有三次长谈，我可以跟你们讲讲这个细节。第一次，他问我，你说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我说不就是为了提高自我的生存价值吗？我们找不到另外的答案，姑且都认为是这个答案。后来我大学毕业，他又找到我，还是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现在你怎么回答。想了半天，他说《老人与海》，他说的也有道理。他出国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次酒，

我们又谈了这个问题,我用了一句话,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谁都有家,谁都有乡愁呀!还在不停地找。他说人生恐怕就如此。而正是这种乡愁才能引发我远离这个群体,但我并没有忘记这个群体,我现在仍然还有诗情。诗属于20岁以前,20岁过后就别写诗了。但我现在做事情经常不能够实现,很惭愧!但我时而还写诗。也就是说这心还非常年轻,还有这份诗心。

问:彭刚现在还写吗?

答:还写,属蛇的嘛。

问:我问他,你干啥那么早就罢笔了?他说是吓破了胆。他说多多把他的画藏到屋顶,后来日晒雨淋,再去弄,画就粘在一起了,老揭不开,那些画就这样毁了。

答:因为当时就凭这些诗、这些画就可以定罪。只要警察看不懂,你就是在影射。实际上我们诗里都有影射。现在是多元的社会,大家是较为自由来表达自己的任何情感,任何思想,没有那种压制。压制的反而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像《北方之歌》,你现在让我写都写不出来。

问: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什么压制。我曾给岳建一说,只要我收集的这些资料、采访、图片,这些最原始的东西能够编成一本书出版,公诸于世,就是胜利。

答:所以我非常尊重你们。但是你们确实要原谅我,我是知道事情最多,但也是最会沉默的一个。再者我躲避二十年了。牺牲了能够获取所有功名的机会,现在已经显得很沉静了。基于这一点原因,请原谅我。希望你们能编得很好,但愿这个时期出来的东西比较真实。

白洋淀琐忆

宋海泉

1968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最早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的,享受着战士出征的荣誉,后来者只配受到充军发配的驱赶。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无论它是出于一种政治姿态,还是出于经济的压力,抑或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实验,对于当时老三届或老四届学生来说,却不啻是一种强加于身的无可逃避的命运,对于这一点,可能有人具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大多数人还是一些模糊但却强烈的情绪。感到一种被抛弃的痛苦和惆怅,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和对前途的渺茫,对于家园的眷恋,固执地守卫着已经破碎的理想。这些模糊、强烈的情绪无从发泄。北京站的送行却使它找到一个适宜的宣泄点。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车站车厢,突然爆发出一阵揪动人心的声响。这声响,激越而又凄厉,这是由哭泣和叫喊交织成的撕心裂肺的声音。火车开出了北京站,转过东便门角楼看不见了,这声音由啜泣而渐渐平静。人们颊上挂着泪水,匆匆离开。北京站复归

沉寂。但这声音却永远在我心头回响，使我不得安宁。我几乎从头至尾地经历了全部送行，后来每到开车前我总要借故走开，我不敢再听到它，不敢在我心上再加一份伤。

郭路生在大家熟悉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写道：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
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
就在妈妈的手中……/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
的手，不能松/因为……

这只不过是一场景的一种诗的描述而已。

二

谈到当时的诗歌，不能不说到郭路生。

有人评论郭路生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

可惜，这个回归不是在一个人性健康蓬勃发展，并受到普遍尊重的条件下完成的，相反，是在一个人的尊严受到普



宋海泉近照

遍的蔑视、践踏、摧残，乃至丧失的情况下开始这个转变的。

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但在诗歌的王国里，它却悄然诞生。肉体可以被消灭，思想可以被禁锢，但是，被麻木的感情、被压抑的欲望、对幸福的追求，总是会复苏觉醒的。

郭路生的诗歌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复苏和觉醒。这种复苏和觉醒是初步的、肤浅的，虽然幻灭的痛苦已经击倒他们，但还固守着旧日的精神家园，编织着已经破碎的梦，大有“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气概。这种矛盾或者这种张力，使这种觉醒的感觉更加敏感。正因为如此，它们受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它们迅速地在知青们中间传抄着，反复地朗诵、吟咏、品味着。沉重的幕帏被掀起一个小角，显露出一片新的天地。

196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读到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实际上，自从上高中以后，每月都有一次诗歌朗诵课，在课上，同学们找来各种诗歌朗诵，可惜没有读过一首能叫做“诗”东西。只有一些夸张的、虚假的词句在蒙蔽着我们的眼睛，僵化着我们的思想，钝化着我们的感觉。为挣脱这一枷锁，我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那些“失望的灰烬”、“余烟的叹息”、“凝霜的枯藤”、“孩子的笔体”……朴素的词语编织了一种与心灵相共鸣的悸动，鲜明的诗的语言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反叛与抗争。黄山莲花峰顶，伴着云海天风，一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使我如坠冰窖，恍然若失。无论是飘落的雾雨，还是变幻的云海，无论是浮悬在云海中的山峰，还是身边的同伴，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一种巨大的绝望在吞噬着我，溶化着我，使我感觉着它的力量。

平心而论，使我们感到如此肠回气荡的，不是他诗歌的形式，而是他诗歌的内容。就其内容而言，他主要表现的是青春、幻灭、抗争和固执的希望。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思想情感。郭路生是他们的代言人。就其形式而言，他采用了我们熟悉的新诗中的严谨的格律体，易于大家接受，没有形式上的障碍。语言上，注意遣辞炼句，因而朗朗上口，有一种清新的宋词的意境。

三

几乎每一个人都曾问过我：“当初你们怎么想到去白洋淀的？”我总是回答：“我也不知道，鬼使神差吧。”

事实当然不会这样简单。

当我们一批一批地送走了同学，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在面前。留在北京是不可能的，拖延下去只会惹来麻烦。不愿意也不甘心被随便驱赶到一个地方，只有自己找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场所。为此，我曾联系过内蒙的阿荣旗（当时划归黑龙江）。这是位于大兴安岭的西侧，呼伦贝尔草原东部的一个县，地广人稀，土地肥美。海淀区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等校的同学集中在那里插队。一个偶然的时机，听到一些同学去了白洋淀，不由心中一动，也想到那里联系一下，碰碰运气。

在这之前，我对白洋淀的印象，全部来自文艺作品。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根据徐光耀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梁斌的《播火记》等，我几乎全都读过，尤其喜爱孙犁的作品。我喜欢他朴实洗炼的文笔，喜欢他淡雅隽永的韵味，喜欢他深厚的文字功力所表现的诗情画意。凭着这些印象，我把白洋淀想象成一个可以暂时栖

身避乱的世外桃源。

然而，情况完全不像想象的那样。当时那里可以称作“战火纷飞”，互相对立的两派在和平的土地上散布仇恨和血泪。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立，才使我们很容易地被占据县城的一派所接收。

1969年3月的一天深夜，我、刘满强、崔健强和许建新，乘南行的火车，向白洋淀开拔了。没有人为我们送行。结伴而行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夏柳燕等，她们去另一个公社插队。还有一名赴白洋淀“考察”以决定自己行止的同学。凌晨时分到达徐水，换乘马车，向安新县进发。

曙色在前方渐渐显现，前途却是茫然未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已然彻底地告别了昨天，告别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所踏上，是一条自我放逐的路，一条漫长的、充满荆棘的路。物质的贫困的是意料之中的事，重要的是，我们将开始一种精神的流浪生活。

四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保定正东九十里左右的安新县境内。一片片洼地，联成一气，长年积水，故名“淀”。南北最长处约五十里，东西四十里。其上游有唐河、猪泷河、漕河、瀑河等九条河流，号称“九河下流白洋淀”。其下游与白沟河汇合，改称大清河。在河北独流并入子牙河，雨季上涨，可向西漫延二十多里，旧县城安州也合并处于一片烟波浩渺之中。

白洋淀本身由大大小小三百多个“淀”组成。其大者曰白洋、烧车、藻乍等。淀与淀之间多以“园子”隔开，园子上长满芦苇。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初夏以后，芦苇长高，白洋淀就成了一片翠绿的世界，即使是站在高堤之上，放眼望

去，只能在绿色的缝隙里，看见一片片粼粼的波光。所以，此时的白洋淀，又成了一片迷宫的世界。只有熟悉道路者，才能在纵横交错的沟渠里自由地出没往返。

一些较小的较浅的水面，往往成片地野生着莲藕与菱角。可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不过，盛夏之时“莲叶何田田”、“映日荷花别样红”，确是一派北国江南的旖旎景色。1973年北京二十八中的袁家方（现在首都经贸大学）和张志国（现在《企业报》）到我们村，有感于此，随口朗诵了一首南朝民歌：东边一棵杨柳树，西边一棵杨柳树，南边一棵杨柳树，北边一棵杨柳树。树，树，树。束不住，郎舟住……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玉米熟了，水稻被谷穗压弯了腰。中秋佳节，玉宇澄清，袅袅炊烟，送来阵阵新米的清香，伴着淀水微微的腥味、收获后裸露田野的泥土芬芳。阳光下残留在田野里的庄稼茬子还在散发着温暖的气息，摇摆的苇梢却已传达着秋天的寒意。这一切交织成一阙交响曲，以气味为音符，高低、长短、轻重、强弱、色彩、旋律、和声，无不应有尽有，且组织得极为丰富，极有层次。

白洋淀真正的收割，是指芦苇的收割。开镰那天虽不举行什么仪式，但也够郑重其事了。几天前就磨好了大镰——那是一种专用工具，长约两尺，宽约尺半，竹竿为把，把长七尺有余。“打苇”是壮劳力的专利，汉子们也因此而自豪。每当打苇的大六仓出发，就像出征那样庄严。归来时一人多高的苇垛把船头压得低低的，几乎要埋进水里，而船尾却翘得高高的，摇船汉子站在高高的船尾上，卖力地用棹划水，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和劳动的尊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不知道周代的秦地是否有大片的苇地，反正《秦风·蒹葭》是这样写的。用它来描述深秋

的白洋淀是再贴切不过的了。霜冻过后，苇叶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苇秆在西风中抖瑟，像一支支手臂伸向太阳。古哲人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每当透过薄雾，影影绰绰地看见人们用大镰砍在瘦弱纤细、毫不设防的芦苇身上时，总忍不住一阵悲哀袭上心头，古代哲人的话像一首歌一样往复萦绕，挥之不去：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的芦苇……

打苇延续到封河。人们抢在水面封冰以前把芦苇入库。封河后人们要忙着苦鱼了。入秋以后，人们用苇箔把鱼过冬的苦地圈围起来，并在其中围起迷宫。人们用冰锥分段凿开冰面，进行初步捕捞，漏网者则被赶进下一区段。最后，鱼儿被赶到一个直径仅有一米半左右的区域，叫做“苦窝。”从苦窝里起鱼叫“出苦”。按常规：出苦由最强壮的劳力担任，出苦时，光脊梁，穿单裤，一碗烧酒下肚，抡起抄网一气不停地起完全部的鱼。围在周围的孩子用冰得通红的小手，从冰面上捡拾活蹦乱跳的鱼。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

五

徐水距安新七十多里。中间有一个三台镇，是打尖吃饭的地方。当时却是武斗的另一派的县委、县革委所在地。为防止对立派的进攻，各个路口设立关卡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我们一行八九人和一车行李，自然是重点盘查对象了。我们反复说明我们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的插队知识青年，行李里绝不会夹带武器弹药，还是不行。理由很充分：既然是插队，就应该由我们“合法的”县革委安排，对立派是非法的，他们不予承认。最后我们找到知青办，一位四五十岁、干部模样的女同志接待我们。她政策性较强，也很通情达理，在她的斡

旋下，终于放我们通行。

马车到达县城，找到接受我们插队的“流亡政府”，才知道还没有给我们安排好落户的生产大队。或许由于“抓革命，促生产”太忙，顾不上这些小事，或许根本无力控制下属各村的造反派。当时，武斗已接近尾声。各村的造反派掌握着村里的生杀大权，他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文攻武卫队，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流亡在县城的“公社领导”实际上不过是各村造反派的办事机构而已。

还算不错，暂时将我们安置在赵庄子。

赵庄子住有我校（清华附中）几个同学：周舵、杨一鸣、冯翥，以及北大附中的周锤、陈佩玲等几位女生。与之仅一桥之隔的李庄子也有七八个北京学生，其中有40年代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但和他们几乎没什么来往。几天以后，大队通知我们：由于村子已接收了几名知青，不能再接收我们落户。落户在赵庄子下游三里的下张庄的王洋兄弟邀请我们到下张庄去。一个多月以后，村里以同样的理由，婉言谢绝了我们。于是，在偌大的白洋淀上，我们开始了新的流浪。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几乎走遍了水乡所有的村庄，几乎认识了所有的北京知青。如果说来白洋淀插队是我们自主的决定，这次流浪却完全是阴差阳错命运的捉弄，完全是被动的驱赶，是我们初到白洋淀给我们的亲切而盛情的欢迎。

4月，是一个多风的季节，还残留着料峭的春寒。我们日复一日地在湖面上奔波。寒风吹打着湖面，掀起阵阵浊浪，湖面开出朵朵白色的浪花，浪花拍打着船头，同时也抽打我们的心。

在这次流浪中，我开始酝酿并写成我的第一首诗《水乡的流浪》。诗是幼稚的，仅是一种情绪的直接宣泄。像我的大多数

诗一样,我羞于拿它出手,最后连手稿都荡然无存了。但是,这是一个起点,从这里开始,我不再替任何什么观念说话,只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良知出发,说自己要说的话。另外,从这第一首诗开始,一个主题始终回响在我的诗中,那就是“流浪”。这是一种命运,也许是一个外在力量的驱赶,追寻那个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也许是受到一个神秘声音的召唤,去执行一种朦胧的使命,或许只是在找寻真实的自我。直到1974年写《海盗船谣》。

六

1969年5月底或6月底,我们终于在寨南落户了。从此,结束了流浪,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寨南仍属王家寨公社管辖。处于伸入白洋淀中心的一个半岛的尖端的一个小岛上,其正北三里是王家寨,再三里是郭里口,东北九里是赵庄子。沿大堤西南六里是大淀头,十二里是端村,二十里是关城,再走二十里即同口。端村东八里是大田庄,东南八里是邸庄。沿大堤蜿蜒西行十八里可到县城,走水路仅有十二里。安州则还要西行十八里。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各村的方位,是想让读者有一个完整的空间概念,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里,集中了北京、天津五百多名插队知青,其热闹可想而知了。

天津知青多属还乡,北京知青多是自谋。以原来就读的学校为核心,吸收一些合得来的朋友,散落在一个个孤岛上。整个白洋淀,就像当年的梁山泊,集合了一群经历不同、背景各异,以当时正统的标准衡量无一例外地都是些“妖魔鬼怪”。其实,他们不过是由于机遇多读了几本书,结合自己的经历多了

几分思考，朦胧中有一种独立的人格要求而已。

人们敏感地嗅出了“异己”的味道，便被视为异端。但是在学生们中间则不管这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则是旧相识。只要是插队学生，不论来到哪个知青点，都会受到招待。记得有一年中秋，寨南、淀头、马堡的几个人相约到关城访友，要找的人都回京了，只有一个女孩做河蚌养珠实验而留在村里。她刚从淀里采样回来，风尘仆仆的样子。见到我们很是高兴，立刻动手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邀来天津知青，一起大吃一顿。随后又开了一个联欢会，大家尽兴而还。我们在村口分手，沿大堤回家。月儿已升到中天，洒下朗朗清辉，四周的景物被罩上一层朦胧的色彩。我们默默地走着，一片静谧。只有水中的月亮在跳跃，随着粼粼水波化作片片金光。忽然，身后传来歌声，那是她在为我们送行。我们回头望去，月色里已看不见她的身影。

七

我常常碰到一个问题：白洋淀到底有什么特殊的人文环境，造成后来白洋淀的诗歌作者群体呢？

经济上，虽然比周围富裕一些，但绝对比不上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像太湖、鄱阳湖、洞庭湖那样的鱼米之乡，甚至比不上苏北的高邮兴化水乡。自五代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来直到元代，作为前线，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正因为如此，才由山西数次移民，以充塞京畿。明清之后，社会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白洋淀以东的广大地区，如沧州、天津等，多为盐碱地，经济一直发展不上去。这样，白洋淀真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华北平原上。

白洋淀不临通衢。趸船雨季时自天津可直溯保定漕河

镇。但由于大清河畔人烟稀少，强人经常出没，航运也不曾发展起来。

我曾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白洋淀人长有一双蓝色或绿色的眼睛。我怀疑他们是元代西域色目人留下的后裔。元亡以后，避祸于此，流传至今。可惜这仅是一个猜测，尚待有心人考证。

白洋淀的文化也不很发达。明清两代近六百年，仅清末出过一个翰林——潘龄皋。他的书法在当地和天津还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著名的北昆表演艺术家白云生，也是安新人。主要的文化生活就是唱戏。京剧和河北梆子是流行的主要剧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自己的剧团，虽说业余，但一腔一调、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大有科班的规范。

我曾有意考察一下动乱后的文化遗迹，为此访问过一些老人，大都心有余悸，因而讳莫如深。也可能是真不知道。我曾在大队的一个旧仓库里，发现过一堆“破四旧”时留下的破烂，其中居然有一副曾国荃手书的对联。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写出字来，居然清秀潇洒，仔细辨来，乃率更家风。

白洋淀出名，是抗日战争的事情。作为八路军一个军分区驻地，朱德总司令曾经视察过这里。著名的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反映敌后抗日游击队战斗生活的照片《雁翎队归来》曾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抗战爆发时孙犁正在同口教书，他描写白洋淀军民抗敌斗争的小说《荷花淀》后来收入中学课本，更是家喻户晓。

等我们到这里插队时，“文化”已成昨日黄花，留下来的只有“武化”。应该说，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是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的，诗歌作者群产生在这里，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

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龕。借助于这个生态龕,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

这个生态龕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中一批思想敏锐的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击。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写诗为例,他们时常就学习体会、书籍、诗稿进行交流,就诗歌理论、写作技巧进行切磋。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不同的领域之间经常互相启迪、借鉴,这种启迪和借鉴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境界。

其次,每个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从中汲取必要的知识信息。白洋淀这个生态龕远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三,安新县距北京三百里,相对山东、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而言,外地的同学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交流。仅就我村而言,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北京等地的同学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少则几日、多则一两个月的留住,是很平常的事情。

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

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远而言之,它继承了五四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创建新诗学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它减少了以往所不可避免的工具主义的倾向,多了一些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近而言之,它是对“十年浩劫”曲折而坚韧的抗争。借助于白洋淀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结出自己的果实。

八

当我们在寨南安顿下来之后，张建中（林莽）首先来我村造访。他与崔建强曾是同学，当时也在联系白洋淀插队。由于武斗不能进村落户。

我们在一起天南海北地神侃，交流读书体会，建中常常只是注意倾听，在必要时才插上几句。他是一位质朴、诚恳、值得信赖的人，富于同情心。他的一位同学于友泽（江河）的家受到“文化革命”的冲击，在北京已无家可归。建中不顾自己家庭同样受到的冲击，不顾自己可危的处境，毅然地把友泽请到家中，住了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插队的几年里，建中曾多次来过寨南。有时是借还书籍，有时是看望朋友，有时过来写生作画，有时并不为些什么，就是过来聊聊、坐坐。世上的事情并不一定都需要理由、借口的。但我却一直没有去过他蜗居的安州北河庄。在北河庄还有他的哥哥和嫂子。

1971年夏天，我们在堤上的新房盖好不久，建中来到寨南。这次他带着画布和颜料，准备写生。一连几天，他早出晚归，一天我们收工回来，建中拿出一幅画来请大家批评。

这是一幅颇具雷诺阿风格的风景画，画的是我村通往淀头大堤的一段。当时我们对印象画派并不很了解，虽然看过一些复制品，但因印刷质量不高，大都失真，很难领略原作的风貌。这幅画同我们看到的真实景色完全不同。夏天的白洋淀原本是一片绿色的世界，蜿蜒的长堤，被行人车马踏出的大道在蓝天和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令人目眩神迷的白光。在这幅画中，建中画出一个全新的色彩世界：青紫色的芦苇，赭石色的大路，紫红色的天空。细碎的笔触发一道忧郁的叹息。

从这幅画中，我似乎一下明白了色彩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可以由画家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从画家的创造而获得生命，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同时，色彩又是一种语言。画家用色彩同画布娓娓交谈，表达着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当我们不再把诗当做一种手段，当做一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把它视为一种独立的审美目标时，它便获得独立的生命和价值。文字、语言、技巧和结构，一切形式都是美的因素，它将所歌咏的事物映上美的光晕。

八年以后，我在学校的教室里做测定叶绿素吸收光谱的实验，阳光透过试管，叶绿素提取液呈现出一种典雅的暗紫色，根本不是通常所见的蓝绿色。我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建中的那幅画来。

也许就在他这次来访时，我给建中看了我的一首诗：《流浪者之歌》。建中曾言该诗对他的早期创作有很大影响，并保存这首诗的诗稿。现在看起来，它不过是19世纪《多余的人》的现代翻版，充满了纳西塞斯式的顾影自怜。

大约1973年左右，建中借走了我抄录当时插队学生中流传诗歌的本子。这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不知怎么搞的，建中给弄丢了。对此，我耿耿于怀。直到1974年他拿来《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和《回声》的初稿：

这曾是我心中的季节/漂浮着九月里明朗的清愁/
风中溢满你的声音/太阳是一簇野菊花/在黄昏的原野
上任情地游荡……

块垒冰释了，我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灵魂。

九

因为我们村的地理位置恰在进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我们

常常要接待很多同学。一两天的停留且不论，住上一两个月的，亦有人在，像甘铁生、陈准子等。而在寨南住的时间最长的，应该说是于友泽(江河)了。

友泽是北京四十一中的学生，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除文学之外，还写得一笔好字，画也不错。“文革”中家遭殃，只身留在北京。开始寄住在学校，给学校画一些宣传画，后来大家都上山下乡了，学校不能再住下去了，就寄住在同学家里。前后换过几处地方。直到分配工作之后，才在白塔寺附近找了一间房子安顿下来。长期的寄人篱下的生活，造成他敏感孤傲的个性。友泽来到白洋淀，大约在1970年春。先住在我们那里，后来则来往于寨南与北河庄之间，在我们那里，总有半年之多。

友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文学性的背景。他全文抄录了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全文抄录了梅热拉依梯斯的组诗《人》，甚至还临摹了书中的木刻插图。还带来了内部出版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寨南期间，友泽尚未开始写诗。他的第一首诗大概是1971年在北河庄写成的。从后来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上述作家对他的创作影响是巨大的。从《纪念碑》、《祖国啊，祖国》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聂鲁达的影响。从为纪念张志新烈士而写的《没有写完的诗》，则可以看到梅热拉依梯斯的影响。在诗歌理论上，有关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源于T·S·艾略特的新古典主义；通过古代神话而发掘民族心理积淀的尝试——《太阳和它的反光》，是受神话仪式学派理论的启发；他后期的一些语言实验，新的语境或语言空间的重构，则在意象派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十

姑娘，如果你在海边/请找到我的船儿/它是被风带走的/我的声音/你高高挂起帆/用天的蓝绸子/然后驾着它/像一片云/飘回/这夜的黑红的海岛/……

像演奏一阙奏鸣曲，孙康(方含)在呈示部里，永远向读者献上这样一个充满了梦幻的主题，奇异瑰丽、神秘、荒诞。浓郁的色彩，飘乎不定的愁情，随着旋律的行进而展开。但如果音乐只是天使的歌唱，那么谁来表现尘世的苦难呢？在孙康诗中，副部主题总有一组不协合音与主部主题相呼应、相对比，把我们的思绪重又拉回到现实，品尝现世的苦难：

我的一滴滴红色的眼泪
洒在秋天憔悴的脸上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孙康及其作品，可以说他是我们现代的行吟诗人，是热情圣洁的堂·吉河德。他唱着理想与追求的赞歌。如果说郭路生是执着的，他是在固执地守护着已然破碎的梦。孙康也是执着的，他却在义无反顾地追求生活的梦。1969年秋，我回京给生产队购买打苇用的旧皮鞋。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赶忙回村。我背着两个大麻袋，走出徐水火车站，早已过了开往安新的班车。夜幕渐渐垂落，我拿不定主意，是到大车店投宿一宿，还是在车站忍一夜。我想起有人告诉我孙康和几个北京三十五中的同学在徐水青庙营插队。我决定投奔他们。

青庙营离火车站并不远。我边走边打听，晚上8点半左右，果然找到他们的住地。

我在青庙营受到热情的接待，由此结识了孙康，开始了长期的友谊。

孙康为人坦直、诚恳、热情。像他的诗一样，他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忠实于爱情，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理想，忠实于友情。他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是从文艺批评转到诗歌创作上来的。

在徐水的那个晚上，他告诉我他正在钻研文艺批评，特别偏重具有社会学色彩的文艺评论。喜欢别林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屠格涅夫曾这样评论他们：“别林斯基是条蛇，杜波罗留波夫是条眼镜蛇。”他们两人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吓坏了老屠格涅夫。其实，在专制高压的时代，不论是怎样的一盏灯，只要是火，只要发出光来，就是黑暗的死敌。

我们还谈到了诗。他说他喜欢普希金和海涅，尤其喜欢海涅的爱情诗。海涅的诗对孙康的影响极深刻，甚至影响到他的生活的基本态度。正因为如此，孙康才成为那个时期的游吟诗人。

在孙康的诗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洛尔珈的影响。50年代初，戴望舒把洛尔珈介绍到中国来了。他曾翻译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洛尔珈诗钞》。想不到二十年后，以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流传开来。

如果把孙康的诗同海涅、洛尔珈的作品作一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密切的血缘关系。北国凛冽的严寒中，南国残酷的战场上，东方文化焦土的余烟里，同样倔强地开放着美丽的花朵以它的纯真傲视着这个世界。

孙康早期的习作，没有超出传统政治抒情诗的藩篱。两件事促成了他诗风的转变。其一是1971年依群诗作的流传，特别是《巴黎公社》，激励他走出自己的死胡同。其二是他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友，她是孙康大部分诗作灵感的源

泉,是他诗作的第一位读者,同时也是第一位批评者。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严格挑剔的眼光,注视着孙康创作的航船。

十一

1970年底,我村崔健强到县里开会。回来时带来一个圆胖脸、留寸头、长着一对招风耳,满脸憨厚笑容的小伙子。介绍说:这是大淀头的栗世征。小名毛头,喜欢哲学。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朴实的小伙子竟是后来呵神骂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多多。诗人自己描写当时的情况说:

一度我们是真诚的/就因为无知的样子很纯真/就因为
我们/还未学会扮演别人/还不了解价格/还不了解善良/是
一种最不经久的商品/……

毛头是以一只被阉割的苍狼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创作旅程的。他清醒的自我意识使他获得了成功,最终地找到自身的内在价值,完成了对人原始本性的回归。

毛头用荒诞的诗句表达他对错位现实的控诉与抗争,以实现对人性的救赎。但是这种救赎,不是以受难而是以沦落,不是以虔诚而是对神明的亵渎,不是以忠贞而是以背叛,不是以荆冠或十字架而是以童贞的丧失为代价来实现的。是的,这种救赎与罪恶之间仅一步之遥,真理和谬论之间也仅一步之遥吗?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读懂毛头的诗。就不再需要什么“非理性的独特经验”来“解读”、“发掘”什么“象征”或“隐喻”的意义了。

毛头曾在县文化馆唱过几天歌。不久就回北京正式学习声乐。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徐浩渊等人,受到深刻的影响。他不止一次说过徐曾经是他精神上的导师。

毛头开始写诗了。

毛头写诗很刻苦。他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这个大本曾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帮助和借鉴。应该说，它是一件宝贵的文物和史料。它不但记录了毛头本人学习写诗时的经历，还可以从它找寻一些诗人的思想和技巧的血缘关系。如果说，“文化革命”十年是文学空白的十年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它被事实所否定。那么，新潮的诗人们完全凭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灵感，写出极具现代色彩的诗的论断，恐怕也是武断的，不符合事实的。

毛头每年将自己的诗集中抄写在一个大本上（同前面提到的抄诗的大本一样的格式），我曾读过最初的两本。当时，我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他诗作中所讲的一切，仅吃惊于他惊世骇俗的诗句，同时也隐隐感到一种罪恶的喻意与悲凉。第一本诗集已印象不深了，只能记起一些零散的句子。第二本诗集题名为《手艺》，取典于前苏联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尘世的特征》：

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一个匠人/懂得手艺/
诗集也是题献给茨维塔耶娃的。不清楚毛头的是把自己看作茨维塔耶娃的私淑弟子，把她当做缪斯的化身而敬献自己的诗作呢，还是另有所指。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对茨维塔耶娃又能了解多少？不过是爱伦堡的两篇文章而已。其一是50年代为出版茨维塔耶娃诗集时为其写的序言，其二是《人，岁月，生活》中有关她的章节。但无论怎样，茨维塔耶娃对毛头的影响不容忽视。后来发表的《手艺——和茨维塔耶娃》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毛头反其意而和之，但我认为这是读懂毛头诗的钥匙。毛头对自己的诗改了又改，精雕细琢。很多作品发表时同我当年看到的已大不相同。坚持诗

的形式美，坚持人性的立场，在这两点上两人是一致的，越过这条线，两人便分道扬镳了。茨维塔耶娃所有生活中孤独的苦难、温文尔雅的高傲、敏感而压制的心灵、不被允许的爱，统统被以优美的辞藻，神秘的韵律，化作一行美妙典雅的诗句，展示了她那金子般的心灵。毛头却拿着一把人性的尺子，去衡量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一切扭曲的形象，但就其本质来说，毛头应该属于理性化的诗人。

1973年冬，史保嘉从兰州回京，在我家见到毛头，第二天收到毛头的诗集。事后保嘉告诉我：“这几年太闭塞了。终于读到了一些可以称作诗的东西。”我想起根子的话来：“别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

有一次，毛头很严肃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有犹太血统。”

我很惊讶，忙问：“是从父系传来的，还是从母系方面传来的？”

“母系方面。”

“何以见得？”

“我外祖家是世居开封的犹太人。”

恰好，我也是开封人。我知道开封确曾有过一支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但现已流散各地，杳无可录了。如果有人对此认真地考证一番，确证这一结论，不失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更重要的是，毛头诗中强烈的赎罪情结，便可以得到一个人类文化学上的解释：古代希伯来人“原罪”和“救赎”的观念，通过家族遗传，以一种现代方式，表现在诗的形式中。

1974年，根子遇到了一些麻烦。毛头到我家来，要走并烧毁了他的诗稿。此后，我们便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了。

十二

1971年夏天，淀头的其他四位成员：卢中南、何方（伴）、岳重（根子）和姜世伟（猴子即芒克）进县城看望毛头。我搭乘他们的船返回县城。至此算是结识了淀头“全伙”。

一路上他们模仿淀头土话，惟妙惟肖，不时地逗得我哈哈大笑。中南和根子的模仿能力极强，根子更有一副浑厚的男低音。以后便被中央乐团招走。当了男低音歌手。他的主要创作活动都是在北京进行的。

插队的最初一两年，知青们尚能安心在农村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没有希望的生活是阴暗的，阴暗的生活是最难忍受的。1971年悄悄地开始了逃离农村的“运动”：有门路的参军，有些艺术才能的考团，根正苗红的上学或招工，其余的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

几年的插队生活，使知青们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生活的严酷现实，粉碎了原来戴在眼睛上的“橘红色”的镜片，现实的光芒直接进入他们的眼睛。

现实是真实的，而起初的光是尖锐的、灼热的。只有强者才能承受住它致命的灼烧，用它强大的营养，营养自己黑色的生命。

根子以他先知式的男低音，宣告这个蜕变的完成，宣告着“心”的成熟：

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次/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它/没有融化，没有龟裂，没有移动/不过在礁石上/稚嫩的苔草，细腻的沙粒也被/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烫死/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不见了/枯黄的透明的光泽。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了/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不再

闪烁

……

我是1972年夏天读到这首诗的。那是一个明媚的星期天。利用教课的闲暇。我到淀头造访。我知道村里只有中南和猴子在，不想伴伴刚从北京回来。

知青宿舍里挂满了中南的人物写生。我们信口开着画中人物的玩笑。猴子不知野到哪里去了。

伴伴递给我一叠诗稿，对我说：“你看看这个，刚从北京抄来的，我只带来这个。”我扫了一眼题目：《三月与末日》。心想：“又是谁在故弄玄虚，用死亡、末日一类的字眼来哗众取宠。”我顺着诗行读下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动，以至拿诗稿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反复几次，才把它读完。这时，我也已经精疲力尽了。我感到我面对一个“狞厉”的魔鬼。这个魔鬼不同于反抗上帝、终于失去乐园的撒旦，也不同于游戏人生、与上帝赌东道的摩菲斯特。像什么呢？有几分高举反叛旗帜，以其犀利的冷漠傲视世人的拜伦的影子，有几分波德莱尔的影子。

根子对诗坛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说依群开创了地下诗歌运动形式革命的话，根子则以其震撼的力量给诗坛带来一种新的生命。他使诗人的视线聚成焦点，回到自我本身，回到了对人存在状态的准确、冷静和近似残酷的把握。他第一次敢于对未来喊出：“不！”

十三

根子对未来的回答是“不”，猴子（芒克）对现世的回答则是“是”。这是两人明显的区别。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从相反的方向肯定人对生活的不同选择，肯定人的自由的权利。

毛头后来把猴子描绘成一位“自然诗人”，称他是“自然之子”。决不可把这里所说的“自然”理解成为与人相对立的自然，“自然诗人”也可理解为谢灵运一类的山水诗人。这里所说的“自然”，乃是没有被社会所扭曲的自然的人，野性的人。他直接面对人的最自然的本质，抗议对这种自然天性的扭曲。

猴子在白洋淀呆了七年。当大家忙着找出路和返回城里的时候，他还留在淀头，一味地生活与写诗：

在开花的时候/孩子们想要到田野里去做客/他们的欢乐/如今陪伴着耕种者/又走进这收割的季节/啊，秋天/我没有认错/你同样是开花的季节。……/啊，你这蹲在门口的黑夜/我的寂寞/秋天来了/秋天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从1972年起直到1975年回城，我一直在村里教书。除了假期，总是呆在村里。与猴子的交往自然就多了一些。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诗，交流心得体会，讲述过去的的生活。猴子给我讲述他和彭刚在武汉的流浪，当时身上只剩下一角钱，为了能体面地向人家乞讨，又怎样花了五分钱买一盆洗脸水，两人争论应该由谁来使用这盆水，而洗过脸后又必须尽哪些义务，最后又如何回到北京。我也给他讲述自己在山西、陕西的流浪，如何同盲流们一起扒车，如何为躲避列车员的查票，在列车上展开令人心跳的捉迷藏游戏，如何过黄河，如何登华山。当时，《在路上》、《麦田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书曾在知青中流行，受到它们的影响，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流浪的经历。80年代初，国门初开，我重回校园读书。一位美国来的留学生说，《On The Way》（《在路上》）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从50年代到今天，几次在学生中风靡。他到中国来读书，惟一带来的一本小说就是这本《On The Way》。

猴子宣称自己不考虑理论问题。心里想什么，写下来就是诗。是的，猴子他有极其敏锐的诗的感觉，就像晨光中的一个小孩子，世界对他来说永远是新奇的、鲜活的。猴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为了摘采已然成熟的诗的果实而已。

有一次，我向几个同学谈起猴子的诗，随口背了一节：

在粗粗细细的路上/我和她并排走着/——她是风

我的听众显然是被打动了。他们从诗句中体会一种巨大的孤独、寂寞和空虚。体验到一种孤立无援的悲哀，同时还有一种承受孤独的勇气。最后一个同学开口了：“他与风并没有相对运动，又是怎样感觉到的呢？”

80年代以后，猴子的诗更加成熟了。不但保留了早期诗作中的新鲜敏锐的感觉，保持着那颗爱心，更具有一种理性的完美，他把自己对诗的感觉引向了更深的层次。我指的是《旧梦》、《群猿》、《没有时间的时间》等长诗。

十四

“文化革命”的十年是思想极端禁锢的十年，但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十年。再也没有比黑夜中的闪电那样震聋发聩，那样撼动人心，那样长久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了。

黑夜里第一道刺眼的光芒是遇罗克。《出身论》第一次宣告了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为此，他惨遭杀害，成为思想解放的第一位殉道者。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十几年后，赵振开（北岛）写过两首献给遇罗克的诗：《宣告》和《结局或开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与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能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

的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其后,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在自己哲学手稿里,借马克思的口重申了费尔巴哈的命题: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是人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人关于神的知识就是关于自身的知识”。在造神运动达到顶峰的时代,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把神降低为人,实际上是把世俗的人提高到神的位置,把对尘世的人的关怀取代对宗教的神的崇拜。马克思说:“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身现实的太阳旋转。”

赵京兴曾在白洋淀住过很长时间。他的女友陶雏诵是师大女附中学生,和戎雪兰等人同在大田庄公社的邱庄插队,与振开、毛头、猴子都很熟。后来振开和保嘉到白洋淀,就住在那里。振开的弟弟赵振先也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陶雏诵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有一次我问陶:你的名字是大声朗读的意思,其中有什么典故吗?她解释说:她出生时,正值其祖父的一部著作——《庄子雏诵》完成,所以她取名“雏诵”,以示纪念。

1969年夏天,赵京兴的手稿在学生中间流传。它标志着已然广泛开展的读书活动已由古典文学领域深入到现代文学领域,进而深入到哲学领域。这种读书活动对日后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通过日后的诗歌创作逐步显示出来。

归纳起来这种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体与价值的转换 前文已经谈到,自郭路生开始,诗歌作者们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读书活动对自身奴性及宗教情绪的批判,使这种朦胧的自我意识逐步自觉,最终使个体的人站立起来,完成诗歌主体与价值的转换:重建人的

尊严,发扬人的个性,自己做自己的道德主人。不再背离自我的良知,不再做神或他人的精神奴隶。这几乎是当时所有读书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第二,注重感性与个人体验 自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把具体真实的世界分离为二:主体和客体,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理念主义者们认为人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动不定,幻灭无常的表象的世界,是另一个永恒、完美、实在的“理念”世界的影子。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宗教所追求的,便是这样一个“理念”的世界。因此,他们鄙视感性,鄙视肉体,否定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以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牺牲作为向那个世界的祭献礼,“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毫不掩饰的表白。

读书活动转换了他们被长期灌输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信条。感性的实在性、丰富性重新得到确立。这使以后的诗歌创作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这种转换,在根子的《桥》这首诗里得到宣言式的表达。

第三,怀疑主义与荒诞 怀疑是人类认识进步的一个前提。现实生活的矛盾产生广泛的怀疑情绪,使大家冲决虔信的罗网。读书活动深化了这种怀疑。他们不仅怀疑现实的政治生活和当前所坚持的道德教条的合理性,并且进而怀疑自身的宗教情绪和人的理性,怀疑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存在的荒谬状态以及由此引起的迷惘、焦虑和孤独感,在他们日后的写作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第四,形式的语言的探索 读书活动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他们认真地学习了当时可以找到的近现代诗人的作品,从中汲取必要的营养。概括地说,他们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波德莱尔以后的象征主义的诗歌。在日后的创作中刻意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境界:奇谲瑰丽,光怪陆离,鲜明的个性,细腻贴切的感

觉,具有强悍的生命力。

随着诗歌从工具到审美目标的提升,他们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进行探索,从而达到一种疏离化的效果,形成一种新的审美张力。这种新的审美经验加入到五四以来建立新诗学的努力之中,形成这个传统中的一道艰难的涟漪。

大概是1972年的秋天,我们在圆明园搞过一次野炊活动。毛头与我村的三个同学曾在大水法残迹前合影一张,戏题曰:四个存在主义者。

十五

1972年底或1973年初,史保嘉带来一位瘦瘦的青年人。他就是后来的北岛。

早在见面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一些诗,像《金色的小号》、《百花山》等。他的诗中有一种清秀的气韵,表现出比较深的语言功底。当时正是大家思想激烈转变时期,大家比较推崇思想力度更强的作品,振开的作品以其清新秀丽而别开生面。

振开早期比较喜欢叶甫图申科的作品,他曾向我背诵过叶的诗作《娘子谷》的片断。叶是前苏联60年代最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的创作涉及极广,最有影响的是他的政治抒情诗。这一点可能也深深地影响了振开,在《今天》上发表的《回答》、《一切》、《宣告》等就其内容而言是对非人道的政治的抗议,是争取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呐喊。它们代表了普遍的社会良知,代表了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义愤。就这一点而言,振开作为新诗潮代表人物的地位,将是不可动摇的。

1978年底,《今天》第一期出刊了。从中认出许多老朋友来。不久,振开找到我,要我参加他们的工作,写一些诗歌评论

或诠释。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编委会的工作会议，但终因家里一对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实在不及旁骛，只得回绝了他的邀请。

十六

尼采宣布：上帝死了！

他实际是在说：人，你要勇敢地站起来，超越旧的道德，超越旧的自我，在没有任何外在形式的前提下，自主地进行你的道德选择，承担其责任和后果，哪怕你面对悲剧的命运。

回顾二十年前的插队生活，回想起当年的同伴，回想起当时艰难的探索，觉得它们已经很久远了。是的，这一切都成为历史，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对新的一代来说，也是一种阴影、一种负担。他们可以从任何起点上开始自己的生活。但对于当时的一代人而言，却是别无选择的。

1994年9月4日

到对岸去

齐 简

二十多年前，我曾到过著名的黄河古渡口——风陵渡。那时风陵渡铁路大桥还没有修通，行人往来都是乘摆渡。船舱很深，抬头能看见沉沉的天色和船夫们绷紧了劲的身躯。船驶入激流，开始颠簸，那船身一倾的瞬间，只见滚滚的黄河水仿佛来自天边，天涯无际，气象苍茫，使人顿生悲壮。那首不记得何时读过的《箜篌引》不由涌上心头：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我们是在渡一条历史的河。

那时候，我们被迫中止了学业，又被迫脱离了正常的生活模式，思想却依然惯性地沿着以往多年形成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轨迹运转。当理想在严酷的现实前撞击得龟裂、扭曲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受着那种锥心刺骨的失望乃至绝望的痛苦，一面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读书、写作，并且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以文会友，形成了若干个群体，从不同的角度与途径进行着不懈努力。当时北京学生中这样的群体很有几个，互相之间也有一些多边的接触和重合。在这些群体中孕育了当今许多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和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

那时有不少人写诗。由于几千年民族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上以毛主席诗词为主要教科书的诗歌教育，因此起初写旧体诗的人居多。但是尚谈不到创作的自觉，只是一种宣泄，把那种混杂着青春、理想、郁闷、茫然和反叛的情绪浓缩在字斟句酌之中。记



齐 简(史保嘉)

得那时与我有过诗词交流的有我的同学戎雪兰、潘青萍，还有师大附中、二十八中、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一些同学。

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他对个人真实心态的表达唤醒了我，使我第一次了解到可以用诗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杈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大致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鱼儿三部曲》等。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1972年底到1973年我曾回京小住，结识了北岛、多多和芒克等人。这时的北京已是新诗的盛夏，而来自白洋淀的诗歌则是其中的一支劲旅。今天当我们用“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称谓来界定当年的诗歌现象时，我想至少应当有两层含义：第一，当年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了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白洋淀作为水乡，它符合人类“逐水草而居”的天性；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水乡，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知识青年对现代文明的眷恋与追求。在当时思想交流媒介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白洋淀与北京的距离便成为不可多得的一个优势。尽管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文化的，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在反文化的表层下有一条巨大的思想文化之河缓缓地流动着。惟其如此，处于这一流域的白洋淀才得天独厚，成为人杰地灵的诗歌的风水宝地。第二，广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自然包括当时主要生活在北京的地下诗人们，如北岛、江河等人。但是“群落”并不是流派，它不是诗风的集合，而是诗人的集合。我喜欢郭路生深情的新格律诗，也喜欢北岛的凝重，芒克的率直，更何况即使是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品味。从这个角度理解，“群落”的提法很迷人，很原始，很自在，令人想起半坡村，想起山顶洞人，回响在山野之间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在蛮荒之地上开垦文明的劳动。

多多曾经给我看他的大两本诗集，那是当时文具店所能买到的最豪华的三元五角一本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其中一本扉页上题着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或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句。见到芒克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总蒙着一层薄纱。那是在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我与北岛相约去白洋淀造访在那里

插队的朋友。我们乘夜间零点从永定门始发的慢车，于清晨到达保定。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宋海泉，再从县城走水路先后到郟庄、寨南、端村和淀头。淀头是芒克、多多和岳重落户的地方，当时只有芒克一人在村子里，他将我们送到端村。在那道长长的河堤上白茫茫的夜雾中，他活泼如顽童般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把这个印象与他诗中的深沉忧郁统一起来。

此岸与彼岸之间本无一条明显的界限。为了显现它，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参照系——河流。同样，当以人的自我意识为参照系的时候，就可以将以白洋淀诗歌为主体的新诗与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抒情诗区别开来。这是一个诗的本质的区别。至于诗的形式，是格律的还是非格律的，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它表现的对象是人类普遍的永久的情感还是诗人片刻间乃至下意识的感觉，则是见仁见智无关宏旨的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新诗也许有一点像佛教的禅，有缘者当下即悟，无缘者百思而终不得其解。很多新诗我自己也始终没有读懂，也常常困惑于究竟是自己资质愚钝还是那些诗本来就是皇帝的新衣？尽管如此，作为当今许多新诗泰斗的同代人，我仍然感到自豪。

如今，当年的诗友们已四散在世界各地，而我们依然在渡那条河。

春季白洋淀

甘铁生

如今,很多往事已经模糊不清。记忆一张褪色的照片,只有个别细节还在脑海里如同跳跃的浪花,偶尔将光斑一闪,让你欣喜地张网将它捕捉。

1974年,春节过去了。该回村务农了。想到回村我就有点怵头。说实话,我并不怕只靠肩挑背扛的艰苦劳动。当初选择那个偏僻、冷落、仅有九户山民的小山村,不就是去自讨苦吃的吗?不就是想凭着青春热血和精力,体尝一下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吗?我们不是都说,要用我们的手,拼出一个沧海变桑田的世界?况且乡民们不是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息繁衍吗?但仅仅几年,知青以激情谱写的理想之歌就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悲怆凄惶的唢呐声。理想彻底破灭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对当时流行观念的嘲讽,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探索,使我们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串联”,希冀在再次深入社会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定位。我三上华山,数往晋祠,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也已经浪迹了一番,并且不止一次地和朋友探讨过全国旅游的方案。这当然要比呆在那个写满惨痛的幼稚和失败的小山村有趣得多。(想想自己那么满怀理想地奔赴农村,实际是受一场政治骗局驱使,是治国理



甘铁生近照

念的荒谬导致了经济危机，致使数百万知识青年沦为应急措施的贡品——你还能偏爱那里的劳动吗？)

我想去白洋淀。早就知道那里是一片云梦泽国。而且有很多同学和朋友在那儿插队落户：张建中(林莽)、宋海泉、崔建强、栗世征(多多)、潘青萍(乔伊)等等，有些虽然没见过面，比如姜世伟(芒克，又称猴子)、岳重、赵京兴和陶雏涌，但已久闻大名。很多朋友已去过，如于友泽(江河)、赵振开(北岛)等，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儿的水上生活，对久居城市或山区的人，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应当说，除了那儿的环境，还有个吸引的地方，那就是这些朋友在当时那个年月，都决非等闲之辈。大家都在读书，都在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蜿蜒迂回。

我、多多和其他两个在白洋淀插队的小伙子结伴乘火车途经徐水前往白洋淀。

那天，白洋淀风不小。摆渡我们的渔船顶风向大淀深处荡

去。我觉得很开心，便和多多在船上把此行的路线决定了下来。

第一个晚上在寨南度过。这村的宋海泉当时在我们这些插青中，学问是最庞杂的，可谓博今通古。至今仍能对任何问题旁征博引。他还多才多艺，除了吟诗作赋，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他同村的崔建强则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还有个叫刘满强的同学，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来，真是声震寰宇。多多的歌喉也不错。大概和根子（岳重）在一起的缘故，他始终没扔下练嗓子这功夫。除了醉心于现代派诗歌，他还醉心于意大利男高音的美声技法，动不动就是“呵，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白洋淀的鱼鲜美异常。那时食油供应紧张，但在这里做鱼，只是把收拾干净的鱼往锅里一放，再加点醋和盐之类的佐料，就会做出极美味的鱼来。饭桌上我们谈政局、谈种种小道消息，谈那时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流行的黄皮书和灰皮书，也谈其他朋友写的诗或小说什么的。但更多的是把自己欣赏的譬如惠特曼、艾略特、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杜琳娜、波德莱尔等等的作品推荐给大家。

那时候，这些作家、诗人的作品都是禁书。中国的书架上只有几本书，舞台上八个“样板戏”。文学艺术有“样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是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十七年出的所有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都不知从哪个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这些书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这些书在我们之中神秘而迅速地流传着。没

人问它的来路，只是被催着快读快还——还有别的人在等着看。于是昼夜兼程地读，做笔记。那时，只要谁那儿有这类书，就会成为大家推崇的人物。

白洋淀似乎刚刚通电（这就比我们山村先进多了，我们仍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电费，灯的瓦数都很小。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胡吹海聊到很晚才睡去。

第二天，宋海泉在队上借了一条船，一行人唱着叫着杀向邸庄。和我们的山村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的居室前都是水。这里是很深沉、很安静、呈深绿色的湖水，而我们建在半山坡的居室下面则是清澈、奔腾的乌马河。“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我们都自视频高。

邸庄知青宿舍处的位置不错：房舍前面的地势比赛南知青的宿舍开阔一些。潘青萍在北京尚未回来。戎雪兰和她的男朋友在。她的男朋友高高大大，很有艺术家的风度。在白洋淀他和戎雪兰一块儿画那些在当时的离经叛道的现代派油画。我们去那天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事在闹别扭，戎雪兰的小姐脾气发作了，把男朋友的画笔使劲地抛到淀里，他就蹲在淀边默不出声地打捞。赵京兴和陶锥诵也在。那时赵京兴刚刚出狱（他因为写了不少哲学方面的文章而触怒了极左派，被抓进监狱关了几年）。当时的赵京兴已经在中学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学者形象。在哲学和马列经典方面，他又是权威。他的名声在我们这批中学生中不胫而走，受到不少激情澎湃的少女少男的崇拜。在白洋淀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关于他和陶锥诵的爱情，也被中学生们广为传播。在那零乱而又破败的房舍里，我们自然是先把熟悉的朋友们的消息交流一番。后来大家就问赵京兴蹲监狱的滋味，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刚被放出监狱大门的情景：“我背着在监狱里用的那些破行头，一走到居民区，

一看见那些低矮的房子，肮脏的街道，蹲在地上拉屎的孩子，还有在狭小的天空盘旋、不愿离巢的鸽子……就强烈地体会到自由的可贵。狱外面的一切都被我赋予了梦寐以求的诗意。恰好我行走在一家人的窗口下，从那里传出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一下就坐到墙根下，等所有的嘈杂声都消失了，只有伟大的贝多芬在诉说着生命音符……”

我听得十分感动。一个希冀洞察社会和人生的青年在追求中付出了代价。也许这是中国特定的环境里普遍的现象？也许这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必然的命运？在亚洲、在第三世界、在中国……在白洋淀的这间房舍里，陶锥诵痴迷地望着他，那目光显示她的全部世界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我们都显得有点睡眠不足。在黑暗里凑在一起，躺在床板上聊那些在村子里遇到的事儿，谈自己阅读的好书，是很够气氛的事儿。

多多和我睡的床铺为近邻。每当谈到形势时，他总是特别认真。我知道他在创作上很有魄力，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自我保护能力。在这点上，我们很多人都不如他。记得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气急败坏地跑到我家说：“据可靠消息，你准抄了我的诗。”那会儿我们之间经常传看一些文稿，看到有漂亮的句子，意象深邃的诗篇，总要摘抄到笔记本上。虽然不愿意，但我还是让他翻了我的那些笔记本，撕下了有他诗句的那些页码。然后他问还看见谁抄过他的诗句，谁从我这儿抄过这些诗。他于是说他还要去谁谁的家去翻找，告辞走了。他的气急败坏让我也沉不住气了。那时我写过一个一万余字的中篇，叫《第四次慰问》，从知识青年的命运揭示那个时代对良知的摧残。这篇东西我在一些知识青年聚会的场合里念了三次。我从来不敢让它落在第二人手中。记得有一次我在徐浩渊、李胜平

那群朋友家念它后，徐浩渊到我家提出借手稿带走，我拒绝了。我当然担心成为地下文学的查抄目标。他走后，我便将稿箱里的文字，通通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当时干啥不将稿件转移呢？事实上多多也并没将自己的稿子焚毁，他只不过转移到什么别处去了。

划着那条船，我们一行人前往多多他们村。我很想见见猴子（芒克）。那时我只是听说过这个侠气颇重的诗人。他的诗纯净美好，像是无邪的单簧管在大自然里抒发情感。他不太和书卷气浓重的人厚交，但却喜欢和同村的农民为伍。盛传他在村里爱上一个姑娘，拼死拼活地要娶她。他和村里的后生交朋友，把他领到北京的家里住。一次，猴子的姐姐终于发了脾气，轰人家走，猴子就帮助村里后生一块儿和他姐姐干仗。很显然，这是我们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还知道他和一个叫彭刚的现代派自由画家一同流浪过——效仿美国作家莫里亚克的《在路上》那种既浪漫又疯狂的方式。

在大淀里，很容易迷路。我尤其辨不出东西南北。我看淀里的景致总是大同小异：小路的两侧是方阵一样的芦苇荡，鸭子在那里游来游去。靠苇荡的地方总能看见鸭子下的蛋。他们村距离郟庄总有半天的水路。记得那一天划船的是多多，他竟然一路划一路辨别方向，没出什么差子就到了他们村。他辨别方向的能力确实让我佩服。

没见到猴子，我有点失望。说实话，我真想知道他对身边的一切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能那么投入地融入村舍之中，那么真心地交村里的朋友，在我总是难以做到的。但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那个太行山的小山村里，知识青年已经全部谋生走了，有的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只剩我独自留守插队。他或许能启发我干点什么。

在宋海泉的寨南住了一个月左右。在那里我读书、游泳，真是悠哉游哉。我们在大堤上闲聊，有时讨论一些颇为深奥的问题，谈文学，谈诗歌。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眼下这个样子，危机已如狼烟四伏。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这样，当祖国摆脱了病恹步入健康发展那一天，我们就不会是隔岸观望的帮闲，而是搏水弄潮的健儿。

此后，我又回太行山的大坪村。在那里务农到秋天，卖了一些议价小米和玉米，卖了一件自己打的小衣柜，带着那点钱，和李胜平结伴继续第二次辉煌的全国“大串联”去了。

1994年8月28-29日

昔日重来

白 青

白洋淀明眸皓齿。美，成为我们的宿命，这或许也是“白洋淀诗歌群落”衍生、存在的诠释所在吧？

当时情形虽然生活困窘，大环境压抑，但在美丽的白洋淀，友善的人群，淳朴的村风，使无以为诉的小知青们自然跌入酒神状态。寻找到称之为诗的独特载体，诗也过重地承载了那些苦辣酸甜，又漂浮升华到精神对等的高度。它不是叛逆谁，反抗谁，假如具有了这样的客观性，恰恰证实了残酷的真实与诗的反差和距离。

那时候我也写诗，我的一本写诗的小本子曾经被传看。后来北京另一位知青跟我说他把自己的下乡日记烧了，还说“文革”中因日记翻腾出旧事倒霉的人及历史上的文字狱等。我终因忐忑不安而烧了那个小本子。里面的诗是不需要读者的，更无功利可言，没有读者的诗不认同谁，甚至不认同作者本人。这件事我在叙事诗《赠友》中提到过。

我们并肩走过沼泽/沼泽被我们的足泥填平了/…
…乡间日记，焚烧了/好像有一重古老的隐忧/……葡萄架下，迎来一群群超逸的朋友/大家都像云彩在那飘过/
只有故事流传着

在大淀头村插队的有三位诗人(根子、芒克、多多),我知道芒克写诗较早。我曾问过他何处是归所,他振振有词地侃了一通感受人生、书写人生的模糊模糊的道理。他说,他非盲目瞎混之辈,他在写诗,还神侃了一通诗的分类,写诗的方法和白话诗许多空位有待填补之类的。我对芒克对诗的高起点认识觉得新奇。

1971年冬天,芒克在大炕上给我读了《致渔家兄弟》。当时感到这首诗普希金味很浓,激情流畅。好像还有五个姑娘围着“我”跳舞的一首诗。画面鲜丽,有音乐效果,曾因之取闹故有记忆。

从1972年冬到与芒克分别后仍保持联系,1974年他曾把一本书为《绿色中的绿》的诗集寄给我们。

1973年我重又写诗。回忆起芒克对诗的挚爱与才气,感叹不已。

重返白洋淀,当我与芒克跪在我母亲的坟前,想起在我们小哥儿几个最困难的时候,妈妈从天津来看我们的情形,不由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我们向老人家深深跪拜。妈妈孕育了我,白洋淀孕育了一代诗人。

1994年4月

我也与白洋淀沾点边

严 力

1970年，我从湖南衡阳我父母所属的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接受中学的工作分配。我去干校前注册在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芒克就是在我回北京后不久认识的，那时我刚刚十六岁，在手抄普希金的诗，而芒克那时已写了不少诗。他因为刚从白洋淀回来不久，讲了不少有关白洋淀插队的事情。他鼓励我写诗，当时我们确实以为喝酒打架再加上读诗写诗是最英雄的事。于是，我写一些悼念我爷爷的诗，因为我爷爷在1968年自杀了，现在想起来，难道是自杀这个人类事件诱导了我写诗的神经？

芒克陆续介绍我认识了一帮画画和写诗的人，画画的有彭刚、张寥寥、鲁燕生和鲁双芹，写诗的有赵振开（北岛）和栗世征（多多）。之后就和芒克、北岛、多多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多多手抄了从各种出版物上能找到的西方现代诗，我最起码向他借过两大本拿回我当时的工厂宿舍转抄。我们在一起有一种幸福的滋味，这滋味一起嚼了五六年，直到1978年前后。大家都从略有些宽松的社会生活中携手或分手组成文学艺术的团体——《今天》和“星星”，但依然是一根藤上的。

大约是1974年秋，芒克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城里憋

得想成家，而对象就是他时常挂在风景日历上的那位白洋淀村姑。那时我已在工厂干了三年我的钳工了，既然哥们儿要从乡下娶个嫂子回来，我就只好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再加一个星期天，第一次去了白洋淀。

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的精神一振。淀民们很热情，芒克忙着与他们打招呼，有好几家人邀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记得当时我们并不向人说“正忙着写诗呢”，因为那种政治气氛不能随便让你搞关系到“意识形态”的创作。

在淀上划船漫游时，芒克向我叙述一些有关1970年以前他们一帮知青在那里插队以及写诗的事。我曾望着淀水和蓝天想起马雅可夫斯基，想起“穿裤子的云”。而已呈黄绿色的芦苇丛令我油然升起要为哪个女孩献上几首情诗的感觉，但心中那股被一直教导的同情穷苦人的阶级意识使我草就了两年后，经不断修改而最终定稿成《穷人》一诗，因为在进村之前我看见了穿着各种补丁衣衫的农人在地里捆干草，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在暗下来的天的分量。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补丁衣衫，如果让1994年的城里人穿上的话，也许是又一种服饰新潮呢。

顺便说一句关于所谓朦胧诗的问题，当时我们既想用现



“星星画会”成员，《今天》诗人严力

代一些的手法但又下意识或有意识地担心因文字而被定罪，所以写的时候有时会多拐几个弯，但那股被压制的忧愁气韵在诗里从头贯穿至尾。现代手法或称对西方现代诗的模仿反过来让我们对放人的情感有种慰藉，就好像这种形式才是适合灵魂躺进去休息的躯壳。

芒克的婚没有结成，去之前我就有预感，因为芒克在城里生活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与插队时无所求的处境拉开距离的。城里这帮写诗画画的朋友都在讨论现代派，毕加索和狄兰·托马斯已经间接在一些纸页上流传过来了。而喝完酒以后的一些情欲的追忆以及浪漫的诗人气质使芒克想进行这一场生活的演出，我当然愿意当观众。女方的家长不同意，女方也很冷静，她和芒克在一条淀边的大堤上散了半小时的步，然后又转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决定不结了。

我赞扬芒克冷静下来的决定，毕竟写诗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是不同的奔放，尤其我们这种写完后就锁进抽屉的写诗处境。

第二次去白洋淀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我时常凑到芒克搭的颇有点像渔船造型的地震棚去商议捕鱼的事，那时我们都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女孩子自然就被描写成鱼了。芒克看来是有意搭成渔船形的，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时福生从白洋淀来北京办货，顺便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就当时讲也就是买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有工作，而我正好是发工资的时候，整整四十元。就买了一只闹钟，剩下的钱作为我们的来回车费。

我为女方扛嫁妆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亲的队列前后吆喝，村民们也来看热闹，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农人的婚礼，而且还扛着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说起来我当时

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记得自己低头往前猛走，差点走进了另一个人家，引起一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队前，让我跟着他。我当时还被嘱咐：“如果新郎家对你招待不周，也就是说倒茶递烟等不及时，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这席话更爱听的是芒克，一路上他至少凑在我耳朵边重复了三遍。



严力和芒克 1976 年
秋在公园合影。

虽然是去参加喜宴，而且还躲开了地震后的满目东拼西凑的地震棚，但我更看到了淀民们的艰难生活。那年白洋淀因为曾干过淀，新蓄水之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扛着鱼网到天津等地去打鱼，然后在当地卖掉，带回一些钱换粮食。所以也经常断顿。我在城里虽一个月只挣四十元钱，但相比之下，简直是天堂了。与勤劳朴实的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干酒时，他们像过节一样嚼着有几根豆腐丝拌白菜，并说有好几个月没吃到了。城乡差别以及“文革”的后遗症对我的震动是极大的，我写了一批诗，像第一次一样，也有一首诗经过几次修改而定稿并出现在更后来的我的个人诗集中，它叫《雪》。

我最后一次去白洋淀是在 1984 年初，我们浩浩荡荡去了

一大帮人,对马德升、雪迪、杨益平和高鸣鸣来讲都是第一次,而我和芒克则很有兴致地为他们讲述被诗意化了的故事。芒克模仿我扛嫁妆的样子虽然像一只弓腰的猴,但没显出肩上的分量感,因为那箱子里只有几床被子和装了糠壳的枕头。

这次我们带去了迪斯科舞曲的录音带,在打谷场上大跳迪斯科,也许是月光的情调刺激了马德升,他拄着双拐上场的舞姿中有着双杠运动员悠腿的大动作,这一下把淀民也煽起来哄起来了,福生和几个年轻的淀民先是想模仿我们的姿势跳,后来也发现了这是种自由发挥的舞蹈,于是就张牙舞爪起来,一时间热闹非凡,我想这多半是迪斯科首次在淀上落户吧。

一年后,我从北京自费留学去了美国。我曾与几个美国朋友谈起过白洋淀以及一些北京的年轻诗人在那里形成的写诗群。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说美国也有诗人聚集的地方。但我心里想:那意义完全不同了,中国的那段时期包含了多少的被愚弄和生存处境的无奈啊!

1994年5月写于北京

林莽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时间：1998年8月18日

地点：北京小营育慧西里

人物：林莽，48岁，诗人，评论家。

采访者：廖亦武、陈勇

问：《今天》的出现是有幸遇见了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是在此之前，整整一代人默默地写作、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莽老哥，你作为那一个时代的见证人，而且多年来也在进行还原、挖掘历史的工作（比如挖掘食指）。我觉得你好像比我们更有发言权。现在我们想听听你对于白洋淀的叙述和你的一些看法。

答：首先说这本书吧，我觉得你们这个选题很重要。因为中国这个诗歌史，多少年来都是非常模糊的。所谓“官方”的叙述，很多是歪曲了的。而中国真正的文学是一股潜流。这股潜流可能是真正介入文学命运的东西，它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白洋淀诗歌群落”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在“文革”后期有这么一批人插队白洋淀。白洋淀不完全是个地域概念，它和北京整个知青群落和“文革”后一代青年的命运是相关连的。白洋淀离北京比较近，又集中了一部分人，这些人又



林莽在白洋淀。



吸引了不少各地来访的朋友，像甘铁生、郑义，电影界的陈凯歌，都去过白洋淀。那时在白洋淀形成一种特殊氛围。另外，白洋淀的特殊之处在于，去的人不是有组织的插队，而是自己联系的。许多知青对当时的一切不太买账。这些人的思想方式，跟那些立志扎根边疆的人不一样。我记得当初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咱们到内蒙反修第一线吧，可以一块参军。”当然我家里的情况是没有资格去

所谓兵团能够接触到武器的地方。我记得有文章谈到白洋淀的知青成份，大约有两部分人：一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在“文革”属于被打倒对象的狗崽子。二是落魄干部子弟，“文革”早期，他们可能也是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但后来由于形势发展，这些人一下被抛到历史外边去了。等到他们冷眼看世界的时候，结合自己的命运，就充满了一种愤世嫉俗之情，因为过去十七年培养的抱负全被“文革”冲光了，他们开始反思、沉沦。其实，郭路生就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失望、迷惘。“白洋淀诗歌群落”因此都受过郭路生的影响。白洋淀参加诗歌活动的人也就十几个，后来真正剩下的就几个人。多多、芒克，后来根子也罢笔了，方含也不写了。现在就剩我、多多、芒

克三个人还再写。除此之外，还有经常去白洋淀的，比如江河。因为他当时的女友叫潘青萍，在那儿插队。我记得江河的第一首诗就是在我屋里的炕上写的，约1970年或1969年的冬天。江河长期休病假，他实际上在白洋淀断断续续住的时间恐怕有两年。而有人插队的时间加一块也不到两年。他们在白洋淀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一些人半年在北京半年在白洋淀。芒克呆在乡下的时间算最长的。但也有一年左右在外流浪。我呢，下乡六年，真呆那儿不过五年。白洋淀的优点是离北京近，信息特别快，几乎集中了全国知青的若干信息。比如山西的知青写有剧本，大家都能传抄或传说。陕西、内蒙、云南，还有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能通过回京知青汇集到白洋淀。总的来说，白洋淀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没人管，有一个自由环境。

问：白洋淀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概念。同一时期的地下文学精英，像马佳、食指等黑龙江、山西知青，他们似乎都可以归入这一群体。

答：“白洋淀诗歌群落”当然包括马佳等同一倾向但不同地域的人。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个诗歌组织。这群人里除了诗人，还有搞哲学、经济学和绘画的。比如崔建强、刘满强。搞社会学的像牟志京、戎雪兰，还有陶维诵。这些人虽然没写诗歌，但他们跟当时的文学有直接联系，并与诗人们混在一块。由于白洋淀地域特殊，村里也没人管，也没集体户，知青自己管理自己，想干活就干活，不想干活就出去转。每到赶集的日子，大家都坐村里的船到县城去聚会了。然后又和朋友转到其他村去了。我是在村里呆半个月就要出去转一转，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住。这是我们当时的风气，白洋淀交通方便，坐船不收钱。只要你在大堤

上一喊：有没有到哪个村去的？谁应了就跟谁的船走。而老乡特别愿跟你聊天，你是个异类，跟他不一样。他闲得无聊，给队里运粮食。你一上船，他可以随便侃，问你找谁呀？什么事呀？然后聊得很高兴。一路划船一两个小时就到那个村了。又从这个村串到那个村。白洋淀所有有知青的地方我都去过。这种交流构成了白洋淀特殊的文化氛围。大家都不是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听话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读哲学，有的人读经济学和文学，随身都带了些书。我当时带的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现在想起来相当可笑）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像革命者一样觉得到农村去是接受炼狱、煎熬，然后有一天你就要怎么着了。当然这种想法过一两年就被洗刷掉了，“文革”没指望了。所以，在白洋淀大家曾试图搞一个农场。离我们村不远有一个被废弃的五七干校。有个叫顾益的知青，领着四五个人把那块地占领了。后来我们设想，包括我、宋海泉、崔建强，山西的甘铁生等等都聚在一起，搞一个知青农场。大伙商量了几次，因具体实施困难太大，就不了了之。而顾益他们确实坚持了好一阵子。当然过了三四年，这种指望没了，代之彻底的失望。于是，好多人开始想现实的路，比如转到什么油田、参军、招工回城。这也是时代潮流，像根子就考到中央乐团唱歌。1974年下半年，又病退成风，办法是在北京开假证明，随便弄个病。然后到县知青办争取他们同情，把你退回北京。写诗的里面，芒克回来最晚。芒克无所谓，他跟村里农民混得特别好，还有个农村女朋友，一心想跟她结婚，不想回来了。还是他妈妈找陶雏诵帮忙。芒克晚到1976年，我呆六年，他呆了七年。

问：你们当时怎么交流思想的？

答：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有一次我到寨南村那儿，宋海

泉、刘满强、崔建强四个人都戴的眼镜。当时分初中、高中两拨人。高中的学生一般较稳定、思想活跃，而初中生随大流，甚至参加当地两派，扛枪打仗。有个叫赵京兴的，北京知青，在地下思想界很著名。《文革中的地下文学》提到这个人，他是陶维诵的男朋友。那时他就开始写哲学批判，写对马列主义的看法，并把自己的材料寄到中科院。那些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这是小孩的东西无所谓。倒是公安局比较重视。就以“倒卖轮胎”和其他什么罪名把他抓起来关了几年。正好那次他刚放出来，找到陶维诵，然后一起，还有多多、宋海泉、甘铁生加上我几个人，聚在寨南。一块谈生活的体验和诗歌的写作。这种交流其实是经常的。只要碰一块就谈这些东西，并交换禁书。宋海泉他们也有—堆书。

问：赵京兴写的到底是什么？

答：好像叫《哲学批判》。那次我们曾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赵京兴谈他坐牢的体会，多多谈他对诗歌的想法，宋海泉谈了一首他新写的诗。

问：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黄皮书的？

答：我有个同学叫崔建强，经常到我们村去，从他那儿得到过几本灰皮书或黄皮书，包括萨特的《存在主义》，黑格尔的《辩证理性批判》、《小逻辑》等。当然也有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像叶普图申科的诗集，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垮掉一代的《在路上》等，都在流传。有个知青叫杨桦，他爸爸是总政文化部的干部，有特别购买证能买到此类似的书。“文革”后期，杨桦把家里的书拿出来让大家读。多多最早接触的一批黄皮书就是从他家来的。我呢，一部分是江河那儿来的，也有部分是从宋海泉那儿来的。这些书传得非常快。一般给你的期限是一到两天，必须读完。有的还要摘抄。也有人整本抄这些书。时

间宽松时，江河也抄过几本书。这些书对白洋淀诗歌的写作促进很大，改变了许多人的思考方式。

问：从你刚才的描述来看，白洋淀还是比较庞杂，既包括研究哲学、思想的，也包括诗歌。现在着重谈诗人，你看怎样？

答：白洋淀其他方面在中国环境里难以成形。诗歌赶上了1978年——《今天》这个机遇。但“白洋淀诗歌群落”呢，与当时的社会是不合拍的。“伤痕文学”和社会是合拍的。由白洋淀到《今天》孕育而出的朦胧诗的精神内核和社会不合拍。北岛的《回答》更是挑战性的。江河的作品踩在边沿线上，他要再往前跨一步，就不合拍了。芒克的东西却超然。朦胧诗在被接受之前被批判，其实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没根据，他们确实是嗅到了一种异端的味道。由于诗歌的可解释性跨度很大，所以它公开发表了。而哲学、社会学则不行，你必须要说明白。明白了，这些东西就不能被接受。上海一个作家叫陈村，他1985年在《新创作》上发过一篇文章，里面把根子那首叫《白洋淀》的诗作了介绍，他是在70年代初从一个朋友那儿抄来了这首诗，非常激动，就在他的朋友圈里传抄。但又怕传来传去引来麻烦，又不敢扩大范围。到了70年代末出现了与叶辛《蹉跎岁月》类似的大批知青文学，陈村说，他当时感到这些东西绝不是从“文革”中，从知识青年来的。代表文学水准的，绝不是这些东西。因为他手头有《白洋淀》这首诗。陈村一直想把这首诗公诸于众。但他又不知根子是何许人，也不清楚他的背景，他只是听说，在白洋淀有一批红卫兵，因为对“文革”有看法，然后集体自杀，有一个诗人出来写诗悼念这些人，命名《白洋淀》，这首诗代表了当时知青写作的最高水平。到了80年代，陈村想把这首诗加入中篇小说中发表出来。可编辑部怕出问题，把这篇小说撤了。后来，陈村把诗在《新创作》上单独发出

来,写了一个随感,纪念上山下乡二十周年。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陈村的说法很有道理,所谓伤痕文学,的确不能真正代表当时的最高的文学水准。

问:这些诗歌是怎么传的?互相抄,还是寄信?

答:寄信很少,一般都是在北京交流,在白洋淀机会也比较多,北京有地下文学沙龙。芒克和多多不是交换诗稿吗?而我的诗,方含、江河的诗,大家互相都传看。每个人都有一堆抄诗本。我有四五本,包括知青的,读书抄来的。多多有一个本子,传得比较广。宋海泉有一个本子,一直说被我借走了没还。我是抄过他那个本子,我记得还了,也许他又借谁了!

问:我觉得细节好听,我是当故事来听的。

答:总的来说,北京和白洋淀构成了一个整体氛围。

问:你们当时也经常跑回家?

答:经常跑回家。我当时总担心家里出事,凡是每次出来报纸的社论,我必定一字一句地抠,看能不能从字眼里抠出点希望。每次回家,路过街角的时候,就要看是不是发生新变化,比如新大字报,真是心有余悸的。这种心情在当时恐怕不只我一个人,像杨桦、崔建强他们也一样。顾益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自杀了。他爸爸是干部,妈妈是学校校长。在“文革”后期,他一直想为家里平反,天天在文化部门口蹲着等哪个部长,沦落成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人。

问:你参加过红卫兵吧?

答:最早老红卫兵的活动我参加了一些,也就两个月,后来我爸爸被打倒,我就没资格参加了。我们那儿有“联动”时期很重要的人物,像田壮壮的哥哥田新新。而我基本上在家里。当时正好我们学校图书馆在四楼的屋顶下藏了批书。一座尖顶教堂似的房子,我们搭桌子爬上房顶。房顶上有大的横梁,

在两个木梁间搁上板子，就可以坐着下棋。有一天我们下棋时偶然发现屋角堆了一堆书，所谓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就偷偷拿麻袋来装。回家之后，大家分着看。这样，从1967年到1968年底，将近两年我每天读一本书。后来搞文学跟这段读书关系很大。因为“文革”前我的目标是大学，老师讲什么读什么，不可能这么多地去读法国的、英国的、俄国的小说、诗歌。像巴尔扎克、左拉、普希金、莱蒙托夫……

问：经过了这一段读书，然后到白洋淀？

答：对，1968年年底。

问：大规模上山下乡是1968年？

答：对。第一次分我到陕西，我没去，第二次分我到东北，我也没去。我不想跟集体走。因为家庭原因，在集体中要受到某种压力。我记得我当时去给关押中的爸爸送饭，和守卫发生冲突，被带回学校谈话，要我划清界线，我心里对这种东西极为反感。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不会反党。由此对“文革”产生了一种怀疑。我想不光是我，这一代思想敏感的人都会对“文革”产生怀疑。突然有一天，有朋友说去白洋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就找了几个一块去了。去了解情况，所有水乡中的村子都问过了，我的想法是找个挣钱比较多，能够自食其力的地方。因为家里不可能再依靠了。当时白洋淀武斗非常厉害，一派占县城，另一派占一个大镇子。我们路过镇子都要检查，行李被翻一遍。而住县城的造反派对知青比较欢迎，希望跟他们一块儿搞。当时白洋淀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档案可以自己带。这样就能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抽掉。我的档案丢了，当时我想没有更好。

问：一批人好像是不约而同地逃避。

答：对“文革”的逃避。我是革命干部家庭出生，从家庭到社会教育，都让你将来做接班人。我积极向上，初中读毛选，高中读《大众文学》，做共青团辅导员，每天走得最晚，劳动也绝对干在最前面，学习成绩也是班上较好的，军训项目每项都是满分。突然“文革”来了，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那时武斗打人每天都发生。有一天下过雨，我到学校操场看见躺着七八个被大雨浇得半死不活的人，都是被剃过阴阳头的，估计后来这些人都死掉了。我们学校光自杀的老师就有七个，包括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他是“文革”前的一级老师，在北京一级老师并不很多，但是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后来我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得到一种印证，一种人性恶的印证。

问：我看过很多红卫兵的回忆录，和你刚才讲的也有点类似，先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看到这么多血腥现实。读大量的书，受了一种血腥的启蒙，然后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答：到白洋淀，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像郭路生写的《鱼儿三部曲》，一种迷惘的寻求，冰层下的鱼寻求阳光，但阳光并没有，最后鱼死掉了，在冰下冻死了。这种幻灭，一代人都经历过。到插队，同学们都分散开了，精神苦闷随之而来。当然，你跟农民不可能说，虽然农民很朴实，认为北京来的孩子不容易。每到过年过节还请你到他家吃饭，有时候我们从北京回来半个月都不用自己做饭，在老乡家里转着吃。但这种温馨解决不了你精神饥渴。特别在夜里，想朋友，想同学就产生了一种写作的冲动。那是1969年的冬天。

问：那时候写的什么？

答：刚开始写诗。写一种日记性的东西，后来认为日记很危险，“文革”的经验。后来就写成诗歌。我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首诗《深秋》，情调基本上还是浪漫主义。还有郭小川、贺敬之、

闻捷这些东西穿插在里边。和五、六十年代不同在于我写得有血有肉，是一种真实心灵流露，而不是虚假的寄托。到1973年接触到黄皮书以后，才突然发生转变。我读的最早的一本是《带星星的火车票》。

问：是什么渠道得到的？

答：是江河带去的。他当时没下乡，在一个厂工作。他有心脏病，就到医生那儿开假条，长年休病假。江河算了一笔账，一个月拿二十六块钱，一天不上班扣两毛钱，最后到月底还能拿到二十来块。如果他上班，等于一个月挣六块钱。当时很少有人这样算倒账。我记得他在我那儿住了三四个月左右，因为白洋淀吃饭不太成问题，虽然艰苦，但白洋淀有鱼。我们经常到老乡那儿要他们不吃的鱼、喂鸭子的黄膳。一要就给。另外我们自己也捞鱼。而白洋淀旱的时候地里长粮食，地多随便种，收了一桶一桶地分。我最早读郭路生的诗是江河带去的。他有一个手抄本《相信未来》，只抄了一半，到了“用孩子的笔写下未来”打住。他说够了，完成了。因此我也抄的是半首诗。《烟》和《酒》是江河那儿抄的。《海洋三部曲》是宋海泉那儿抄的。由于这类诗歌启蒙，尤其读到现代主义，例如波德莱尔的作品之后，写作方向开始发生变化。那是在1973年，我写了一首诗叫《列车旅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芒克的《天空》，但却不约而同都采用了这种断断续续的方式。到了《二十六个春节的回响》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一种新的方式了。

问：你接触的第一本黄皮书是《带星星的火车票》，你读了之后是什么感觉？

答：耳目一新的感觉。书里写的是俄罗斯的一代中学生，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感受。他们想离家出走，寻找金

羊毛。当时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对社会的反抗意识和觉醒,确实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而他们的年龄比我们还小,都是十六七岁,而我们已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另外我觉得它的写作速度非常快,给你的东西是非常新鲜的,不再是巴尔扎克式的沉闷,后者一片叶子可以写出十几页。而现代主义的书容量大,信息量也大。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我记得在北京王府井,有个213号,卖一些内部书。你有工作证就能进去。

问:还有这种书店?它是怎样的背景?当街吗?

答:有,它开在街面,上一个楼梯进去,外面没有橱窗,不摆书,而摆一些别的东西。在白洋淀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在学校当老师,学校有一笔钱,可以“为学校”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什么是存在主义》。当时我也画点画,有个朋友叫崔建强,他也画画,我跟他讨论过很多次什么叫印象派?什么叫野兽派?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因为资料非常少,你很难看到成形的东西。都是这篇文章有一点,那篇文章有一点,或者某个朋友谈到一点感觉。当时彭刚的传说开始在知青里边流传。比如画列车上所有的人都在昏昏欲睡,只有一个孩子的一只眼睛是碧蓝碧蓝的,这画我没看过,但传说已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撕碎扑克牌贴在一张的灰色背景上,这种方式开始引起大家的共鸣,认为它确实很有意思。带有某种社会反叛性的东西。

问:你看过他的画没有?

答:彭刚的画我没看过,都是些听说。还有山西的一些人写的独幕剧。无非写到知青的自杀,或者在集体户发生的《等待戈多》,当时《等待戈多》已有人读到了。

问:在你之前我们采访过彭刚、马佳。彭刚是1975年以后放弃绘画,也不写诗了。马佳在《今天》创办以后,退出了这

个圈子。而根子彻底罢笔了。我问彭刚原因，他说是因为害怕和绝望，而马佳说是怀着对某种东西的蔑视，沉默了这么多年。

答：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心里话。“文革”后期，大家都比较成熟了，“文革”到底哪天能结束？中国会走向哪儿？写《二十六个春节回想》的时候，我其实隐藏着这种东西。虽然那个幽灵在世界上没人相信了，但这种东西一直存在，一直笼罩这个世界。例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东西你丝毫不想参加，但它时时在影响着你。所以，当时我灰心丧气。中国也就从一个阴影走向另一个阴影。林彪事件那么大的事件，也很平静地过去了。这个民族太好愚弄了。还有可怕的株连九族，因为一首诗、一封信，你也许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种恐惧我想每个人都有，当时孙康（方含）就提醒我，别拿诗给别人看。我记得多多有一次还找过我，特别着急，问我抄过他的诗没有，我说没有。“真的没有吗？”他特别害怕。后来我在街上见到多多，我问他干什么呢？他说他傻帽似的什么也没干，天天跟小孩游泳。当然他也受过审查，没有发生什么事，但这种压力是每个人都存在的。所以《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北岛也好，芒克也好，很有勇气。他们是抱着随时被抓起来的这种可能性，去撞“禁区”。

问：对，从白洋淀到《今天》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从当时的情况看……

答：恐惧，失望。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它不可能有出头之日。年龄大了，开始注重实际生活。像根子上中央乐团，在知青里边算相当不错。还有人参军，像郭路生。有人从政，诗人们开始发生分化，这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时期，大家都二十五六岁到三十岁了。中国讲三十而立。但这些人生活

一点指望也没有，不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所以马佳和彭刚都说得比较真实。

问：对，自然分化，比如多多跟《今天》的关系就比较远。

答：其实我跟《今天》距离也比较远。我接触最多的是江河。因为我俩家比较近，加上过去是同学。边缘接触的是多多，再往后就是北岛、芒克。我也读过北岛、芒克的早期作品。我记得有一天，江河跟我说：“听说办了《今天》，咱们去看看呀？”我当时和北岛不认识，但知道。因为圈子间有个隔离，我接触比较近的几个都没参加他们早期的活动。江河写完《祖国啊祖国》的时候（他每写完一首诗，不管夜里几点都敲门叫我），问是不是给《今天》？后来他又说，我这些东西可能能在公开刊物上发。当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江河通过他们院一位老太太，直接递给刘心武。刘心武看了以后，夸这人字写得不错，却对诗不屑一顾。把江河气坏了。从此，他才开始到《今天》发诗，大约二期以后。

问：这条线你还是理得比较清楚。现在回过头，你是怎样看《今天》之前这么一段历史？

答：我觉得《今天》以前的写作者，是自生的，完全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长出来的。它没有任何功利性，也并不对文学寄予任何希望。这是和人类需要生存的本能，同样的文化本能。再加上它有“文革”那种“产生”背景，对人的心灵触动非常深入，像任何一次人类最惨痛经历会使人觉醒一样，我觉得“文革”可能是对这些灵魂的一次提示，激发。只有文学才能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另外，白洋淀给了这些人一个非常自由的天地，它不再受集体的控制。这个环境既不像监狱，也不像尘世生活，倒真应了毛泽东的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再加上“文革”前出版的大量黄皮书、灰皮书散落民间，给这批人及时

进行启蒙。我觉得这批人的东西你可以说幼稚，但它毕竟是从生命最根本的感觉出发——这点就是最根本的。为什么你现在读有些东西很能刺激你。刺痛你的原因是它没有任何虚假，就像你吹箫，它是一种从你心里头流淌出来的，没有造作，不仅仅为了追某一曲调，根是正的。另外，没插队这种经历，也不会产生这批人。也许他们会按部就班上大学，或当个工程师，当个老师，也可能是很迂腐的一批人。事实上，这批中学生对大学生看不上，他们虽然从大学里学了些东西，但是非常迂腐，而且对权力的追求，对政治的追求却远远超过我们。北岛说得好：“我不相信”。那么他们还想从那里边去获利，那就不可能彻底。亦武，你是不是在这些日子里体会到了这种东西？

问：这应该尽量让当事者和原始资料出来说话。

答：我不知你是否收集到“文革”中潘青萍写的四封信？

问：没有。

答：这个东西是写到何维凌的，何维凌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还有王彦，曾经和邓朴方是同学。这些人文化底子要比中学生强得多，但是更多的是追求政治上的东西。当然何维凌已死在美国了，他曾经在国务院改革办当过研究人员。他们借助当时的社会背景，要进入中国的领导阶层，改造这个社会，他们有这个抱负。好像白洋淀写诗的这些人没有类似想法。

问：我更愿意从文学、诗歌的角度来看70年代这段历史。肯定以后还有人来做同一段历史，但他或许从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民俗学的角度去做。我这儿有《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和马波（那个老鬼）写给赵一凡的信，从信上看，他们感到有一种历史契机马上就要到来了，应该抓住。另一方面，就像你描述过的那种孤独、徘徊，在这一过程中有人罢笔了，但真正天边浮出一线光的时候……



1998年7月，诗人们相约在北京丽都花园小聚。

左起：张洪波、潘青萍、林莽、刘福春、吴德安、蔡其娇、牛汉、史保嘉、芒克、唐晓渡。

答：大家就坐不住了。

问：对，人的一种本能吧，争取社会承认的本能，荣誉感，每个人都有。《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写了四页，满满的四页，非常希望……所以这个时期非常有意思。

答：基本上就这么多内容吧。确实是这段时期为“朦胧诗”作了一个铺垫准备，没有这十年的准备，也不会产生后来的诗歌运动。

生活、书籍与诗

舒婷

外祖父竖起一根指头，引诱我学一首美丽的“儿歌”：清明时节雨纷纷。他念了两遍就进里屋去取香烟，出来时见我一只脚在门槛上跳进跳出，口中念念有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惊异之至，立即决定让我随外祖母到街道扫盲班去启蒙。每逢婶婶婆婆们考试，我总要搬张凳子，站在大圆桌边提示，同时响亮地嚷着：“别慌，姥姥，我来救救你！”老师置之一笑，她大概不相信外祖母的场场考满分和一个四岁顽童有什么关系。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阅读课外书。我的座位也渐渐由后往前移，因为我的眼睛很快变坏了。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过道、门后、衣架上去搜索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舅舅、姨姨们都喜欢看书，书的来源五花八门，无论他们对我如何戒严，我对各个房间的偷袭总能成功。上初中时，我的借书卡上已全是长长的外国书名。班上有人问我：为什么净看外国书？答：中国书已看完了。于是专门开了班会整风，批判我的轻视民族文化。那时提的中国书指的是《敌后武工队》之类的。不



1970年,上山下乡第一年回家探亲。其时,未来的“朦胧诗”主将舒婷刚开始学写诗。

过,《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故事》等书我也是滚瓜烂熟,那是外祖母每夜哄我上床时讲过无数遍的。

我的作文成绩一向很好。五年级时第一篇作文《故乡的一天》被当做范文评讲,黑板上抄满了“异想天开”、“树影斑驳”等我搜罗来的十几个形容词。老师很起劲,我也很开心。可怜后来我却要花相当大的气力去纠正滥用词藻的坏习气。初一年级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初二年级学期考试我十分认真地完了卷,成绩却是47分,并且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看来对我的作品的声讨,是十一年前就开始的。

十三岁以前我常常参加朗诵会,但除了课文和老师指定的诗目之外,我不读诗。我至今尚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想到写一首半文半白的五言短诗,发在校刊《万山红》上,还因此着实得意了好几天。

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两年，这一点可怜的文化程度却是我的重要基础，使我对语言的兴趣和训练自觉化。包括后来在农村时每天学五个生字，帮助我在表述时有更大的灵活性。我认为：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和把握是致命的。“使诗人把握到关于那几个惟一正确的字的惟一正确的安排方式。”（托尔斯泰）

学生时代像万花筒一样旋转：夏令营、生物角、歌咏比赛；未来和理想五光十色地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仿佛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我最初的朋友就是我的教师。跟着生物老师跳下潮湿的洞穴去采撷蕨类植物，从此我克服了怕黑的胆怯心理；每天午饭后在小山上的音乐室，我屏息望着音乐老师敏捷的手指，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似乎在他的指间流淌；我怀念凤凰花盛开的校园路，地理老师常送我走到拐弯的地方，站在那颗星星的照耀之下，我至今还觉



1972年，告别插队的地方——闽西上杭县太拔公社。舒婷在这儿劳动、写作了三年多。找一堆剑戈般的乱竹丛做最后的留影。

得那手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肩上；有次我大哭了一场，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被调离到僻远的山区去，据说是惩罚他的“母爱教育”。

但是，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时的眼光和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

“当！”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在我的肩上，我顺手一摸，是颗热呼呼的弹头。上面，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尽管还有噩梦，梦见十几公斤重的木牌、铁丝上渗出的血珠，屈辱在我尊敬的人的眼里变成阴暗的河流。我总是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收拾些衣物和食品，送去给被监禁的家人，走进另一个充满喝斥、白眼的噩梦。

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真相来。只有书籍安抚我。

1969年，我与我的同代人一起，将英语课本（我的上大学的梦）和《普希金诗钞》打进我的背包，在撕裂人心的汽笛声中，走向异乡。月台上、车厢内一片哭声。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

生活不断教训了我的天真。然而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

挤在破旧的祠庙中，我听过吉它悒郁的乡思；坐在月色朦朦的沙渚上，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再艰

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于是，我拿起了笔。

那三年内，我每天写日记。回城之前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后来发表在《榕树丛刊》散文第一辑上。

我拼命抄诗，这也是一种训练。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

另外是信。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最大的享受。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焦灼地在村道上守候那绿色的邮包，又怎样迫不及待地坐在小桥上读信。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这首诗流传出去，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兴趣给我送书来。我曾花一个月时间关起门读弗·梅林的《马克思传》，又通读了毛选四卷的注解部分，虽然我从来不敬神；我还很困难地读了《美学简育》、《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理论书，又很轻松地忘得一干二净。由于朋友们的强调，我还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

1971年5月我和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朋友在杭大桥散步，他连续三天和我讨论诗与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言谈在当时每一条都能够得上反革命的名册。他肯定了我有写诗的可能，同时告诫我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

品。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的心愿和向往？”回到小山村之后，我写了这首诗给他。（《寄杭城》发表在《福建文艺》80.1期）

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远去，古榕树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记；没有思想倾向的作品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寄杭城》是我已经发表作品中年份最早的一首，但并不是我的第一首诗。不少青年



1977年春夏之交，舒婷第一次到北京，与北岛、艾未未（中立者为星星画派画家、艾青之子）合影于八达岭。



1977年10月19日，在长城八达岭合影。左起：北岛、蔡其娇、舒婷。

朋友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却说了这么一堆废话。因为：假如没有友情（我的心至今仍像葵花朝向温暖一样觅寻着朋友），假如没有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没有老师在作文本上清晰的批语，没有历史、绘画各科给我的基础知识，没有莫泊桑和梅里美的诱导，甚至要是没有外祖父的“儿歌”，很可能，我不写诗。

“撒出去，失败者的心头血；矗起来，胜利者的纪念牌。”任何最微小的成功都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和积累。

1972年我因独生子女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一种搁浅的感觉（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我常常在冷寂的海岸边彷徨：“从海岸到礁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黎明，多么骄傲我的心！”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处于冷窖之中，感到“沉沦的痛苦”，但“觉察的欢欣”正如青天的绿叶一样，不引人注目地悄悄流向枝头叶脉。

这种觉醒是什么呀？是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挑战心理。要求生活恢复本来面目。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

1973年我到建筑公司去做临时工，当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匠。我心甘情愿地一点一滴磨掉我的学生腔。听老师傅叙说生计艰难，和粗鲁的青工开玩笑，在汗水溅下滋滋响的水泥预制场上，操过铁锹，掌过震动器。夜班时我常常伙同几个淘气包摸到邻近的盐碱田刨地瓜，就放在铁壶里烧。咸滋滋的煮白薯并不真的那么好吃，我高兴的是再没有人因为我的眼镜和挎包里的书而轻视我。使我能安静地利用午休那一个小时，躺在臭哄哄的工棚里，背垫几张潮湿的

水泥袋，枕在砖头上看完《安诺德美学评论》。

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桦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支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我只是偶尔写诗，或附在信笺后，或写在随便一张纸头上，给我的有共同兴趣和欣赏习惯的朋友看，它们很多都已散失。也许有人要责备我没有写熔炼炉和脚手架的诗（我试写过，只是写得很糟），是的，当我的老师傅因为儿子的工作问题在佛寺的短墙边卜卦，我只是和满山的相思树，默默含着同情，在黄昏的烟雨里听了又想，想了又听。我不会朝他读破除迷信的诗；我宁可在休息时间里讲故事，用我自己的语言，选择适当的情节，讲《带阁楼的房子》、《悲惨世界》，并不天真地认为，我的诗能抵达任何心的港湾。

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1975年，由于几首流传辗转的诗，我认识了本省一位老诗人，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首先是他对艺术真诚而不倦的追求，其次他是对生活执着而不变的童心，使我尊敬和信任，哪怕遭到多少人的冷眼。他不厌其烦地抄诗给我，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德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 $1/2 + 1/3 = 1/5$ ”的教师比比皆是，而我却

连一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我又一次感觉到现实和理想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无垠的大海，纵然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我写了《船》，老诗人立即写诗回答：“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这两句诗至今还压在我的玻璃板下。

“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早年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对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突然有了清晰的出路。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人流泪是不够的，还得伸出手去。“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当你发光时，我正在燃烧。鼓舞、扶持旁人，同时自己也获得支点和重心。

1975年前后的作品基本上是这种思想。这一年我在织布厂当过染纱工和挡车工，1977年调到灯泡厂当焊锡工，一直到现在。我的体质从小就弱，所做过的工作都相当累人，以致我痛苦地感觉到有时我竟憎恨起美丽温柔的鹭江水，因为它隔绝我，使我比别人要多花半个小时去赶渡船。上大夜班时，我记得星星苍白无力，仿佛失眠的眼睛，街灯刺球似地转动在晨雾里。不少人以为我养尊处优，所以当有位朋友在1976年写信给我：“正是鼓浪屿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回答他：“不知花朝月夕，只因年来风雨见多。”

我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正上夜班，我很想走到星空下，让凉风冷却一下滚烫的双颊，但不成，我不能离开流水线生产。由于常常分心，锡汁淌到指间，燎起大大小小的水泡。这首诗被诗歌编辑批为：低沉、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看样子，只有“银梭飞舞”的东西才是青年女工的感受啦。

至今，我总还纳闷着：青年女工的感受谁最有权力判断呀？

我闭上眼睛，想起我作为一个青年女工度过的那些时

辰。每逢周末晚上，我赶忙换下工作服，拧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的朋友们到海边去，拣一块退潮后的礁石坐下来。狂欢的风、迷乱的灯光，我们以为自己也能飞翔。然而幻想不能代替生活，既然我们不能完全忘却它，我们只有把握它或者拥有它。沉重的思索代替了早年那种“美丽的忧伤”，我写了《流水线》。

《流水线》已经挨过还将遭到不断的批判，就连肯定它的人也要留一个“局限性”的尾巴，因为“它没有焕发出改变现状的激情”。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在一些名著的前言后记中常见到的我国理论家的发明：某作家无论多伟大，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千篇一律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找到革命道路，等等。然而，天才不是法官，不是巫师。艺术不是仙丹灵药。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

我从未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只是为人写诗而已；尽管我明白作品要有思想倾向，但我知道我成不了思想家，起码在写诗的时候，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信任思想中的加减乘除。

1977年我初读北岛的诗时，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好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一切》。正是这首诗令我欢欣鼓舞地发现：“并非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在我们这块敏感的土地上，真诚的噪音无论多么微弱，都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我不想在这儿评论北岛的诗歌，正如我将不在这里品评

1980年,《福建文学》举办白期舒婷作品讨论。在研讨会上,舒婷曾抗不住“歪曲”而当众痛哭,成为福建文坛一则笑话。



江河、芒克、顾城等人的作品一样,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我在1978-1979年简直不敢动笔,我现在远不认为他们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派”,他们各有区别,又有其同点,就是探索精神。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像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有志气的青年一样,比较自觉地把自己和民族的命运连系在一起。他们的勤奋和富于牺牲精神使我感动。

现在常说的“看不懂”、“朦胧”或“晦涩”都是暂时的。人类向精神文明的进军决不是辉煌的阅兵式。当口令发出“向左转走”时,排头把步子放小,排尾把步子加大,成整齐的扇面形前进。先行者是孤独的,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地呼救,我打开窗门,目送它冉冉飞往沸腾腾的桂花树。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

1980. 12. 7.

第一九七六年

彭 刚

在1975年将尽的时候，我回想起年初的誓言，理解世界，不禁感到这一打算落空了。是的，当未到达世界前，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至多是儿童心中的玩意、好听的名字和奇妙的幻想。

人的幻想太多了，就像酒醉后，看不出前后左右，这样，这在幻想的醒悟中破灭。

新年一周后的清晨，哀乐把人们唤醒，告诉了噩耗，人们忙起来，惊讶，多话，四处打听原委，四处传播着消息。

这天，天气很好，虽是隆冬，可阳光像春天样，暖融融的，街市上与平日一样，斗嘴、拥挤、排队，大家还未意识到哀伤。

第二天，当人们从家里来到街上、汽车上、工厂里，悲凄的空气才慢慢地麻木了大家，大家沉默了，不说笑，也不敢说笑了，城市安静了，城市悲伤了。憔悴的人们不像往常那样，下班后急忙回家，而在街头等候送灵的车队，他们靠着自己的自行车，吸着用纸卷的烟草，又悲哀又有兴趣地等着，看着，十里长街两旁满满的人，直到深夜，人们不得不回家了一——明天还要上班呢，许多人却几乎站了个通宵。

日日夜夜，川流的人们一家一家、一群一群来到广场，自

动地戴上了黑纱，戴上了白花，默默地站立，向着广场中央的纪念碑，默哀，宣誓，虽然这哀伤未见是真诚的，这宣誓就更虚假，但这沉默的人群与时远时近的喑哑的抽泣声，却深深地浸入心中，激起人们心中的悲痛。

人人在将离开这百姓们的“祭坛”时，悄悄地把自己带来的白花挂在四周的松树上，庄严而缓慢地离开了这广场。不久松树就像白雪的墙一样，围绕着碑，只是这“雪”不会融化，不是冰冷的，它是人们心中的长城。

两个外地人，大概刚到这里，身上什么也没有带，望到大家后，不好意思地走到松墙旁，偷偷地拿了两朵白花，戴在胸前，走入人群。

十几年来，这里举行过盛大的节日游行，这里挤满过热情的学生，这里被清洗得冷冷清清。这是第一次，在没有任何人的主持命令下，老人、小孩、男人、女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忘却了日常的生活，为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逝去而悲伤，这是没有过的。

不过这种简单而非凡的悼念，与其说是为某人举行的，不如说是人民为他自己举行的悼念，悼念每个亲人，每个朋友，悼念这时代，悼念命运，悼念自由，悼念人民。

我望着巨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沉痛中矗立，朦胧地看到了许多人生的价值，我走进人们中间，和人们一样，垂头站着，悲伤着，企图在这万众的情绪中，走到人民中，走进这巨大的灵魂中，但是，像雾一样，它包围着我，我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怎么也捉摸不透。

几天后，城市又活了，人们为一点小事而吵闹不休，警察无缘无故捉人，日子又流水样，平淡无奇地逝去，生命在暗中出生、入死，没有了人民，只有丈夫、妻子、儿女，而我所体验到

的灵魂更没有了，我怀疑我当时是错觉，因为，孤单而渺小的生活是每个人悲伤的源泉，也是每个人的归宿啊。

春起，警察因故连日盘问我，像墙一样，我感到，他们竖在我和自由之间，我没有办法说清自己，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甚至没有力量来坦率地说话，压迫和恐怖感淹没了我。此时，我明白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每个人都是无可求助的，又相互爱莫能助。它是我们的主人啊，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走我们的一切。

小时候的欢乐，大部分都记不清了，记得的那些也觉得非常疏远，大了后，学习、爱情、家庭、社会，各种各样的责任越来越多，羁绊着，使得我失去了绝大部分的自由，仅仅还保留着反省这无自由的自由，如果要把这仅有的、微小的权力也夺走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生机，如果对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愿意意识到沉没，我愿意接受由此而生的痛苦。而不愿像许多被横祸劫走的人一样，无知无觉地离开这里。

唉，自由，像奴隶样的自由，平时不以为然的自由，在将要丧失的时候，则是不可缺少的，万般美好的。

今年，在清明的阴晦中，人们走上了街道，走上了市场，三三两两的人们像洪水样从各处拥进了广场——人的海洋。这广场和街道是国家秩序的传统象征，是不许人们自动在这里聚会的。

人们在这交谈着，站立着，注视着，走着，拥挤着，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的中心便是为无数昔日革命者立的碑。上空灰白惨淡的天，充满着人们的不安和骚动，人们今天来到这里不再缅怀昔日的神了，而是渴望今日众神的崩溃；等待着，等待着，人们在广场上小声议论着，期待着有什

么热闹看。

上午，一个青年跑进广场，在大众面前把手划破了，用血写了一句话，当然，这句话并不高明，但周围的人群像浪一样拥上来，争着和他握手，高叫着，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支持，随后像拥着领袖一样拥着他走上了碑的台阶，人们大喊大叫地把他抛到空中，下来又抛上去，人们欢腾了，这西方古老的习惯在中国的大众中使用了，同时西方自由与民主也将人民的心中默默苏醒。

有人打开录音机当场录下这众人的欢腾，准备保留下来这自由的曙光；有人用半导体喇叭念着蹩脚的诗文；有人在教唱着自己刚刚编好的歌曲，有的人在一小群人中激昂地讲演，当大家所渴望听到的声音一停止，人们便齐吼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不知道，如若帝王来到这里面会有何感触，但我却被这巨大的热情激动了。

人们激动了广场，广场也激动起人们，整个后半天，广场和人们和花圈和挽联沸腾了，叫喊声此起彼伏，人流湍急。

黑夜默默来临了，藏起了人民的面孔，却把人民的心打开，广场上几十万人聚在一起，听着一个站在果皮箱上的人起头歌唱，微弱的声音后面震动起低沉的鸣响，几十万条的喉咙情不自禁地唱着沉重的歌，把在场的，不在场的，活的，死的人们深深感动，这无数的心脏共同着一种巨大的灵魂而跳动，人民诞生了，他的灵魂在这儿，没有形影却所向披靡，把千千万万的生者与死者的心灵融化。

第二天早晨，当人们重又来到这里时，发现广场已被警察包围了，碑前无数的花圈和更多的白花都被一扫而光了，只剩下几辆清扫车在警察的保护中扫地。昨天未赶到的人们和又带来了花圈的人群走过来，要进广场，和警察交涉了一

番后，被后面更多的人簇拥着冲破了警戒线，占领了广场。

上午、下午，广场的人群更密更乱，像蜂窝一样，像火山一样随时都要爆发。人们被一个人的高呼惊动了，向着这个人，这个方向迅速地聚拢，这个人喊了一声使所有人都愤怒的口号后，马上跑起来，人们尾随着追打，叫喊，最后这个人跑进中国的议会厅，嘈乱的人流跟着就要涌进这最森严的禁地，这个朝代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在渐暗的广场上，一团烈火腾起，人们推倒了汽车，点燃起来，登时被突然的火焰吓了一跳，人们向四周乱跑远远地离开火焰，慢慢的大家明白了，于是又发疯地向着火的地方跑去，这时，广场上的警察、民兵、外国人，一切可嫌的人都成了攻击的对象，人民疯了，中国革命的风暴在此重演，和几十年前一样，这怒火，这暴乱，无从选择，毫无理智，疯狂地蔓延，增长，人们殴打警察，撕去他们法律的衣裹，人们把兵营包围，当人们被士兵的水龙头浇回后，重又上去，推倒了救火车，烧掉了，人们把外国人的相机抢过来，踩烧，恫吓他们，人们把路过的食品车拦住，把面包抛向空中，人们高喊道，要求自由，要求释放，人们在疯狂中，在喊叫，在奔跑，在大哭，在为所欲为。

终于。黑暗来了，数万名军队和警察包围了广场，刚刚还冒着自由气息的地方，马上传来枪声和惨叫声，直到天亮。这夜，究竟打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没有人知道，但警察和军人在暗中误伤的就有几千名，死了几十名。恐怖再次来临，可是一个人民的国家一旦用武力镇压人民，这个国家就快到绝路了。

天亮后，广场站立着军警，阴森森的，人们只匆匆地看一

下这战斗过的地方立刻走开,以免被逮捕。但不知是谁,在纪念碑正中浮雕上,把铁链锁在一个过去的革命者——今天的官老爷;过去热情的战士——现在无情的刽子手的颈上,在锁链下挂着一件斑斓的血衣,没有人知道,这是对当政者的嘲讽还是对昨日流血的控诉,或是对这些年来血腥的控诉,但这肯定是人民的愤怒。

半年后,“四人帮”被清洗了,人们传说,弹压是他们挑唆制造的,但是,不论怎样,人民是在为自由而战,人民是觉醒了,如果真是他们制造的,那么他们失算了,弄巧成拙,因为这将导致他们的灭亡。

随着恐怖的加深,人民分裂了,人民的灵魂也销毁了,但它的阴影却在人们的头脑里回荡着。很久后,人们再讲起时,广场、歌声,几十万人依旧兴高采烈。回忆像光一样,在黑暗中闪烁。这件事情中,我得到启示的好像一个空旷的声音向我说:人的生是在人类中活的。人的价值是在人类中的。人的灵魂是在人民的灵魂中的。个人是孤独而又是不孤独的。个人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离群索居的生活,渐渐地把我精神蛀空,只有泛泛的自我意识,我伤心地感到,就像在盆里的树一样,把水吸干后就再也不会生长了。

我还是我生活的中心,还是我的希望,但是我厌恶这样,只有自我的狭隘,而无灵魂。我缅怀那短暂的几日,我渴望着心灵的复活。

仲夏的一个凌晨,月亮挂在天上,大地发生了一阵低沉的轰鸣,随后大地动摇了,瞬间,一座千百年的古城,一片几百里的田野,平为瓦砾,几十万人丧生的梦中,几万人在墙、砖的间隙中苟延着生命,一场浩劫,像风一样轻松地扫过人间。

地震后，北京的街上满是人，人们裹着衣裳，床单，被褥，还有的裸着身体，议论着，大家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灾难多重，大家还很麻木。

几天后，衣裳褴褛、形容憔悴的人拐手拐脚地到了北京，他们是幸存的，步行了几百里，到了这里，继续向南走，远离那灾难，回到亲属怀中。当人们问着他们，有人哭着说，有人麻木地说，家里的人除自己外无生者，他们简单地说完后，立刻又狼吞虎咽了别人的给予的食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这时起，北京人开始害怕了，慢慢的，人们终日不上班，工厂停产，商店偶尔开一下门，大家从家里出来，站在马路上，睡在马路上，城市的空场上又满是人了。人们熙熙攘攘，四处探听消息。而各种车辆却苦于遍地的临时搭起的棚子，寸步难行，拥挤不堪，城市的秩序守则全瓦解了。人们却被这种异样的生活搅得挺欢乐，像在巨大的夏令营中，喧闹不停，只是每个人都想到了有死亡存在。

第一批进入这废墟中的是军队，当士兵和活着的人们埋掉表面的尸体，准备新的生活时，大地又爆发了震动，连续摧毁着残存的建筑，许多房屋倒塌得更平了，许多活着的人又死了。这座故城充满了窒息的腐尸味，荒凄满目。

想起那瓦砾和尸体，想起大地，我为人类而感到绝望。浩劫无声无息地来到，没有道理，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又无法逃脱，人类浴血奋斗千百年的业绩，人类千辛万苦的足迹，都易如反掌地毁于旦夕，空无所剩。啊，我们不是为毁灭而生的，但我们又怎能知道，我们苦于对命运的无知，对上帝的无知，对突然来到的灾难的恐怖。

秋天，中国的一个巨人离去了，这个人创造的时代也开始结束；是这个人用理想把人民带出了苦难，又是他使人民进入

更深的深渊，多少人成了他假（设）想的敌人而被埋葬，更多的人迫于他的理想而半死不活，整个人民都被他监禁了。当然，他自己和他的崇拜者也同样被束缚在这土地上，在这思想桎梏里，在这强权中，没有自己，没有希望，更没有意义。

现在，这支柱倒塌了，人们为偶像的失掉伤心，也为出现的曙光欢欣，只是人们在各自的脸上都带着不同的悲伤，因为还有警察，还有同事的告发，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吧。

一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历史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年底，我见到一位几年未见的旧友，本想把自己的感触说一说，谁知道，见故人，我也没有说明白什么，分手后我还有些后悔。我想，我好像明白了，像我们这样求索人生的道理，在过去、现在，在中国、世界同样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只是在世世代代人走过的路上和他们一样走过年华，并且也会和他们一样，走到一个地方鸣鼓收兵，像中国的古语那样：以不变应万变。

二千多年前基督诞生在今天，在第一九七六年他做好事我看到了，不知在下一年他在我心中以何面目出现。

1977年1月写于北京

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

第五章

《今天》的创刊及黄金时期

1978年至1979年是中国民刊的鼎盛时期，从外省到首都，从边缘到中心，几乎都有私印的小册子、传单和杂志流传，大约有成千上万种，令人想起“文革”初期不同派别的红色小报。然而，后者作为一种对文化的浩劫终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对这种以“纯洁思想”为目的的极端精神王国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当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进而在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后，封闭的社会之门终于启开，人们涌向几十年不敢踏进的“禁区”，由拘束地张望、感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其时，郭路生、
钱、凡等都写过清明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

恩戴德到热泪盈眶，继而产生自由地表达自我，自由地表达一切的冲动，于是，民刊应运而生，并受到曾经在底层饱经磨难的邓小平的鼓励，他说：“人民有什么话，就应该让他们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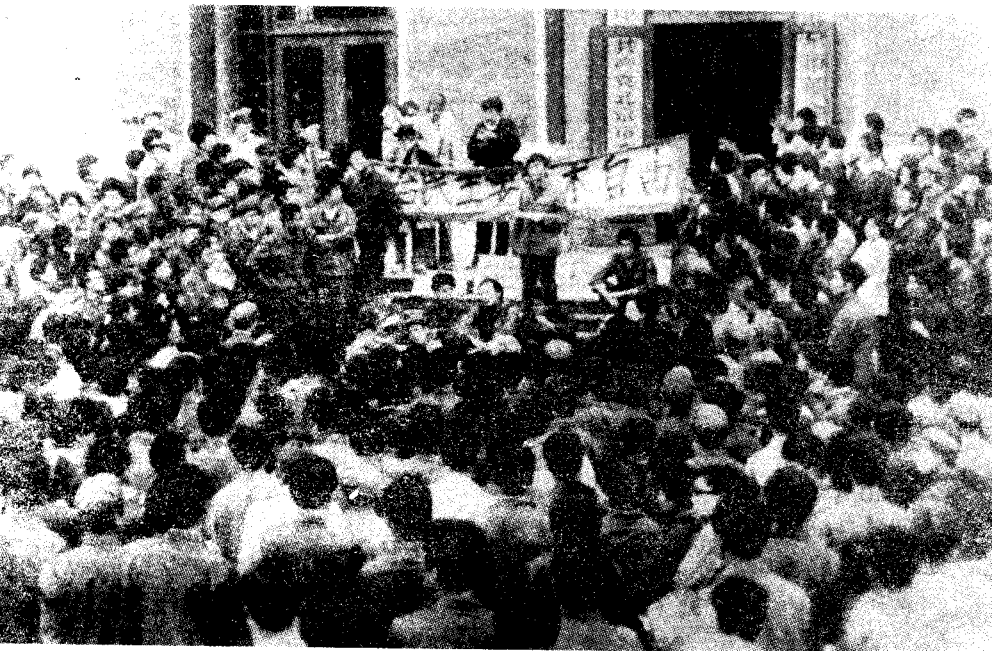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上，一直贯穿着一条宁左勿右的路线。“四人帮”将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路线推向极端，就成了“八亿人民八个戏”；举国上下，“两报一刊”发号施令。而在“文革”后期恢复和创办的《人民文学》、《朝霞》等几

家“官方”期刊、不过是极左政策的文学图解——这种用文学图解路线斗争的创作思维甚至贯穿到反“四人帮”的作品中，从文化界元老郭沫若的“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到《于无声处》、《十月的风云》等轰动一时的应命之作，其构思、手法依然同《海港》、《决裂》一样，堪称“三突出”的样板。

对于中国文坛，1976年至1978年是彷徨、蜕变时期，由于政治形势尚不明朗，有限的几家公开文学杂志的编辑思想仍处于几十年形成的传统桎梏中，刊登的所谓“解冻”文学不过是紧跟形势的文学——文学即人学这类在上个世纪就被俄罗斯文学大师们解决过的问题，直到80年代中期，仍旧为

在西单墙头出售刊物





在“星星美展”游行后北岛在市委门前演讲。

文化界争辩不休——因此，在国家公开发行的报刊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甚至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的时候，广大民众就将越过这种“政策性极强而又易变”的舆论工具创造一个民间的自由的“舆论”环境，这环境曾经传播“总理遗言”，引发四·五天安门运动，最终为邓小平的复出铺平道路，也让那帮强奸民意的政治丑角认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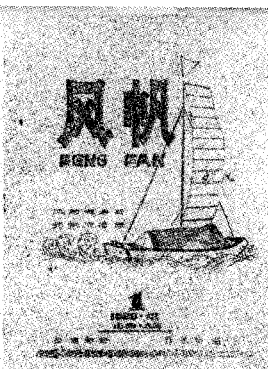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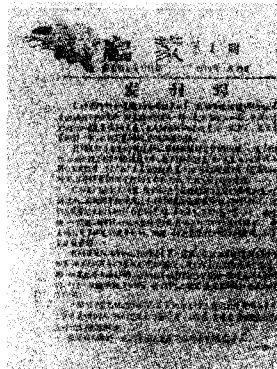
民刊的出现是民主自由舆论成熟的标志，它们由手抄本小说、诗歌、政治传单发展演化而来，并遇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复出这么一个历史转折契机。如果当时公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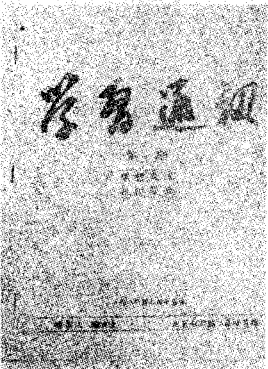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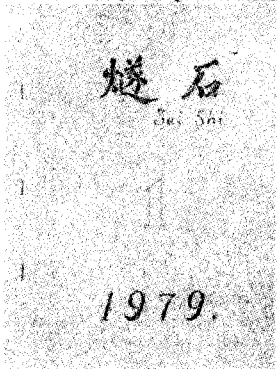
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民刊《今天》(1978-1980)。第一届编委：芒克、北岛、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今天》第一期后，因文学及社会见解，编辑部发生分裂，五人退出。遂由芒克、北岛重新牵头成立第二届编委，有北岛(主编)、芒克(副主编)、周郛英、鄂复明、徐晓、陈迈平(万之)、刘念春。后黄锐复来，做美编，赵一凡为幕后编委。

的国家出版物能与民间舆论同步成熟，与广大人民同样富有激情的话，长期处于地下的文学作者们也许会放弃办民刊的想法，直接通过公开发表作品去产生影响——可惜，历史不是设想……

现在，《今天》创刊的时代背景已凸现出来，那是一个人民积压多年的心声需要表达而又在正规渠道得不到表达的特定关口。《今天》的创办者们鼓励它的作者在国家刊物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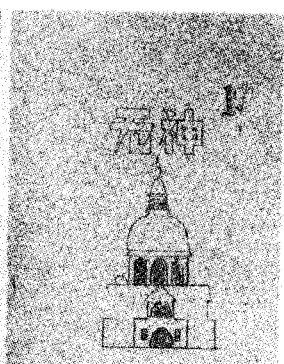
FOLIO 273 : ZHI JIANG · QIMENG · YIE XI TONG XUN · RENJIAN · SUISHI · FENG F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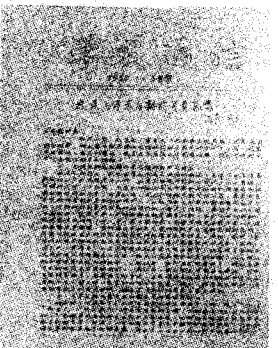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各地自发地涌起创办民刊的热潮，图为与《今天》同时出现的众多思想、文化、艺术油印刊物的封面。

表作品，但前提是必须使用在《今天》上使用过的真名或笔名，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今天》的知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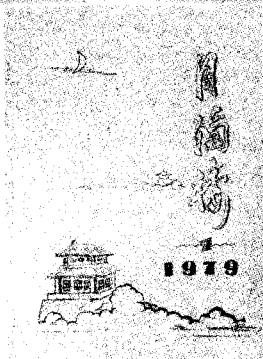
《今天》以一个文学杂志，特别是一个诗歌杂志著称于世，它一共出了9期正刊、4本《丛书》(诗集加小说)和3期“非正式刊”，并且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通过若干朗诵会，作者、读者、编者交流会，各民刊联谊会，以及同各界群众和读者的通信联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上登载的诗歌作品，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文学水准，开辟了比盛名一时的“伤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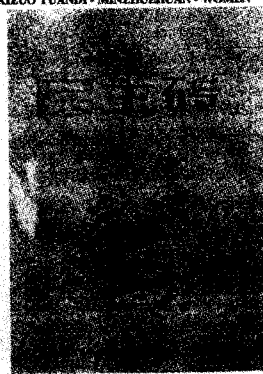
FOLIO 270: WUSHEN - XUEYOU TONGXIN - YANJIANG - QIU SHI - RUANG BIAO - BAI HUA



学”更深更高的人性空间。因此我们在这一章里，登载了《今天》创办人北岛和芒克的访谈录等，以及贵州诗人黄翔用感性的笔法，描写当时历史环境的文章。曾经有朋友建议我们对与《今天》同时期的文学民刊作一个全貌的介绍，并特别提到贵州的“启蒙社”，但是，仅收集前面所提及的资料，就得花几年的时间。至于为什么“重《今天》而轻《启蒙》”，则完全是因为《今天》的前后线索比《启蒙》显得清晰，并且与朦胧诗血肉相连。如果将来，有人能提供相当的历史物证，展示《启蒙》和《今



FOLIO 269 : FA - YUE-MAN LOU - FEIDIE - XIZUO YUANLI - MINZHUZHUAN - WOMEN



天》相等的重要性，我们将虚心地修订这个观点。

历史对某一阶段政治、文化现象的淘汰是很无情的，在激烈竞争的民刊潮中留下来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意义，还得力于《今天》幕后的大批文学志愿者。他们没有在《今天》上发表任何作品，甚至本能地回避出头露面的机会，但他们尽心尽责，保证了杂志的印刷、校对、出版、发行及与读者的联系——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回忆里、在精神上把自己认作是当年《今天》的一员。他们是赵一凡、周郢英、鄂复明、徐晓、刘建平、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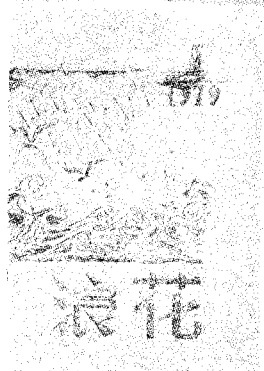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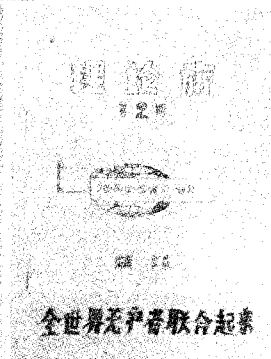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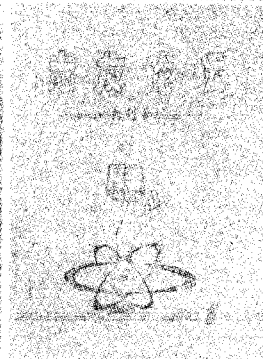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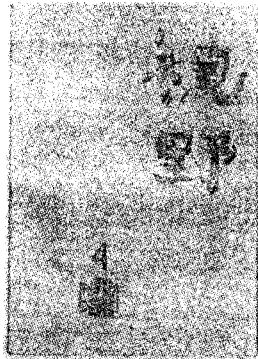


FIGURE 267 · RENMINZHI LU · SHENGHUO · LANG HUA · LIJUN QI · SHIYE · SHIYOU LUNTAN



南、王捷、程玉、李鸿桂、崔德英、张玉萍、尹蕾、陈延生等几十人。在这个群体中，周郅英是一个象征，一种默默的凝聚力，相信读者能从著名作家史铁生撰写的墓志铭和其他图片、文字资料中，感受到一种不可摧毁的灵魂的力量。

对声名远播的芒克、北岛的访谈固然必要，对默默无闻的李南、王捷的采访也不可或缺，历史由这两部分人组成。盛行于90年代的一种理论总是要追究“谁做谁的铺路石”，而捷克的平民政治家瓦茨拉夫·维尔却强调“人人都有参与历史的



平等权利”。虽然这在具体的现实里难以实施,可我们愿意在这本书里,追求这么一种诱人的理想。

黑太春是《今天》最小的诗人,长期以来,他作为一个流浪汉、一个边缘之外的艺术家生存着。他至今还在回忆着,跳跃着反叛——这从对他的采访中能感受到。

北岛访谈录

刘洪彬整理

《今天》的主编北岛，1992年6月6日，在伦敦大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上，叙述了70年代的《今天》的一些史实。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北岛审阅，如有谬误，当由本人负责。

北岛：老赵（赵毅衡博士）告诉我，让我谈谈《今天》的历史，实际上我就怕谈这个。因为你们知道最近《今天》增加了一个栏目，叫做《今日旧话》，很多人写，但是，谁也不愿意写《今天》这一段历史，到目前为止参与《今天》的人都不敢写，尤其像我，就更不敢写。说起来好像这里有很复杂的心态，就是在历史中你怎么叙述，你的角度，还有你的角色，这些都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既然老赵下令，我就只好讲，而且我想就着多多谈的一些故事，从故事讲开，从故事讲起。

我跟多多见面确实非常奇怪，后来多多写道我们俩是以歌手的名义互相介绍认识的。我们见面，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叫史康成，他说是介绍一个美声唱法的歌手，我们完全是业余的，我只学了几个月，学得很差。我去时，多多那会儿正好从他家的楼梯上下来，非常傲慢的样子，他说我比他还傲慢，



1978年底，芒克(28岁)和北岛(29岁)
创办《今天》时的合影

带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然后我们俩握了握手。那是1972年。第二次握手是在十年以后，就是他到《农民报》，我在《新观察》，那是1980年，我们的第二次握手，差不多隔了八年时间。那时候正好也凑巧都在一个院里工作，《新观察》和《农民报》在一个院里。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当时属于不同的沙龙，我们有一个交叉的中心，就是芒克。1972年的时候，我一个同学的朋友叫刘禹，这人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同学叫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他说要给我引见一下北京的先锋派一个团体，我这样就会见了芒克，而且在此之前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受到普希金很大影响的诗人。我跟芒克见面以后互不服气，吵了一架。但是芒克给我的震动的确是非常大的。我想我可以说1972年以前的诗就不愿再讨论了，真正开始写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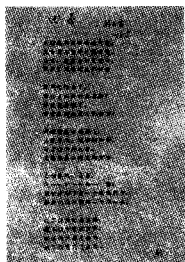
《今天》主编北岛在 70 年代末

实应该说是在 1972 年开始。和芒克的来往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在白洋淀。我也去白洋淀看过他。我们划着船，一块喝非常便宜的白薯酒，四毛多钱一斤。白洋淀的船是真正的渔民的船。当时还有彭刚，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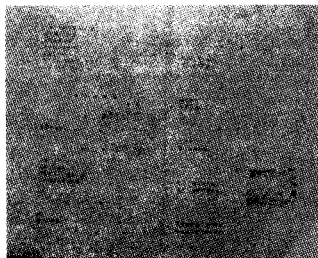
先锋派实验者。所谓先锋派就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诗人芒克，一个是画家彭刚。彭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谈太多。我们所谓先锋派的第一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刚才多多没有谈到这段故事。他们就是突然决定要到全国旅行，就是突然翻过北京站的墙以后就上了火车，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到了武汉之后才发现没钱，就开始卖衣服卖裤子，在武汉实在待不下去了，在再“扒”火车时，被人家给遣送回来了。我跟芒克和彭刚来往比较密切的是从 1972 年一直到 1980 年。在这个期间，我们确实谈论过中国文学如果要搞自

由化运动的话，我们一定愿意为此献身。这在很多时候当然都是酒后狂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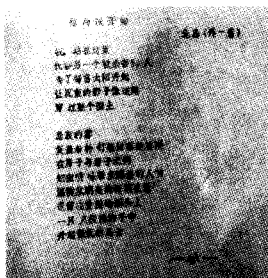
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准备筹办《今天》，筹办《今天》的念头，是在此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比这早一点。那是秋天，在黄锐家。黄锐，大家知道是星星画展的发起人，也是《今天》的发起人。我、黄锐和芒克三个人在黄锐家喝完酒以后，大家认为现在形势不错，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芒克说：“好，咱们干。”当时，我们能找到的人很有限。因为大家酒后就清醒了，如果真干这件事的话，实际上困难是非常多的。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里包括另外几个人，我不便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国内，而且他们确实介入《今天》的时候并不长，当时的参与者一共七个人。我们就开始组稿，然后我就找印刷机，当时实在找不到稿子，诗稿好找，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稿子。后来我们就找到马德升。马德升的一篇小说，给他改了三遍，发出来了。黄锐改的第一遍，芒克改的第二遍，我改的第三遍。最后把马德升给气疯了。小说发表以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抗议信。这确实使我们以后开始尊重别人的创作，以前我们就是很任意地这样做。第一次的印刷也很有意思，我记得特别难的就是找印刷机，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油印机那个时候控制得非常严，都是由党委和工会控制，不会轻易借出来的。在找印刷机的过程中，我们还找到张欣欣。很奇怪，张欣欣那时候也根本没写作。张欣欣是北医团委的什么干部，她说借不出来，这是控制的。最后黄锐终于背回来一个特别破的油印机。还有纸张问题，因为我们当时都很穷，纸怎么办？那就只好偷吧，反正我们有的朋友在印刷厂，芒克当时就



载于《今天》创刊号的轰动一时的北岛名篇《回答》，此诗后公开发表于《诗刊》。



载于《今天》的北岛名篇《太阳城札记》，全诗包括引起巨大争议的一字诗《生活——“网”》



载于《今天》的北岛名篇，为悼念遇罗克烈士而作。

在印刷厂，还有什么人在工会工作的，大家就开始偷纸，偷了一个多月，陆陆续续攒了够出一期的纸（所以纸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就刻蜡版，开始印刷。然后我们在一个可以说是三不管地区，那片地区现在变得很高级了，是北京的一个使馆区了。那时节既不属于城里，也不属于郊区，也不属于农村，就是这么一个边缘地区。就如奚密说的，中国的诗歌是从边缘地区出来的。那真是一个边缘地区，谁也找不着。在一个朋友家就开始印刷，那个朋友家是我们过去经常聚会的地方，就是唱歌啊，喝酒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因为实际上要印出一本刊物，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大家三班倒，吃大锅饭，炸酱面。一直干了三天三夜，而且当时手都磨破了。三天之后，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印象还很深。当时下着大雪，我们住的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的小房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干完以后呢，大家都精疲力尽。每天晚上，我们出去上厕所都排着队一块出去，可以看现场的周围环境。但是真正印出来又很茫然，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先去吃一顿吧，好几天光吃面条。我们到了东单的一个夜间食堂，那个时候还没有酒吧。就这样跑到那儿去，喝着烧酒，大家非常感慨，下一步怎么办呢？好像要生离死别了，这事已经干了出来了，那就贴吧，说第二天给贴出去。那由谁去贴呢？这时候有些人说“我现在考大学，不行”，“我现在比较困难”，有些人说“我现在要结婚”。后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只好由我、芒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去干。我们三个属于比较有胆儿的，我们说我们去贴。记得临别的时候大家是痛哭一场，因为谁知道此去是不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呢？第二天早上，在我家熬着浆糊，那个时候浆糊太贵了，买不起。熬了浆糊，我出了一个主意，觉得挺高明，把自行车后面的车牌给涂改了。因为，大家知道 1976 年四·五事件，

公安局就是用自行车号码来抓人的。所以我们就把自行车号码改了。我记得把“0”改成“4”，把“1”改成“10”。改完号码之后，我们就骑着车去贴，车架的后面放着浆糊桶，当时一共贴了二天，比较顺利。第一天在市内贴，是在纪念堂旁边，那会儿纪念堂刚建成；还有西单墙，还有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部门。第二天去了北大、人大、清华。

唯一出了一点问题的是在人大，人大大概历来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大学，校方很厉害，派了一保卫干部出来跟我们交涉，最后吵了一番，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们走后，很快就被撕掉了，北大的保存很长。从北大出来以后，有两个人尾随我们，吓得我们以为便衣跟上了。那个大冬天，路又滑，其中一个人摔了一个跟头，我们想便衣不至于那么蠢吧。后来才知道那人叫姜宏，是后来某民刊的主编，以后我们就开始交谈。

从11、12月开始，北京就陆陆续续在西单墙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最初是上访者的申诉的大字报，以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民刊。第一份我记得是某某论坛。《今天》是第二份，《今天》是12月23日问世的。以后有什么《群众参考消息》、《启蒙》等等，多达几十种。其实，当时这个背景和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邓小平想搞改革，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所以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今天》出版在12月22日。我还记得邓小平在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的时候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12月27号，一个加拿大记者在西单墙前面转达了和邓小平谈话内容。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我也



北島在《今天》編者、作者、讀者交流會中(1978年)

在场。当时没有扩音设备，所以他的讲话是被一层层人声传达出来的。’

我还是多谈论《今天》的事吧，我想当时整个的背景，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上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赶紧地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9月份成立，当然进行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文学研究会的编委。所以在9月份到12月份之间又出了3期的文学资料。另外，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号和1979年10月21号，这两次朗诵会，我想也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后唯一的。后来我们就在八一湖找了一个空场。我还亲自去勘测了这个地方。我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录音机能把当时的这个过程给录下来。朗诵会那一天，我记得正好是赶在1979年年初，形势特别紧张的时

候,就是中国政局变化非常奇怪,一阵一阵的,《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79年年初,因为当时这些民刊都太势单力薄,他们组织一个民刊的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非常奇怪的印象,就是跟一些陌生的人在中山公园的那些古柏下见面,都是不认识的人,然后周围是一些更陌生的人,在后面跟着。在围着一个场子里,我记得大家开了一个会,当时就说互相声援,如出问题要及时公布。以后就搞了一次活动。《今天》没有人发言。



1976年春,老诗人蔡其矫与青年诗人赵振开在景山公园里促膝交流。

但是其他民刊发言之激烈,把我们给吓坏了,我记得是杨光提出到底有没有信仰自由?就是说应该有信仰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这在当时绝对是异端邪说。这次活动导致了《今天》的一次分裂。当天晚上我们就吵了一架,到底怎么办?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在当时肯定已经构成了一个事件,会使很多人入狱。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既然这件

事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坚持下去。当时其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要在西单贴出一张大字报，就是说不承认《今天》参加了这个会，或者认为这个会是不合法的。后来我就坚持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说我们已经做的事就已经做了，这样做等于落井下石。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今天》第一期后的第一次分裂，大部分人为此退出了。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害怕，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当时只剩下我和芒克。后来黄锐又加入了，黄锐当时也是反对。但是从第一期以后，我们变成孤家寡人了。当时我们根据一些地址，我们就联系找到了一批人给我们帮助。

所以以后《今天》的成份就可以说非常复杂。实际上《今天》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工作，它的一个编辑部，另一部分是作者。编辑部完全是一个作坊，因为全部是手工操作。以后我们就不偷纸了，因为开始赚钱了，开始卖点钱，或者有别的一点来源。我们就开始买纸，从买纸到刻蜡纸，到印刷，到邮寄，到出售，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完全手工做。所以这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我想现在说到《今天》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些人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些人。当初我记得《今天》最繁荣的时候有二三十人，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护士、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都是这样一些人。《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

这些人最初像黄锐、马德升实际上都是《今天》成员，后来有曲磊磊、王克平。后来他们觉得在《今天》无事可干，除了帮画画插图以外，没什么创造性。他们就决定拉出来，所以大



1979年夏,当时北岛的女友、画家邵飞
在北京电影学院游泳池边留影。

家知道在1979年的9月份,《今天》和“星星画展”还有某某民刊等、一些杂志搞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星星画展”的露天展览,在美术馆的墙外举办的。当时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术馆内正在举行每年一度的全国美术展览,是非常官方性的。就是在10月1号的前三天,突然在美术馆外的铁栏杆上,“星星画展”挂起了一块块的木雕,尤其像王克平的那些奇怪的木雕,当时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拿绳子把那个小公园围起来。首先遭到园林局的人的干涉,第二天

遭到警察的干涉。以后我们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开始搞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就是在1979年三十年大庆的时候搞一次游行。但这次游行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就是说当时在这个游行之前，北京市委非常想妥协，当时他们派了一个北京市美协的负责人刘迅出来调



1977年夏，在北京郊外樱桃沟聚会留影。蔡其矫（右一）、赵振开、邵飞（后排）。

停。但是他找不到可谈判的人，因为在这帮人里，谁也不能代表谁。他找过我，也找过黄锐，最后只好回去报告说没办法谈妥。当然实际上他们给的条件不错，就是给“星星画展”一个展出场地，由官方提供。但是最后没有谈成，到了当天晚上，只好决定游行。所以我们这些人都会被赶上了前线。当天晚上我给吓得就没敢回家，我躲到一个朋友家去住了，而且给女朋友写了一封诀别书：你收到这封信后，我就回不来了，而且一辈子咱们也就算了。像王克平等，都是把钥匙留在家里了，都是说准备豁出去了。当时的游行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想是整个的一个缩影。声势浩大的时候，就是从西单出发的时候，那时候马德升慷慨激昂地讲演，各民刊的讲演，声势浩大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就是周围围观的老百姓上千人。但是六部口前面一出现警察以后，就剩一百多人了，剩下的人全都爬上树、爬上墙去看了，然后就喊“冲啊”什么的，就是都想看热闹。后来，警察放出一条线，说你们必须按照我们指定的路

线走，所以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队伍又变成上千人，还加上外国记者。这个游行的事我就不多说了，有很多人叙述这段历史。然后我们举行了第二次朗诵会，是在10月21日，我们这次朗诵会有很明显的挑战色彩。因为我们特别加上了政治性特别强的诗，比如说像《西伯利亚囚徒》。而且那次朗诵会来的人非常多，有一二千人。到了12月8号，就是1979年12月8号，政府决定把西单墙从西单迁到月坛公园。我还记得赵南（《今天》的一个成员），他写了一首诗《给你》，当时我们看了热泪盈眶，就是非常浪漫、非常悲哀地描述这段历史。到了80年代以后呢，大部分民刊都停了，但是坚持下来的就是某某民刊和《今天》，这样两份完全不同的杂志。我现在实际上完全谈的是《今天》的外部风景，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条件，和整个政治气候、整个西单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是怎么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当时就是整天面临着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威胁，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压力。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用再多讲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今天旧话》这个栏目，有很多人继续在写，我也准备再写，比如最新一期我们要发一篇纪念文章。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叫赵一凡，他是一个文学收藏家，如果说他的角色没有怎样重要，但是他当时可以起到一个北京那个沙龙的中心人物的作用，由于他收藏的诗很多，本来注定要遗失的一些作品因而得以一直保留到现在。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这个栏目。我先谈到这儿吧，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再提。我谈得很混乱，因为没做任何准备。

芒克访谈录

唐晓渡

(文中 T 为唐晓渡, M 为芒克)。

T: 作为 1949 年以来的第一家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今天派”诗歌被认为是所谓“新诗潮”的发端,但迄今很少见到有关情况的完整陈述。你是《今天》的创办者之一,能详细谈谈创办前后的情形吗?

M: 1978 年上半年,北岛把自己的作品打印成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他希望我也打印一本。当时我手里诗稿不多,有些丢了,有些毁了。我这人没把自己当个诗人,因此对写下的东西没太当回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烧了好几本,包括 1973 年前后写的三首长诗《绿色中的绿》,有四五百行;《主人》,二百来行;还有一首《第 23 个秋天》,也有一百多行,应该说这些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太长了吧,没见谁传抄,烧了就烧了,只是回头想来有点可惜。我的诗被传抄的都是些较短的。那次北岛帮我找回了一批。他找了赵一凡,赵手里有我 1973 年的另一些主要作品:《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等等。我 1971 年最早写的 9 首短诗,根子看



《今天》创刊时期的芒克与北岛

过，后来我自己不满意，都毁了；那次也找回了一首《致渔家兄弟》，印象中是赵振先送来的。《白房子的烟》、《冻土地》、《路上的月亮》、《给》、《荒野》等，也都是那次收集来的。就用这些诗，加上1978年写的一些，我编成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心事》。然后高杰帮刻的蜡纸，黄锐设计的封面，印出来大概是在八九月份。

这件事可以说是办《今天》的一个引子，因为正是在操办《心事》的过程中，我和北岛、黄锐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密切了彼此的关系，奠定了日后合作的基础。我对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一直心怀感激。



1979年8月,《今天》
副主编芒克在玉渊潭八
一湖畔主持诗歌朗诵会。

T: 确实称得上是一段佳话……顺便问一句,你和北岛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M: 1972年。是刘禹介绍认识的。刘和何伴伴、根子、陈凯歌、田壮壮等都是北影子弟,当时相熟。他看到了我的诗,说“四中也有个写诗的,你们应该认识”,于是就认识了。当时读到北岛的唯一作品是《金色的小号》。这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你知道,我们的笔名,是互相起的,是在1978年。

回到正题上来。就在我们忙着印诗集的同时,西单墙已经贴了许多大字报,还不断有上访的人游行。到10月,气氛相当热烈了。一次我、北岛、黄锐一起商量,觉得应该寻求一种

更有力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声音，结论是应该办一份文学刊物。那时年轻血热，说干就干。首先找了刘禹，又找了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还找了新影的陈嘉明。我记得第一次开会碰头是在张鹏志家，鼓楼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那次碰头会的结果是成立了一个七人编辑部，刘、张等负责理论，黄锐美编，可以说各有所长，相当完备。

又商量给将办的刊物起一个名字，每人提一个。我非常潜意识地想到了“今天”，大家觉得不错，就定了。

T：你所谓“非常潜意识地”是什么意思呢？

M：就是没有考虑，直觉如此。倒是出的时候由北岛执笔写“致读者”，把内涵阐述得比较清楚。

接着开始征集稿件。当时手里已有一些。诗，除了我和北岛的以外，还有蔡其矫和舒婷的。舒婷是蔡推荐认识的，以前与北岛已有联系。史保嘉的哥哥史康成翻译了《谈德国废墟文学》，又让张鹏志等写文章，又找了马德升的版画、木刻作插图……马德升还写了一篇小说，让我和北岛给改得一塌糊涂。

第一期稿子很快征齐了。刻蜡纸不成问题，有的是人。困难的是印刷。没有油印机，只好分头找朋友在单位印，带上纸。那时纸控制得很严，买大批纸要证明。好在我当是在造纸总厂工作，就请朋友们帮助一块儿往外“顺”（“顺”，北京土话，意即偷拿。——编者注），这样买了一部分，“顺”了一部分。后来我们终于借到了一台油印机。

第一期印刷是在陆焕兴家，现属东直门外新源里一带，当时还是农村，比较隐蔽、安全。孤零零一个大院子，住着好几家人，周围是菜地。编辑部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有几个干脆就住在那里，连轴转，饿了就面条招呼。马德升也参加了，因为有他的画。他对自己作品的印刷质量要求很严。马那时是个很谦

虚、踏实的人，瘸着一条腿，让他别来，他坚持每天拄着双拐来，在雪地上不知摔了多少跟头。

12月22日，全部内文包括封面都印好了，决定第二天贴出去。外面情况复杂，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可能一去不回。商量的结果由我、北岛、陆焕兴三人去。我和北岛那时都还没有交女朋友，没有顾忌，又是发起人；陆则是自告奋勇。头一晚熬好了浆糊。23日出发前大家都来道别，很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劲头，事实上我们确实也都和亲人朋友作了交代，万一出了事如何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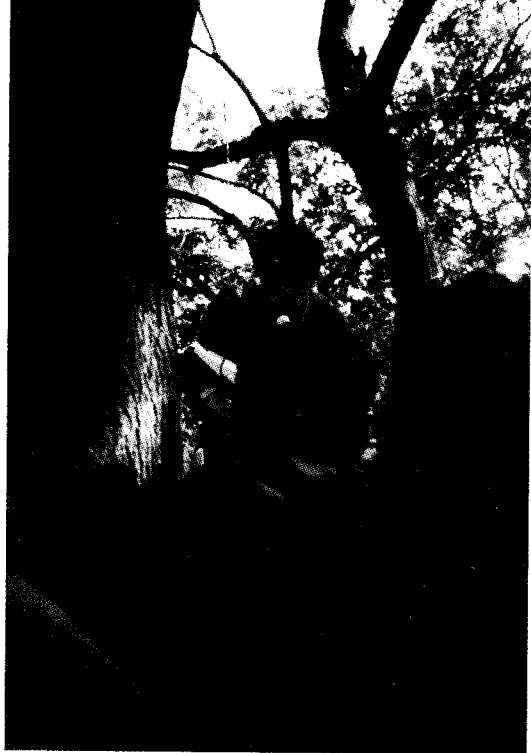
我们骑着车，挎着包，挂着浆糊桶，心里既紧张又从容。第一站自然是西单民主墙；然后转去天安门，当时天安门东边有一排大木板；再去王府井，相中的是一家大商店的门面。每一处身边都站着许多人，议论纷纷，包括警察。我们可不管他们在说什么，三人密切配合：我刷浆糊，北岛贴，陆焕兴用扫帚刷平。再往后我们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最后一站是虎坊桥，当时《诗刊》在那里。这么转了一大圈天已经黑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又冷又饿，浆糊也冻上了，于是去晋阳饭庄慰劳了自己一顿。

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就去了几所主要大学。我和北岛跑了北大、人大。北大学生反应最强烈，保留时间也最长。但在人大遇到了麻烦。保卫处的人不让贴，我们硬贴上，一转身，又被揭掉了。那时我们称人大是“保守势力的顽固堡垒”。

剩下的第一期装订好，大概有1000本，都散发了。编完第二期又加印了1500本第一期，那时我们已开始征求订户了。

T：听起来像是一段传奇。据说第一期和第二期中，编辑部曾发生过分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M：起因是参加一次民刊联席会议，是在陈旅家。我和北



1979年9月,《今天》编者与千余名读者在紫竹园公园举行作品讨论会。图为主持人芒克在讲话。

岛都没在,是黄锐去的。与会者商量联合举行一次抗议活动;黄锐捏不准分寸,没敢在决议上签名。我知道后不以为然,又赶过去,没犹豫就把名签了,然后在编辑部通报了此事。记得当时是在张鹏志家,吵得一塌糊涂。除了北岛和我,其他人都不主张参加这次活动,认为《今天》是文学刊物,不应加入政治活动。而我认为,民刊的命运是共同的,如果取缔,不会独独留下《今天》,因此必须相互支持,一致行动。他们认为我的看法只能代表我一个人,不能代表编辑部,应该就此写一份声明,贴到墙上去。当时大家一起干,没有主编、编委之分,这样的要

求不能算过分，因此我表示同意。但这时北岛急了，说这不等于把芒克卖了吗？他也同意签名参加抗议活动。这样就僵住了。北岛说既然无法统一，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二人退出算了，但保证继续合作。大家沉默。一会儿有人说你们不干了，我们还怎么干？北岛说假如是这样，那就你们退出，我们来干。你可以想见当时有多尴尬，但确实没有什么余地。最后他们同意退出，会议不欢而散。

那天出来后我和北岛特别兴奋，当晚就住在他家，一夜没睡，谈怎么重新组织人，怎么办好《今天》。

T：如此解决难以调和的分歧倒是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那么第二届编辑部是如何组成的呢？”

M：《今天》第一期贴出后，我们收集了一些在上面留言希望联系的人的名单和地址，重组《今天》编辑部就以此为基础。我们先后找了周郅英、徐晓、陈迈平（万之）等。李南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李南的一大功劳是介绍了一员干将鄂复明。他插队内蒙12年，当时刚回到北京。这个人很少说话，但特别能干，我和北岛都非常信任他，从印刷、财务到为读者复信，都由他去抓。有他参加工作，是《今天》的幸运。李南又介绍了李鸿桂（桂桂）、程玉，加上主动要求参与的庞春青（黑大春）、崔德英、张玉萍和老熟人刘念春、赵一凡等，到1979年3月，新班子就齐了。编委还是七人：北岛、我、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郅英。后来黄锐又回来了，做美编。赵一凡算是幕后编委，共同负责收集有关资料。

为了使编辑部工作正规化，北岛提出设主编、副主编。我支持北岛任主编。一来他大我一岁，二来他比我要沉稳些，从整体考虑更合适。于是开了七个编委都参加的会，确定了此事。我任副主编。



诗人芒克在1979年10月1日游行前的演讲。

T:当时在编辑方针上都有哪些主要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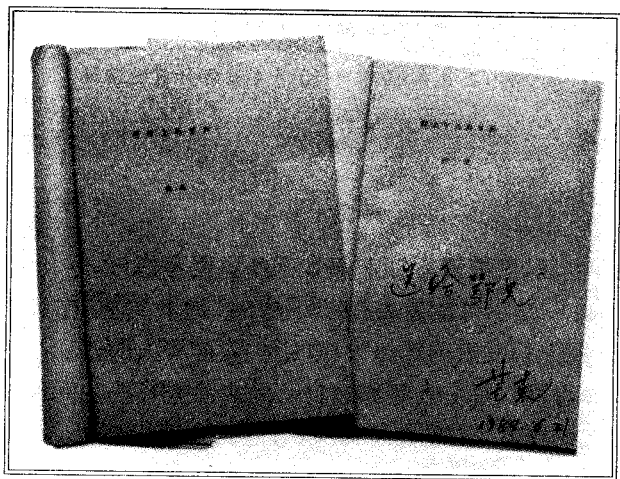
M:一是尽可能发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比如二、三期先后发表的郭路生(食指)、依群等人的诗。二是努力扩大作者群,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关系去寻找、发现知道和不知道的作者。当时找了孙康(方含),还有田晓青。当然也有一些重要人物找上门来,比如江河和甘铁生,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杨炼是“星星”第二次画展上认识的。顾城是他姐姐顾乡带着找去的,夹着他的一大卷诗。我对他的诗不太满意,直到第二次诗专号才发了他署名“古城”的两首诗。他那时像个孩子,见了我们就往后退。严力是早就熟识,参加“星星画展”又碰上的,他的诗我们也拿来发了……我们还试图找过多多、根子、马佳、宋海泉等,但没有找到。

为了改进印刷质量,印第四期前我跑了一趟德州。联系的人记不得了。那边的经手人是关锋的儿子,他帮着买了一台

手摇式滚筒油印机,我去扛回来,一回来就加印了第一期。

办第二期前后是我们收获最大的时期,差不多每天都要收到一大堆信。

T: 那么订户情况呢? 你刚才说到从第二期开始征求订户。你们的经营意识如何?



北岛和芒克的自印诗集

M: 订户很踊跃。许多人把钱夹在信封里。第二期的订户大概有好几百人吧,这在当时已经很难了,而且以后一直比较稳定。每期我们都印不少于 1000 册,发完了订户,剩下的就拿到民主墙那里去卖,通常总是一下子就卖光。这样,下一期的经费就全有了。

那时说不上有什么“经营意识”，但也不尽然。比如第二次“星星画展”，《今天》配的诗；画展的说明书也是《今天》帮助印的，说好卖的钱归《今天》作经费。当时可没少卖，尤其是第三次。

这些钱维持刊物周转是足够了，还可以用来考虑进一步改进质量。除此之外要花的钱很少。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劳动大都是义务性的，包括来帮忙的人。第二期出来后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大学生，北大的特别多。北大、北师大、北师大，我们都设了点；每期出来，就到点上销售。印刷装订时也有许多人过来帮忙摺页。这些人也都是义务劳动。

当然也有一些日常开销，包括我的一笔“特别开销”。为了印第二期，我去单位请假，可头儿一天假都不准。我说不准就不来了。待印完再去上班，头儿让我写检查，不仅是纪律检查，还要我交代清楚这些天都干了些什么。我说纪律检查可以写，其他不行。他说那你就不要来了。交涉了几次都僵持不下，我一跺脚干脆不干了，一心一意办《今天》。为此编辑部每月给我发生活补贴，每周一次，每次6元，怕一次发给我让我喝光了。北岛知道我这个人手脚大。

T：这一举措无疑十分明智（笑）。请接着谈谈你们的工作程序好吗？

M：《今天》当时分两大块，一块是编辑部，一块是作者群。作者群每周一次在赵南家开作品讨论会，这同时也是《今天》发表作品的确定方式之一。我和北岛的大致分工是他管小说，我管诗。最初我们都喜欢修改别人的东西，说来也是希望保证刊物的质量。但后来就很少改了。

现在人们说得比较多的是作者群，很少说到编辑部其他的人。作者群当然是确立《今天》面貌的主要因素，但编辑部



1979年,《今天》在紫竹园公园召开的一次
编者、读者、作者讨论交流会现场。

也功不可没,他们冒的风险甚至更大。

T:除了出版刊物外,“今天”还开展了若干其它活动。人们较为熟知的有例如在八一湖搞的两次朗诵会,在紫竹院公园搞的“编者·作者·读者座谈会”,协办“星星画展”等。其它还有哪些主要活动,能否请你也谈一谈?

M:还有一次大的活动,即抗议第一次“星星画展”被取缔,时值三十周年大庆前夕。这次抗议和声援活动是《今天》和《四五论坛》共同发起的。也是在76号开的会,会后以三家的名义给北京市委去了信。要求答复,期限定在9月30日午夜前,否则就游行。30日我们又集中在76号刘青家,有徐文立、刘青、我、北岛、王克平、黄锐等。因一直未见答复,估计会发生比较大的事情,搞不好要抓人。为了保证第二天的游行

能如期进行,决定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徐文立、北岛和黄锐统领,留在76号,继续等答复并应付不测;第二梯队由我、刘青、王克平负责,当晚住在外边,连夜组织人。口号是“要言论自由”、“要艺术自由”,写了横幅。两个梯队约定10月1日上午在民主墙汇合;即使第一梯队被抓,也一定把游行搞成。同时我们还起草了一封致各界的公开信。

结果第一梯队没出问题。到点大家全部集合到民主墙下。一到那里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临时在一个土台上搁了一张板凳开始演讲,先后有马德升、黄锐、徐文立等。公开信是我宣读的,读完马上出发向天安门方向游行。王克平和另一个人在前面打着横幅,马德升走在中间;我们身后浩浩荡荡跟着成千上万的人,很是壮观。快到府右街时两边突然冲出大批警察,白花花一片分布成几道防线。一见这阵势那些跟着的人纷纷后撤到离我们几十米的地方,有开溜的,有上树的,把我们几十人晾在了前面。

徐文立上去交涉。对方说奉上级指示不许通过天安门,必须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走。我们同意了,于是右拐从现在的音乐厅、和平门、前三门、再左拐到北京市委,把市委大院坐得满满当当。北岛、徐文立、黄锐进去交抗议信,我、刘青、王克平在外面组织演讲。后来上面接受了抗议书,北岛他们出来,我们才宣布游行结束。

应该说这次游行是相当成功。这样成功的游行1949年以来不多见,而且是在“十·一”,或许是第一次,至少在北京如此。当然“文革”中的那些除外。我们《今天》还真和“第一次”有点缘分。79年4月以民间自发的形式举行诗歌朗诵会获得成功,也算得上是1949年来的第一次吧?

审判魏京生的录音,也是我们和刘青一起,以《四五论



在《今天》创刊十五周年的聚会上，王捷为她做了个蓝色生日大蛋糕，上面写着：“今天15岁”。从左至右为：鄂复明、唐晓渡、芒克、王捷、“骆驼”。

坛》的名议整理出来，用《今天》的印刷机印的。黑大春、陈延生去西单民主墙卖，结果被抓了，于是刘青出头去换人。他一去不返，被判三年劳教。其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出来经刘念春转到法国发表，又被加刑，刘念春亦因此被抓。

T：就我记忆所及，自1980年上半年起，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大家都知道1980年下半年《今天》编辑部改为“今天文学研究会”，《今天》改为《今天研究会文学资料》与此有关，请谈谈具体经过：《今天》的最终解体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吗？

M：应该说自办《今天》始，形势就没有真正松快过，程度

不同而已；但《今天》仍然坚持按部就班地出。除正刊外，还出了4种丛书：北岛的《陌生的海滩》、《波动》、我的《心事》和江河的《从这里开始》。

1980年夏，民刊纷纷停办，但我们又想人不能散，交流活动不能停，应找到另一种形式，作为文学团体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变通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凡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的，都是会员，大概有30余人。理事会仍是七人，有北岛、我、江河、陈迈平、赵南，其余记不清了，好像有周郅英。研究会活动了两三个月，出了三期“资料”，到1980年底就无疾而终了。

“今天文学研究会”是自动消散的。其实在人散之前，心早就散了。许多人想方设法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被吸收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包括一些主要成员。那年冬天极冷，阴冷，心情也很萧条。《今天》被勒令停刊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厂里的开除通知，理由是已旷工数百天。就为这，父亲也和我闹翻了。这些事搅和在一起，真令人感到“悲哀是大海”。厂里的事，家里的事，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看到初衷被抛弃，被毁掉，难受。我想到我们当初之所以要办《今天》，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团体，行使创作和出版的自由权利，打破官方文坛的一统天下。我和北岛私下也多次说，决不和官方合作。现在抓的抓，散的散，看到我们想干的事就这样收场，怎不叫人感到失望！最困难的情况都挺过来了，但有的人最终还是经不住俗欲的诱惑。

北岛和我有过议论。他主张尽可能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这同样会扩大我们的影响。他有他的道理。但我认为这最多只能是个人得点名气，于初衷无补。

我在76号又坚持了半年。朋友们都见不到了，只有老鄂

每天下班来看我，用剩余的钱尽量维持我的生活。那情景真够凄凉……

T：可以想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许多年，听起来还是有点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M：让我失望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今天》被勒令停刊时，我们曾起草过一份呼吁书，请求文学前辈关注，予以声援，一共发了一百多份，都是在文学界、思想界有名望和有影响的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给我们回信。我们曾找过萧军，萧要了我们的名字后才出来，但态度相当暧昧。有人说唯有他对我们表示过支持。这不确切……当然，他们有难处，我们能理解。

老作家中也有对我们好的，如严文井先生。《今天》停刊后常让他太太给我送些钱，还介绍过我找冯牧，希望能让我到《文艺报》工作。

T：作为“过来人”，你对当年的《今天》从总体上作何评价？如果方便，也请谈谈对复刊后的《今天》的看法。

M：回头去看，能创办《今天》这样的刊物，让不得发表的“地下文学”作品得以发表，坚持了两年，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体现了当代作家争取写作和出版自由最初的自觉努力。

《今天》是那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作为刊物，《今天》应该说是成功的；至于个人成功与否倒在其次，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是为刊物服务的。

但换个角度，也可说《今天》最终是失败了。没有争取到出版自由，我觉得作为作家、艺术家是一种失败。我这人不喜欢干失败的事，至今仍心有不甘。中国只有作家协会这样官方文学团体是悲哀的。我们前几年搞“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后来办

《现代汉诗》，不就是想有像《今天》那样的、自己的文学团体吗？

《今天》当然有它的成就，但失败者去谈成就没有多大意思。同时，也不能过高估计了《今天》的成就。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出现和存在，而作品显然还不够成熟。

一个作家的成熟取决于他个人作品的成熟；一个刊物的成熟则取决于许多作家的成熟；《今天》还没来得及成熟就夭折了，或者说被扼杀了。它在国内的消失不管怎么说都是件遗憾的事情。尽管后来在海外复刊令人高兴，但其生存的意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东西，当它消失时也就结束了，再出现时已是一样新东西。

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历史。对我来讲，尽管那两年非常有意义，值得珍惜，因为可以说我们曾有过短暂的出版自由，但毕竟已成为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的，还是让历史去评说吧。

T：谢谢你今天所说的这些。我相信它不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而且还包含着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再次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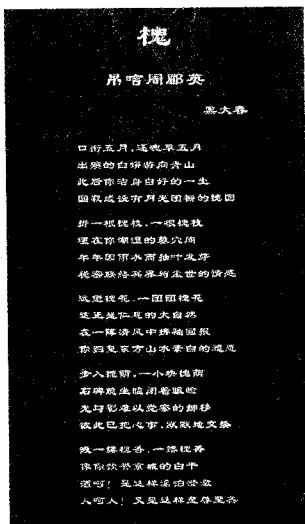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芒克，诗人，现居北京；唐晓渡，评论家，现居北京。

周郿英墓志铭

史铁生



周郿英的墓志铭(1995年5月5日立,史铁生撰,赵家焘书。)



《今天》编辑部最小的成员黑大春作的悼亡诗。

周郢英，以非凡的毅力同病痛抗争三载，于1994年5月5日离开了他所爱恋的这个世界，终年48岁。

所有他的朋友，都看他作亲敬可赖的兄长。他心中始终装满的是炽爱，因而名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他眼里永远看见的是平等，因而善良的人都会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喜悦和忧悲，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并不由于一个身影的消逝而离我们遥远。

郢英是新文学的推动者，作为《今天》最初的编委之一，他真诚且毫不张扬地尽了他的职责。

郢英是以助人为乐的人，是以宽厚为怀的人，是以俭朴为美的人，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郢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忘记你那间简陋而温暖的小屋，因其狭小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因其博大，那儿连通着几乎整个世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郢英，你的亲人和我们在一起，你幼小的儿子将慢慢知道他的父亲，以你为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

郢英，愿你安息。郢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今天》编委周郿英主持紫竹院交流会。

作家史铁生(《今天》作者)向周郿英作最后道别？





《今天》小说家万之(陈迈平)摄于长城(1977)。

《今天》成员万之在周郁英去世时从海外发给徐晓的传真。

徐晓：

拆开中学生周溢进消息，闻之心情沉重。你是位老，亦是革命家。不过，在这种时候，没法向你道什么话，或替谁白的话。大概，都不是多余，而是废话。我不想说。1981年10月中，我最敬重周郁英送你，更不想有朝一日和你们道别。或许可表明心迹，请你们的谅解。如友，如同人似也。如履薄冰，可者亦重，生者亦重。我相信的是周郁英的百年之憾，相信的是你临危变异的叫喊，叫喊的哭气和勇气，也相信你与周郁英依然会谅解我，知道我的心情。

陈迈平10月同利不益 就不好再提

情，指故能早弃，我也不想再写什么挽联挽诗。至少对我来讲说，要更简单才权。直性直情，我想用直白的形式继续与老周的心灵的对话。我确信最能相信人是有在天之灵的心，心有地，自会显灵。当然，我仍然希望有隆重庄严的悼念仪式。

陈迈平：这二年，听到凶信也多，所以，只要听到大家都说着好好的，就盼什么都好；你我也就好好活下去吧；请问候老郁教生第1次；希望都好好活着！祝

万之

迈平

1981年3月24日

李南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时间：1998年8月6日

地点：北京蓟门桥

人物：李南，女，无业，《今天》成员。

采访者：廖亦武、陈勇

问：请谈谈你是怎么介入《今天》的？

答：《今天》第一期贴出来以后，周郿英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有一个文学刊物，办得相当不错。这么多年吧，才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跑到西单去，把《今天》第一期看了，我发现在最后有一张让人留言、留地址的白纸。周郿英把他的名字和地址都写上了，我也紧接着他写上了我的。王捷紧接着我的名字，把他的名字和地址也写上了。因为王捷和周郿英的弟弟是好朋友，所以关系也非常密切。后来振开就去找了周郿英，并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大约中午吧，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振开找到我家。我们谈了一个下午。那天，第一谈到了我希望参加《今天》的工作。第二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

问：你可以再讲一讲，没关系。

答：他那篇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基本上跟我的叙述差不多，但



《今天》成员李南摄于赵一
凡追悼会上(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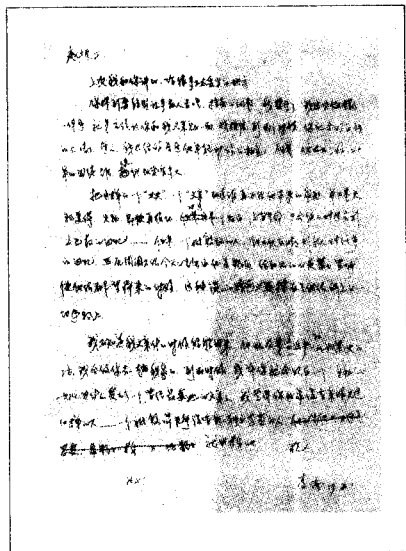
有一个地方,我跟他也说了,就是他的结尾啰嗦了。如果他能写到女儿与父亲两个人的谈话,中间隔了二十年的年轮,在这儿切断,我觉得比现在更好。但北岛写得很好,他跳出了当事人的圈子,写出了我写不出来的东西。当时我的情况是父亲摘了帽,回来了,平了反。他摘了帽也在劳改农场呆了好多年才回来。好多人都向我们祝贺,可是我就觉得人的感情,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的伤害、践踏所造成的隔阂,已经很难愈合了。原来是全社会都要求我们划清界线,但这个界线没法划,是

吧？他们总可以说你没划清。后来又来祝贺。好像一下什么事都没有了。当时我觉得太可笑了，那伤还在心里留着呢。所以看到《牧马人》里平反了就痛哭，就觉得莫名其妙。有什么可哭的，是他们把你弄成这样的，还让你感恩戴德，太莫名其妙！

问：对。

答：后来就比较好玩了，约我去某体育场附近，某电线杆子下面，有一个持蓝色书皮的人与我们接头。后来我发现，北岛喜欢蓝色。当时邀了我的朋友陈彬彬，就是现在曹思源的夫人。她原来与我一块插队。她通知了她的同班同学程玉。小玉又带了她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桂桂。但是，那天陈彬彬没来，我们三人去了。印象里接头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引我们在居民楼里乱转，拐了好多弯，到一个地方，主人是陶家楷。他在一个

极空的屋子里，靠墙角有一张单人床，墙上挂了一张挂黑纱的照片，是他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有一张桌子，桌子下放满了酒瓶。陶家楷没怎么说话。主要说话的是老木头（北岛）和猴子（芒克）。只见猴在屋子里忙乎。想招待我们，但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手足无措的样子。而老木头却非常认真地对你们说：欢迎你们参加到《今天》的工作中来，并介绍他是主编、猴子是副



李南写给北岛的信原件

主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们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麻烦呢，就推到我们身上，你们就甭管了。这种话对我们简直是太大的侮辱，所以当时就特别生气。我们表态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事自己负责任。

问：他们不认为你们是小女孩儿？

答：怎么可能是小女孩儿呢？他们那样说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但老木头说，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们话得这么说，我们得把话先说到前头。这样我们算是接上头了。后来我知道，本来他们是七个人，后来撤出五个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想搞纯文学，没有也不想参与政治性太强的行动。再后来老鄂对我讲了一些事情，我们认为退出的也是令我们很敬佩的人。他们一方面一直关心着《今天》，一方面固守着自己的理想。他们为《今天》的诞生付出了很多努力和做出很大牺牲。他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8年底，就是《今天》十周年纪念这段时间，老木头回来了，我们回忆了这一段，我说，你们打着纯文学的旗号，但每次大的风浪你们都走到前头了。讨论会也好，示威游行也好，哪次都没把你们落下。这也是我喜欢这帮人的原因。在76号干活非常有意思。这帮人好，非常爱玩，都放得开。还有就是猴子给大家做西红柿鸡蛋面。那会儿是共产主义生活，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搜兜，有粮票的掏粮票，有钱的掏钱。老木头还拿了一个录音机去，把他喜欢的曲子都带去，听着音乐干活，很有节奏感地干活。过去很多年了，听到那些曲子，我马上想起《今天》那时干活的情景。每次印完往外去贴的时候，猴子一定要在末尾贴一张白纸，雪白的白纸，我觉得太奢侈了：本来很困难，把那么白的纸贴上去干什么呀！可我一反对，老鄂就乐，老鄂说：猴子就剩这么点虚荣心了，你还不准他贴吗？一个是贴的这张白纸，一个是他们的封面。《今天》的

封面,在这些刊物中一直是做得最精致的,是下功夫的。

问:好些民刊的封面我都看了,的确是这样。

答:就在第一次把这个封面印出来的时候,送到76号,当时大家都在那儿,一翻,狂欢了。我不记得是黄锐还是老木头说,原来设计是黑色封面,印刷厂害怕,不印。我记得是这么回事。老周活着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隐喻,因为徐晓接触印刷厂,她说没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蓝色也比较有意思,而且对大家来说,蓝色也能接受。《今天》之所以还活到现在,在国外还活着,虽然它跟我们原来的《今天》已有很大的差距了,移进了一个象牙塔里去了,但是我觉得,它最初是有根基的,是经过很多很久的准备,而不像有的刊物一冲动就推出来。所以那些刊物变化也很快。

问:对,北岛说他们在办《今天》之前,至少是默默地准备了将近十年。

答:所以,从我的观察,《今天》和其他刊物相比,它的队伍是很扎实的。我不能说它的作品我都喜欢,我也跟一些朋友议论过,不管你多弱多小,哪怕苍白,也有生存的必要。我们就尽力去做。在《今天》幕后有一批人,文笔相当不错,而不写作,像周郅英、老鄂都是这样的人。

问:从老鄂那儿得来的印象,《今天》有三个系统在发挥作用,一是公开发表的作品;二是召开一些诗歌朗诵会,作品讨论会和参加民刊的一些活动;三是它的出版,包括它的校对,都相当严密。虽然过去有些民刊也办得很好,但考虑得似乎没他们长远,包括读者来信的整理,一本一本的,非常整齐,今天我看到这种东西还很激动。随着历史延续,浮在面上的,就那么几个人吧,而下面却有很多人做铺垫,化为一种群体浮雕般的背景。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不起眼的事,需要非常有头脑的

人去做。

答：这就是老鄂做的。

问：你可以谈一谈老鄂吗？是你把他引荐到《今天》去的？

答：我们原来一块在内蒙插队。我跟老鄂真正认识的时间是在1976年。在这之前见过面，但不接触。老鄂不爱说话，但他给人的感觉非常踏实，非常细心。当时我在《今天》干得非常高兴，我的男朋友，就跟我捣乱。其实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右派子女被放到这个位置上了，我觉得我没有错。而且就是我们的父母有错，也不应该父债子还。而且回过头来看，实质上他们也没有错。那个时候，从来没给过这些人公正，给过这些人说话的机会，所以我才加入了《今天》。因为我觉得它给你开了一扇门。曾经有一次，在我们家跟李陀说过。李陀当时觉得其实现在门已经开得很大了，为什么还要有民刊呢？我就跟他说，鲁迅先生有篇文章说，因为有人要求揭房顶了，所以才开的窗户。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前头揭房顶，有你们的今天吗？有你这个所谓的开阔吗？没有这些人在前头开路，你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开放的形势呢？当时我就这么讲的。

问：这是幻觉，实际上直到今天社会也没有完全放开。

答：这种开路意识比较重要。当时我确实没想写。而且我也问了周郢英，他也没想写。我看得出来，周郢英的才华很高，也绝对能够写，但没写。我们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跟男朋友有一次非常严肃的谈判，他要我在他和《今天》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没法选择的事。老鄂回京了，刚三天，我跑去他家，二话没说，就把他拉出来，跟我一起到76号去了。这是我特别高兴的。大家都觉得老鄂非常稳妥，我感到挺安慰的。我们这些人人都保持自己比较独立的看法和做法。像我那个时候，常在民刊之间转。那些买刊物的人一看就知道，哪个人是哪个刊物

的。但也有交叉帮忙的，不完全固定于一份刊物，当时有徐晓、小玉、桂桂、彬彬和我，还有王捷等人。

问：你能够给我们谈谈这几个人的情况吗？

答：徐晓没什么可说的，徐晓是非常活跃的。有一次，我、小玉、彬彬、老周，还有王捷，我们出去逛马路，然后高高兴兴就到老木头家去了。正好徐晓在那儿，这也是徐晓跟老周第一次见面。当时大家聊天，忽然之间徐晓和小玉开始对暗号了，说什么“王八楼”。因为她俩都曾经被捕过。徐晓是因为“第四国际”的事，小玉是1977年的时候，跟李冬民他们那个案子有牵连。都曾关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她俩对上暗号了。后来有一次我们一块去北海划船，徐晓和小玉在船上还合着唱了一支歌，是在监狱流行的，还挺好听。你们听徐晓唱了吗？

问：还没有机会。

答：所以，就这样我发现小玉虽岁数跟我们相差很大，也是比较有经历的。有个因天安门事件被关过的小孩跟我说，他曾在监狱窗户里看见过小玉。他说小玉被提审时头发是散的，看着地面，拾起了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我问小玉，你为什么要捡东西？她说在监狱里，一个很小的树枝都非常管用，你可以把它插在墙上当钩子挂东西。徐晓也跟我说过，她那会儿被关起来时，想方设法从梳头的篦子上取下一个齿，在地上磨细，在发针给她们用时，用针在小竹齿上钻出眼儿，做成针，可以随时缝东西。

问：我听老鄂和徐晓讲，你对周郢英的情况比较了解，是吧？

答：我比他们俩认识得早一点。

问：我们在整理这么一段历史的时候，了解到两个早逝者非常重要，一个赵一凡、一个周郢英。赵一凡的作用非常具体，

收藏、保存、归还。他对《今天》的创办作用非常巨大，但周郢英的情况，我们听到的只是关于他的威信高，大家非常尊重之类的评价。我们想听听关于他的一些具体细节。

答：我跟周郢英认识是1976年。我第一次见周郢英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的一个朋友，也在内蒙插队，她的男朋友被抓起来了，当然是挺冤的。她跟我说，她有个朋友，她们当时上交的那些材料，都经过他的修改、润色。本来写得很平淡的，但经过他一修改，马上就不一样了。而且关键是他能拔刀相助，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躲了、跑了，可他不是。所以我挺想认识他。后来我们要到颐和园去玩。我那朋友就想请他照相，带我去找他，说他照相特别好。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感情生活上有曲折，有过大的创伤，曾经有个女孩追他，追到他后又把他给甩了。所以他那时就给自己一刀。

问：他当时在做什么？

答：他当时在自动化仪表厂上班，地安门东大街，他厂门口正好有一个高坡，他们就在那儿聊。我那朋友很注意穿着。当她讲到某个人时，说那人现在非常资产阶级化。没想到周郢英把她打量了一番，说，那你呢？我当时哈哈大笑。我说：“哎哟，太坦率了！”我没想到。因为一般人当着生人的面说话，都要藏藏掩掩，而他特别直截了当。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没事我就过去，聊天、玩，很开心。而且我对他有一种大哥哥的感觉。他才比我大两岁，但是到他那儿去，有一种启发你、开导你的感觉。因为他的生活经历比我厚，比我扎实。我那朋友曾说过一句话，她说得非常形象，说她拿周郢英当个纸篓。我想我不行，别人往我这儿倒，我就承受不了。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确实都拿他当纸篓。但是他有一点，并不因为你弱，就让你觉得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在他这儿，绝对

是平等的,我觉得他在《今天》的作用,主要是一种凝聚力。插队那个时候,我给他写过信,他给我回了信(他回的信应该是两封,但有一封找不着了)。我给徐晓看过,因为她说我总是听人家说周郡英文笔特别好,但是,我从没见过他写的东西。我当时很失落,我说你的生活经历比我充实得多,我不知道一个人应该怎么生活?所以他在信中说:我身上留着生活给我的刀疤。他还给我寄了张歌片,叫《草原上的家园》。当时我在草原上孤零零的,接到后还挺高兴的。因为他是一种关心。他虽是写了两封信,但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把很多东西都融在里面了。当然他也是个人,有时我也生他的气。他有那么一股劲儿,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挺得住,他对我帮助非常大。就是说在我生活中是起一定作用的。

问:你今天和老《今天》那批人联系还多不多?

答: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些人在哪儿都无所谓,因为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可能大家很久没见面,见面还是这些人,没有变化,这些人定型了。我比较遗憾的,是老木头和猴子的沟通太少,渠道太少,我觉得现在国外的《今天》和我心中的《今天》有很大的差距。它太象牙塔了。而且我自己认为,老木头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在国内发表过的东西就不能在《今天》发表,这是不对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今天》曾经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特别棒,就是凡是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的作者,他在任何官方杂志上发表作品,必须用《今天》的笔名。这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特别好。所以,每当这些作者的作品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占领,影响力大。我认为现在的《今天》还应该坚持这种立场。不论是当年,还是现在,它的读者都应该是中国人,而且是大陆的中国人。所以,它选择稿件的标准首先应该是内容,而不应在版

权等问题上过于拘泥。这样它可以使国外国内的沟通更充分,更紧密。《今天》现在把自己约束住了。我认为很遗憾,它会丢掉一些人。不仅遗憾,而且痛心。我看了一些《今天》的作品,在某些地方,特别是老木头,达到了他最初的理想,但实际上,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老木头。因为他有他战斗性的一面。这一面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在4月21日,当时在胡耀邦追悼会前的那天晚上,有很多人朗诵他的诗。我心目中的老木头是这样子。就像老鄂给我说的,刚开始很多人说自己是朦胧诗人的时候,老鄂非常认真地把一些人挑出来,说他们不是朦胧诗人。后来老鄂说他明白了,谁都可以当朦胧诗人,把老木头和猴子挑出来就够了。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相当准确,因为他们并不朦胧。他们在《今天》创刊就写出了自己的想法,一点都不朦胧。我不喜欢诗,但后来我翻过他们的诗,他们是诗人,不玩弄感情,而有些人不是诗人,是匠人。就跟好些画画的人不是艺术家,唱歌的人不是艺术家,搞文学的人不是艺术家一样,他们是匠人。他们在那里玩弄这些东西,玩成什么都可以,像万花筒一样,但狗屁。这是我的感觉。

王捷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时间：1998年8月7日

地点：北京北太平庄

人物：王捷，无业，《今天》编辑部成员。

采访者：廖亦武、陈勇

问：我觉得在《今天》有两个人普遍受到尊敬，一个是赵一凡，一个是周郢英。赵一凡的作用、影响我已清楚了，关于他的材料齐全，补充材料也比较多。周郢英呢，很多人都谈得比较抽象，希望你能谈得具体一点。

答：你还是提问题吧，要不有点无从谈起。

问：我不是记者。朋友们把我召来就因为我能客观地干一些事。你谈吧，无所顾忌地谈。

答：我认识周郢英是通过他的弟弟。周郢英有个弟弟叫周保英，我俩在陕西插队，后来进了同一个工厂，很快就都成了朋友，时间是1971年6月。开始是通过他弟弟跟他接触的，然后我回了北京，跟他也熟悉起来了，大概是在1973年、1974年，或者1975年的样子，具体的记不清了。交往过程中，我们一块聊天，那时候中国那个形势，比较封闭，比较沉闷。我们对这个社会呀、政治呀，有点感兴趣。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聊得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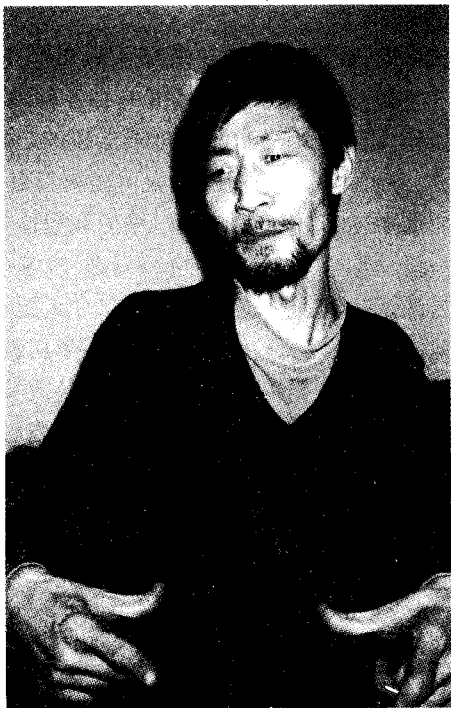
较多。

问：在《今天》你是最早认识周郢英的吧？

答：是。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各种动态。有一天正好碰见周郢英，跟他聊天，他当时对刚出现的《今天》评价很高。他这样说，在几年以内，中国不太可能再有超过这个的，有什么比这个水平还高，那难以想象。然后我也去看了，感觉差不多，耳目一新。当时我刚上学。学校里在79年曾经要求我写一个你怎么认识这些人的？怎么参加到《今天》里面去的？写一个材料给系里。我反问是什么意思？是交待材料还是什么？系里说不是这个意思，是有关方面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个刊物的情况。我就写了，后来给周郢英看过。当时就觉得耳目一新，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当年我跟周郢英刚认识后，其实见面不是很多。他弟弟还在陕西，我当时还给他弟弟说过我跟他哥哥交往，受益匪浅。周郢英做人确实比别人看得远，跟他聊天确实是有受启发的感觉。我听他弟弟说过，他在人大附中上学的时候，应该是1963年前后吧，在他们学校弄出一场辩论来。跟班里面人一起辩论《红楼梦》该不该读？反正类似于这么一些话题。《红楼梦》是一本好书，该读。这在当时革命化教育阶段，是属于受批判的。他是在初中的时候有这种想法，这种经历，后来社会会有很多变化，他就比别人要看得清楚一点。

问：你，还有李南，是和周郢英一起到《今天》去的吗？

答：好像是吧，具体记不清楚了。原则上我们是一块，后来等于说是慢慢就加入了。反正我到民主墙上去看完了《今天》后又见了周郢英，跟他聊起过这个感受。后来听他说，北岛分别找过这些留了地址的人，并且找了他，跟他聊过，他跟我说了。后来北岛来学校找过我，我正好没在。他跟我们宿舍里的一个同学聊了一会儿，留下一本杂志。因为我在留言的纸上说



《今天》成员王捷

了,感觉挺好,希望得到一本杂志,望联系。最后是听周郢英讲,见到北岛,跟他聊得也不错,有点那个意思,没明说,就是说看能不能一起做点什么事?已经有那个想法。然后就跑去帮着干活,慢慢等于说就加入了。一本杂志除了有人供稿子外,还需要一大堆人印刷、装订、送人。

问:出版系统那一套?

答:对。其实我们多数人做的还不是编辑工作。

问：除了编辑工作，做过这样一些活的有多少人？

答：具体人数嘛，很难说。干过这些活的人比较多，但是频率不一样。有的人兴趣比较高，没什么事当然去得比较多。有的人就去得比较少。大概有一二十个，有的人兴趣特别高，甚至没什么事也不离开，成天在那儿泡着，有活干就干活，没活干就瞎聊。人得数一数：李南、桂桂、老周、老鄂、胡洁、小英子、小陈、石头……这些人都是不写东西的，最多是爱好文学。其实有一些写东西的人，跟老木头、猴子（分别指北岛、芒克）他们认识，也都去，但去得不是太多。

问：多多去了吗？

答：最初那段时间好像没见过。有些人是这样的，原本就和老木头、猴子他们认识，不一定到这儿来见。猴子有家、老木头有家，在家里或其他什么场合见也一样。反正我不太清楚了。猴子是经常在76号盯着。

问：你还可以谈谈，你们这部分人，还有周郢英和《今天》编辑部的情况么？

答：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今天》大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主要像老木头、猴子以及他们周围好多人，后来《今天》公开面世之后，有很多写东西的人，大体上是他们来往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像我们这些，有兴趣，愿意帮忙，愿意干，这样的一部分人。大体上是这么两部分人。周郢英在这里面位置比较特殊。当时和事后吧，其实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觉。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他的年龄和经历、建议，都被大家尊重。他的性格也适合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性格比较随和，感觉无拘无束的，什么事情包括个人的都可以跟他说，特别值得信任。而且他也特别愿意帮助别人。这么多年了，不管与《今天》有关没关，各种各样的事，帮别人干的事非常多。后来这些

年，有朋友也想办杂志，结果是死活也弄不成，而且把朋友之间互相的关系也伤了。后来就有朋友问我：你们在办《今天》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我说没有。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特点，或许是时代的原因吧，这些人的理想色彩特别重，因为有这个思想基础的话，各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矛盾。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大事。像我们当时愿意来做，就不会有别的问题。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依我说就是运气好。正好《今天》由这么两批人组成。而这两批人中间，据我所知，老木头、猴子他们是写东西的一大批人。第一期出了之后，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就散了，写东西这部分人自然就剩下老木头和猴子两个人了。然后另一批人是新加入的，但正好都和周郅英认识。而且这些人吧，在那个时候想法都差不多，对社会持一种批判态度，同时也有这种热情。正好都是这种人，正好又都跟他认识。确实，他在这部分人中也比较有威望。同时周郅英这个人 and 老木头、猴子关系都处得极好。最后自然就形成由这两部分人组成的团体。正好这部分人有一个代表，那部分人有一个代表，这样的结构自然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了。所以到最后，这个团体稍微正式一点，老木头说一个杂志要有主编、副主编，那就很简单，大家的意见，自然就是老木头主编、猴子副主编、周郅英副主编了。

问：等于说周郅英聚集了一帮人？

答：周郅英自然就成了一个负责的角色，所以，周郅英、郭复明都是关键性人物。

问：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基本上还是清楚了，周郅英的作用是凝聚这两批人。

答：其实我们这些人吧，多数都是不写东西，最多算是文学爱好者。只对社会、政治这种行为有兴趣，具体到周郅英这

儿，也是这样。还有一条是什么呢？除他和老木头、猴子关系不错，性格不错外，他这人对文学本身是个非常出色的爱好者。过去对文学书籍看得非常多，特别有自己的看法。你说他不写东西，也没在这方面发展，哪怕搞文学评论，他从来没这个想法。但实际上，他对文学很有自己的见解。否则的话，你为人再好，但从文学上你与老木头、猴子无法沟通，恐怕也不行。鄂复明也有自己的见解。

问：他说当时退出《今天》的那些人也没错。

答：对，我非常赞同。绝不能拿什么对与错来衡量他们。我跟鄂复明当初聊天，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办《今天》）这个事是好事，我们愿意来做。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从开始到后来停刊多少年之后，你不时会特别真实地感受到你做这个事情，对于陌生人起过一些什么作用。但是我俩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我想别人恐怕也是这个想法，就是根本不能指望这个事情将来在历史上如何，或起多大作用，根本不考虑这个事，管不着。要是拿枪逼着，不让干就算了吧。我的意思是说，不光是从功利上来考虑，就是纯粹客观上来评价这个事情到底将来起多大作用，历史上能存多久，这跟我没多大关系。我想，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特点。不考虑乱七八糟的事，什么历史感啊之类的，该干就干。

问：你当时读大学吧？

答：刚上大学。

问：在大学里《今天》的发行、宣传是怎么回事？

答：当时我们在城里几个主要路口都张贴，猴子、鄂复明，一大帮人弄一桶浆糊，然后拿上印的东西，东单、西单，北京这些主要路口，比较空旷的地方，“啪”地贴上去。我那会儿在北大上学，到北大找一个宣传栏，墙什么的，引人注目的

地，“啪”贴上了。开始是这样张贴，然后很快就有人想买。因为买不大方便，或者到76号，或者到西单。西单还不是永远有人在那儿卖。后来慢慢就发展成订户，就有好多人要订，这样就通过邮局寄。当时上级没有明确指示，邮局对这种东西拿不准，你交钱，只要愿意，他就当印刷品寄。就在北新桥邮局，现在还在。每次鄂复明拿去，一大堆，写好地址寄。

问：当印刷品寄？这很奇怪。

答：上级没有明确指示说这种东西不准寄。总之是一直到后来停刊吧，在邮局那儿没受到阻碍。鄂复明最清楚这点。订户大概有好几百。我记得每次印1000本，要寄一半。北大也有些订户。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几十，很快就卖完了。

关于发行量的事大家还议论过。你说印2000，2000也未必能够。工作量相当大。刚开始都是推油印滚子，效果不好，后来买了一台手摇机，好多了。具体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了订户制度以后，订书人的预付款，这样就有点钱，添了一台机器。那时候，大家跑76号去，有时候干活，其实常常也不是。它本身就有吸引力，哪怕干活也好，不干活也好，大家泡在一起聊天，特别高兴。

问：周郢英除了搞内部外，在外面也组织活动吗？像作品讨论会，朗诵会等等？

答：基本上不。他出头露面不多。记得有一次，有关方面把他叫去问《今天》的事，说你是什么，干过什么我们都清楚，都掌握了。他自始至终一句话没说。他这人特犟。他跟朋友打交道特别温和，很宽容。其实他这人性格有一种极端的犟。

问：你的脉络非常清楚，把周郢英和赵一凡的区别谈出来了。的确也需要这么一个人。

答：是这样，尤其当时那种情况。要当时没这么一个人做

具体工作，刊物没法生存。

问：光靠写东西的人办刊当然不行。诗人一般都个性化，你还可以谈一谈对《今天》这些人的印象？诸如北岛、芒克、方含和其他作者。

答：方含来往很少。

问：还有万之呢？

答：万之后来来往多一点。

问：你可以谈一谈。万之还在海外办《今天》，好像是副社长。

答：他那时并不活跃，他基本上是作者。

问：那时候你们和食指等人接触过没有？

答：有，但不多。留的印象不是对他一个人的印象。因为跟他来往确实比较少，听别人介绍。先是见过一次，大家一块聊过之后，听别人讲，这是鼻祖。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记得在插队的时候，有个同学寄给我一首诗，就是他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那种时候看了之后，没有什么特殊的体会，只觉得一种冲动。

问：据说食指的诗在知青中流传得比较开，而芒克、北岛的影响那时还比较小。

答：对，《今天》之前这一段，多多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

问：好像食指的诗更适合那个年代的人阅读？

答：北岛这个人给他安个老木头的绰号实很对。他这个人待人比较真诚，不是躲躲藏藏那种。但是他不太善于与人交际。人情世故都不行。

问：芒克经常主持会议？

答：对，更多的是他主持。猴子跟老木头不一样，比较外向，也善于表达，但他又不属于油滑的那种。老木头比较严肃。

问：他现在也是那样子，而彭刚说，北岛基本上是几十年

一张面孔。现在的《今天》你看过吗？

答：我看过。

问：谈谈你的感觉。

答：说实在的，现在这个《今天》，随便这么翻一翻，读着读着，它没过去那个感觉了，我谈不上太多的。

问：怎么没感觉了呢？是不是印刷上太精美了？

答：说不清楚，反正总觉得是另一回事，距离比较远了，兴趣也就不大了。我现在的状态和当年也不太一样了。

《今天》与我

徐 晓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我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人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



热恋中的徐晓和周郅英。

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1973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6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

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的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18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做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守旧或者说惰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检着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

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这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



1994年5月5日,《今天》编委周郢英逝世,留下遗孀徐晓及年幼的孩子周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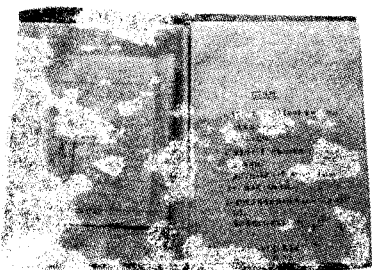


“勘误表”，鄂复明、赵一凡
作，用于《今天》内文勘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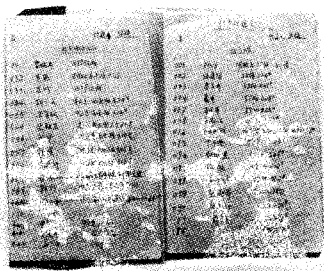
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



“打字说明”，鄂复明、赵一凡规定，用于《今天》印刷。（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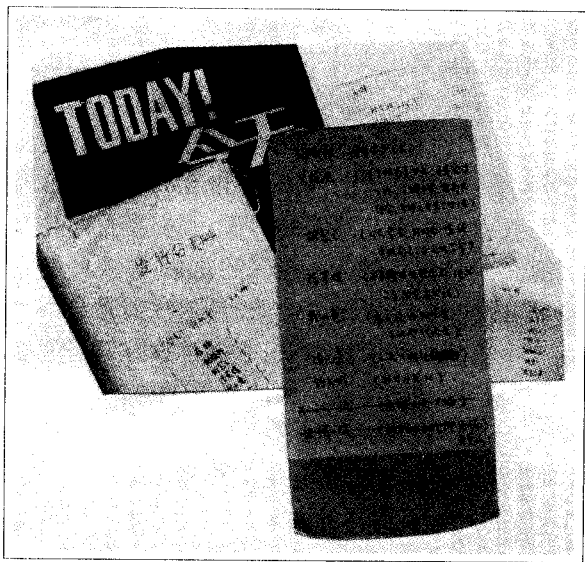
《今天》曾采用张贴、专人代送和邮局专寄给订户的发行方式，图为订户名册及指定代送人。

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他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兴。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兴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与此同时，上层的保守与改革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墙，一批政论性民刊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象牙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郢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李南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



赠送给胡耀邦、陈荒煤等国家党、政、文化领导人的《今天》杂志及发行名单。

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7年因涉嫌李冬

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 20 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只有 17 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两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 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家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人称为“曹破产”。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今天》有关的历史，仍然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五年以后的 12 月 23 日，我们在周郦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年。十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眯眯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蜡烛的话，那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十五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

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帜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刊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聚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很快我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少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

了风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做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棚，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氏兄弟的家。刘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诣。他的哥哥是一份民刊的主要人物之一。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委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刘氏兄弟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

离。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记得快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象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后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里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76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76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姗姗。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关方面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无疑使她们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

展”事件后，他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1984年，他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讷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1972年2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1973年而是写于1978年，我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

证据,对此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共产党,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出国已长达七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话,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1994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

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 27 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

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 1979 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

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犷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癖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

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魅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

写诗则是呼吸。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

的个人主义者。迈平 1986 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 and 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

《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入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 he 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

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

好。好在，赵南历来是为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拮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写作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分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1988年，晓青的系列长诗《闲暇》的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1980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晓青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郢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经跑到迈平

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舱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后跳楼自杀。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在批斗自立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顶着

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年的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的，是“文革”独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想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只好承认我百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但我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我在这里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

代派作品挂在西单民主墙，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似乎成了马氏品牌标识。在80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80年代中他到了法国，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他原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

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这不等于说现在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个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76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架着双拐到坐上轮椅？

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愠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来，他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80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当“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同时，“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写道：“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

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今天》一共发行了9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这在民办刊物中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但是,西方人无法想象,在一个不准许选择的社会作出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作为诗人,他们有长于常人的想象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象不到日后的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

者们。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鄂复明、周郡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们的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署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郡英邂逅。周郡英是在墙上看到《今天》的，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墙的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信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名和地址写在上面。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们从边缘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1994年他死于疾病，振开

以今天杂志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个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今天》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给他三十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账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

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特定的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1989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国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郡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都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

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有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一定早已成了人妻，成了人母，成了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199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她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

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步走出生活的每个人？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法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而《今天》曾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主流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和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为此而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情结和执着的思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

人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的《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这十多年里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浮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S君，比如W君，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1985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郢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自己的父亲。对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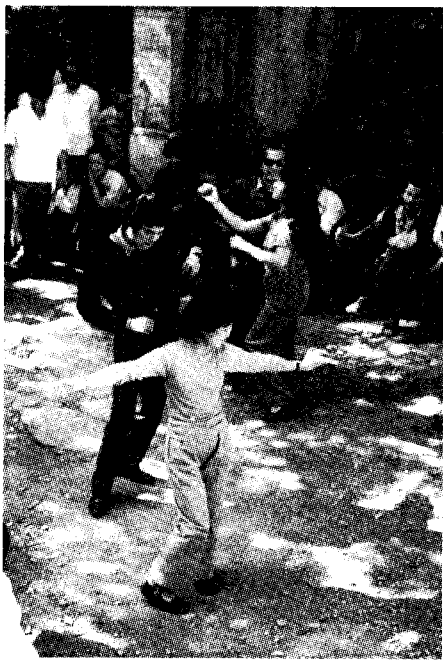
1997年5月 于北京

第六章

《今天》诗人的社会活动及影响

90年代通俗读物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但寿命却只有一年半载，这同70年代民刊《今天》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它每期的印数不过1000本左右，其影响却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文学。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朦胧诗人”的个人选集或评论文集正式出版，其中还不包括译成各国文字的版本。最近，日本还出版了全套的《今天》杂志影印本，装帧十分豪华、考究，令推油印机滚子出身的老《今天》们望洋兴叹。

由于“文革”和阶级成份，创办《今天》的人们均无缘上大学，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这些平均“初中文化程度”的朦胧诗元老的名字不仅



“星星画展”之后,《今天》组织的一次有九十多位文学爱好者参加的郊游活动,在北京郊区云水洞附近的一个空地上,诗人与画家,即兴开舞会,芒克(左)邀一位四川姑娘,王克平邀一位蒙古族姑娘率先跳起了当时颇为“先锋”的摇摆舞。

登上大学课堂,而且成为大批文科硕士和博士的论文题目。因此,所谓边缘与中心、学院和在野的位置是可以掉换的,这同写作本身有关系吗?加勒比海诗人沃尔考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

芒克一直呆在国内,没有也无从改变他的生活。因此他的诗歌从70年代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自然生长的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可惜时代变了,在公众舞台上站着的不再是诗歌和诗人。芒克是个特别慷慨的人,包括对待那辉煌的历史,他快活地抱怨着,让我们“抄家”。接着,我们又从徐晓、鄂复明、黑大春、唐晓渡、蔡其矫、王捷、王燕生手里,收集到大批资料。其中包括《今天》总目录、《今天》大事记和《今天》读者

来信选编等等。

集体相片，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表情专注而开放，打着那个喧嚣时代的烙印；而这一阶段的个人照异常严肃，如果换掉服饰，酷似五四运动时期创办民刊的青年知识分子。其实这种“个人照”不属于个人，而是全社会激昂情绪的某种折射，正如当时《今天》的诗歌，特别是北岛的诗歌是民族潜意识喷发的某种折射。连童话诗人顾城也写出了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被老《今天》们提得最多的是“76号”，刘氏兄弟的家。他们其志不在文学，却把家奉献给《今天》做编辑部。在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事在那个时代却习以为常，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到编辑部去义务服务，除了印刷和发行宣传，大伙就聚在

1979年夏，《今天》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组织了编者、作者、读者见面及诗歌朗诵会，图为编辑部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史康成、芒克、黄锐、于友泽、徐晓；中排左起：鄂复明、刘念春、北岛、黑大春；后排左起：赵振先、刘建平、周郡英、王捷、甘铁生、万之。



76号,如痴如醉地讨论文学和人生,听诗人们朗诵、布道。《今天》的另一个聚会点是赵南家,这儿可以举行更大规模的朗诵会,1980年夏季,几十个诗人在这儿开了个“欢迎法国诗人于连”的首届国际讨论会。

当然更大的朗诵会和作品讨论会是在公共场所进行,北岛持重,芒克就经常主持会议,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表情和手势宣讲诗歌——北岛说,为了这一天,他们那代人默默准备了十年。

而作为文学青年的田晓青、黑大春当时并不理解这话的含意,他们在人群中仰慕着,以能成为《今天》的一员而骄傲。应该说,《今天》还有一群这样的后继者,他们始终持非功利创作。

《今天》美编黄锐是画家,《今天》的插图作者马德升、曲磊磊、王克平、钟阿城、严力、艾未未等同时也热爱或创作诗歌。后来,他们都成了轰动一时的“星星画展”的干将。“星星画展”在美术界的开创意义相当于文学界的《今天》——这样的诗画合璧极大地拓展了《今天》的社会外延,并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后来成为朦胧诗主将的江河、顾城、杨炼都是在这阶段进来的。

1980年,《今天》停刊不久,《诗刊》举行首届青春诗会,《今天》诗人及投稿者江河、顾城、舒婷、梁小斌应邀参加。而在此之前,《今天》主要作者北岛等人的诗作已在全国各公开杂志大量发表,并引起强烈反响。尔后,“朦胧诗”这个贬义词出现,在长达几年的争鸣中,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成为“朦胧诗”的代表,象征着新诗潮,并为国际诗歌界所重视。1986年,全国第二大诗刊《星星》将上述诗人同较正统的杨牧、叶文福、傅天琳、李钢、叶延滨并列,评为最受读者欢迎



《今天》的成员们在
北京郊区游玩。

的十大中青年诗人。

至此，“朦胧诗”在同保守势力的拉锯战中取得“家喻户晓”的全面胜利，《今天》由此被载入史册。

但是，食指、多多、芒克、方含，还有我们在本书中写到过的若干位诗人、志愿者、思想者、文化传播者、启蒙者们都在被称作“文学繁荣时代”的十年里渐渐湮灭和遗忘，是岁月的无情？人类们健忘？还是所谓“历史的选择”？

一批人注定付出代价，一批人注定是这个代价的受益者。而在我们编辑这本书的时候，食指、多多、芒克早已被重新“挖掘”了出来，在有限的时过境迁的文化圈子产生影响。

这是世纪末怀旧的需要？还是对过早成名者的逆反心理？总之，与学术无关。

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大众的朝秦暮楚是不会改变的，诗人，永远生错了时代吗？

13 路沿线

田晓青

13 路是北京城区一条老公共汽车线。它究竟有多老，我无从考证，亦无关本文宏旨，要紧的是它大致划出了我成年以后的生活半径。自我 1973 年从军队复员到一家工厂上班至今，除偶尔的逸出，在这条路上已经奔波往返了二十四年，估计已经绕地球好多圈了，却在原地未动（不论从地理意义还是从人生意义而言）。据此您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刻板、循规蹈矩的家伙。不错，我正是这样一个家伙，若不是半道上出了点差错，说不定此刻我正在以前的终点，北新桥北京电视设备厂的钳工案子上打盹呢。

儿童医院

13 路公共汽车从城西头风景如画的玉渊潭公园附近发车，摇摇晃晃地驶过拥挤破败的老城区，在城东北角的和平里北口打住，在北京横平竖直的田字格里曲曲折折地画了一道涂鸦般的斜线，一路上的风景令人愁闷，站名却可引发方志学家的思古之幽情。

眼下，同其他公汽线路相比，13 路沿线二十多年来变化不大，除临街的危房改建成铺面（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莫过

于白塔寺站牌旁边冒出的一家名曰“亚当和夏娃”的性保健品商店),几乎一切如故。

请想象 70 年代末的一个早晨,地点在 13 路儿童医院一站(当时的车站位于儿童医院十字路口的西边)。当最后一位乘客吃力地挤进车厢,汽车轰鸣着起步时,从不远处的街角,一个剃小平头的家伙如逃命般狂奔过来,斜背在身后在“军挎”里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我真为他捏着把汗,那饭菜若是从饭盒里颠出来,会弄得包里一塌糊涂),他先是迎着汽车跑,然后放慢脚步,停住,当汽车擦身而过时跟着跑几步,然后一个箭步窜上去,用手拽住车门内的扶手,用脚卡住正要关闭的车门,身子晃悠悠地吊在车厢外(这场面颇似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扒火车的惊险镜头,绝非我辈能模仿一二的)。车门放屁般地撒着气,终于哐当一声关上了,汽车发出一阵夸张的怒吼向前驶去,我看见那个绿色的“军挎”在车门外晃当着,随着车身的颠簸发出响声……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街边的洋槐上枝条已开始发绿,骑车的姑娘们迎着春日炫目的阳光眯起眼睛,天气真不错,你不必再去挤公共汽车(13 路汽车正拐过街角,引擎的声音被建筑物挡住,骤然减弱,然后消失在遥远的往日)。这是 70 年代末的一个早晨,也可能是几天以前。

西单墙

在阜城门下车的人很多,如果你运气好,可以占到一个座位。瞧,运气来了,还是个靠窗的座位。当你挪动脚步的当口(在您这岁数,动作已比较迟缓),运气就已经失去了。我看见他敏捷地用身子挡住我,在我的座位上安顿下来,两眼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其实窗外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



1982年夏天,《今天》诗人杨炼与田晓青在承德避暑山庄合影。

我站在他的身后,看他从“军挎”里掏出一本书,书名在我眼前一晃:《人的远景》。我不禁暗暗惊奇,我认得这本书,封面是一张牛皮纸包的(原来的封面已经掉了),我用钢笔描出标题字的边缘,然后用下雨般的斜线填实。当时这本不知从何而来的书在朋友们手中传看,最后又不知向何而去,为此我的上家(我从他手中借出此书,期限为三天)和我的下家(他从我手中借出此书,经上家同意为期三天)闹到几乎绝交的地步,最后大家同意此书已完成使命,说不定此刻正在另一个读书圈子里传看,亦可能正塞在某一个凌乱的书架上(我忍不住要想象它在造纸厂里经历了几度轮回,眼下转世为哪个刚上车的时髦小妞手里那张花哨的《精品购物指南》)。

我记得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法共的政治局委员,叫作加罗

小诗一首 田晓青

虚构

语言模拟着岁月的变迁

历史，一个虚构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我被虚构着

寂寞的地平线

抹不出世界的边缘

太阳从那里沉落

留下黑里暗

当它再度升起

却浇灌着崭新的一天

《今天》诗人田晓青手稿。

蒂。这本书用批判和允许答辩的方式介绍二战以后法国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思潮。这让我着实惊奇，因为我一直以为批判是不允许答辩的。说到存在主义，我记得老于曾对我讲起，在一次玉渊潭的诗歌朗诵

会上，他问一位法国记者：萨特在法国的影响如何，那个法国人用食指和拇指圈成一个圈儿——等于零。

这件事当时给我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我想这就像一位孤陋寡闻的天文爱好者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新星，别人却告诉他这颗星实际上早在人类诞生前就熄灭了。

这是题外话，还是让我们回到 13 路公共汽车上来吧。

若是在 90 年代，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看大部头的著作是很可奇怪的，一般人们在公共汽车上只看小报和杂志。我在这车上经常见他已经好久了，我隐约记得他开始从“军挎”里掏出的书是些俄国小说（不是现在的俄国，是 1918 年以前的俄国——那使两代人梦萦魂绕的契诃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俄国。这之间隔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帝国的陷落，历

史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然后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和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有一阵他甚至从包里掏出一本《资本论》，但没几天就换了，或者这部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经典（我现在却认为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是另一本薄得多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因为对革命者来说《资本论》太沉，不便于携带，亦不便隐藏），对一个生活在商品活动并不典型的社会中，并且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来说，是太过艰深了。

也许他在公共汽车上看书是为了装模作样，也许他仅仅为了不给老人、孩子和孕妇让座（说来奇怪，那时的孕妇特别多）。

我能猜想他的生活，每天按时上下班，星期日洗澡洗衣睡懒觉，交际范围很窄，充其量四五个人，都是厂里自命不凡的家伙。照此推论，他会终老在13路车上，我仿佛看见他头发花白，仍旧穿着那件发白的工作服，“军挎”已经换成手中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他吃力地挤上13路，包里已经没有书，只剩下一个装着猪食般饭菜的饭盒……但看来我的估计有点偏差。

有一阵，他突然从13路上消失了。那时有一些事情发生。先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然后是华国锋离开了政治舞台，而西单路边的一堵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油印的传单；一位美国记者在天安门对广场上的中国人说，他明天要见邓小平，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为转达，有人要他问问邓小平对西单墙的看法。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作了回答，小平说，群众受压制这么多年，发发牢骚是可以的……西单墙（当时被称之为民主墙）前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那时全国

各地的上访大军在北京的大小公园中安营扎寨，胡耀邦成了政坛明星；那时对越战端初起，来访的印度副总理愤然中断了访问改变日程回国；那时一个叫魏京生的年轻人据说因泄露军事机密被捕……那是个多事之秋。

一次我偶然经过西单墙，无意中看见他正把车支在马路边上，然后他钻进看大字报的人群。看来他上下班选择了一条更切近历史进程的路线。

现在想起来，西单墙前的气氛很像是一个农贸市场，不过叫卖的货色不同，从上访者血泪斑斑的控诉到民运人士对国家内政外交的建议，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攻讦，那时人们仍旧穿着千篇一律的蓝衣服，但个性开始显露出来。有一种很独特的蓝混迹其间，中国老百姓无需费力就可以将这种蓝辨认出来，这种蓝当时叫“藏蓝”，或干脆叫“警蓝”。这种蓝总是给在场的人群带来恐慌。

西单墙东侧，电报大楼的钟楼上隔一小时就敲响《东方红》；长安街对面的首都影院、长安戏院和鸿宾楼饭庄的前面依旧人流熙攘（当时《北京日报》曾登出一则采访，一位鸿宾楼的职工气愤地对记者说：我们感到很气愤，他们（指西单墙前的人群）扰乱了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长安街上人流依旧，大多数人忙于上下班，上街购物，养家糊口，甚至来不及向街边发生的事瞥上一眼。“四五”事件才过去没多长时间。

我跟在他的身后挤进听演说的人群，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正向听众呼吁思想自由：“一个人怎么能够禁止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呢？”他激愤地说，“一个政府又怎么能够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止公民思考呢……”人群里有人问他，魏京生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说：“他授人以柄了。”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L君，当时他站在一张凳子上，向“警

1980年夏，法国诗人于连来北京，与诗人们在赵南家聚会。图中站立者为北岛，坐中从左至右为芒克、田晓青、江河。



蓝”发出挑衅，而他演讲的题目现在看起来可以发表在任何一份党报党刊上，那天他的题目是关于引进外资和所有制，每当他提到中国的近邻与世仇日本时，就禁不住提高嗓门，他把战后的日本与中国作了一番危险的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这番比较在当时足以把他送进监狱，后来他果然进了监狱，而引进外资和所有制的改革则已成为既定国策。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时在这堵墙上发出的声音，有多少得到了历史的呼应而成为现实，又有多少被时间湮没，仍不失为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那些发出声音的人的命运，使人不禁回味古希腊悲剧中有关预言家们的主题。

1995年的一天，我在贵友商场对面遇见L君和他娴静的

夫人。他说他将去美国，到美国后他将一边进修、一边打工过日子……后来我站在路边，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街头的人流之中……

还是让我继续跟踪那个年轻人，他在我走神的一瞬间已经不见了，我的面前只有一堵墙。墙上的文字在1978、1979年之交料峭的寒风中抖动着，喧嚣着，渐渐远去……

当我再一次见他，已是时隔半个多月了，那是在北沙滩文化部的院墙外。当时他形单影只地站在雪地里，在看墙上贴着的一溜白纸。不远处文化部大门口站着一个人持枪的哨兵。他手里拿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后来我在13路车上看到过这个本子。我越过他的肩头读到那些陌生而奇特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或者：黄昏，黄昏/丁家滩是你蓝色的身影/黄昏，黄昏/情侣的头发在你的肩头飘动……”

能与自己的青春在一条老路上邂逅，不失为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那时，诗的意境与困乏的生活，迟来的青春发育期的躁动与13路沿线那些迷宫般的陋巷在记忆中混合成一种无限孤寂的调子，我在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这条街叫忧郁街/我们看见那疯子从街上走过/他兀自唱着，不停地变换着噪音/在一堵墙上他吃力地写着/笔体里还带有青春期残忍的痕迹……

从那时到今天，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憧憬和雄心坠落尘埃，又有多少才情和美感被消磨殆尽。让我们再听一听1979年元旦前夕一伙年轻人在一份油印刊物上发出的自信的声音（他们仿佛在预言春天的来临）：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再招致雷霆的惩罚……

过去，老一代作家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当最后一个熟悉的身影从 13 路沿线的街头消失，那个时代，那种生活方式永远结束了。只有在无人的夜晚，当你走在街上，你可能会在幽暗的胡同口和昏黄的路灯下闻到一些残存的气息……

如今，当我坐在 13 路车上，两眼望着窗外，回想着往事，不禁暗自纳闷：《今天》的才子们与 13 路沿线破败的老城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

铁狮子胡同

1980 年下半年，《今天》被迫停刊，人们已经很少聚在一起。

那一阵我上班途经张自忠路，有时透过车窗会见到赵南拿着一口小铝锅，去不远处的津风包子铺去买包子。他的身子在瑟瑟的秋风中微微佝偻着，显得十分疲惫。我猜想此时他的家中的地板和沙发上，一定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宿夜的人。那一阵朋友们已不怎么去他家，进出他家的是些可疑的时髦男女（“那些可疑的男女就是我们。”有一次当我谈起往事时大春对我说），其中有外国记者，混血的年轻人，也许还有“警蓝”。那一阵听说他家经常举行舞会，“踢死狗”音乐通宵达旦地响着，引得街坊四邻怨声载道。在旁人看来，真有点醉生梦死的味道。朋友们试图劝他，但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

他当时仿佛正处在一个隐秘的斜坡上，只盼着早点滑到坡底，旁人谁也帮不了他，过了不久，他被捕了。

我并不确知当时赵南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怀着感激之情回想起他，想起他善良的有点负疚的微笑，和他文弱的谈吐。他无私地敞开他的房门和心胸，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我亲切地回想起那间宽敞的老房子（徐晓家的一本画册帮助我印证对它的印象），屋子里的一些细节透过岁月和香烟的烟雾渐渐清晰起来（那时大伙都拼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直抽得对面不见人。记得有一次我因迟到从屋外看见从打开的窗缝中冒出腾腾的烟雾，就好像是失了火）：墙上黄锐的由坚实的色块构成的油画（画的是一家街道缝纫工厂），墙角的一张木床，靠门边摆放的一溜沙发，老旧的木地板踩上去发出嘎吱的响声……房子当中的火炉上，一只水壶噓噓地叫着，冒着白汽，赵南的母亲——一位沉默的老太太走进来灌暖瓶，我听见瓶胆发出刮风般的噓声，然后渐渐升高，变成急迫而危险的唿哨……这一切显得又温暖又静谧。

时值夜晚，屋子里坐满了人，他们在倾听，在交谈，也有时发生争论。而在我的梦境中，大家都沉默着，似乎不知为什么聚在一起，或者像无声电影的画面，有动作而没有声音。我有时忽发奇想：说不定公安部门的某个档案室里存放着当时的录音，可以为这个画面配音（那时大家都猜测赵南家的房间里被装了窃听器），它可以魔术般地唤起当时的感受和气氛。但也可能你听到的只是一群陌生人进行的一场莫名其妙的谈话。

你从张自忠路下车，过马路往西走，你的身后是人大清史研究所暮色浓重的宽大门廊，还有墙头拉着电网的神秘莫测的和敬公主府（听说中央的某专案组曾在里边办公）。你进了

一座红砖门柱的大门之后，拐过一幢红砖小楼墙角……

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当你沿着它重返往昔，你竟无法判断那条窄巷的走向，它隐藏在小楼的侧面，曲折向南，以获得一种曲径通幽的纵深感，而实际上赵南家的后墙是临街的（从屋里可以听到墙外汽车的轰鸣声），这条狭巷应该是向西……当我写下这几行字，这种感觉上的错位造成一种奇妙的晕眩。如今，当我乘13路汽车偶尔经过那里，看到那一排房子的后墙已被洞穿，改建成临街的店铺，它们简陋而实在的外貌彻底破坏了我美好的悬念。

你若是个新来者，首次受到正式邀请去参加每周一次的聚会，当你在暮色四合中走进那条幽暗的窄巷，街上的喧声和你的现实感一同远去，你的心会莫名其妙地抽紧……而一扇破旧的垂花门会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你的左边，就像是一本撕去了封皮的书本（在北京四合院的结构中，垂花门是二门）。在你还来不及觉察时就闯进了当代的文学史。此后，细心的读者会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一个若有若无的身影，正像一个13路汽车上的老乘客偶尔会觉得某一张平淡的面孔似曾相识（我曾在徐晓家那本外国人拍摄的相册里寻找，那些照片记录的场面他大都在场，但却找不着他的半点踪影）……

也许你当时并没有想到历史，更可能的是你的脑海里闪过某部描写地下工作者的电影的片断……但门附近并没有望风的人，这使你在迈过门槛时犹豫了一下。

你穿过院落，右边葡萄架阴影浓重，枝蔓在晚风中晃动。走进右边小小的天井，你看见一排蒙着纱布的窗子里透出灯光，人影幢幢（这些文学上的密谋者，你只是在那本油印刊物上见过他们的大名，你不禁怦然心动）……你胆怯地敲敲门，门打开了，放出烟雾和蝇群般的交谈声，一些陌生的面孔转向

你，然后失望地转回去。你好像走错了门，恨不得马上抽身离去，这时，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青年从单人床上站起身，脸上挂着歉疚的微笑招呼你，把你从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我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有多少人去过赵南家，比如说我的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那里结识的。还有些文学圈里的人见了面会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对了，想起来了，是在铁狮子胡同。或者：你去过铁狮子胡同？我怎么没见过你……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人去过赵南家，那里一度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时髦的文化沙龙，出入其中的有文学圈的人、早期的民运分子、文学青年、大学生、时髦的都市青年、搞艺术的、外国使团的文化官员、外国记者、来访的外国作家、诗人，还有安全局的密探……那里举行过《今天》的作品讨论会、朋友之间的聚会、外国人的告别酒会、生日宴会、通宵达旦的舞会……有一次我为一个朋友介绍对象，相亲的地点也选在那里，几个相关的朋友出席作为见证人和顾问。结束后，在13路车站分手时女方惊奇地问我：你怎么认识这么多岁数比你大的人？……

总之，那一阵赵南家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开放最好客的地方，在这里谁也不会问你的身份，你若是在喧闹的酒会上醉倒，回不了家，可以躺在赵南家的沙发或地板上过夜，而第二天早上7点钟左右（当然，那时你还在梦中），我就会在13路车上见到这一节开始时的那一幕……

那一站叫张自忠路，可不知为什么朋友们总叫它的旧称：铁狮子胡同。

东四十四条 76 号

在纪念《今天》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老鄂对我说，在他

为这次纪念会整理过去的读者来信时发现了 I 写的一封信，这令我十分惊奇，一下子记起了当时在一阵冲动之下趴在钳工案子上写下的这封信。信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一首幼稚的小诗，其中充满了罗曼蒂克的伤感的意象：迷宫般的胡同，孤零零的风筝，以及同断线的风筝一起飘逝的童年……，那是一次呼救，一个善感的年轻人从压抑得令人窒息的岁月里发出的呼救……

收信人的地址是从那本蓝色的油印刊物上抄下来的：东四十四条 76 号《今天》编辑部。这个地址已经结结实实地烙在了我的大脑皮层上。那时对我而言，这个地址意味着拯救。

从船板胡同下车，往前走不远，在我上班的工厂的斜对过，有一家小酒馆。每天下午 3 点钟左右，总有人约我偷偷溜出厂门去泡酒馆，并在那里消磨掉下班前腻人的两个小时。那里坐满了各式各样的“酒腻子”，就像是一个失意者和走到尽头的人的收容所。我和我那位同事喝着酒，听着那些醉鬼们有一搭没一搭的斗嘴：“你牛什么皮呀，开口闭口冯先生，你不就当过两天祸害老百姓的勾子军吗？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我是普通劳动者，退休工人。”另一位拍着胸膛说……我已经不愿再听下去了，我仿佛看到了我命运的尽头，后来我想，也许是为了躲避无聊和时光单调的流逝，人们才去搞革命，搞文学……

有一阵在这个小酒馆里突然冒出两个金发碧眼的漂亮的洋妞，引得那些“酒腻子”伸着脖子争看西洋景，她们不喝酒，只在柜台前买一些粉肠小肚之类的熟食就走掉了，后来我知道她们是去给芒克的女友毛毛上英语课。

我以为我寄出的那封信不会有回信，并为我一时冲动

写下的那封信害羞，我在那封信里写了一些我平时不愿启齿的话。出人意料的是，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把我的那首小诗称赞了一番，并约我到76号一叙。从信中诚挚的语调看，我想这回信一定是老鄂写的，但我从没有问过他，也从未告诉他我从这一篇文字中受到的感动超过我所读过的任何一篇，我仿佛看到另一种生活的远景向我敞开……这封信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如今我反而吃不准是否该为此感谢命运。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单独溜出了厂门（不是去泡酒馆），钻进了小酒馆旁边的一条胡同里。

进了76号院，我意识中的第一个反应是走错了地方——一个破旧令人愁闷的大杂院，正是我意欲摆脱的困乏生活的活生生的写照。在这个地方与其说能产生艺术，还不如说只能孳生蚊蝇……院子里散发着“开水烫便盆的气味”（一读者来信语）。我犹疑地向一位在水管子下边洗菜的老太太打听，那老太太先是戒备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轻蔑又鄙薄地用下巴指了指前面（我猜想在她在眼里，这是一伙伤风败俗、整天鬼混在一起的可疑分子，正是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需要加以监视的人，近来社会上阶级斗争非常复杂）。

如今，我只能隐约地记起那一幕（或许是将几次拜访搅在了一起）。在那间局促的斗室里，一个衣着相当讲究、戴着秀琅镜、清秀得像女孩子一样的年轻人趴在破旧的八仙桌上写诗，他说他在等“猴子”（芒克是英语猴子的音译），他说他与“猴子”在白洋淀插队时就认识了，他让我看他刚刚写好的诗：反叛——射向主席台的足球……孩子——卡车的第五个轮子，……等等。后来我知道他叫严力，一个风格独特的画家兼诗人，他对语言极其敏锐的感受力最后发展出一种魔术：能够让

词语之间像互相排斥的电子般在接触时放电，并将那光的影子延迟地留在人的视网膜上。一个身段苗条、穿着发白的军上衣的漂亮女孩在炉子上煮面条，一个瘦高的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从屋外进来同我们打招呼。芒克，那时你那么年轻，有着小狼般漂亮的微笑……振开在里屋对某人说：你看，这儿像徐志摩，这儿像戴望舒……过了一会儿，振开送一个少年出来（若是我没记错，这孩子是黑大春）。

那天振开跟我谈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记住，只记得告别的时候，他伸出手，我感到诚挚而凉爽的一握。院子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薄暮中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

玉渊潭的朗诵会

我在文章的开头曾提到 13 路终点站附近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玉渊潭公园。那年秋天，《今天》编辑部在那里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在八一湖畔的一片林间空地上，我首次目睹了当时的“名人效应”。编辑部的成员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蓝白相间的有机玻璃徽章。大学生和好奇的游客们践踏着草坪。振开、芒克与一些民刊的主编们站在一起，如影随形的是一些外国人、“警蓝”和一些记者。有人向我指出其中一位，说他姓唐，是位内参记者，说他曾用赞许的口吻在给头头们看的内参上报导过《今天》的动向。

那时的诗好像比现在的更适于朗读，一个女孩很有感情地朗诵方含的《在路上》：从乌鲁木齐到北京……那是一首谣曲风格的诗，献给那些从前的兵团战士和插队的知青，其节奏令人想到洛尔迦小曲的汉译：从直布罗陀到喀提斯……没有调好的扩声器不时发出阵阵高频噪音……

还有一些不修边幅、形象怪异的人，他们剃着光头，留着

络腮胡，穿着破旧的中式对襟小褂或发白的中山装，光脚穿着圆口布鞋……我总把他们想象为早期的革命家、闹市中的隐士、有怪癖者、民粹派、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他们叼着烟斗（或不叼烟斗），讳莫如深地笑着，在他们的门徒的簇拥下活像是乱民之首。有人向我指点其中一位，说他曾是“文革”中的学生领袖，后来是某省头头的秘书，现在正参加大学中的竞选……另一位是国务院某部部长的公子……

为写这篇文章，我曾翻箱倒柜，试图找一些能够唤起我的记忆的物件。在一个存放各种废证件的抽屉的最底层，在一张伪造得很拙劣的高中毕业证书（1989年为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伪造，但没能用上）下面，我翻出两张发黄的照片，其中一张的近景中，处在人群中间的于友泽面部不自然地绷紧，看上去还不太适应名人的角色，不远处一个梳着短发戴校徽的女孩正以非常优雅的姿态迈过草坪的围栏，她被固定在那令人心动的瞬间……另一张是这个令人羡慕的团体富于青春气息的合影，在我按下快门的一瞬，迈平和春春眨了眼。

初夏的空气在颤动，枝叶在草坪上投下斑驳的阴影，一台索尼录音机放着电声音乐：《溜冰圆舞曲》或《卡布里岛》，那熟悉的曲调低低地掠过平静的湖面，穿透悠悠岁月，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那一阵你若是在13路汽车上看见他，而你又是个细心的人，你会觉察到他身上发生的细微的变化，他时常双目呆滞，嘴唇翕动——嚼口香糖是后来的时尚，他当时咀嚼的是一种更有滋味却更不易消化的东西：词语。

那时的词语不是词语本身，甚至也不是它所意指的东西，那时它意味着一个更含混更暧昧的世界，直到这个世界，这个“诸神最后的栖身之处”（圣·琼·佩斯语）被无趣的现实和同

样无趣的聪明人一笔勾消……

一开始我就被北岛、芒克、方含和江河的诗句所吸引，即使是现在，当我重读他们的诗句，仍能感到一股清新亮丽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这些诗句如过早开放的花朵迎风怒放，纯美而易于弄脏和凋谢。直到我发现了另一个品种：更结实、更芜杂、更粗犷的诗，它唤醒了我身上的怀疑和反叛精神，它更符合我杂乱无章的阅读经验，这就是毛头的诗。

游行

在一次逛街般的游行中，朋友刘建平对我说，你的诗北岛看过了，要在下一期的《今天》上发表，于是这游行的队伍在我眼中骤然变成节日狂欢的行列。

还记得那场游行吗？队伍从西单民主墙集合出发，打算穿过天安门广场，却在电报大楼下面被拦住，长长的二排警察挡住了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于是队伍只得转向南边六部口的方向。令我惊奇的是队伍旁边竟然出现了一台破旧的哗哗作响的胶片摄影机。在当时，像这类装备只有国家的电影制片厂才有。刘建平像个热心的导游，一路上向我介绍队伍中的成份：便衣、西方和北约国家的记者……还有那时北京边缘社会里有点名气的人。那是田力，他指给我看一个穿着军绿上衣的年轻人，当时报上颇为轰动地报道过“文革”首例涉外婚姻，他就是这次国际事件的肇事者，走在他旁边的那位法国女孩据说是他在北大校园外用有“文革”特色的手段结识的……总之这个行列的组成足够庞杂和有趣，而那些固定在长杆上的毛茸茸的麦克风又像这个队伍的奇怪仪仗……

我想我这辈子说不定有幸能看到有关那次游行的纪录片，说不定还能在其中辨认出我自己（镜头扫过我时，浑身一

阵发痒),拿摄影机的哥们儿,现在你在哪儿呢?

当我拿起笔,才发现试图重现往事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当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他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同往事会面,如同与死者会面。结果我好像在回忆前世的事情,而那些往日的面孔犹如亡者的面孔,即使见到如今的他们,我也无法将二者重合起来,就像从一个坏了的破相机里看到的。

当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有一种幻觉:我仿佛身处一个梦中,从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躯体向外窥视,视野如同旧式坦克乘员一般狭窄,只能看到一些局部、一些琐碎的无足轻重的细节,而那个年轻人闲下来时也在想象我,使劲地想,但他是白费劲儿。

那时朋友们之间流传着一本《人,岁月,生活》,作者是爱伦堡,一个以其种族的生存智慧熬过斯大林时期的严冬的犹太作家。在这本书中他很可能省略了诸多不便言说的事情,却像一个走到生活尽头的怀乡的老浪子,回想起早年巴黎街头贫困而丰饶的悠游岁月……世纪末与世纪初、战争与革命、艺术家和他们的情妇、潦倒困顿的生活、天才和悒郁症、肺病、死亡、“古老的罗曼蒂克王国的沉沦”(海涅语)……这些就是这本书打动人心的地方,大家熟悉洛东达那些大名鼎鼎的酒客肯定胜于我熟悉我们厂对面小酒馆里的酒客……如今很难想象,一种落拓不羁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一度竟成为北京街头的时尚。

那时大伙都是工人(现时所谓蓝领),北岛是四建的,芒克是一家造纸厂的,江河是一家街道工厂的,方含和赵南是电焊设备厂的,于是有人说,《今天》是工人阶级编给知识分子看的。

那时诗与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对社会和公众无害的自戕的生活方式，在厂门诊部和合同医院泡病假是这种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技巧之一。一位朋友曾向我生动地描述过那些高手们的真功夫（听上去颇像武术中的内家功）：当某人伸出胳膊量血压时，如果你悄悄走到他的身后，从他的屁股底下冷不丁抽去椅子，你会发现他纹丝没动，仍旧稳稳地端坐半空中，就像一位太极高手在向医生示范骑马蹲裆式。而功夫稍差的可以暗地里用脚使劲儿蹬住椅子撑儿，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灾难性的场面：厂医正读着血压计上的汞柱，只听得桌子底下“咔嚓”一下声响，厂医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脸上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将血压计的气囊从患者的胳膊上解下来……

有些画家是从写实主义风格起家的，最早的作品是“因病返城”证明上的各类公章（是为“萝卜章”），继而是北京公共汽车上的月票，据说某月的月票因颜色过于特殊，以至难以模仿，后来灵感突至，遂采用“点彩派”的手法进行临摹，经测试，一米开外看不出破绽，当月果然平安无事……

至于“窃书”（孔乙己语）的手段却简单得像哄小孩的戏法儿，拆穿了興味索然，道具是一件普通的棉大衣，只是两个口袋是漏的，因此，即使装上十本书，拍上去仍旧是瘪瘪的十分清白。据说某一位窃书者因过于贪心，以至出门时有点迈不动步，因而露出了马脚……

“我这是怎么啦？”从阿城家出来，在去德内大街一家小饭馆的半道上毛头叹道，“本来挺好挺乖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有毒的长诗《鳄鱼市场》，在这首诗里他回顾了横遭压抑的青春艰难而邪恶的蜕变。

宫门口横二条

在那段时间里，朋友刘建平带着我探访 13 路沿线的半地下文学社会，他带着我初次走访了于友泽、赵南和黄锐家，然后像维吉尔一样告退，把我独自留在这文学炼狱的边缘……

在下班的路上我会伸长脖子向窗外探视，有时我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留着小泽征尔式的齐耳短发，蓬松花白的头发打从中间分开。若是夏天，他会光脚穿一双塑料拖鞋，一条毛着边儿的牛仔短裤，那条短裤的裤角朝前翘着，后边紧贴着重腿，那是由一条破了膝盖的牛仔裤撕去下半截形成的效果，而撕去的下半截数年后被顾城拿去做了帽子，我想他因而经常做颠倒的梦，在梦中把地狱当做了天国……

通过阅读我已经知道浪漫主义是一种综合病症，它的早期症状是神经官能症，晚期症状是邪恶。这两种症状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希特勒（后来当我听到别人说自己最崇拜希特勒时，我便想到充满爱国主义狂热的德国小布尔乔亚，德国人应该抱怨，这么几百年才诞生一个的天才，正是从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市民偏狭而阴暗的天性中孳生出来的）。

艺术应该是天才最恰当的形式。如果当年维也纳艺术学院降低入学标准，破格录取一位眼神忧郁的青年，那么历史将会改写，古老的欧洲将会多一个无足轻重的伪古典主义的画家或建筑师，少一个杀戮了欧洲一半人口的屠夫，世界上的艺术院校招生时若遇到眼神不对的考生最好录取，免得生出后患……

至今我仍旧是个艺术天才的爱好者，他们富于戏剧性的生动的人生和才华横溢的作品使世界变得有趣。

“站着别动！”在宫门口外的马路边我对于友泽叫道。老于站在路灯下，不解地望着我，他头发长长的，穿着一件露出棉絮的破大衣。“你这样子活像个要饭的。”我说，老于放声大笑。

剩下的是些伪先知/是些荒原上的布道者/他们翻披着褴褛的灵魂/出没于人群麋集的街间巷尾/叫卖无人问津的天堂指南……后来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现在我怀着感激之情回忆那一段时光，回忆那间大概不足八平米的狭长的小屋（因它主人的不安分和精力旺盛像中了邪般的生气勃勃）。当我有一次无意中骑车经过宫门口横二条，看那空寂的门洞时，我想到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美丽的妻子已不在人世，不禁黯然。我似乎又体会到看见那扇小门上了锁时那种隐隐的失望。我会在一个挂在门边的留言簿上写道：“老于，今天来访，不遇。”

当我们悠闲地穿过这条胡同，往往会碰上一个光着脊梁的汉子冲着老于大喊一声：“于子，吃了么？”当得到肯定的回答，便很痛快地着补一句：“得嘞。”随即扬长而去。

当时北京的啤酒供应困难，时值盛暑，我们像沙漠中的骆驼，满城转悠着找啤酒喝，我们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分工：他加塞儿我掏钱。老于加塞儿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我远远地站着，看他同队中某一酒客客气地交涉，然后从容地站进队里，这一招几乎是屡试不爽。当我看见他端着满满的两升啤酒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我的心兴奋得要蹦出嗓子眼……若是在晚上，我们会端着啤酒坐在小饭馆前面的马路牙子上，柏油路面还散发着太阳的余热，一大口冰凉爽口的啤酒灌进焦渴干燥的喉咙，就像吞下凛然的剑气，精气神儿陡增，于是万事皆备于我，可以高谈阔论了：“如今这人们不论诗写得如

何，可一个个活得都像诗人……”老于喝了一口感慨地说道。

也有困窘的时候，通常是在月底，我和他的钱都花光了，于是就精心设计出一条路线：先去北影宿舍的刘禹家，若他不在，就去西四的老牛那儿，老牛刚拍完电影回来，兜里肯定有钱。刘禹果然不在。

（注：这是一篇未完成的往事随想，作者想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写十来万字，经作者同意，我们先将这部分发表。）

《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

鄂复明提供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创刊,第一期(创刊号)出版。

1979年2月26日,第二期出版。

1979年4月1日,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教二楼204室下午1:30,第三期(诗歌专号)出版。

1979年4月8日,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地点:玉渊潭八一湖畔松林小广场,上午10:00。

1979年6月20日,第四期出版。

1979年9月初,第五期出版。

1979年9月9日,读者、作者、编者恳谈会,地点:紫竹院公园草坪下午2:30。

1979年9月27日,协助举办第一次“星星美展”地点: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

1979年9月29日,“星星美展”被市东城分局取缔,并将存放在美术馆东厅内的展品扣留。

1979年10月1日,为“星星美展”被取缔一事,举行集会和游行。

1979年10月7日,重印第一期(创刊号)。



1979年9月27日,第一届“星星画展”期间,画家王克平(前右)向美协负责人刘迅(前左)介绍作品,前中为画家李爽。

星星会员(左起)王克平、马德升、严力、曲磊磊和黄锐,在黄锐家小院。

1979年10月21日,第二次诗歌朗诵会地点:玉渊潭八湖畔松林小广场。下午2:30,印发朗诵会诗选。

1979年11月18日,因发售刊物,本编辑部成员庞春青被拘留。

1979年12月末,第六期出版。

1979年,第一届星星美展,观众踊跃的场面。





1980年8月“星星美展”第二届全体成员摄于中国美术馆顶楼。



1980年1月20日，《诗刊》社召开首届“青春诗会”，邀请全国各地20名青年诗人参加。《今天》诗人顾城、舒婷、江河应邀出席，图为全体诗会代表合影。其中有王小妮、梁小斌、孙武军、徐敬亚等人。



1980年，舒婷上京参加“青春诗会”时，与《今天》编辑部全体成员见面，共同到北京郊外云水洞游玩。图中两位女性，右为舒婷、左为徐晓，其他有北岛、赵南、周英、陈延生、芒克、黄锐、江河、甘铁生、赵振先。



1982年，曾因涉外婚姻轰动一时的 星星美展 画家李爽与王苏在法国



1980年夏,法国诗人于连与朦胧诗人们合影(尊重本人意见两人面部被盖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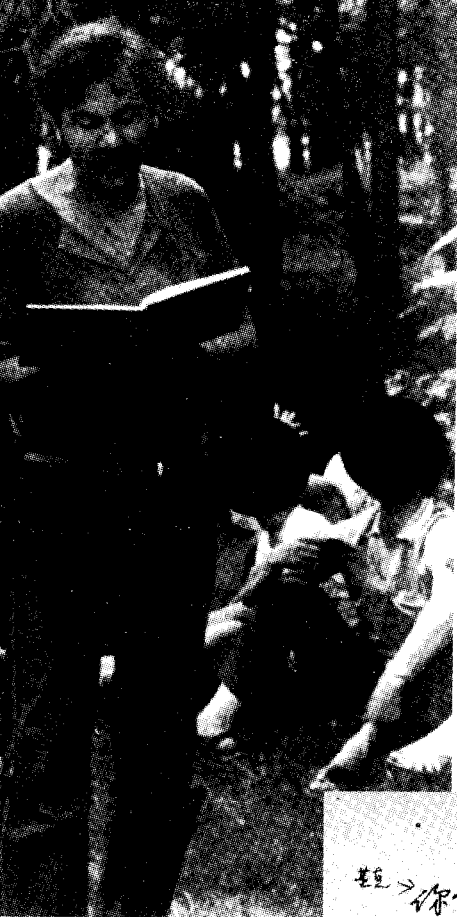
酒后的中国诗人严力醉薰薰地拥抱法国诗人于连。



上图：1980年夏，朦胧诗主将北岛在“圆明园国际诗会”上举刀切豆腐时显得杀气腾腾。

右图：《今天》最小的诗人黑大春在“圆明园国际诗会”上朗诵。





1980年夏，法国诗人于连在《今天》举办的
「圆明园国际诗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

给苏娜丽莎
 红豆 > 你像离去的燕子，没再回来

E rínia, cavalante | 你像个骑士回来
 as auroras de China | 带着中国的曙光回来
 com teu sorriso | 带着

那时一颗绿色的月亮 | 洒落在我的记忆里

O asir el iris.
 irse
 hasta ser nupcia
 y alto
 en la epistola

你像个骑士回来
 带着中国的曙光回来
 直到结婚那一天

于是，你用吧拿另一草帽
 盛满海水，在每块石头上

北京

法国马赛派诗人于连在北京期间，到越南
 家与众多朦胧派诗人即兴联诗时的手稿。



1980年夏，“圆明园国际诗会”后，芒克（中）、陈延生（左）与法国马赛派诗人于连比赛攀爬圆明园中的大石柱。



1979年秋，黄翔率贵州《启蒙社》的诗人进京，与《今天》诗人们聚会于圆明园。交流思想，切磋诗艺。从左到右为张玉萍、于美好、黄锐、黄翔、江河、甘铁生、黄建刚、薛明德、芒克、北岛、陈迈平（万之）

1980年1月末，芒克诗集《心事》·（《今天》丛书之一）出版。

1980年2月，第一期（总第七期·短篇小说专辑）出版。

1980年4月，第二期（总第八期·诗歌专辑）出版，北岛诗集《陌生的海洋》（《今天》丛书之二）出版。

1980年6月，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今天》丛书之三）出版。

1980年7月，第三期（总第九期）出版。

1980年8月，艾珊短篇小说《波动》（《今天》丛书之四）出

今天文学研究会
章程

今天文学研究会是由青年作家、诗人组成的文学团体。

本会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研究。

本会的一切决议经全体会员大会通过。

本会的会员必须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参加本会各项活动，服从会员大会的决议，并交纳会费，会员有自行退会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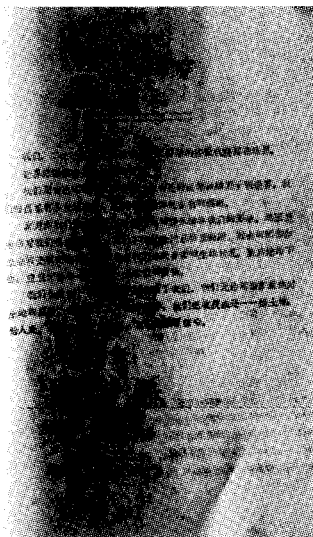
凡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遵守本会章程者，提出申请，经全体会员大会批准，即可成为会员。

今天文学研究会

1980年11月2日

《今天文学研究会》章程

登载于《今天》第六期的
《星星》美展前言。



版。

1980年8月20日至9月4日，协助举办第二次“星星美展”地点：中国美术馆。印发作品配诗及作品简介。

1980年9月12日，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制定的法令中“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的有关条例，强令《今天》杂志停刊，中止出版发行工作。

1980年9月25日，为《今天》杂志被查封一事，发表《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

1980年10月,为《今天》杂志申请注册,争取早日复刊多方奔走。

1980年10月23日,召开“今天文学研究会”筹备组会议编发《文学资料》之一。

1980年11月2日,“今天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编发《文学资料》之二。

1980年12月初,编发《文学资料》之三。

1980年12月末,市公安局再次通知本刊,终止一切活动。

1979年4月至1980年12月,定期举办作品讨论会,时间是每月初的第一个周末晚间。地点:张自忠路赵南家中。

《今天》编辑部出版发行刊物总目

鄂复明提供

《今天》文学双月刊 第1~9期总目

中篇小说

波动(四、五、六期连载) 艾珊

短篇小说

1. 在废墟上 石默
抉择 李枫林
瘦弱的人 迪星
2. 归来的陌生人 石默
瓷像 万之
路口 崔燕
哑吧姑娘 林露
3. 墙 铁冰
雪雨交加之间 万之
原谅我,兄弟 天然
4. 教堂里的琴声 舒婷
开阔地 万之
圆号 伊恕
6. 聚会 天然

在小公园里 舒升

7. 旋律 艾姍

仇恨 伊怒

没有太阳的角落 金水

远方——雪 万之

红气球 萌萌

老人与伤兵 阿蛮

星 凌冰

永动机患者 晨漠

9. 万之短篇小说两篇 万之

城市之光 噩耗 假面舞会 夏歌

一个孩子死了 肖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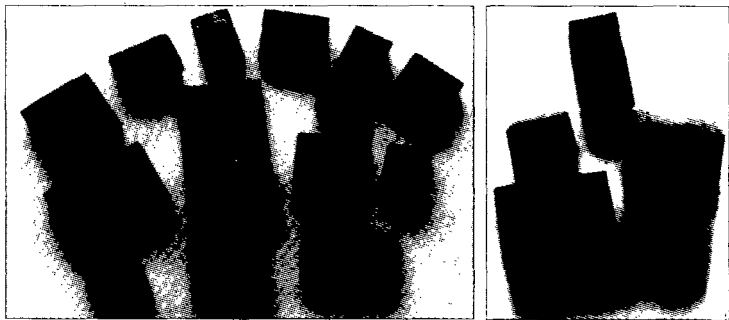
稿纸上的月亮 石默

诗歌

1. 风景画、给——思念 乔加

致橡树、啊，母亲 舒婷

《今天》所用过的锌制图画的印版及今天的印章。



- 天空、冻土地,我是诗、白房子的烟 芒克
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 北岛
2. 十月的献诗 芒克
相信未来、命运、疯狗 食指
眼睛、你好·百花山、星光 北岛
生日、孤独 方含
冷酷的希望(组诗) 艾珊
3. 纪念碑 江河
巴黎公社、长安街、无题 齐云
鱼群三部曲(长诗) 食指
在路上、无题、人民 方含
心事(组诗) 芒克 太阳落了(组诗) 写给珊珊的纪念册、自画像 芒克
中秋夜、四月的黄昏 舒婷
太阳城札记(组诗)、云啊,云、小木屋里的歌、一切、走吧 北岛
4. 祖国啊,祖国 江河
给你 凌冰
雨夜 陌生的海滩(组诗) 北岛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指
秋天(组诗)、我有一块土地 芒克
5. 没有写完的诗(组诗) 江河
献诗:1972~1973年(组诗) 芒克
烟 食指
船灵铭睡吧,山谷、是的,昨天、日子 北岛
6. 谣曲 方含
心,总是那一颗、忠诚与遗弃、夜晚 阿丹

路上的月亮(组诗) 芒克

候鸟之歌、岸 北岛

8. 为了、颜色(组诗) 飞沙

小窗之歌、也许 舒婷

穷人、我是雪、歌、蘑菇 严力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酒 食指

带我走吧、风、无题 小青

海边的儿歌、印象 方含

生命之音 南荻

无题、橘子熟了、红帆船 北岛

习惯、迷途、宣告无题 北岛

夜晚,早晨好 程建立

仿佛 易名

山影,海岸 暂停

雪人 古城

海岸·海风·船,城市(组诗) 芒克

梦之岛 白日

人生 晨星

自画像、希望 凌冰

星,星星变奏曲、从这里开始(组诗) 江河

9. 虚构 小青

幸福的绿叶 夏朴

结局或开始,港口的梦 北岛

观象台 世荒

葡萄园 芒克

我们从自己的脚印上…… 杨炼

翻译作品

1. 诗三首 [西班牙]卫尚·亚历山大 钟长译
纯真(短篇小说) [英]格雷厄姆·格林 方芳译
谈废墟文学 [德]亨利希·标尔 程建立译
2. 鸡神(短篇小说) [苏]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
歌还译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和亚·布活克 支波编译
西德“四七神”(简介) 程建立编译
3. 步入永恒(短篇小说) [美]小库尔特·冯尼格特
冰洋译

评论·其他

1. 致读者(代创刊词) 《今天》编辑部
动物篇(寓言) 咏喻
大自然的歌声夏朴——评“法国风景画展”(随笔)
夏朴
评《醒来吧,弟弟》 林中
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历山大《作家介绍》 吴歌川
2. 30年代文艺论争和文艺民主(评论) 方思
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画评) 夏朴
向……(随笔) 静之哗
4. 评《伤痕》的社会意义 史文
《自然·社会·人》巡礼(随笔) 钟城
记《今天》编辑部组织的朗诵会(报道) 秋实
关于摄影作品《秋之魂》 弓长
5. 克罗齐美学的启示 艾虹 史文
评《思绪》的思想性(随笔) 毕捷
6. 试评《今天》的诗歌 辛锋

“星星美展”前言

“星星美展”部分作者谈艺术

二十小时的“星星美展” 韭氏

9.《今天》短篇小说浅谈(随笔) 韭氏

答复(诗人谈诗)

奇异的光(文学评论) - 《今天》诗歌读痕 徐敬娅

美术摄影作品

1. 卷烟的清洁工(木刻)你们出生在哪儿?(木刻) 晨牛

2. 秋之魂(摄影) 山岚 诗歌小说插图 晓晴

3. 冷对(线条画) 阿城 诗歌插图 艾未未

4. 青春·思绪(线条画) 陆石

5. 梦幻曲(木刻) 晨生

《没有写完的诗》插图 陆石

《今天》封面设计 夏朴

《今天》丛书书目

1.《心事》(诗集) 芒克 插图9幅(线条画) 陆石

2.《陌生的海滩》(诗集) 北岛 封面设计 夏朴

3.《从这里开始》(诗集) 江河 封面设计 夏朴

4.《波动》(中篇小说) 艾珊

《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总目

短篇小说

1. 带星星的睡袍 徐晓 相会 棣子

2. 万之短篇小说三篇 谜、沙、自鸣、钟下 万之

诗歌

1、歌手 小青

愤怒 食指

欢乐 英子
赠别,小巷 顾城
离别之后 严力
致渔家兄弟、茫茫的田野 芒克
归梦 舒婷
兰色狂想曲 杨炼
和弦、住所 北岛
向日葵(组诗) 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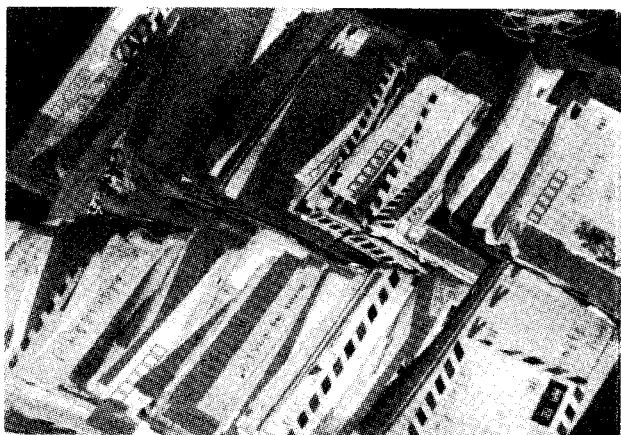
3. 画廊(组诗) 白夜
海 小青
枫叶和七颗星星、无题 北岛
画、天快亮了 芒克
简历 顾城
假如、歌、车站、冬 江河
乌蓬船 杨炼

其他

- 1、致《今天》读者书 《今天》编辑部：今天文学研究筹备组
2、今天文学研究会章程
星光,从黑夜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 老广
“新诗”——一个转折吗?(评论) 洪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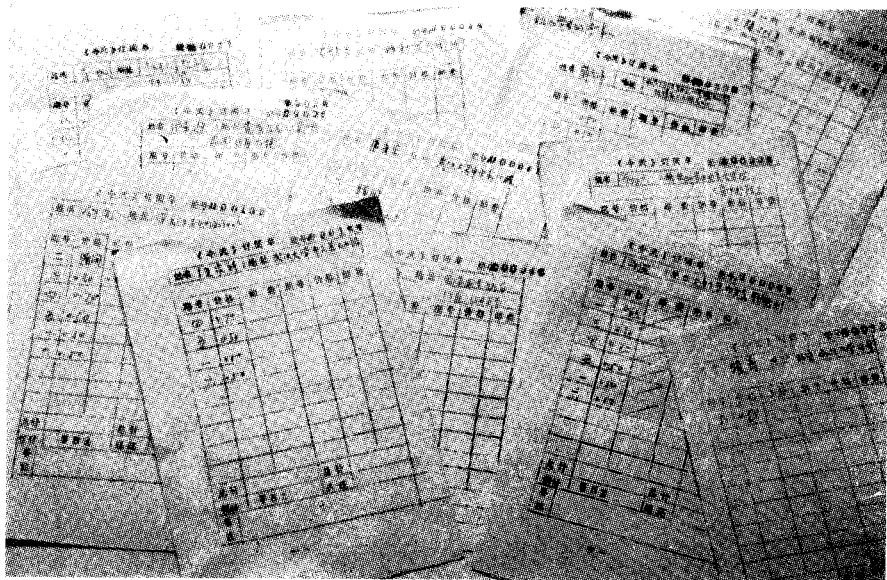
《今天》出版物印数：

《今天》第 1—9 期	1000 册
《今天》丛书四种	每种 1000 册
重印第一期(创刊号)	1500 册
《今天》文学资料三期	每期 600 份



《今天》杂志保存的部分读者来信

部分《今天》订阅单



星星点点

阿 城

1979年，记得是夏天。晚上，黄锐到北新桥我家里来。所谓家，是为了结婚刚借的一间七平方米的屋子。如结婚，凭政府配给的票，可买床一张，还可以买，很奢侈，书柜一具。天气热得漆发粘，但终于还是把柜门拉开了，我的画在里面。黄锐要看看它们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个画展。

黄锐看了，说还可以。我很感激，也明白自己有几两重。三十岁，不是狂的时候了，二十不狂三十狂，都有点儿发育不良。

如约在几天后赶去参加筹备画展的聚会，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东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儿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

《今天》插图作者阿城创作的周总理像(第三期扉页)。



很可能我记错了,画展的名字“星星”就是那天黄锐提出来并且定下来。我同意,这样可以让人说清楚是哪一个展览。

黄锐和马德升为了展出的场地到处奔走。马德生被大家称为老马,其实不老,拄拐,却灵活异常,甚至可以在拐上做双杠动作,令人目瞪口呆。我总以为老马出面事情会好办一些,其实中国是个平等的国家,不给其他人的,也不给残疾人。我曾随着去过美术家协会。印象是接待的年轻人很热情,但管不了事,管得了事的却不能答应任何事。

没有任何单位可以提供场地,不是因为钱。于是大家决定10月1日前两天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头公园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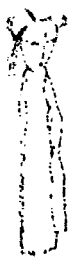
“星星画展”,是个雪球,越滚越大。有天见到黄锐,他很高兴地说,有一个搞木雕的,叫王克平,东西很好。于是晚上到黄锐家,王克平已经在,很温和的一个人,东西,令人吃

钟阿城创作的插图

鍾馗嫁妹

亦疑是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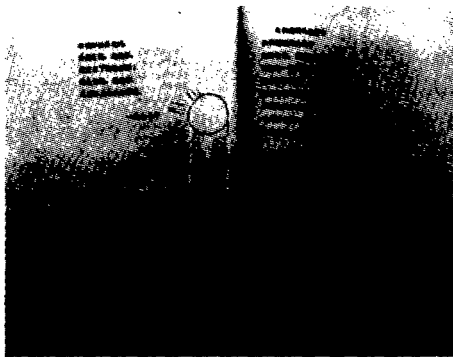
三月年
阿城



惊而且喜欢。又有严力,很聪明的某种成熟,诗写得极好。黄锐、老马也都会写诗,我很敬佩,因为诗实在是极难的东西,需要才份。当然还有李爽,我一直认为她是少有的那种天性能克服阴影的人。人是越来越多,朱金石、周迈由、薄云,我亦把毛栗子介绍进来。我记得有一张几十人的名单。

我所能做的事,一是将大家的画翻拍洗印出来,希望卖出以补经费;二是运画,把别人的画用三轮儿车先运到黄锐

和老马家,再运到展出场地,之后装画到镜框里去,这是需要仔细的活儿,我很仔细。出汗的活



曲磊磊为《今天》创作的插图。



曲磊磊化名
陆石为江河
诗插图。

儿是运王克平的木雕，很沉，其中一个叫“沉默”的木雕，搬起来吃力而且有预言性，展览被取缔了。

结果是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那天的第一次不是为了庆祝的游行，再结果是允许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于是再搬运，结果困难的是钉子。冬天到了，几百万家要装煤炉取暖，钉子售缺。但是历年的钉子还在，我从一扇老窗上使用各种办法拔出113个钉子，长短不一，都有资格进博物馆。

来年，1980年，第二次“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栅栏里展出，人有退出的，有新加入的。展出之前，江丰来审查作品，脸红红的，上海浦东口音，看了放在西城黄锐家的画，都通过了。再到东城看王克平家的木雕，除了“偶像”，也都通过了。后来“偶像”还是展出了。我认为它是几十年来有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第一个可称为艺术的作品，有种可触摸的幽默感。

之后，历史上到目前在大陆没有第三次“星星画展”。

《歌》

严力

天很低
紧贴着脊梁
走吧
这段路是你
熟悉的家乡
为了把这双鞋
给黎明穿上
走吧



我不知道历史要怎么写,尤其是种具判断的历史。古今中外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判断就没有历史了,结果变成为重要的是判断。可是十年前那盏昏黄的灯哪里去了?斑驳的墙壁哪里去了?当然,闪光灯过后,一排笑容可以固定在胶片上,可是某天中午大家去隆福寺吃芝麻酱面条,老马把拐杖靠在桌边儿,黄锐举着钱挤在窗口,大家把一碗一碗的面条从人头上传出来,有一碗撒了,王克平笑了:“我操!这些怎么判断呢?”

历史,对于某个人,某些人,也许是那些不能与其他人共享的部份。

星星旧话

黄 锐

十年前的秋天，10月2日，香港的报刊，世界的各大报纸，甚至日本的《朝日新闻》，都登载了星星游行的照片。马德升威风凛凛，双拐杖成大字形，疾行前头。

这一天以前，我们都默默无闻。真挚，热情，亦有些盲目。尤其是我，做事难说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信念。1976年天安门事件，我因投诗被拘禁，后获自由，也并没有豁然一悟。策划星星，怎想到它会参与历史，或是一代风流！恐怕中国的艺术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多其他的事实来证明的艺术吧。但反过来，那个时期，文化艺术亦是空白，枯燥得不得了。人们需要真实，需要新鲜空气。一件突出的事儿，马上成了人们沸腾、说个没完的话题。像袁运生那幅“穿上裤子”的壁画，连工人、店员都传说知道，艺术的小道消息亦是不胫而走。

那时候是段真空。虽然人们还保留着对“文化革命”的恐惧，但新的东西出来了，是那么自然，那么快感。虽然自己不

是新东西的创造者，但有人做了，人们欣赏这“做”，体会一种下意识的没有控制的自由。最好不是自己做。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富有领略感的民族，常常好奇心和懒隋习惯相抵，自以为迈出了步子，其实还站在零的位置。游行的时候，旗帜一挥，响应者成千上万，其势浩大。走到府右街，前面突然排出了警察队，人群呼拉一声散去了。回头一看，只剩下孤零零三十几人。连我们奋力喊出的口号，也被宽阔的街道分散了。

人群并没有完全散去。他们挤在街角，退后二百米的地方，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心里切望我们走好。他们对我们的“保护”，成了当时历史的协调。

“星星画展”，我和马德升是负责人，和我们对话的是北京美协领导刘迅和官布。官布其人，无数官僚中的一位，无言以赞。刘迅，个子不高，目光炯炯，动作很有力量。作为美协头头，他曾答应给我们举办展览。前例有：4月，“油画研究会”在中山公园，江丰写了画会开放宣言；另一派“无名画会”成立，亦排进美协日程中。差不多半年，我和马德升，快把美协门槛儿踩平了，仍是在云雾山中。当然，刘迅自有苦衷。“油画研究会”，成员多是教授、画师，刘迅本人亦其中之一。“无名画会”，大都是油画风景写意，兵马也算齐整。而我们杂七乱八，抽象、半抽象、超写实，无奇不有。到后来，9月27日，星星自办露天展，刘迅很可能心有不安。他很快来看展览，并安排了把作品存放在东门厅。29日，有群人啪啪地扔石子儿过来，并向我们身上吐痰，也是刘迅救驾，接我们到美术馆内，避免我们与那群人正面冲突。准备游行的抗议通牒后，他找我，到我家里，我不在，与我母亲恳谈，说他此时已抛弃个人同情，是在党的立场，政府的立场，劝我们悬崖勒马，美协并予合作。之后，又找到东四十四条76号我暂住的地方，我介绍老徐接

待他，自己坐在一边，看老徐对刘侃侃而谈。再看刘迅，我觉得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无不可信任的了。但人情和约束此时已无能为力，历史露出轮齿，一齿压一齿地转动了。

我们星星各画家，在以后的时间不乏磨炼。刘迅是政治家，因此事件在官场上几经沉浮。还有江丰，全国美协主席，断然给我们安排美术馆，展出第二届星星美展。后来他身体崩溃了，一些官僚把星星事件当做问罪的狼牙棒，无情打击他，促使他卒以早逝。

我再次见到刘迅已是88年。他样子不变，侃侃而谈，仍旧一片爱国热情。9月之秋，我又接到他的个展请柬，时间极仓促，我从大阪出发，途经上海，终于没有赶上18日的闭幕。但我心有安慰——画册上他的画是极抽象、单纯的色块，无造形地静中有动。令人怀疑刘迅是否成了星星，还是星星成了刘迅。

1980年8月，我们在美术馆三层办第二届“星星美展”。观众人山人海。一天，江丰在下面开会，我、马德升、王克平三个求见。江丰痛斥我们背信，态度激烈，不留余地，令人惊讶。原因是我们没有与他合作，展出了“过头”的东西。另一方面，民刊的朋友们，《今天》的诗人们都兴高采烈，认为是自己的节日。他们都搬到美术馆“上班”，并且每天一道去喝“酒精”。现在，这些人星落云散。

我也曾是《今天》的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北岛和芒克，他们肯定是《今天》的盟主，现代朦胧诗的代表。从1978年底开始，自办油印杂志，从编排到内容，水准高有深度。可是我有了脱离《今天》的愿望。次年春季，《今天》组织郊游圆明园。另一位画家薛明德被邀同行。薛是四川人，第一个在西单墙举行了露天画展。天气很美丽，景色亦潇洒。我开始勾画

稿。不一会儿，我的朋友们都跑到薛那里去观战了。薛啪啪地甩着画刀，他的艺术动作赢得一阵阵喝彩。他的颜色是响亮的，结构却一塌糊涂。而我的作品完全是学生之作。晚上，我疲劳、孤寂，跑到76号闲坐。只有于美好一个人在。她是薛的女友，众所周知。而她却对薛不满，大骂薛不仁，这很安慰我的情绪。我说我没有在《今天》可干的事情了。她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想参加。”她是一位画家。做什么呢？还能做什么呢？北京的画家是够窝囊的了。我说：“我组织一个展览！一个北京人办的展览，可以镇住全国的展览！”

我最先找了马德升。没有马德升的合作，“星星”就不会成为事实。马是了不起的干家，他的了不起的艺术无庸赘述。在单位里曾有“远学王铁人，近学马德升”的口号。他有的是热情和意志，而我多一点谨慎和原则。76号，我们召集了成立会，来者除我们俩之外，有钟阿城、朱金石、关乃炘、于美好、唐千刚，还有两三位较早就画现代画的。薛明德是76号常客，不请自来，结果成立会开成了垮台会。薛大叫大嚷：“我是世界知名画家，作品价值上万，姓黄的是老几，有什么权力主持这个会？”唐千刚：“我有四十幅画，少一幅不行，应该有我的展室，紫竹院快办我的个展了。”关乃炘：“我的个体画是世界级……”后来只要我一说话，薛就乱叫，简直无法忍受。我先跑了出来，并拉马德升出来，对他说：“像薛明德、唐千刚这样的全甩掉！”

后来我们就比较顺利，找了一些新同伙，曲磊磊、李爽、薄云、王克平、严力。由我和马德升先看作品后定人选。在克平的家里是戏剧性的，我和老马在他的屋子里，惊讶有不少奇怪的木雕。我说：“在展览里你的作品会最轰动。”他说：“是吗，那我就参加了。”可是他连最轰动的画家马蒂斯、康定斯

基都不知道。在严力家，我们是去看李爽的画的。我仅知道严力是诗人。除了李爽的画以外，还有几幅风格别异。严力说是他画的，并问：“怎么样？”“不错，有新东西，”我们回答，“来参加展览吧！”严力被突然的邀请乐坏了，据说当晚就喝酒喝出了毛病。毛栗子、杨益平，现在各有新的发展，他们是最后一分钟里走进星星大门的。曲磊磊带了来，两个都身穿军大衣，干部弟子的样子，手里拿着画。我们正布置展厅，觉得挺麻烦：“此画一般，以后再说吧。”便下了结论。曲磊磊说：“我的老哥们了，让进来吧。”“好，来，把画挂上！”结果这两位也成了星星。

我手里有份名单，星星的成员有：王克平、曲磊磊、钟阿城、黄锐、薄云、马德升、杨益平、毛栗子、朱金石、肖大元、周迈由、邵飞、严力、李爽、何宝森、张世琪、甘少诚、关乃炘。以上成员两次“星星美展”都参加了，仅参加过一次的成员有：尹光中、李永奇、赵大陆、王鲁炎、包炮、宋红、赵刚、陈延生、张之中、刘大宣、曹立伟、汪建中、郑振庭。尹光中是唯一的外地人。

仅此，啰嗦了这么一篇。阿城曾有一句话：“绘画是眼睛的艺术，不用语言的。”我也是约束在先。可是无法拒绝汉雅轩主人的一片热诚。十年了，星星的前一段已成了历史。后一段，现在的一段真的用眼睛去裁判了。爱好者们。批评家们。还有星星艺术家自己。

1988年10月

反省的时代

马德升

时间会把一切固定在本来的位置上。移位只是暂时的。在宇宙把一切都抹掉之前，人类最后的文明是个体的归位。

—

1980年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至今已八年。当时的政治形势左右摇摆，忽冷忽热。在文艺界内部有人开始点“星星”的名字（反精神污染运动要不是早收场一个月就要公开批“星星”）。因此，这四年“星星”失去了各种活动的可能。

后四年，“星星”半数以上的人散落到法国、瑞士、英国、德国、荷兰、日本和美国。出国后，首先要“重新做人”：第一是学讲话，第二适应那里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法，第三是租房卖画支付一切生活费。这是三个极现实的问题。剩下的才是发展艺术。与此同时，国内经历了1987年的政治动荡。尽管如此，在这短短的三四年里，东西方的“星星”仍然在探索。国



在“星星美展”游行前,马德升在西单演讲。

内:杨益平、毛栗子、肖大元、张志忠、何宝森、包炮、薄云的作品不断被国外收藏家收藏,并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外:阿城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重视,曾掀起“阿城热”。黄锐的作品已进入日本的收藏界;邵飞的作品被英国一家博物馆收藏。严力的诗和在美国纽约创办的诗刊“一行”在国内外受到广泛的承认,王克平、李爽的作品被送往汉城奥运会参加展览,王克平、马德升的作品被巴黎市政府与博物馆收藏。马德升以中国水墨画在巴黎首次得到法国文化部的承认与赞助。等等。由此可见,“星星”大部分成员的作品已进入了世界现代艺术的潮流。尽管国内外的“星星”处在不同性质与形式的压力、困扰之中,但追求艺术的本质却一如既往。

十年过去了,“星星”作为一种艺术运动现象,在中国艺



星星画家马德升能拄着
双拐跳迪斯科。

术史上的作用已经完成,这是历史事实。但,“星星”的真正艺术形象却在十年中确立。这是极重要的十年。“星星”不是一种艺术流派。就像“星星”一样,在天空各就其位。世界当今的艺术已进入了“星星”的时代,“太阳”的时代早已过时。

二

地球已运行到全面反省的年代。中国人更有必要加深反省。如果一个民族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屈服、忍受和狂热地追随封建的统治和个人崇拜于怯懦之中,那么就不能不说这个民族有了本质上的问题。

不要忙着向那几页肮脏的历史上啐吐沫，那上面也有自己的痕迹。不要再做“两性人”，不要再干当婊子又立牌坊的蠢事。从任何角度贩卖灵魂都是可悲的。为什么不能丢掉艺术家的美名，而去午门前卖“大碗茶”？那里赚的两毛钱既干净又踏实。中国的文艺界里并不是没有傲骨，沈从文先生就算一个。几十年不开笔，退出文坛，一头埋进古籍之中。精神实在可赞。看来做学问也不是没有“干净”的地方。中华的黄土文化需要干净的断裂，才能获得新生，缠足式的过渡后患无穷。

“伤痕文学”并没有抹掉人们心头的伤痕，只不过是织补了一种政治力量的外衣。而当一些少数作品真正触动“伤痕”时，却换来新的刀疤。二千年的伤痕难道还唤不醒沉睡的反省。反省！反省！只有不断地、深刻地反省，从自身的认识中解脱出来，才能公正地站到历史面前，重新认识现实。每个中国人都应在这面具有黄土文化的镜子面前深刻的反省。只有大规模的，全面的反省，10亿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星星美展”的行动与作品的内涵不能不承认是这种反省的前端。也不得不承认在近些年来，有些中国人在反省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三

回归人的本性，回归自然的本质。回归——是当今艺术的主流，是艺术的本质。

承认文明的唯一途径是——销毁文明。自从有了“哲学”以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解决，而且问题越来越尖锐化、复杂化、无聊化。

今天的艺术家追求的不再是自身的发现、实用与享乐，

而是艺术的本质。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艺术潮流,首先要把自己从现实中解脱出来。背离现实越远,就越能清醒地认识现实。这样才能还原自然的本质,人的本质才能得到回归。艺术品的力量将是立体的记录、再现,人、自然的一切痕迹。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从宏观到微观,从无形到有形,从听觉到视觉,从嗅觉到触觉。艺术将质变为一种“空气”,隐、现在自然之中。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包括重复性的磨难),足以逼使艺术家重新认识世界,再现自然。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经历磨难最多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需要在人的本性上、自然的本质上进行深刻的反省。只有尽快回归到这一人类实质性的问题上,中国才能更多地产生世界第一流的、具有现代精神的作品。

在国内如能尽快实现这一事实,最基本的保证是:“活人”与“死人”不再是人们思维的障碍和生活的威胁。任何实践与冒险都会得到生存的可能并受到尊重。每个人都以人的本性面对社会、参与社会。只有这样,黄土文化才有可能重新确立于世界。否则,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星星”的作品,自1979年以来的十年中,不断地进入现代艺术的潮流,不断地受到社会与艺术界的承认与重视,这是与“星星”的自身反省和争取一个正常化的生存与创作条件分不开的。

当人类不再相互厮杀、仇恨、排斥时,自由也就会自然消失。当艺术全面回归到自然的本质上时,人类将不再会意识到艺术的存在。

为“星星美展”十周年纪念展而作

1988年11月2日于巴黎



偶像(铜) 王克平
1978年作

工艺美院学生致王克平的信

王克平同志：

向你的胆魄致敬。你无情的刻刀，解剖了社会的无耻、虚荣和欺骗。那些所谓的雕刻家，早已是行尸走肉，他们伪善的灵魂会在你充满生命的作品面前发抖！作为艺术的绘画和雕塑不是粉饰社会的彩色！它要告诉人们、启发人们。你做得好，并希望会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

工艺美院学生
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顾城访谈录

王伟明

王伟明：从你的诗作中，我感觉到你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如洛尔迦(LORCA)惠特曼(WHITMAN)等。你喜欢这些外国诗人吗？是通过翻译来念他们的作品吗？

顾城：我外文不行，所以只能通过翻译来读外国诗。我爱人懂些英文，有时也译诗，这对我理解外国诗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确如你所说的，我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有一段我天天读他们的诗，把他们的诗带到梦里去，有些诗是一生读不尽的。

我喜欢外国诗有一个过程，很小的时候我就读普希金的童话诗《小飞马》。那时我不关心什么是诗，只想多知道些故事，另外再多翻翻几页彩色插图。我发现惠特曼时笑了半天，我想他可真会胡言乱语。洛尔迦的诗，我们家也有，放在书柜的最下层，我把它抽出来时，看见封面上画着个死硬的大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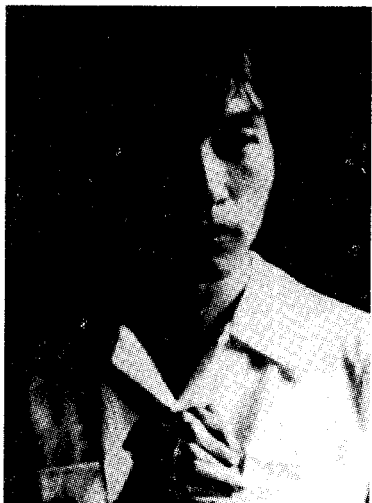
头，我想也没想就把它塞回去，那个大拳头实在太没趣了。

认真开始读外国诗是在十多年后，我先读了些浪漫派的诗，感触不深，我觉得他们有

些姿态是作出来的。真正使我震惊的是西班牙和它的那个语系的文学——洛迦、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聂鲁达。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精神，这声音震动了我。

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朋友说我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车的村庄、月亮和少女。他的谣曲写得非常劝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



顾城

迦，因为他的纯粹。

惠特曼和洛尔迦很不相同，他是开放型的，是文雅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却不会在狭窄的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对于他——惠特曼来说，对于他干草一样蓬松的胡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解的，没有年龄，没有什么千万年存在之谜。那些谜轻巧地而像纸团，像移动杯子一样简单——灵魂和肉体是同一的，战绩和琐事、田野和人、步枪子弹和上帝是同一的，生和死是同一的，都是从本体上生长出来的草叶。

他像造物者一样驱动着它们，在其外又在其中，只要他愿意，随时能从繁杂的物象中走出来，从法规中走出来，向物化的生命显示彼岸。他说：那里是安全的。他说：宇宙自身就是条大路，为旅行的灵魂安排的许多大路。他说：你一出生就在这条路上。他说：为了让灵魂前进，一切都让开路……一切具体的东西：艺术、宗教、政府。

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愿超过、也不能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

我读惠特曼的诗很早，感应却很晚。我是个密封的人。一直到1983年的一个早上，痛苦的电流才溶化了那些铅皮，我才感到了那个更为巨大的本体——惠特曼。他的声音垂直从空中落下，敲击着我，敲击着我的每时每刻。一百年是不存在的，太平洋是不存在的，只有他——那个可望不可即的我，只有他——那个临近的清晰的永恒。我被震倒了，几乎想丢开自己，丢开那个在意象玻璃上磨花的工作。我被震动着，躺着，像琴箱上的木板。整整一天，我听着雨水滴落的声音。

那天我没有吃饭,我想:“在诗的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许多伟大的行星和恒星,有不同的波,有不同的火焰。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我们困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困在时间中间。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

王伟明:除了外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中国古诗吗?请你谈谈对传统的看法。

顾城: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

我就活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不仅喜欢诗,而且喜欢摹画一些送给朋友;我不仅喜欢古诗,而且喜欢在落叶中走,去默想它们那种魂天归一的境界;我常闭起眼睛,好像面对着十个太阳,让它们晒热我的血液。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两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它们。

学习古诗,历来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悟其神,一种是摹其形。我以为前者是大道,穿越物象才能到达本体,忘其形才能得其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可惜许多死于章句的人都不这样想。他们喜欢研究服装上的纽扣,把外衣当贵宾,他们迷信古律声,似乎唐诗是靠仄平对仗做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偏见造就了明清以来的大批诗匠,直到现在还有遗风。殊不知至人无法、大象无形,李白原又有多大程度上仰仗了格律呢?形式本身只应当是道路,而不应当是墙。伟大灵魂的前进本身就创造了最好的诗的形式。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使他永远临近那个聚变、那个可能的工作，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万物之中。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除了这个最重要的自身条件外，无疑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使灵魂生长和显求。需要土壤、音乐、历史、道路、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需要语言，没有一种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的语言，成功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还有些纯客观的条件不仅对于大诗人，而且对于小诗人适用。就是要有食物、要有安静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他们的工作。

王伟明：你曾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去，深为大自然所影响，故你早期的诗，主题多取材于大自然。现在你回到城市，你写的诗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顾城：是的，是有很大变化。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垒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

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城里有许多好东西，有食物、博物馆、书，有信息，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大平原棕色的注视，没有气流变幻的《生命幻想曲》。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

我不习惯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并且写作。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走来。我不能

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融化古老人类的坩锅，我只有负载着它们前进，希望尽快能走出去。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我老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

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1984年11月

“朦胧诗”问答

顾 城

问：最近，我看了有关“朦胧诗”的评论，有一些想法，希望你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谈谈你个人的看法。

答：我非常愿意。

问：首先你讲讲为什么叫“朦胧诗”，它们比较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答：“朦胧诗”这个名字，很有民族风味，它的诞生也是合乎习惯的。其实，这个名字诞生的前几年，它所“代表”的那类新诗就诞生了，只不过没有受过正规的洗礼罢了。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类新诗时，它已经渡过压抑的童年，进入了迅速成长的少年时期。它叫什么名字呢？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现代新诗、朦胧诗、古怪诗……后来，争论爆发了，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学名了，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折中，“朦胧诗”就成了大号。

我和一些诗友们，一直就觉得“朦胧诗”的提法本身就朦胧。“朦胧”指什么？按老说法是指近于“雾中看花”、“月迷津

渡”的感受；按新理论是指诗的象征性、暗示性、幽深的理念、迭加的印象、对潜意识的意识等等。这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仅仅指这些，我觉得不是没有抓住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

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问：据你说“这类新诗”的特点是“趋向主体真实”和“倾向主动创造”，“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可是，我却听到一些人说，它们的主要特点是难懂。你对“懂”与“不懂”是怎么认识的呢？

答：懂，说得文一点，就是理解。

我觉得对于诗和人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由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来决定的。这两方面，包括着许多内容，其中主要的有：审美的阶段性、审美的方式（标准）客观的生活、主观的天性以及作者在表现瞬间的成败。

先说审美的阶段性。

凡是懂点基本理论的人都知道，审美观并不是一个铁铸的度量衡。它是一种随着人类进步，个人成长而不断发展的意识；作为人类来说，它是一条不断扩展的河流；作为正常的人来说，它是一棵不断生长的树木。

热爱小人书的年代，也曾翻到过惠特曼的书。当时我很吃惊，这不是疯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那为什么又印出来了？印的人也是疯子？那他妈妈也不管管他？可怕！可怕的东西还不少，鲁迅和屈原……好在他们都比我大，不归我管，我继续看我的小人书。

当然，后来渐渐理解了，从《小溪流的歌》到《长长的流

水》；从欧·亨利到杰克·伦敦，到雨果，到罗曼·罗兰、到泰戈尔……当我再看《离骚》和《草叶集》时，我震惊了，和小时不同，是一种被征服的震惊。

我去问过我的诗友们，发现也是一样，每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审美阶段，都有一本到几本偏爱的作品，这种偏爱是在变化的，最后的喜爱对象，总是越来越趋向人类所共同承认的东西。而这些作品（除儿童文学外）并不是在上小学时，就能理解的。

这是正常现象。

除了审美的不同阶段能造成“不懂”以外，不同的审美方式，不同的美学观念也能造成理解上的距离，有些是属于正常共存，有些则是“动乱年代”留下的实用主义意识。这种畸形意识，就是用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来衡量，也不能说是正常的。

在“四人帮”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好像文艺只是印得漂亮点的政策说明书，是近乎于起扫盲作用的“多种形式”。诗呢？也变成了给社会装点韵脚的竞赛活动。后来，好了些，从“四五”运动起，诗开始说真话，诗开始有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很快，在反映社会问题上，有了突破，诗有了某些独立的社会价值，这是令人兴奋的。但一切就到此为止了吗？人，还有另外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的祖先耕种过，收获过，他们收获的果实，已经在人类的太空上，变成了永恒的星星。但在前几年，这些领域却大半长满了荒草。这些领域就是人的心理世界，伟大的自然界和人类还无法明确意识的未知世界。

这些领域需要重新开拓、扩展，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必须表现，于是，有了拯救者。他们敬重古代的诗星，却没有重复

过去的耕耘方式，因为重复不是艺术劳动。他们带着强烈的创造愿望，表现着新一代的需要和理想（所谓“朦胧诗”正是他们的表现方式之一）。

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些领域正变得清晰起来。当然，在清晰的同时，一些读者朦胧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了用一种意识来要求作品，要求每个作品都对社会问题直接表态。如果没有，他们就认为其中空洞无物了，这是对诗，对文艺功能的偏狭理解。

诗的内涵如此多样，如此丰富，以至于使人无法用一个观念来概括它。诗的幻想天性决定了它永远要开拓新的领域，建筑新的精神世界。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终究会成为历史。

除了刚才讲的观念性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属于个人的东西，它们在诗的共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天性。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对诗的具体需要。由于天性是个非常莫测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先绕过它，只讲生活。

几百封青年读者给作者们的来信，提出和说明了问题。

为什么喜欢所谓“朦胧诗”的大半是青年？

为什么许多读书并不很多的青年的心，会通过所谓“朦胧诗”在遥远的地方共振？

完全是超现实的直觉吗？不！更重要的，是一代青年的共同遭遇，共同面临的现实，共同理想追求。

当然，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荒地中寻找新路时，迎接你的荆棘将永远多于花朵。生活是这样，在作者学习创作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未知的真切和年龄都决定了，他将不断在瞬间失败、绕路、搁浅、触礁甚至永远沉没。没有任何光荣可

言，站在大陆上的人将嬉笑他们，亲人们将痛苦。但是，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些这样的人去献身，因为在这样的人中，终究有一些会沿着同伴用失败探明的航线，去发现新的大陆和天空。

问：刚才听了你对“懂”与“不懂”的分析，好像明白了一些当前所谓“朦胧诗”的争论。你不同意那种“对诗、对文艺功能的偏狭理解”。那么，你对诗、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又是怎样想的呢？

答：刚才我说了诗的内涵是多样性的，所以我认为诗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性的。我造成有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政论诗，更喜欢创造性地表现灵魂和自然美的抒情诗。我以为一切真正美的诗，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玫瑰和剑并不对立，斗争并不是目的，斗争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手段，从这方面说，剑是为了玫瑰。

我们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已经开始懂得：政治不能代替一切，物质也不能代替一切。一个民族要进步，不仅需要电子技术和科学管理，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其中包括建立现代的新型审美意识。美将不再是罪犯或奴隶，它将像日月一样富有光辉；它将升上高空，去驱逐罪恶的阴影；它将通过艺术、诗的窗户，去照亮苏醒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

为了下一代比我们更高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洁净的窗户。

传统与我们

杨 炼

它早已活着，现在活着，将来也会继续活下去。它不是一个词，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条河，一座连绵不绝的山脉。它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细胞中和心灵每一次颤动中，无形，然而有力！它使我们不断意识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对昨天的否定。昨天存在过，还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在渐渐远去的未来者眼中，昨天和今天正排成一列，成为各自时代的标志。

它是传统，谁都无法、也不能摆脱的传统。我们基于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语言形式。说它是形式，因为它从不规定某种题材的“时代性”，而是规定了某种特殊的感受、思维和表达方式，它在创造每一件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使我们服从。我相信，任何个人的创造都无法根本背叛他所属的传统。每一个艺术家在他所提供的“单元模式”中，都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浸透着传统的“内在因素”，这是他自身存在的前提。传统应当被理解为“内在因素”所贯穿而又彼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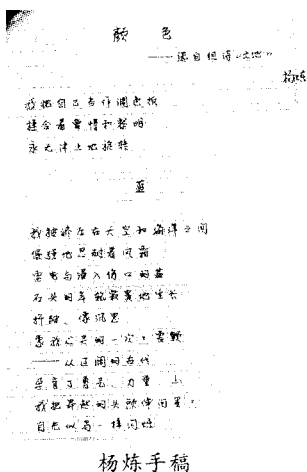
立的“单元模式”系列，像一列用看不见的挂钩连接起来的火车，活在我们对自己环节的铸造中，并通过个人的特性显示出民族的特质。

所谓“内在因素”和“单元模式”，是我在探讨传统时设计的两个词语，前者指那些摒除了单纯外部特征后面使传统仍然成为传统的东西，后者指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融合各方面因素而自成的艺术风格。例如：当我们探讨屈原这个中国伟大诗人的“单元模式”时，不仅会注意他所独具有许多艺术特色（既他与同代或以后的伟大诗人们不同的地方），而且会注意到他与其他同代或以后的伟大诗人们相同的地方。具体地说，当屈原通过《天问》、《离骚》等诗篇，强烈地表现出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直接把握的要求，成功地赋予这种要求以一整套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象征体系，并构成巨大审美快感时，他就在本质上完成了他重新发现传统的任务，他最具特色的变革恰恰使他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传统本身：楚文化中最具魅力的神话——巫术体系的“内在因素”。

同样，在远距屈原数千年之后的我们这里，形成贯穿着传统“内在因素”的单元模式，也依然是每个艺术家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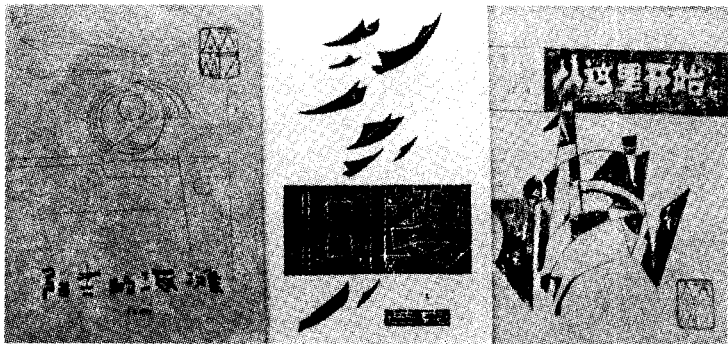


杨 炼



强调传统的意义并非企图仅仅以此判定艺术品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过去的”标准能用来衡量“今天的”东西。强调传统就是强调“历史感”——这个名词尽管早已为人所知，但可惜还未能能在创作中充分得以体现——强调对于艺术进程中应当扬弃或保持的不同部分的清醒认识，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在”。“现在”只有在与“过去”相比较的时候才有确切的意义，而盲目、怯懦的人们往往无视这个根本命题。同出于一种无知的人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抛弃传统”，有的人自命不凡地宣称自己“反传

传统”



北岛、芒克、江河自印的诗集封面。

统”。结果是相同的,因袭伟大祖先的外表服饰并不能就成为伟大的后代(一种丑角?);而无休止地模拟外来影响也变成另外传统的笨拙俘虏;两者从不同方向同时进行着消失自己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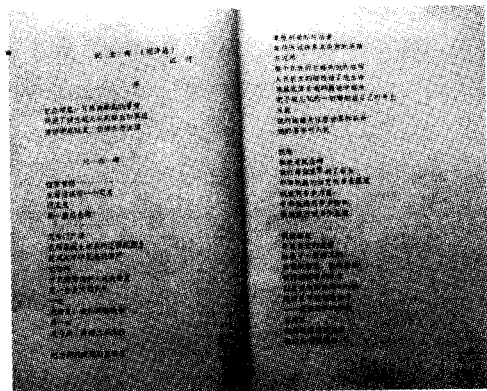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要建立些什么?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必须进行新的综合,诗的威力和内在生命来自对人类复杂经验的聚合。诗歌传统的秩序应该在充分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有机加入后获得调整。再没有比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但古今中外的大师们所付出的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艰巨劳动。

必须千方百计地占有知识,从而拥有供分析、比较的基本原料,把握永远在变化、发展而又具连贯性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到、发掘并确立那些在历史上与我们相呼应的东西,从纷繁复杂的来源中提取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核”,这就是曾

聚会场景:江河、芒克、严力、马德升、白天祥(法国人)(1980)。





登载在《今天》上的江河名作《纪念碑》，后这首诗发表于《诗刊》，刷新了政治抒情诗的传统理念。

被称之为“成熟的智慧”的那种能力。智慧不是聪明，这两者本质上的区别在于聪明始于单纯，终于浅薄；智慧始于复杂，终于深刻；聪明或许会以某种先天性的新奇感受耀人眼目于一时，智慧却首先是丰富的经验，刻苦地追求和最终形成的坚实的思想结构。我以为如果没有内心的充实，所谓感觉纯属一种幻影。只是在成熟的、具有坚强意识的极少数艺术家笔下，鲜明的形象才正确地被赋予读者感觉的意义。只有这样，“创造”才是一个事实。

我们谈到分析、比较，这里应当提倡某种“批判精神”。诗人应当具有对自身需求的敏感，而汲取知识以满足需求却不是无选择的。艺术家只有在能透过言辞的外表效果而洞察作品“内重量”时才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正因为如此，列宾对马雅可夫斯基赞不绝口，罗丹酷爱苏狄阿斯，艾略特从但丁的诗中引申出一整套艺术本质的深刻感知挽起了手臂。另外，我们确实看到，一些诗人在写出最初引人注目的作品之后，很快就被自己无休止的复制“稀释”了，这也是缺乏批判

精神的表现。对于诗人自己的历史来说,这种“批判”更为重要。诗人的一生,应当是自我更新的一生,既不怕打破旧有的平衡,又不断追求在更高水平上的新的平衡。“批判精神”是汲取的前提,“自我更新”是创造的必然。不断更替的充实和空虚,蕴藏着诗人成长的全部奥秘!

面对当今诗坛,我要说:有些口头上大谈其如何忠实于“传统”的人未必懂得“传统”,他们仅仅满足于作隔日雷鸣的微弱回声;而一味凭借个人直感,以为这样就可以“反传统”的人也终将因根不固而叶不盛,很快凋敝于他所轻蔑的土地上;这两种人都忘记了,所谓“自我”既不仅是个人本能的冲动,又不仅是集体共同的法则,恰是此二者的融合。艺术追求必然同时体现个性和整个传统的总趋向。

那么,要真正地坚持传统,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我认为首先应明确自己诗的位置。假设有这样一个坐标系:以诗人所属的文化传统为纵轴,以诗人所处时代的人类文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为横轴,诗人不断以自己所处时代中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反观”自己的传统,于是看到了许多过去由于认识水平原因而未看到的东 西,这就是“重新发现”。就像当我们追求

母 母 是 谁 的 曲

1215

如果大地在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真理
谁还高谈阔论,谁还会
在梦里遨游
寻找遥远的星辰
谁不愿去
每天
都是一种诗
每个字都是一颗星
谁不愿去
谁不愿去
谁不愿去
谁不愿去

江河手稿

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既呼应、又抗拒的“诗的世界”时，在屈原一系列伟大诗篇中所找到的印证一样，那些被先辈们的天才早已珍藏在作品深处的宝藏，将因为新的才华的注入而焕发光芒。处在“坐标交点”上的我们的诗，也因此具有了某种自觉的“纵深感”：两个领域互相渗透，使它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

这篇短文来不及进一步探讨传统“内在因素”的具体问题，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分子不妨列举一些饶有兴味的题目：如中国独特的象征体系（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从这一点出发对《易经》作过细致探索）；中国哲学、艺术、宗教中反复强调的客观、综合和超越性（超功利性）；自然诗观和自然意象（中国诗中独特的视觉语言——多层次具象感知）；诉诸读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意识冲动”；屈原诗中有机的复合结构；过去轻率地以“玄学”弃之的“悟”与“静”等典型东方思维方式，各家众多构成中国诗特性的具体技巧等等。一首意义重大的诗应当首先对于文学有所贡献，而不是仅仅愉悦一下这群或那群听众的耳朵。

传统，一个永远的现在时，忽视它就等于忽视我们自己；发掘其“内在因素”并使之融合于我们的诗，以我们的创造来丰富传统，从而让诗本身体现出诗的感情威力；这应成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我们占有得越多，对自身创新的使命认识得越清晰，争夺的“历史空间”也越大。

传统在各个时代都将选择某些诗人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是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光荣。

蔡其矫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时间：1998年7月28日下午

地点：北京东堂子胡同59号

人物：蔡其矫，81岁，著名诗人。

采方者：廖亦武、陈勇

问：在老一辈诗人中，你和“今天”派这帮年轻人接触最多，是吧？

答：是的。大概在1974年，艾青从新疆来到北京治眼病，因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没有人理他。他住西单一个妹妹家。那时候只有我跟他来往。我是到艾青那儿去，经艾青介绍认识了北岛，可能是在1975年。在这之前，北岛也认识牛汉，所以也带着认识了牛汉。“今天”派的舒婷是我在福州认识的。1973年她从乡下回来，我的一个学生说她的诗写得很好，把她的诗抄给我，我们就开始通信了。我把一些香港来的外国翻译作品、诗寄给她。这样，1974年在厦门我们就见面了。1977年她就来北京找我，我带她认识了北岛，北岛又带她认识了一些北

京的朋友。

问：舒婷那个时候写了些什么诗呢？

答：舒婷那个时候在乡下一个叫上杭的地方。她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来北京后，在一些聚会上，大家更多的也是玩，也有朗诵的，舒婷就朗诵何其芳的诗。《预言》是何其芳 30 年代的诗，舒婷抄了整整一本。开始写的《大海》、《泪珠》等诗作基本上受何其芳的影响。



1980年7月，艾青（右）、严辰（中）、蔡其矫（左）在“青春诗会”上与青年人座谈。

问：你能介绍《今天》第一期的情况吗？

答：《今天》首期首篇是我的（指诗歌）。因为当时我跟他们年龄不一样，北岛就替我用了一个化名叫乔加。第二个就是舒婷的《致橡树》。这首诗是舒婷来北京后回去再寄给我的。我拿给艾青看，艾青十分欣赏，给北岛看，北岛就要去用了。第三个是芒克的诗，第四个才是北岛自己的《回答》。首期主持芒克算是北岛最好的朋友。编辑部有罗范生、芒克、北岛，还有三个大学生，大概六七个人的样子。像黑大春就是后来的了。

问：江河、杨炼和顾城何时加盟今天派的？

答：江河是在“星星美展”前就参加了“今天”派。杨炼是来“星星美展”参观以后，写了一首诗。杨炼那时写的诗还是民歌体，50年代很通俗的那种。还有顾城也是来看“星星美展”，这

样他们也参加了“今天”派。“今天”派通过“星星美展”吸引了不少人。

问：哦。

答：“文革”后期，“今天”派这些人主要是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的黄翔来北京贴诗报，对他们有一定影响。后来有了西单墙，才有了《今天》。《今天》出了三期就被取消了。取消后，他们继续，不张贴，就一本一本卖。一本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也很贵啊！一期也能赚个几百块钱。徐晓就是在这个时候卖《今天》。她是师大的，早期可能跟江河有联系。卖刊物收入，每个月就给芒克几十块钱。当时最困难的是芒克，芒克是一个工人。江河也是一个工人。杨炼是文工团的。顾城有父亲养他。那时还有黑大春，卖过《今天》。

问：你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吗？

答：没有。

问：记得在1979年过后，《诗刊》登“今天”派诗人的诗还是登得很多。

答：1979年底，《诗刊》召开了一个“第一届青春诗会”。舒婷来了。本来也有北岛的名字，后来北岛让给了江河。

问：“第一届青春诗会”的名单是怎样定的？为什么要请这些人？

答：邵燕祥比较好，他知道这些人。《致橡树》为什么会传开呢？是邵燕祥弄到《诗刊》上发表了。

问：后来还有《回答》。

答：也是他呀。他先是编辑部主任，后是副主编。

问：“第一届青春诗会”的阵容是最强大的，“今天”派的舒婷、江河、顾城都是那届的。而且还有王小妮、徐敬亚……

答：还有杨牧、梅绍静。

问：是邵燕祥定的名单吗？

答：邵燕祥是编辑部主任嘛。讲课是王燕生请我去的。

问：也就是说内部安排是王燕生？

答：对，王燕生也不错。那时柯岩是支部书记。

问：柯岩思想相当古板，他没有干预吗？

答：开始没有。“第一届青春诗会”完了就开“全国第一届诗歌座谈会”，我去参加了。那个时候柯岩还不错，讲一天课，她上午听，下午还听。后来可能形势对那批人不行了，慢慢他才对这些东西有所阻止。开始能在《诗刊》上发表的东西后来就不行了。后来把他调到作家协会去了，没有别的名义，就是一个理事。

问：那“朦胧诗”之争是什么时候？

答：大概是1979年以后，就是艾青率诗歌访问团南下访问回京以后。这时他已经有地位了，就……后来仍然比较好嘛。

问：那是怎么回事？他在《光明日报》批“朦胧诗”了？

答：他（指艾青）30年代就批过何其芳，虽被打成右派了，但他本质上是古的。他到日本去开了个什么会回来。就完全是官方口吻了。他有了地位后，就慢慢显出他的古了。这是官方意识对他的影响，所以他就反对“朦胧诗”。

问：那“朦胧诗”之争跟艾青还是有很大关系？

答：当然啊。很多人，包括绿原也反对。但当时大家都很生气，干吗要把学术问题往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引？北岛一首诗《彗星》是写爱情的，被当政治诗批判，攻击“今天”派。杨炼的《诺日朗》也被当政治诗，这些都是乱来呀！我和艾青本来是好朋友，他在落难时我们接触比较多，“朦胧诗”之争后我们就渐渐疏远了。

江河
徐味鹤
徐敬亚
才树莲
顾城
陈武巨
孙武军
杨炼
高代林
林莽
食指
芒克

1980年7月20日，第一届“青春诗会”十七位青年诗人的签名。

问：对。你是和这帮年轻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位老诗人。

答：我比较倾向于年轻一代。

问：后来听说你显得比较超然了，喜欢旅游，是吧？

答：对，写一种比较隐蔽的东西。朦胧就是要隐蔽嘛。写个性化的东西，与主流文化断裂。林莽是从白洋淀来的，后来把食指也算成朦胧派了。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食指是“相信未来”的，北岛他们是“我不相信”，这是很不同的。食指代表了大部分人，那时上山下乡，他虽然看到了一些现实，但他还相信将来会好。北岛这些人不一样，他已经是不相信了，他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一点，他们程度上是不一样的。芒克是从白洋淀来的。北岛写的一篇小说《波动》，那个男的基本上是芒克的影子，女的是史宝嘉的影子。芒克虽然后来不太有名，但他是元老，最早的。这几个主要人物舒婷有古典的基础，而北岛没有。从传统来说，舒婷有她的优势，她的祖父是秀才。从理论上来说，江河比较优秀。北岛各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传统不行。杨炼是写东西很快，非常聪明，但变化很大，有些时候，他甚至把外国的东西弄进诗歌里面来。顾城很主观，根本没有生活。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后 记

老实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与我原想策划出版的“那一本”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我非常喜欢它现在的样子。

1998 年 9 月 8 日，为编书忙得热火朝天的廖亦武突然被迫离京。临行前，将尚未完稿的 40 余万文字连同收集到的照片、信件等原始资料统统交给了我。致使本来很正常的“约稿、交稿”程序凭添了几分“悲壮”。

翻看内容，里面名人济济，但高谈阔论之腔并不多。不难看出：还原历史、客观公正地记录当事人的经历是《沉》书唯一追求。也就是说，校对时只改错别字不行。这使得“圈外人”对此无能为力。

我通过周忠陵向徐晓（现为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求援，后又设法找到了林莽（诗人，《诗刊》编辑）、唐晓渡（诗歌评论家，作家出版社编辑）等当事人。得到了他（她）们的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特别要感谢《今天》的老成员李楠女士（我们只通过电话），她在无偿为本书校对的同时，也为本书提出了重

要删改建议。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校样返回时,稿纸上布满了她娟秀、清晰的字迹和后来返回的校样上各种规范的改、排版符号。怪不得徐晓向我推荐李楠时说:“她是赵一凡培养的校对”。也正是因为校对认真,最后终审时,出版社只划掉两篇文章(其它原因)其余只字未动。

我与本书责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资深编辑张德茂先生,是98年10月在西安开第九届全国书市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正值《沉》书第三次遭北京××出版社退稿(前两次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出版社)。绝望之际我便“有病乱投医”了。闲聊中得知,张德茂老师已年过半百,曾经也写过诗(主流的东西)。他非常喜欢朦胧诗,也很同情朦胧诗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一点可以从他为争取本书的出版,在报选题时,几乎是噙着泪水朗诵食指的作品《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看得出来。张德茂先生的真情流露,使得当时在场的出版社领导和其它同事无不为之动容,而我却担心安装在张老先生体内的心脏起搏器,是否能承受得了他突然加速的心跳频率。

三个月后,我在北京接待了令人尊敬的张德茂老师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年轻有为的社长韩全学先生。他们正式通知我,《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的书稿,经报新疆新闻出版局审批后通过了。

我在举杯祝张老先生、韩社长身体健康的同时,也真诚地祝愿《沉》书不会像它所记录的当事人们那样多灾多难。

(注:上文提到的出版社未能通过的两篇文章是:黄翔的《三次进京有感》、《今天》读者来信数封。在此深表遗憾。)

张 明

1999年4月2日